



國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

錢

穆著



內 容 簡 介

本書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之最後一編，皆屬有清一代。惟作者於五十年前早有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此冊各稿，皆在其後。前書所重偏在學術，以乾嘉經學為中心；此書所重偏在思想，極多為前書所未及者。最後康長素、章太炎所取材料，多涉及民國時代，有考論民國以來七十年之學術思想者，窮源溯本，此兩人更為不可忽。而中國四千年來學術思想傳統演變之所及，則此書實為其殿。承先啓後，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誠為有志於此者所當研玩也。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

錢 穆 著



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基本定價 肆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錢 穆
發行人 莊 剛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序

序

此爲余彙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之最後一冊。初，余在民國二十年秋始赴北京大學任教，即開設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講論有清一代之學術。越二年，全部講義成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距今已四十餘年。稿既成，又獲戴東原孟子私淑錄一種，乃戴氏未刊之稿，又章實齋未刊稿二十餘篇。時日軍已占北平，余藏其稿於衣箱之底，輾轉自天津抵香港，携赴衡山南嶽，又轉自昆明携赴成都；始刊布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有關章氏各稿，嗣經大陸再版，又分散入章氏之文史通義中；而戴氏一稿，則抗戰勝利後，迄未爲人注意，今以附刊此集中。

又余在成都，受政府之命撰清儒學案一書。時政府擬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其前三朝分囑他人刪約黃全兩學案爲之；清代以諉余，定時限，定字數。余在成都郊外賴家園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窮日夜之力依約草成。時適有友成都新識彭雲生教授亦治理學家言，赴西安，余懇其代搜有

關清代關學各家成書。雲生覓得近二十種左右携返，有清一代關學材料幾備，其中極多外面未流傳者。余撰學案此一部份，最自愜意。又余爲李二曲撰新年譜，凡二曲一生思想著作，分年編入，所化精力爲尤多。又余從四川省立圖書館及賴家園某氏藏書中得遍讀甯都七子之各書，自謂此一編亦甚得意。其次則爲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亦提要鉤玄，頗費苦心。竊意學案一書，此三編或稍有價值。惟其時生活，備極窮窘，中午喫麵湯，晚餐進稀粥，終未得白米飯入口。稿成不及另鈔副本，卽郵寄重慶國立編譯館。不意其他宋元明三朝學案之節本皆遲未交稿；而編譯館擬俟全稿交齊始付印。而日軍忽投降，勝利還都。余之學案一稿，乃由編譯館雇船載返南京；有數箱書中途沉沒長江中，余稿亦在內。僅有序目一篇，余寄稿前錄存，曾刊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內，一鱗片爪，姑供想像者惟此已。

及余既撰朱子新學案，又草寫研朱餘瀋一書。其前諸家均已散入本編之第六、第七兩冊。此編所收，如顧亭林、呂晚村諸人，於學術史爲重見，但寫法微有不同；如陸桴亭、王白田諸人以下，則於學術史後又重寫。又有舊稿如顧景范、崔東壁諸篇，乃在北平舊作；本編最後章太炎一篇，則應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紀念所寫，彙收於此，先後亦逾四十年矣。回念前塵，不勝惘然。余患雙目不能見字，及今已近兩年。此編各稿皆由及門何君澤恆代爲搜集，又代校字；積年陳稿，已不能親讀一過，一仍其舊，未能續有所改定，幸讀者諒之。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孔子誕辰前兩週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目次

序

一、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一
二、讀朱舜水集	一二
三、陸桴亭學述	二〇
四、顧亭林學述	五二
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	七四
六、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	一〇四
七、跋嘉慶乙丑刻九卷本讀史方輿紀要	一一〇
八、陸稼書學述	一一六
九、呂晚村學述	一三五
一〇、讀張穆著閩潛邱年譜再論尚書古文疏證	一五〇
一一、記姚立方禮記通論	一六四

一二、續記姚立方詩經通論	一八二
一三、王白田學述	一八六
一四、記鈔本戴東原孟子私淑錄	二〇六
〔附〕 孟子私淑錄	二一三
一五、讀姜白巖尊行日記	二四一
一六、錢竹汀學述	二四三
一七、讀段懋堂經韻樓集	二六四
一八、記鈔本章氏遺書	二七四
一九、崔東壁遺書序	二八三
二〇、讀古微堂集	二九五
二一、羅羅山學述	三〇九
二二、朱九江學述	三一九
二三、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	三二九
二四、餘杭章氏學別記	三四二
二五、太炎論學述	三四八
二六、清儒學案序	三六四

一、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有清二百六十餘年的學術思想，可分兩個階段：自世祖順治入關起至乾嘉時代止爲前期，自道咸起至清室覆亡止爲後期。前期一百七十餘年中，正值滿清政權鼎盛之際，清儒在異族政權嚴厲統治下，於刀繩牢獄交相威脅之艱難環境中，雖有追懷故國之思，而懾於淫威，絕不敢有明目張膽之表示。途窮路絕之餘，不得不沉下心情，切實作反省研尋功夫。而多數學者被迫走上考據訓詁的消極路線，終生於叢碎故紙堆中，追求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少數較爲積極的學者，於研究經史義理之餘，直覺的或非直覺的披露了他們潛在的民族意識，或迫於良知，以一吐在喉之鯁爲快，爲被壓迫奴役之平民階層一抒正義之聲，對當道之統治政權，隱約晦昧的提出了批評的主張。此輩思想家乃在清代早期，開拓了一片新天地，其精神直可上追晚明諸遺老，間接承襲了宋明儒思想的積極治學傳統。道咸以後的八十餘年，則屬後一階段，一方面滿清政府的統治勢力，

隨着對外戰爭之連續失敗而日趨衰微，一方面西方近代政治思潮，隨着外國勢力之東來而源源侵入，由於上兩項因素的影響，乃使晚清儒家思想，爲之丕然大變，首倡變法之議的康梁以及領導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可爲本期之代表。本文僅就前期清儒爲思想界所拓之新天地，作一概括之解釋，至於晚期思想，則不在討論之列。

清儒學術，直承晚明而來，但未依晚明的路向發展。在晚明諸老心中，藏有兩大問題，一是宋明儒的心學，愈走愈向裏，愈逼愈渺茫，結果不得不轉身向外來重找新天地，這是學術上的窮途；另一則是身世上的窮途。晚明不比北宋初，正當宋代無事將及百年，社會文物隆盛，他們不甘再沒溺於道佛方外消沉的圈子裏，一時翻身來講人文大羣政治教育一切積極事業。他們心中只知道回復三代孔孟，這是全部樂觀的；晚明諸遺老則不然，他們是亡國之餘，孑遺的黎民，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政治教育各方面都想從頭有一番仔細的認識，到底那些是有真正價值確可保存或發揚的，那些是要不得的，當前大禍，究竟由何招致，均須加以思索研尋。因此北宋初期的心情是高揚的喜劇式的，晚明諸遺老則是低沉的悲劇式的。北宋初期常見其昂首好古，只要把三代孔孟來代替魏晉隋唐與釋迦達摩，他們的心情常見是情感的，宗教的，與經學的。晚明諸遺老則在途窮路絕之際，重回頭來仔細審量與考察，他們的心情常是理智的，社會的，與史學的。但是晚明諸遺老的學術路向卻並未能順遂發展。第一是滿清的部族政權，很快安定下來，社會有秩序了，民生轉入順境，又朝廷刻意牢籠，威怵利誘，把一輩讀書人盡要拉入政治界，雖不斷有極度

慘酷的文字獄興起，但晚明諸遺老的悲劇心情到底是逐步消散了。而且拉入了政治界，又不許你認真作政治活動，只要你消極順命，不貪污，孤立安本份，教育更講不到，只須你應舉守法，如此則自不許你認真用理智頭腦來講史學。晚明諸遺老的史學，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理學，亦可說是一種新理學，他們要用史學來救世教人，現在則世已太平，人已安業，大家上奉朝廷法令，應科舉，守官職，一切有滿洲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禍殃，晚明諸遺老一片史學心情到此無可寄託。心情變了，學術如何能不變？但此下沒有大氣魄人來領導此學術之變，而且他們內心深處並不是要變，只是外面環境逼得你走委曲路。這有些像魏晉王弼何晏講儒學，阮籍嵇康講老莊，全是沒氣力，由外面誘導擺佈，並非內部激發推動，晚明諸遺老的史學，於是到清儒手裏便變成一種專尚考據的經學了。

經學本來帶宗教氣味，中寓極濃重的人生理想，但清儒經學則不然，清儒經學，其實仍還是一種史學，只是變了質的史學，是在發展路上受了病的史學。經學在外面是準則的，在內面是信仰的，因此治經學者必帶幾許宗教心情與道德情味，但清儒經學則是批評的，他們所研究的幾部經籍，只是他們批評的對象，他們並不敢批評經籍本身，卻批評那些經籍的一切版本形式與文字義訓。所謂文字義訓，亦只是文字的訓詁注釋，尤其是在與人生道義與教訓無關的方面。換言之，是那些隔離人生較遠的方面。他們治尚書，並不是爲的政治楷模；治詩經，並不是爲的文學陶冶；治春秋，並不是爲的人事褒貶；治易經，並不是爲的天道幽玄。他們只如史學家般爲幾部

古書作校勘與注釋的整理工作。再換言之，他們只是經學，而非儒學。東漢經學還有儒生氣，清儒經學則只有學究氣，更無儒生氣。總之是不沾着人生。他們看重論語，但似併不看重孔子。他們只看重書本，但似不著重書本裏所討論的人生。這如何算得是經學呢？

清儒研經之外，亦治史學，但他們的治史，也像他們的研經，他們只研究古代史，不研究現代史。他們只敢研究到明代為止，當身現實則存而不論。他們的治史，亦只爲史書做校勘整理工作，卻不注意史書裏面所記載的真實而嚴重的人事問題。清代學風，總之是逃避人生。魏晉南北朝時代之逃避人生是研讀老子釋迦，清代的逃避人生是研窮古經籍。

但清儒到底也有耐不住的時候，或者是他們的不自覺而對人生問題有所論列，則他們亦有一共同態度與共同意見。他們大抵反對擡出一個說法來衡量一切或裁制一切。換言之，他們反對思想上的專尊，或說人生理論上之獨斷。他們大抵主張解放，同情被壓迫者。他們的氣味，寧是反經學的，至少是非經學的，所以說經學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

清儒思想之常主解放，同情被壓迫者，可舉戴東原與錢竹汀兩人爲例，此兩人乃乾嘉盛時最標準的學者。戴氏偏尚經學，錢氏偏尚史學，而兩人都抱有一種平民的同情，解放被壓迫者的情調。錢竹汀經史小學無不精擅，其學卓絕一時，其集中似乎很少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問題，此處特舉錢竹汀，正好做一個不自覺而流露其思想態度者之代表。至戴東原則高言放論，可謂是一位耐不住而披露其思想態度之代表人。錢竹汀有春秋論，謂春秋誠是一部褒善貶惡的書，但其褒善貶

惡，只在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用不着另有筆法來做褒貶。他說：「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如此則豈非史書褒貶，正好在不褒貶，只直書其事以待後人之自下評判。這是何等平恕的見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並與錢氏同此見地。）竹汀又有大學論，謂

大學書與論語忠恕一以貫之之旨，若合符節。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非忠恕之道。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

這又是何等平恕的政治理論。其實照此理論，根本即不認有自上治下的政治。竹汀又論尚書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作容，鄭玄作睿，竹汀謂未必鄭是而伏非。

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潛研堂文集卷五答問二）

今按此條殊可注意。據段玉裁說，思曰容乃今文尙書，思曰睿乃古文尙書，此屬古書版本異同。惟人之思想究貴深通，抑貴寬容，此則非關訓詁，實乃一極重大之人生問題，即所謂義理問題也。以常識言，既曰思想，自當主通，不當主寬。寬是屬情感態度方面的字，不是屬思想理智方面的字，故段氏說文解字注徑爲許叔重改字，不用思容也之原文，這是有理由的。竹汀亦小學訓詁大師，此處卻不免違背了他們當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主張，要據義理來決定訓詁。他告段玉裁說，若曰思主於睿，則恐失之刻深。（語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已明明透露了竹汀自己對人生問題的見解。清儒常笑宋儒主觀，此等便是清儒亦不免於主觀處。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等語，宋明儒最所樂道，故宋明儒所唱，乃人生之高調，清儒則對人生好唱低調，乃說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只在此心能寬容。這樣的大口氣，大理論，到清儒手裏，只是平民化了，做了他們同情弱者的呼聲。但在竹汀書裏，如此等處，不過偶一吐露，不易多得。他們常常逃避此等問題，不肯傾吐直說。惟戴東原則不然，他竟大聲疾呼，公開地表示他的意見，遂有他的晚年名著，孟子字義疏證。疏證中最大理論在其分辨理欲，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謂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

而不顧之謂理。

宋儒程子朱子，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骸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

又曰：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罪，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

這些都是東原極憤激的話。其實他的立場，還是極平恕，還是同情弱者，爲被壓迫階層求解放，

還是一種平民化的呼聲。換言之，現在講經學，是社會的，不是宗教的。是學者的，不是教主的了。若我們再深一層求之，則清儒此種對於傳統權威之反抗精神，其實還似有一些痕跡可見其爲沿襲晚明諸遺老而來。但他們的敵意，他們對上層統治者不能正面發洩，遂使他們的攻擊目標，轉移到宋儒身上。在晚明遺老只埋怨晚明儒學術誤國，現在則責備宋儒理論爲上層統治者張目，作護符。他們只是卑之毋甚高論，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諸儒之一般意見，而非東原個人的哲學理論也。如上引，東原明指今之治人者云云，則情見乎辭，此亦是一種不自覺之流露也。

清儒反對宋學，一面固因他們新得了許多考據訓詁校勘的法門，確然在古經籍的整理上，可以越過宋儒。再則宋明儒是承接著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長期的道佛思想瀰漫之後，而刻意要爲中國政治教育各方面建立一正面積極的標準或基礎，而現在則宋明思想已成了學術界之新傳統，爲上層統治階層所利用，故乾嘉諸儒對當時統治權之敵意，亦以攻擊宋明儒爲發洩。所以晚明諸遺老對宋明儒的態度尙屬批評的，而乾嘉則幾乎近似反動。晚明諸遺老多半尙是批評陸王，乾嘉則排斥程朱。乾嘉的態度愈偏激，愈見他們內心波動之不自然。

總之乾嘉經學考據極盛時期，卻是他們內心極沉悶的時期。他們攻擊程朱，便證他們心裏之耐不得，重新要從故紙叢碎中回到人生社會之現實來。這一趨嚮，遂又從經學轉向史學。戴東原同時便有章實齋，樹起史學旗幟來和經學對抗，這依然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委曲之流露。據章實齋自己說，當時經學考據乃承襲亭林一派上接程朱。而他的史學則是承襲梨洲一派上接陸王。此種

意見，在近代學術思想史有稍深刻研究者，未必都能同意。但若求解放，則史學應比經學更解放。若求平恕，史學亦應較經學更平恕。經學未免偏向古代，史學則自應偏向近世。經學未免要立一標準，史學則自屬平鋪，事實即是標準，不須另外有標準。故在戴東原之後有章實齋，亦是清儒學風自身應有之趨勢。實齋云：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又曰：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

故實齋史學要旨在切人事，尤在切合當世之人事。所謂經世之學，即須切合當世之人事。但所謂史學切人事者，尤貴能爲複雜變化之人事籀出幾條公例，庶於當前可以應用，故史學雖求切當前之人事，而卻必還溯往古，乃始成其爲史學。史學必能爲人事籀公例，此即史學之義理。必於史學中見義理，此種史學乃可經世。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必稱堯舜，即史學也，而主性善，則由歷史籀出公例，即義理。發明性善之義理，豈非經世一大法乎？陸王心學，病在過重當前，

忽略了往古。實齋自謂浙東史學原於陸王，但實齋在當時，亦僅注意教人由博古轉入通今，由空言義理轉到切近人事，只可當作提出史學宗旨的一番導言，卻並未深入史學裏層。實齋說六經皆史，皆三代先王之政典，此固不誤，但彼謂：

學者崇奉六經，以爲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如此言之，豈不變成教人同樣地遵守當代專官掌故卽爲史學切人事乎？故依實齋之言，勢必轉成以時王制度爲貴，而譏同時學者以「但誦先聖遺言，不達時王制度，未必足備國家之用」。其實清儒學風，其內裏精神，正在只誦先聖遺言，不管時王制度。此一層，實乃清代學術之主要精神所在，所謂汲源於晚明者正在此。故戴東原錢竹汀，雖若消極逃避人事，其真源則確近晚明諸儒，還是認真人事，還有一種倔強反抗的意味。若實齋教人切人事，而歸於推尊時王，此在清儒學風中轉成反動，決非正流。亦可說是倒退，非前進。故實齋雖有心矯挽當時經學家逃避人生之不當，而彼所提倡，實未足與之代興。必須明得此理，乃可認識此下卽道咸以後之新經學，所謂公羊學派與今文學派之真意義。

道咸以下，清代部族政權之淫威，已漸崩潰，學者開始從逃避人事轉回到預聞人事。但他們自然不甘於貴時王之制度。那時新史學並未建立，而經學積業則依然尙盛，因此道咸時代的清儒，遂不免仍要借助於經學權威用來指導當前之人事。此一趨嚮，恰與乾嘉相反。乾嘉只求解

放，現在則求樹立。他們想借經學權威來裁制一切，此乃乾嘉諸儒內心所不取，抑且深所反對者。但道咸諸儒終於走上了這路。總之清儒學術，曲折紆回，始終未獲一條正當的直路，亦由此可見。

道咸諸儒要憑經學權威來指導當前，換言之，即是要把先聖遺言來壓抑時王制度也。這一要求，逼得清儒對經學的興趣集中到春秋，尤其是公羊家。因為他們有非常奇異可怪之論，有微言大義，可資借題發揮，有改制變法等明白主張，有對人事褒貶之大條例。本來此等都應向史學中耐心覓取，晚明遺老曾有此意嚮，惜乎中途折入乾嘉經學，退避到古典研討中去，未克盡其能事。現在則即以古典爲堡壘，對時王制度開門出擊。因此晚清公羊今文學派外貌極爲守舊，內心極激進，此非從學術思想之淵源處深細追尋，不易明也。

但此是一條夾縫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學派所理想，亦非浙東史學派之意見。考據義理，兩俱無當。心性身世，內外落空。既不能說是實事求是，亦不能說是經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學術走入歧道，早無前程，又經太平天國一番摧殘，學術種子刮地淨盡，正待後人全部的更生。而同時西學東漸，挾其萬丈狂濤，席捲囊括，使人無可阻遏，乃亦無可吸取，一時措手不及，內部的虛空加上了外部的衝蕩，於是乃有晚清之維新運動。這在中國思想史上，實在是一幕徬徨、迷惑、淺薄、錯亂的悲喜劇。

二、讀朱舜水集

朱舜水乃明亡後一大儒，梁任公曾按其生平，爲作年譜，一加誦覽，有典型不遠，精神如在一之感。惟恨甲申崇禎殉國，舜水年四十五歲，雖學已有成，而國事鼎沸，曾未有所表現之機會。此後四十六歲，卽亡命日本。五十八歲在安南，強毅方正，鎮靜不屈，幾罹殞身之禍。六十一歲之冬，始獲在日本定居。此亡國後十七年之生命，長在波濤崎嶇中，未獲一日之安，亦未有寸尺之展布。及其定居日本，至八十三歲而卒。隻身寄居異域，窮困譏讒，出乎尋常。而獲得當時日本上下之師事禮養，至其開啓此下日本文化之新生，乃在日本學人自治其本國史者爲之研考論定。惟舜水定居在日前後二十三年，雖其心存祖國，要之乃若完全是一日本歷史上人物，於吾中華故土，可謂關涉至少。然其品格之卓越，德行之淳至，則固純粹是一中華大賢之傳統，讀者一覽梁氏年譜，當可依稀得之。惟梁譜詳其行事經歷，略其學思傳承，今欲稍加補述，而所可窺見

者，亦只賸其居日後之幾許篇章文字，可資尋索。除其針對日方而發者以外，其專對祖國歷史文化學術演變有所闡申，殆實無幾。蓋其時尚在日方江戶初期，佛學風靡全社會，尊朱乃受韓國李退溪影響，其創始第一人，卽由釋轉儒，由僧回俗，彼邦其時學術界情況，卽據此一端可推。及舜水在日定居時，日人已知有陽明，已有朱王異同，亦知有儒釋之辨。舜水原籍餘姚，乃陽明同鄉，惟舜水頗不喜陽明之講學，既懲創於晚明之世風國事，其所追尋，乃儒學之大統，而志在經世，於當時理學家講堂錮習，門戶積見，實深排斥。今就其集中，專關此一態度者，稍加綴輯，庶以補梁譜之缺，而舜水一人，失於我而得之彼，其有關於此下中日兩邦治教之大，亦於此可爲治兩國史者揭示一消息，固不限於舜水一人之生平已也。

舜水文集有答佐野回翁書有云：

來問朱王之異，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戾，王文成何得輕詆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欲排朱子而無可排，故舉其格物窮理以爲訾議爾。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鷄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厄於張璁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託之於講學，不立異，不足以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僞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

是舜水於陽明講學，菲薄之意溢於言外，縱所譏彈不得謂正，要之其是朱非王之意則昭然矣。

又文集卷七答安東守約第三書有云：

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賢契慨然有志，真千古一人，此孔孟程朱之靈之所鍾，幸唯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至若以不佞爲程朱，不佞學問荒陋，文字龕疎，豈易當此。賢契求師之專，故以未似之有若爲似也。媿極媿極。

舜水慨論明季門戶講學之無當。東邦學人，尊舜水爲程朱，而舜水自媿爲未似。此固舜水之尊程朱，亦不願以所尊爲標榜而啓門戶也。

文集卷二十二雜著三，加藤明友問四書六經用何人注，舜水答曰：

朱子之注不可廢。禮以陳澧，易以鄭庠，（謂寧波府學校所用。）尙書用蔡沈。此其大略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經國理民，爲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惜舜水終老異邦，若此寥寥數語，能在祖國暢發其旨，對此下乾嘉學風能稍有糾挽，此於國瑞民福，將裨益何深乎？

問：僕素宗宋儒，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雅言，答：

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陽明之事，偶舉其說，非僕宗陽明也。幸勿深疑。

洛蜀之爭，亦宋儒之習氣。舜水深惡講學有門戶，故曰：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亦見雜著三。）

林春信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答：

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宏化，康濟艱難者也。

嗟乎！舜水用心亦苦矣。如高劉輩皆不得以巨儒鴻士目之，更何情爲之辨朱王門戶乎？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舊說所言，與朱晦菴所傳大異。答：

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是舜水之尊朱可知。若曰不敢以古戾今，則舜水又何爲是朱非王乎？傳註爲芻狗筌蹄，此與陸象山六經皆我註腳之說大不同，亦與乾嘉之必尊漢儒註腳大不同。

問：昨聞吉水太守問格物之義。答：

前答吉水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爲業，以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近之。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

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

隨時格物致知之說，羅整菴曾竭言之，不知舜水曾見其說，抑與之暗合耶。要之舜水論學，亦自明己意而止，不樂拘拘效經生。故亦不樂晦翁目龍川爲異端，然亦非是龍川而非晦翁也。

安東守約問曰：朱陸同異，不待辨說，明矣。近世程篁墩道一編，席元山鳴冤錄，其誣甚矣。然尊德性道問學，陸說亦似親切，奈何？答：

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是朱者非陸，是陸者非朱，所以玄黃水火，其戰不息。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陸，或從水。從陸者須一步一步走去，由水程者，一得順風，迅速可到。從陸者計程可達，從舟非得風，累日坐守。只以到京爲期，豈得曰從水非，從陸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也。

舜水不喜辨門戶，然明謂陸不能及朱，則意有偏尊顯矣。細讀舜水全集，可謂舜水乃一提倡儒學之人，非提倡理學之人。若以理學論，朱陸顯分門戶，陽明亦承此門戶者。但以儒學論，則象山成就顯不如晦菴。故舜水於理學上之朱陸異同，亦不再加深辨也。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爲宗主，如何。答：

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衣冠，是其病也。其徒王龍谿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爲異端。

舜水言陽明好處極多，乃指其功業言，陽明亦得爲一儒者，其講學乃其病處，卽據龍谿爲證，亦可不煩多指摘也。

又舜水告守約曰：

明道先生甚渾厚寬恕。伊川先生及晦菴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此亦舜水不喜後儒爭門戶，故有此語。

又文集卷二十三小宅生順問，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答：

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草，板蕩忠臣也。若王陽明，惜其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谿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辭擅聲，未足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弼州，猶少長於數子耳。

觀此，知舜水論學術、人物，並不拘拘當時之所謂理學家言。故以李夢陽王弼州與薛敬軒並舉，如陽明，先擊劉瑾，後擒宸濠，亦明代一人物，惜其多了講學一節，無限饒舌，於經濟民生，有何實補，此則舜水之意也。

問：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學，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如之何而可。答：

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卽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

足爲大儒否，果有關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果能以爲學修身合而爲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踪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臯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舜水論學大旨，重實功實用，又奉程朱爲準繩，則以爲學與修身必合而爲一也。如其以李夢陽薛敬軒並舉，李夢陽固非一理學家。又謂王龍谿何足復道，而王弼州猶少長於數子。王弼州亦絕不預於理學之流，然李夢陽王世貞名列文苑，要不失爲一儒者，故舜水稱引及之。舜水亦不樂於北宋洛蜀之辨。可見舜水論學，不拘拘於當時所目理學之樊籠也。後世奉程朱爲理學創始，然程朱在當時，特從孔孟經義求重昌儒學耳，其所辨對象，在專意文章詩賦與老釋異端之二者，不如後起反程朱者，更在古經字句間標新立異，重起門戶也。大抵舜水尊程朱，亦以其爲儒學而尊之，非以其爲儒學中理學一門戶而尊之。陸象山有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此乃在理學中爭門戶，舜水亦言，禹稷契臯陶伯益所讀何書，此乃於儒學中重實功實用，其意自不同。若以舜水擬之當時之明遺民，則其論學之意，當近顧亭林。亭林謂經學卽理學也，捨經學安所得理學哉。其意實亦不滿於陸王在理學中更創門戶耳。黃梨洲雖亦同時走上經史實學之途，然仍不忘理學中之門戶，此則與亭林舜水不同。惟舜水終老異邦，其學與亭林亦有異，乃頗多似於陸桴亭，在社會民生之實功實用上用心。亭林矢志不仕清廷，然身在北方，接近政治界，故其論著，多著意治平之大經大法，以待後起之新王。舜水在異國，桴亭在閭里，措意乃多在社會民間，更近程朱所提倡之格物。要之三人皆能言制度，亭林所重在政治制度上，桴亭舜水所重在社會民間制度上。日本

之得益於舜水者亦在此。所謂制度，皆卽古代儒家之所謂禮也。若專就此一點論，則桴亭對當時之影響，似遠遜於舜水。因舜水居異國，故其效特顯也。又如桴亭頗有取於明初之劉誠意，而舜水則不許方正學爲通才，（亦見文集卷二十二雜著三）亦兩人意趣相似處。朱子於古人尊陶潛，於時人尊岳飛，舜水於明末高劉，亦不許其爲巨儒鴻士，又豈得專就理學一標準裁量古今人物乎？至於乾嘉諸儒，乃標榜漢學以與宋學爭門戶，更無實功實用可言。陸王在理學中爭門戶，乾嘉在經學中爭門戶，惟亭林桴亭舜水，較更著眼孔孟儒學之傳統，故此三人，乃同尊程朱，而三人之爲學，亦各自不同，然此乃流派之不同，非是門戶之各別也。

三、陸桴亭學述

朱子學之流行，余所最心折者有四人。在元曰黃震東發，明則羅欽順整菴。明清之際，有顧炎武亭林及陸世儀桴亭。朱子之學，性理經史，俱臻於極。黃顧尤長於經史，羅陸更邃於性理。故亭林日知錄屢稱東發，而桴亭思辨錄則時推整菴。亦見其學脈所自之有辨也。然若言理學經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兼而有之，則桴亭轉若與亭林爲近。此亦晚明學風所趨，而兩人者足爲其表率。亭林日知錄分經術治道博聞三類，主經學卽理學，於性理闡申，似視黃羅陸三家較遜。言治道，則猶未泯詁經考史之迹。桴亭思辨錄，博聞差堪比肩亭林，殆已超出黃羅兩家之上。其闡明性理，則粹然考亭矩矱，所得似較整菴益勝。而其言治道，亦復原本經史，博究古今之變，而尤能泯化史學襍積。使讀者見其爲論治，不覺其爲論史。亦猶其言性理，使讀者惟見其言人生日常，而不見有理窟之勃窣。比擬思辨錄於東發之日鈔，整菴之困知記，亭林之日知錄，所詣固是在伯仲之間，而思辨錄一書，益見有清新特出之妙。陳辭措意，脫落恒蹊。稱心而道，

擺盡纏縛，別開生面，洵不可多得之書也。

桴亭值易代之際，畢生未涉仕途，與亭林相類似，而聲光闇淡尤過之。全祖望始爲之作傳，謂國初儒者，曰孫夏峯黃梨洲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邃。下迄清季，羣稱晚明三大儒曰亭林梨洲船山，於桴亭亦少稱述。惟其太倉同邑唐受祺彙刊其遺書二十一種。唐文治蔚芝主辦無錫國學專修館，思辨錄亦重加印行。余前在大陸所讀卽唐氏本。抗戰時在成都，草爲清儒學案，桴亭一案卽據唐本。惜此稿勝利回都時沉沒江中，今重寫此文，所據乃張伯行刊正誼堂本，及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四庫本，唐本則不可見，並其梗概亦無可追憶矣。

考思辨錄乃桴亭隨筆記述，始於二十七歲時。文集有再答張芭山書，謂辛丑之冬，遭大變，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如石索弟書鈐刻，遂竟授梓。又謂弟承尊諭，宜嚴訂定，毋輕授梓八字，銘之心腑，冒昧一刻，未及論定之憾，知他年不能免矣。辛丑桴亭年五十一，則其書乃桴亭生時親手交刻者。又其書付刻，卽名輯要，每卷前題其同學友江士韶藥園盛敬聖傳同輯，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爲前集，共二十二卷。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目爲後集，共十三卷。前後集共三十五卷。葉調生吹網錄云：卷首有張能鱗序，作於順治戊戌，言原書四十餘卷，選輯僅十之三四。戊戌桴亭年四十八，是此書早有刪訂，必是桴亭自爲之。江盛之名，殆是付刻時加入。其答芭山書，特表其謙沖之抱之未以自滿耳。惟今思辨錄後集，有出辛丑後者，

如丙午論性毘陵諸條，最爲顯著，是則辛丑後又續有增入。丙午下距桴亭卒尙五年，思辨錄是否丙午後猶有增入，則不可知。其子允正所爲行實，稱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已刻，後集二十二卷未刻。則殆是賸稿，桴亭所未欲刊行也。又有桴亭門人毛師柱增輯書文詩歌雜說三類，則是從未刊稿中增輯之也。

又考思辨錄輯要之刊行，在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張伯行正誼堂本則刻在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前後相距已五十年。至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開四庫館，又後五十餘年。其所采乃正誼堂本，提要謂其非世儀之完本，不知完本實未行世，當時四庫館臣似於辛丑始刊本未獲寓目也。

此後道光十七年丁酉，安徽督學使者沈維鐫又覓得太倉王寶仁藏安義舊刻，爲之重刊。光緒三年丁丑，江蘇書局又據張本沈本校刻。應寶時爲之跋，謂張本舛誤不一，據沈本校正，其重出者悉刪去。余今仍將此兩本逐卷校對，乃知張本實全據安義輯要本。序謂得桴亭思辨錄一編，爲之重訂行世，其所得實卽是思辨錄輯要。其曰重訂，亦頗未見有重訂之工。以張本校安義本，偶有遺漏，不似刪削。而第六卷下半，兩書相異，更不知是何故。要之此卷張本遺脫爲多，並有兩條合爲一條，未加分辨者。此篇僅事選錄；將來儻有人能將江南書局本與無錫國學專修館本重事校勘，勒成一完善之定本，則甚幸矣。

桴亭之學，一本朱子，觀其思辨錄輯要，分門別類，廣博浩瀚，乃儼如朱子之語類。雖論其

質量，若有未逮，要之爲朱子以下所未有。其爲學規模，實可謂是朱子之具體而微也。

桴亭之論學有曰：

爲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尙經濟則趨於權譎，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爲喪志，朱子以伯恭爲眼蠱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揚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辭藻，盧駱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胥無主宰，到處差錯。

桴亭之學，於此五者，皆所涉獵，然皆能祛其弊而見其大，可謂卓然不失爲道學之正統矣。然桴亭之論道學則曰：

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也。

又曰：

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又曰：

天地間只有此箇道理，人人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橫爲蔡京章惇韓侂

胥輩分出箇門戶，目爲道學。甚至著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說道學當統攝一切學問，非可外於一切學問而自立一道學之門戶。在前惟朱子有此見解，在後惟桴亭具此識趣也。

故又曰：

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

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爲人，盡人道。

桴亭抱此意見，乃於晚明之講學家，甚表不滿。故曰：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

又曰：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誚。

又曰：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

既曰道學卽是爲人之學，而此等皆不在爲人之務之外，自亦不得謂其當在道學外。可見桴亭論學觀點，致廣大而盡精微，會性理經濟而一之，實與向來一輩道學家不同，洵不失爲朱子學之正統嫡系也。

桴亭講學，又有一端最可取者，在其不立宗旨。嘗曰：

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醫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

理學家皆不免喜立宗旨，而晚明尤甚。桴亭則力非之。思辨錄又曰：

昔朱子，人問以宗旨，朱子曰：某無宗旨，但只教人隨分讀書。愚亦曰：儀無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聖賢。

此卽桴亭在道學傳統中直承朱子之證。

或問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爲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爲貫串周匝，有根腳、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始覺得，非着意以此四字爲入門也。入門之法，只真心學聖賢耳。

又曰：

居敬窮理四字，畢竟是起手工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曰：尙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者，方是古今一大儒。

桴亭又嘗戒人，於朱子之說，但當申，不當闢。論爲學，貴能有根脚、有主宰，而又求有進步。朱子之學，卽桴亭爲學之根脚主宰處。有此根脚主宰，乃可求進步。故其學之於朱子，乃有申無關，如上所引皆可見。

桴亭又曰：

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此條見遺書淮雲問答輯存。桴亭論學，於陽明，龍溪，心齋，頗不滿。然亦特重在無善無惡之一義，其他亦多有申無關也。

桴亭又曰：

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

桴亭論學，主於兼體用，合天人，而尤貴於盡人以合天，達用以明體。故每自人生界上窮至於宇宙界。朱子以上，桴亭又推尊濂溪，奉此兩人爲其治學之最高標的。

桴亭極推濂溪之太極圖，謂：

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

尤於朱子理先於氣之說有深契。乃曰：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

太極在陰陽之先者，只是卽陰陽而推其所以然。不是另有一箇太極在前，生出陰陽來。

未有火礪之時，但無此礪之形，所以爲礪之理固在。

又曰：

整菴之言理氣亦固矣。卽氣是理者，以爲氣之中卽有理，非氣卽是理。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崑山魏莊渠見到。

整菴恪守朱子，亦多發明，明儒中當推爲朱學巨擘。惟失之辨理氣，此下諸儒承其失者不少。梨洲以王學立場，主張心卽理，乃深取整菴此辨。船山一本橫渠，在此問題上，實亦與整菴同調。桴亭雖極譽整菴，然亦時糾其誤。蓋不立宗旨，亦不立門戶，惟求其是，誠所謂卓爾不羣。而在桴亭當時，能剖辨及此者，殆已無人。亦可謂朱子之學，實亦至是而絕響也。

桴亭又曰：

理在天地之先，範圍天地之化。數在天地之後，曲通天地之情。明數之人，所以能事事前知者，以數合天地，非以天地合數。明理之人，所見在天地之先。以天地隨理，不以理隨天地。

二程爲北宋理學開山，然初不稱述及於濂溪之太極圖，尤於邵康節言數，閉拒不加講求。朱子始推尊濂溪，以爲乃二程之學所自出。又同推康節，稱之爲振古人豪。厥後理學家多知尊周，明儒如曹月川薛敬軒於尊周外兼尊邵。桴亭亦同時兼知尊邵。嘗謂易自康節發明，而易與數始顯。此條分別理數，一屬先天，一屬後天，自朱子後，剖析到此，精闢得未曾有。思辨錄中陳義，往往

舉重若輕，語極平淡，不見有苦心力索之致，亦復無博引曲證之勞，只是直抒己見，而真從深思明辨中來。具此規模，乃可當得述朱二字。此非精熟宋明兩代理學諸家源流派別離合向背之所在，亦不知其經千洗百鍊而獲此融會取捨調和鼎鼎之功也。

桴亭論宇宙界，終自推奉周朱，於康節橫渠各有評鶩。如曰：

張子知虛空卽氣，又曰太虛不能無氣，下語雖極精微，終不如周子朱子之劃然。

又曰：

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

又曰：

康節以四爲數，言水火土石而遺金木，終欠自然。

又其論鬼神則曰：

以鬼神爲陰陽則可，以陰陽爲鬼神則不可。卽以四書五經中所稱鬼神證之，何嘗與陰陽相混。

此條不僅可以澄清張程所言，並亦可以剖辨朱子所申。朱子論鬼神，本之張程，多超出古人舊見，而桴亭亦不苟同。余嘗謂儒家應分先秦儒與宋明儒。宋明諸儒，雖曰語必本之先秦，然亦有遠離遠出者。卽如張程朱子論鬼神，與孔孟所言，意實大殊。桴亭承兩宋道學大統，而一一必挽歸之於孔孟。其論濂溪太極圖，則謂其一本易繫辭。其辨鬼神，則謂以鬼神爲陰陽則可，而不可

以陰陽爲鬼神。此亦於張程朱子所說有所申，無所闢，而已卓然自見己意，不事蹈襲，亦不務爭駁，乃彌見其書之粹而醇。

桴亭論理氣，可謂善述周朱。其論性，則尤能特標己見，不苟同於張程分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節。然玩其所言，仍是有所申，無所闢。語若平淡，而剖析精到。此一論點，尤爲桴亭反覆研尋後所得，而亦極爲自信。因曰：

言氣質，原未嘗離天命，是就人言天。若離人言天，不但易入虛無。卽極高明，與人何涉。

又曰：

未生以前，此理在天。既生以後，此理在人。萬物皆備，飽滿具足。不從此中識取性善，而仍講未生以前，縱極至善，已被禽獸草木分取一半。

又曰：

性者，氣質之理。人，氣質之理善，物，氣質之理雜。

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不必離氣質而觀。

孟子當時，只就氣質中說善。孔子子思之言，無不同條共貫。孟子以後，周則無不脗合。

程朱間有一二未合，而合常八九。

桴亭絕不主張離人言天，因亦不主張離氣質而言性。理只在氣中，性亦只在氣質中。惟同時又必

主理先氣後，又主人性之善。此皆其特見精深處。桴亭又謂性善乃指恒性，指性之常。故曰：

孟子言性善，於氣質之中道其常。荀卿言性惡，於氣質之中道其變。

此條頗近亭林日知錄。

又曰：

此中間靈處謂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謂之性。性中之妙而合理者謂之善。分義理氣質而言性，猶是意圓語滯。

因此桴亭不言性中無惡，而極贊明道善惡皆是性一語。因曰：

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

人皆可以爲堯舜，論其理。惟至誠能盡性，語其實。

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語極精微。然着意精微，便有弊病。此處已隱隱逗出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語更精微，卻已隱隱走入釋氏離一切心即汝眞性一邊去。

桴亭學本朱子，固不以朱子之學爲支離，然常以精微戒人，此亦桴亭之獨見。其以精微爲戒，正是其特見精微處，惜乎欲索解人不易得也。桴亭極反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一語。而又曰：

喜怒哀樂，好惡生殺，無非天理。故曰善惡皆天理。

善惡皆天理，卽是說善惡皆性。桴亭於此特標出中庸中和二字。其言曰：

論性精微，莫若中庸，然只說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中與和是善。未發無不中，已發無不和，是聖人之性善。未發未能無不中，而未嘗無中。已發未能無不和，而未嘗無和，是常人之性善。性善二字只如此看。

於是桴亭乃提出其自己之性無善惡說。其言曰：

人性中無所謂善惡。只有中與過不及。故聖人盡性，只是致中和。

此處極見桴亭論學常有由宋明回返先秦之傾向。宋明理學家言似嫌多涉精微，先秦孔孟儒則語多平實。桴亭乃以宋明儒之精微回闡孔孟之平實。既歸平實，斯可免精微之流弊。故桴亭並不關宋明之精微，乃以孔孟平實來作闡申，則一切精微自歸平實也。於此見桴亭之自下語，雖若一一平實，而於平實中實有愈見精微之處。

惟專就論性一節言，朱子已竭論非氣質無以見性，而又主性即理，理不離氣，亦不雜於氣。桴亭所論，似偏重不離一面，可以糾張程分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之流弊。而於性之不雜於氣一面，則發揮似嫌薄弱，仍不如朱子所論之較更深密。

桴亭又曰：

同是萬有不齊，於物則謂之雜，於人則謂之純。人可以學問，而物不可以學問也。

此條見性善圖說。即宋儒所謂變化氣質，而推擴言之，則氣質雖萬殊，而可以純於一善也。

由論性轉到論心，桴亭亦獨有其精湛之見解。今姑舉遺書論學酬答中答周王臣一書為例。其

言曰：

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二說皆得之，而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其所統，亦非特性情。有是性，感物而動，喜怒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擴而充之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亦莫非天之所賦。

此處融合天人體用而會歸於一心，非深契朱子論學淵旨者不能及。後儒徒以陸王爲心學，不知朱子乃造心學之極詣，似惟桴亭能窺見到此。

思辨錄中又論人心道心，其言曰：

道心只就人心中合於道者言之，非有一心。曰：然則如何言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

曰：此是說工夫。

又曰：

整菴看人心道心大誤。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

合道卽猶謂合理。理在氣中而非卽是氣，道心亦只在人心中，非有二心。道心人心不雜不離之妙，亦猶理之於氣之不離而又不雜也。整菴未能深瞭朱子理氣之辨，故亦不深瞭朱子人心道心之辨。桴亭以朱子之辨理氣者移之以辨人心道心，語極簡淨，平實。然不精讀朱子書，則不知思辨

錄此條之精微而平實處。桴亭此處又用太極字，太極卽理，桴亭極贊一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之語，又極讚理一分殊之說。天人合，故人心可卽又謂之道心，又謂之太極也。朱子辨理氣心性，後儒得其淵旨者，當端推桴亭。東發整菴亭林，於此或遠或近，或得或失，要皆非桴亭之比矣。

桴亭又辨此心之已發未發，其言曰：

所謂未發，不過念慮轉接鬬筭處毫髮之間。

此問題，朱子辨論已極詳密，故到桴亭手上，乃可片言解紛。凡如此類，非得前人之着意精微，不得有後人之落歸平實。然求能於前人精微處落歸平實，此正大非易事。故非細讀朱子書，將不易見桴亭思辨錄之精采。桴亭思辨錄正多爲朱子論學作畫龍之點睛。縱是細讀朱子書，不讀思辨錄，亦每使人有不見壁上飛去之憾。

桴亭又曰：

工夫存乎我，境界因乎外。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

前念方滅，後念方起，此處有桴亭所謂轉接鬬筭處在毫髮之間者。桴亭從此境界點出中庸戒慎恐懼四字工夫，實是平實之至，又極精微之至。然若誤認此時境界，以爲把柄入手，則非槁木死灰，卽是虛無寂滅。桴亭早年，曾學靜坐養生工夫，故能識得此一境界。然非後來正學功深，則不易得此見解。

桴亭又曰：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菴以爲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

朱子常言心體本卽是一知覺。是則本體不昧，卽是知覺不昧也。若恐人誤認從知覺上去，改說本體不昧，豈不又將使人誤認從本體上去。於此諸條參互推求，終於舉出中庸戒愼恐懼四字工夫。此四字，亦可謂卽是此心本體，但不得謂之有知覺，亦不得謂之無知覺。由此求之，則本體在是，功夫亦在是。然必工夫到，乃可言本體。故從兩宋理學家言而向上求之，歸之孔孟先秦，則一一易於落實。若自兩宋理學家言而向下求之，更欲各關門戶，窮極精微，則弊病終不免。整菴困知記不如桴亭思辨錄，正在此一上一下之間。故讀困知記，則人見其精微。讀思辨錄，則徒見其平實。能兼得於此二者，始爲能善讀思辨錄，思辨錄之不易讀處亦在此。

由辨已發未發，乃有存養省察工夫之辨。桴亭又言：

存養省察，要看得他是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一切不放下，中無一毫沾滯。

朱子論理氣，論心性，總是教人要看得是二，又看得是一。桴亭此等處，皆是善學朱子。既要一切不放下，又要中無一毫沾滯，則惟戒愼恐懼四字，可以恰切道出此體段。

因辨存養省察，又有動靜之辨。桴亭曰：

心從靜中得，功向動中求。

此十字，要言不煩，玄珠在握。非眞下工夫，不易有此體悟。又曰：

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

靜者安乎理之謂。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爲靜。

此兩條見論學酬答與陳言夏。

以上辨涵養省察，辨動靜，朱子皆以歸納入一敬字。桴亭之論敬則曰：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今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曰天卽理，把天字亦說得平常。此爲上等人說則可，爲中下人說，便無忌憚。不能作其恭敬之氣。子瞻欲打破敬字，若如古人說敬天，子瞻能打破天字否？

又曰：

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許多昏憤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

又曰：

先儒有曰天卽理，予曰理卽天。

天卽理見朱子論語注，亦是道學精微之言。程門言敬，曰主一，曰心中無一物，所言似皆涉精微。桴亭論天一從周朱，其論太極，論理先於氣，又曰天氣地質，自亦承認朱子天卽理也之義。但此處乃謂此等可爲上人說，不能爲中下人說。此亦桴亭論學，常主從精微轉歸平實之一證。

故其答人書，謂精微之理，乃未及知也。

桴亭又曰：

道學不可著意。予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箇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多一番著意矣。

此亦主從道學精微轉歸孔孟平實也。

其與人書有曰：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而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宋儒乃不得已而言。

此處謂是宋儒之不得已，亦是極平實，而較之亭林，則見爲有精微之趣。

或問知與行，桴亭曰：

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未可以概而論之。及其至也，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

知每易涉精微，行則落於平實，然此二者亦是一而二，二而一。孔孟平實，道學精微，精微盡歸於平實，平實一本諸精微，此乃桴亭論學趨嚮所在。

凡桴亭論理氣心性，大旨具如上述。今再進而論其言居敬窮理者。桴亭有曰：

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

其言主宰，亦猶上引言根脚。有此心主宰作根脚，乃可向前求進步。論學酬答答周王臣書有云：

兼言理氣，道其全。專言理，明其主。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

理者人之所同，氣者我之所獨。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故君子有窮理之學。

理在吾心，而求之天下之物，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必事事而察，日日而精，時時而習，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而又非馳騖於窮大之謂。

馳騖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

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

此書所言，皆通透明達。以人合天，必貴有作之主者。作之主者卽此人心，然貴能從人心之大同處作主。有了主，又貴能有進步，故必外窮物理。如是始可合天人，兼體用，此心達此境界而才始見。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聖人之與學者，其道與學，乃亦成爲一貫。

又文集答陳介夫有云：

吾輩爲學，只是真切二字。眞則得其本心，切則不離日用。得其本心，則居敬之道得矣。不離日用，則窮理之功密矣。

言居敬窮理，終有精微之嫌，桴亭釋之以真切二字，則彌見爲平實。

思辨錄中其他討論道學傳統上種種問題，莫不談言微中，明白扼要，脫盡理學家窠臼，而指示出理學中無窮蘊奧，此等精采處，幾於隨處可見。茲再拈錄數條示例。如曰：

事物到前面，只看外一層，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是格物致知。

玩物喪志與大學格物致知語皆出程門。桴亭以只看外一層與能看裏一層來作解釋，可謂親切明白矣。

又如曰：

化生之初，未有萬物，誰爲輪迴。化生之後，自少而衆，自一而萬，如何輪迴。

此由朱子言鬼神意而推申言之，極淺顯淨括之致。

桴亭言道統，亦極有深義。桴亭實可謂是宋明道統殿軍。自桴亭以下，未有能闡明道學更如桴亭之親切淵懿者。桴亭有曰：

道統重聞知，不重見知。

聞知者，無師傳而有開闢之功者也。

宋仁宗時，有同時開闢三人。周濂溪張橫渠邵堯夫。二程雖同時極盛，然卻有師傳家教。

又曰：

大程以天資言，則近於周而勝於朱。以事功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

朱。

又曰：

大程實是天資勝，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卻每有窒礙。

又曰：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尤當在配享之列。

又曰：

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謂孔子賢於堯舜，朱子賢於周程，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或者以業之故而並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

此條見論學酬答顧殷仲，乃桴亭對兩宋諸儒之評騭。桴亭崛起明末，其學直承周朱，然實不能盡其用，若論成學之功業，則尙不如亭林日知錄。桴亭於闡申理學義蘊，維爲卓至。其開啓此下學術新途徑，則不得不謂其有遜於亭林，此則亦時爲之也。桴亭在明儒中惟時時稱道羅整菴，而於論學大節，則駁正整菴處亦多。全謝山傳有曰：思辨錄所述，疏證剖析，無不粹且醇。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是桴亭在理學傳統中，亦一聞知者。易代以後，築亭水上，潛龍不用。身居江南人文薈萃之區，而聲光獨闇，此固大儒之學養，資後人之

觀其德則可矣，然亦豈桴亭之所欲乎。其論易之明夷有曰：

明不可息。雖晦於外，不可息於內。混迹庸衆，所謂晦。專心聖賢，所謂明。

又論易之潛龍曰：

非龍德不能當潛，今之潛而龍者又誰乎？

此見其自負與自處。又曰：

聖人能盡其所以然，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體，而不能盡用。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

此條見論學酬答盛聖傳。惜乎桴亭之所志所學，終以限於形勢時位，而不獲大彰顯於後也。

桴亭學之最值稱道者，乃在其理學與經濟之兩面兼盡。桴亭爲學，一一依蹈朱子軌轍。自朱子後，能本末精粗，內外體用，一以貫之，實惟桴亭有此蘄嚮，亦有此造詣。所謂天德王道，內聖外王，以人合天，以用見體，皆桴亭所標舉以爲學的者。故曰：

孔子而後有眞學，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做得補偏救弊。三代規模，全未夢見。

桴亭實欲推致眞學以達之於善治，其分別漢唐宋與三代之意，亦即承襲朱子之答陳龍川。惟不專用王霸字，不專從漢祖唐宗居心上說，故亦言之若更見爲切實。如曰：

撥亂不難，致治難。三代以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此處提出撥亂致治兩項，亦於朱子辨王霸外別標新義也。

又曰：

三代以上，主於用君子。三代以後，主於防小人。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又曰：

孔孟以後，待小人太寬，待君子太嚴。議論繁苛，甚於東濕，使君子坐失機會，不能展動分毫，亦主持世道者之過。

此兩條，若相反，實相成。法制議論，多偏陷於防禁一邊。然防禁不了小人，而終於束縛了君子。

又曰：

古之治也以道，後世一決簿書，成爲吏胥世界。

又曰：

家法與家禮，此一家中王霸之辨。

又曰：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滲漏，以其意欲一網收盡天下也。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辦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此說欲一網收盡天下，可謂最能申述朱子之意。至謂治天下與治國異道，更屬卓論。又曰：

周禮是治國之書。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王荊公不識此意，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

此等說法，又是何等乾圓潔淨乎。

桴亭又曰：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孟子一生大學問，爲致治之大綱。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有曰：

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政治之本。

其論封建，謂：

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

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

善治者當循今郡縣之制，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而無封建之名。

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

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爲傳賢。

此等說法之背後，必先具一番公天下之心。惟桴亭則專從平實言，不從精微言。讀者徒震驚於其用封建字，而疑以爲迂，則誠無可與語思辨錄之書。桴亭又曰：

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爲善之利。三代以後立法，常恐人有爲惡之弊。收人才，去文法，是當今最要務。

又曰：

以人才用國家，未嘗爲國家用人才。

又曰：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

分鄉是小封建法。

鄉約是個綱。社倉保甲社學是個目。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

此等立論，皆是乾淨俐落，精微平實兼盡。

其論井田，謂：

郡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

桴亭又特著治鄉三約詳其法。其論封建，只在分職權。其論井田，只在均財富。其論由治鄉而治國而治天下，尤爲能盡本末內外而一以貫之，而尤要則在其論學校。

其論學校謂：

儒治所不同於吏治者，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

此見論學酬答郁儀臣。又曰：

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

此條見文集蘇學景賢錄序。又曰：

古者有大學之法，後世但有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

又曰：

古法盡亡，必須制作。

伊川看詳學校，不如文公貢舉私議，然皆不過就近代言。明道請修學校劄子，則通於三代。

又曰：

學校之制，惟安定湖學教法，明道上神宗書，尤得貫通推行之法。

而桴亭特所注重者，則在學校之師。謂：

師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倣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治事，宜各各分爲諸科，聘請專家名士以爲之長。爲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爲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亦易。

重師道而不廢專家，此亦申朱子義。又倡師尊於君之論，謂：

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

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尙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此與予天子擇師之說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

又曰：

太子卽須爲擇師，及卽位則終身師之。

問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庶乎名實兩得。

又曰：

設臺諫，不如設師傅。

其論禮樂，雖亦備究精微，而終亦一歸平實。謂：

朱子語錄中冠昏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伊川便太泥古。

又曰：

朱子儀禮經傳集解，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使後世無所遵守。

又曰：

審樂斷以聲爲主，紛紛論器論數，皆後一著事。

審音不難，卽以俗樂論之，如琴瑟疏而雅，琵琶繁而哀。笙簫和而柔，羌笛厲而勁。中正和平之音，非必不可求。

欲知雅樂，未始不可於俗樂胡樂中參求反觀而得。

其論經史，則曰：

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書兼載文章，即後世之古文。詩即後世之詩。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一代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五經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餘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註疏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此世儒尊經之過。

文集曹頌嘉漫園文稿序有曰：

義文之易，所以述天人，即後世性理諸書是也。虞夏商周之書，孔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即後世史傳諸書是也。商周之雅頌，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即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周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即後世八書十志之類是也。

如此論經，較之六經皆史之說，更爲允愜。其自爲書鑑詩鑑，乃師法王通之續經。

又曰：

凡作史，志書須詳於紀傳。文中子曰：史之失也，其於遷固乎，記繁而志寡。此言真千古確論，亦千古絕識。

又曰：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合爲一書，文獻通考亦髣髴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觀一代

之全。

桴亭論性理常求其一貫，經濟亦當求一貫，故論法制，亦貴能觀一代之全也。

又曰：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建都考，歷世統譜等，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又曰：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二十一史雖不讀備查足矣。

此皆卑之無甚高論，極平實之至。桴亭又分讀書爲三節，一曰誦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一曰講貫，自十五至二十五爲一節。又一曰涉獵，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其所列書目，自經史理學外，在講貫涉獵兩類者，又有天文地理水利農田兵法諸種，而古文古詩則三節皆列。又有本朝事實，本朝典禮，本朝律令，皆在講貫涉獵中，謂此最爲知今之要。今之學者，有終身未之聞。謂：

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

重師道，卽是重道學也。重讀書人，卽是求進步也。凡讀思辨錄中論善治，必當會歸之於其論真學而一以貫之，斯可得其深趣矣。

桴亭之學，一依朱子格物窮理之教，故主隨事精察，謂：

向讀區田法而異之，民間何以竟不傳。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迄無成功。予嘗欲親試之。

今思辨錄中備詳其說。

桴亭又論兵法有曰：

唐有李靖兵法，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從此書中脫出。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四書五經中言兵，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要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記攻戰之迹。令學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殺，而人才有造。

又曰：

戚繼光紀效新書特勝，以其曾經實歷。練兵實紀不如紀效新書。

明末天下多寇，桴亭又輯城守全書，自稱頗爲詳密。

桴亭於農政兵書，平日既多究心。其他如天文曆數地理險要河渠水利醫學藥物，幾於無不研窮。茲不摘引。

桴亭又留心詩文，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有關興衰治亂者。又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以後

詩有合於興觀羣怨者。而其論詩，尤具隻見。嘗曰：

不論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論辭，總之不知詩。

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事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僞言也。

又曰：

唐詩多寫景，宋詩多談理。然唐詩未嘗不言理，宋詩未嘗不寫景。予意欲選唐人宋詩，宋人唐詩，以破當世之成見，病未得暇。

又曰：

邵堯夫擊壤集，前無古，後無今，其獨造處，直是不可及。

堯夫詩胸次極妙，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康節直任天機，縱橫無礙，從來詩體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

康節詩直把詩作際天際地一事，豈止篇章辭句而已。唐人詩，康節做得。康節詩，唐人做不得。

白沙之詩，合道理與風雅爲一，所作詩有子美詩之聖，堯夫有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爲一人。

凡其興趣之廣泛，途轍之開濶，實可謂是朱子後一人。

桴亭又曰：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論語所稱有四科，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此即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概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不過文學中人耳。乃歷漢唐以來，儼然專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不得與從祀之列，概擯之門牆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裒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者必另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又曰：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當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或問：吾輩爲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欲爲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

又曰：

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黃憲文中子德行，張良李泌言語，孔明房杜韓范司馬政事，遷固李杜韓柳歐陽文學，庶幾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又曰：

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享之列，非僅從祀已也。

又曰：

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羽顏真卿張巡岳飛，皆當在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反得竊之以惑衆。在二氏未免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

又曰：

聖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備之書皆其職。雖矻矻孳孳，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託涵養，悠悠終日乎？

孔子刪述六經無論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

又曰：

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彰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

凡桴亭之所志所學，亦可於此想見其大概。

此稿刊載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故宮圖書季刊一卷一期

四、顧亭林學述

章實齋文史通義，分清初學術爲浙西浙東兩派。渭浙西宗顧亭林，尙經學，淵源自朱子。浙東宗黃梨洲，尙史學，淵源自陽明。竊謂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爲其代表，皆經史兼擅，而亭林造詣尤卓。蓋由朱子轉經史，其道順。由陽明轉經史，其道逆。在晚明諸遺老中，孫夏峯李二曲黃梨洲皆治陽明，稱三大儒，知其時王學尙盛。亭林論學，則時若有反理學之嫌，至少若與理學面目不同，然其確尊朱子，則斷無可疑。日知錄中屢引黃震東發日鈔，及陸桴亭思辨錄兩書，可證其學脈。余舊爲近三百年學術史，亭林有專章敘述，茲篇專拈其於理學中尊朱斥王之一節，學術史已詳者不復著。

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有曰：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爲之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此言語錄，並不指全部理學言，乃指理學中之部分言。文集卷九下學指南序有云：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故取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由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

下學指南一書今不傳。亭林之斥語錄，乃就其淫於禪者言，在宋如上蔡、橫浦、象山，而更暢衍於明代王學盛行之後。亭林此編，採錄東發，折衷朱子，可證其對宋元明三代理學之態度。

又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有曰：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又文集卷四與人書四有曰：

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

是亭林所謂經學，乃自漢至宋通言之。古之所謂理學，指宋。以其合於經，同於經，故曰即經學。後之所謂理學，指明。亭林謂其不取之五經，但資之語錄，亦如釋氏之有禪，可以不誦經典而成佛也。

又文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有曰：

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無人而不論學矣。

又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有曰：

今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

是亭林之惡夫禪與語錄者，乃惡其開速成之路，而墮下學之基，並顯指白沙陽明言。而其瓣香所宗則在朱子。

文集卷五，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有曰：

宣氣爲山，眾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羣言實總於眞儒。兩漢而下，維多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

是亭林言經學，尤重宋儒，而其推崇朱子，誠可謂高山仰止。而不徒羽翼聖功，乃亦發揮王道二語，更值注意。所謂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亭林意，惟朱子有之。亭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自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故其爲學，羣經之外，兼及諸史。晚年卜居華陰，與王山史同修朱子祠堂，而爲此文，其平生學業志氣精神所注，血脈所自，端在朱子，信不誣矣。

亭林餘集與陸桴亭札有云：

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事者也。近刻日知錄八卷郵呈。思辨錄刻全，仍乞見惠一部。

與亭林同時，治朱子學最具精詣者，莫過桴亭，而亭林以內聖外王之真儒稱之，則亭林志業可想矣。

日知錄卷十八配享條有曰：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五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胡元至于我朝，中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此所謂中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者，猶卽其辨亡國之與亡天下，是亭林認爲元儒尙能守中國道統，而其重視宋五子，以爲直接孔孟，故謂先王之道猶存也。

又同卷嘉靖更定從祠條有曰：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神宗元豐七年，（此年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無傳注之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集傳，及蔡氏之

尙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嘉靖九年，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有王者作，其還遵貞觀之制乎。

又曰：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爲大禮，出於在上之私意。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出于在下之私意。與宋人之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此所衡評，卽其平素經學卽理學，捨經學安有所謂理學之主張。自左丘明卜子夏以下，迄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於傳註六經有功。程朱乃及胡安國蔡沈陳澧亦然。卽張栻呂祖謙，亦在又次之列。周張雖不傳經，於羽翼六經有功。在亭林之意，固未嘗爲漢宋分疆，故經學中卽包有理學，而理學亦不過爲發揮經學。至於明代中晚以下盛行之語錄，乃離異經學以爲學，故亭林不以理學許之。下及乾嘉，嚴分漢宋，經學獨歸兩漢，理學全受排斥，此又與亭林意見大爲不同。

又卷二十四書五經大全條有曰：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榦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德秀。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四書集疏，趙氏順孫四書纂疏，吳氏眞子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

氏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諸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表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士人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是亭林明以朱子四書爲經學，而謂經學之廢始於明，又謂宋元尙傳實學，元儒吳澄明儒程敏政，皆鑒於當時之徒務文字訓釋以爲學，激而爲朱陸異同作平反。然當亭林之世，情勢又非。實學日荒，虛談益張，故更寧取於元儒也。

亭林餘集與潘次耕札有曰：

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間，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乎。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

焉，則可必其有成矣。

此見亭林於宋元明三代學術高下之評騭。蓋亭林深崇朱子，黃東發闡申朱學，特爲亭林所欣賞，故日知錄中屢引其說。即日知錄爲書，亦似與東發日鈔有淵源，後人每以與王伯厚困學紀聞相提，抑紀聞猶其次也。

日知錄屢引黃氏日鈔，尤其關於論心學之近禪者。前引夫子言性與天道條引曰：

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雒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亭林寧取元儒，深惡晚明，即此意。

又卷一良其限條引曰：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刻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亡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省齋

記）

又曰：

存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遊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山陰縣主簿廳記）

又卷二十心學條，引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句有曰：

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蔡九峯作書傳述朱子之意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法而並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

又同卷內典條引曰：

論語曾子三省章集註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自謂論語之外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

東發最尊朱子，然於朱子語亦多糾挽。傳心一語，朱子在鵝湖會前，屢有提及，而東發明加反對。上引心學條，亭林亦曰：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此承東發意，惟措辭較緩。

又卷九忠恕條有曰：

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謂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

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此條下面又引東發言相發明。亭林一承東發矯朱子，正證其一意崇朱之亦猶東發也。

同卷予一以貫之條又曰：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詞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彼章句之士，既不足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上引前一條以尊德性言一貫，下一條以道問學言一貫，若兩者相衡，則亭林論學大意，毋寧更重後者。蓋其學脈，端承朱子而來。而盡掃虛玄，一歸平實，存理學之精神，而脫去理學之面貌，於學術思想之轉變上，尤有關係。

日知錄卷十求其放心條有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也。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義，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野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此條用論語釋孟子，而孟子求放心之定義自顯。又曰：仁義未有不學問而能明，此語益見深趣。孟子言良知，與言仁義自別，細讀孟子書自得之。

又同卷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條有曰：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始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我道者幾希。

務求一歸之內，空言德性，而輕視問學，忽略實務，此爲亭林所不滿。乃主於事爲上見德性，於功業上講義理。亭林之於大學八條目，可謂尤重修齊治平之後四項，與宋代理學尤重格致誠正前四項者稍不同，然其精神命脈，固是一貫相承，卻與此下乾嘉考證學大異其趣，此層不可不辨。

又卷九不踐迹條有曰：

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

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卒以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門。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不學無以入聖人之門，不學無以成三代之治，聖功王道一歸於學，此爲亭林論學要旨。

又同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有曰：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凡亭林所糾摘理學之流弊，正卽承朱子之意，觀此條可見。又上引心學條，引唐仁卿答人書有曰：

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問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

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於心學者，爲其求心也。

仁卿名伯元，萬歷甲戌進士。明史入儒林傳。深疾王學。陽明從祀孔廟，仁卿上疏爭之，因請黜陸九淵而升周程張朱五人於十哲之列。其人又屢見於顧憲成之小心齋札記。胡直廬山曾貽書兩首，力辨其詆王學之非。亭林於仁卿語不惜詳引，又如同卷舉業條引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亦就當時人語指陳當時流弊，如此乃更爲有力也。而亭林之自言之，則尤慨切憤痛。前引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有曰：

五胡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廟丘墟。

學術非而人才喪，國運隨之，亭林目擊身受，於此更有深感。故其於朱子晚年定論一節，尤鄭重置辨。

日知錄卷二十朱子晚年定論條有曰：

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

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筆編輯而爲之辨曰：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子策，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程篁墩因之，乃著道

一編。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輯車之卷正相唱和矣。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

宛平孫承澤謂，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亦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

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姿，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王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說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第，爲泰州龍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罪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

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此條所論，尊朱貶王之意，可謂透竭無遺。然亭林固不爲墨守之學者，陽明與朱子持異，主要起於朱子之格物補傳，王門後學，格物異解蜂起，而亭林於大學格物亦創新解。

日知錄卷九致知條有曰：

致知者，知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后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則。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此條歷舉詩易孟子戴記諸篇散見物字以釋大學之格物，此卽所謂以訓詁明義理也。厥後乾嘉諸儒，鄙薄宋儒義理，而競治訓詁，然能如亭林此條真能以訓詁明義理，而有關思想上之重大節日者，實不多見。可見徒治訓詁無當經學，乾嘉諸儒與亭林之區別卽在是。一通宋儒義理，一則門戶自閉，於理學全不關心，高下得失自由而判。今謂亭林乃此下漢學開山，不知其間精神血脈固迥不相侔也。

又同卷性相近也條有曰：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人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噍躄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善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性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

論性乃有宋理學一大題目。然如孔子言性相近，朱子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既分別孔孟言性，又增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別，似不如亭林所言之直捷明

確。蓋亭林實能擺脫理學窠臼，而攝取理學精髓。若使此下經史之學能循此發展，則洵可爲儒學開一新境。而惜乎學脈中斷，乃專走上考據訓詁一路，經學非經學，又何當於亭林所謂捨經學安所得理學之經學乎？桴亭論性善亦辨宋儒，詳桴亭篇。

亭林於經學言義理，尤有高見卓識，超宋代理學言義理之上者。日知錄卷九管仲不死子糾條有曰：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夫子之意，以被髮左衽之禍尤重於忘君事讐也。

論至於尊周室攘夷狄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論語集註，謂桓兄糾弟者，程子之說也。謂管仲有功而無罪者，朱子之說也。忘君事讐四字，亦取之集註。亭林此條，針對集註，獨揭夷夏之防大於君臣之分之一義，而謂是春秋之志。經學義

理發揮至此，可謂功在萬世。

日知錄卷九素夷狄行乎夷狄條，相傳刻本無之，見近人張繼所得原鈔本，有曰：

文中子以元經之帝魏，謂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何其語之儉而悖乎？宋陳同甫謂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賢而猶爲此言，其無以異乎凡民矣。夫興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無不復之日，若之何以萬古之心胸而區區於旦暮乎！此所謂儉也。漢和帝時魯恭上疏曰：戎狄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夫以亂辱天人之世，而論者欲將毀吾道以殉之，此所謂悖也。孔子有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狄夷，不可棄也，夫是之謂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導之以爲虐于中國，而藉口於素夷狄之文，則子思之罪人也已。

亭林以明遺民，處易代之際，抱亡國之痛，而幸使吾中華民族得免於亡天下之大劫者，斯惟當時諸遺民修身講學不懈益勵之功，而亭林之功爲尤大。此亭林所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抑當亡國之際，非匹夫之賤，亦將不足以盡保天下之責。其君其臣肉食者有所不能預。此義亦當深辨。

今綜觀亭林所言，實有由孟子上返之論語之傾向。故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有曰：

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聖人之爲學，平易而可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

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也。

漢儒不重孟子，僅自孔子而上推之周公。孟子自二程始加提倡。同一經學，漢宋之辨在此。理學中有心學，則皆推本於孟子。亭林尊朱貶王，故其言義理，必折衷孟子於論語，使持心學者無所措其辭，而經學理學亦未見相歧，此實學術思想上一大關鍵。晚明東林顧高講學，已於論孟有微辨，語詳顧高篇，讀者可參觀。乾嘉經學少具此識，乃尊康成取代孟子，主訓詁取代義理，高擡漢儒，而孔子地位亦轉晦。此實乾嘉經學之迷途。戴東原爲孟子字義疏證，乃欲並天理人欲之辨而泯之。不知此乃理學上大綱領所在。陽明與朱子，雖有異同，在此辨別上，未有歧見。心學與理學，亦惟在此可以打併歸一。而乾嘉以下之經生，乃並此不加理會。此可謂之是經學，而不得謂之是儒學矣。若使亭林轉生乾嘉以下，更不知又將如何措辭也。

亭林於經學考據，亦斟酌漢宋，能見其大。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有曰：

周易經分上下二篇，傳分十篇，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自漢以來，爲費直鄭玄王弼所亂。程正叔傳因之。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

朱子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正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此校版本，主采朱子本義之古文易，純本考據立場，東漢費直鄭玄皆失之，而南宋朱子獨得之。若必以時代先後論，而謂漢儒近孔子，故必是，宋儒遠孔子，故必非，此則又何俟乎考據。

又日知錄卷十九經條有曰：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至於今朝，此學遂絕。

此論禮，主采朱子說恢復儀禮之科。是亦經學上犖犖大端，朱子開其先，亭林承於後。惟其深通理學，故得於經學有卓識也。

又文集卷二儀禮鄭注句讀序有曰：

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

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遍者。

凡尚虛談，必蔑經學。基實已隳，高玄無益。蓋亭林之批判經學理學者，此亦其一端。王安石極尊孟子，而晚年亦喜釋氏，學脈異同，所貴善辨。後人僅以日知錄爲考據之書，則宜於其着精神處多所遺失矣。

又文集卷六與毛錦銜有曰：

比在關中，略倣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

又文集卷五華陰王氏宗祠記有曰：

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累世同稱義門者，亦往往而有。

凡亭林論學，舉其尤要者，曰人材，曰教化，曰風俗，而尤致謹於禮，此皆其論經學之要端深旨所在也。厥後乾嘉漢學家治三禮，乃端端於名物考據，而風俗教化作育人材之大，則懵焉無知。正因鄙棄理學而一意治經，則宜其所得之有限也。

亭林又考中國古籍用體用二字之起源，亭林佚文補與李中孚手札有曰：

承教，謂體用二字出於佛書，似不然。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之，順次之，體次之。又曰：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

又一札云：

魏伯陽參同契首章云：春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伯陽東漢人。並舉體用始於伯陽。朱子少時嘗注參同契，不可以朱子爲用惠能之書。

此於體用二字備詳其起源所在，亦爲治中國思想史者必當注意一問題，此考證之學之有益於言義理者之一例也。乾嘉學者治經學，心中無義理，遂若義理考據可以分途，不知分則兩失，合者兩得，理學家中惟朱子深識此意，而亭林之學，其精髓所在皆出朱子，則在學者之細參。

綜上所陳，可知亭林之學尤要者在其日知錄，實爲後人治朱學者開闢新疆宇，貫輸新血脈。亦可謂昔人多注意羽翼聖功，而亭林特潛心發揮王道。學者本於此書，旁參陸桴亭之思辨錄，上溯黃東發之日鈔，自當局面恢張，路脈分明。由此以上窺朱子學之全體，以及後來之流衍，康莊大道，庶或遇之。而如晚明心學之與乾嘉考據，其得失自可不待辨而知。

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

自孟子唱性善之說，後儒如荀卿董仲舒揚雄荀悅以及唐之韓愈，皆不信奉。經宋代程朱之推尊，而後孟子性善之說，遂成爲此下儒家之定論。然程朱之說性善，其果有當於孟子當時之真意與否，明清兩代，遞有爭議。尤著者，爲顏習齋與戴東原，二人皆攻詆程朱，又徧及宋儒，其所辨說，果爲得孟子真義否，仍滋疑難。晚明王船山，猶在顏戴之前，獨尊橫渠以糾程朱之失，較之顏戴，似爲持平，而抑又深至。抑且於朱陸異同之外，又提出張程異同之新公案，爲治宋儒思想者所不可不知。舊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於船山思想，敘述粗備，獨於此節，略而未及，本篇乃專就船山讀四書大全說一書，有關於闡釋孟子道性善之義者，撮要列舉，以資討論孟子性善論者作參考，亦爲治宋學有意研究張程異同者作例示。昔嘗有意爲舊著學術史拾遺補闕，草爲外篇，成稿四五篇，中經離亂，盡已散佚，此稿亦往昔作爲外篇之意，有志治船山思想者，可取與舊著學

術史並觀，凡彼所詳，此不復贅也。

孔子極少言性與天道。論語惟性相近一章言及性字，茲先引船山說此章者於前，其言曰：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性。所謂氣質之性，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故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自人言之，則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爲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天之有。是氣質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以物喻之，質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氣則所以成聲，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以氣吹笛，則其清濁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製之不中於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氣過於輕重，則乖戾而不中於譜。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後其音律不爽。造化無心，而其生又廣，則凝合之際，質固不能以皆良，氣麗於質，則性以之殊，故不得必於一致，而但可謂相近。乃均之爲笛，則固與簫管殊類，人之性所以異於犬羊之性，而其情其才皆可以爲善，則是概乎善不善之異致，而其固然者未嘗不相近也。程子之意固如此，故必云氣質中之性而後程子之意顯。以愚言之，則性之本一，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盡一者，大端在質不在氣。質，一成者也。氣，日生者也。一成則難乎變，日生則乍息而乍消矣。故知過在質，不在氣。乃其爲質也，均爲人之質，則既異乎草木之質，犬羊之質矣。是以其爲氣也，亦異乎草木之氣，犬羊之氣也；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卽形色而言天性也。乃人之清濁剛柔不一者，其過專在

質，而於以使愚明而柔彊者，其功則專在氣。氣日生，故性亦日生。惟本氣之理而即存乎氣，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藏。乃氣可與質爲功，而必有其與爲功者，則言氣而早已與習相攝矣。氣隨習易，而習且與性成。然則氣效於習，以生化乎質，而與性爲體，故可言氣質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別有一氣質之性也。質受生於氣，而氣以理生質，善養者何往而不足與天地同流哉。質之不正，非犬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於此而全於彼，長於此而短於彼，乃有其全與長之可因，而其偏與短者之未嘗不可擴，能踐形者亦此形，而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惟並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見無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則就其已分而不一者，於質見異，而於理見同，故曰相近，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氣質，孟子亦不能裂其氣質之畛域而以觀理於未生之先。則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雖然，孟子之言性，近於命矣，命善故性善，則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則隨質以分凝矣，一本萬殊，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易曰：「繼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繼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質也，既成乎質而性斯凝也。質中之命謂之性，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爲大公而至正也。

以上節錄船山讀四書大全說論語陽貨篇性相近習相遠章之大意，其中有特值注意者，船山論性，毋寧更主張孔子性近習遠之說，而於孟子性善之說，猶有微辭焉。此下說孟子性善，不能忘此處之所揭一也。又張程首有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別，而朱子取以注此章，謂此所謂性，

兼氣質而言，又引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今船山曰：「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是乃針對朱注而發，語極明顯。又曰：「所謂氣質之性，猶言氣質中之性。」而又將氣質二字分別言之，是於程說顯不贊同，而特婉言之，隱言之而已。並於義理之性一面，文中全未提及，此固因朱注亦未提及此四字，然船山云：「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性。」即指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別言。此一分別，船山顯所不取，而此處不明白指出，語氣中多似對程朱留地步，其明白對程朱之說加以辨難者，多見於孟子篇中，此因著書體例，分條列說，不能於一處說盡也。船山於宋儒之學，獨尊橫渠，義理之性與天地之性之分別，亦最先創始於橫渠，二程盛許其說以爲可以補孟子所未及，然船山謂程子所言氣質之性，實與橫渠原義不同，其言見於其所爲張子正蒙註，下文當再引述。而船山論性，此節最爲簡盡。讀者先於此細翫，則此下所引錄，如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

此下摘錄其關於孟子論性善諸章之說，惟另分條理，不復拘其章次之先後，亦不備注章名，讀者有意深求，自可進窺其原書也。

論性則必溯及於天人之際，而船山於此，最有深見。其言曰：

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既因氣而有所

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未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

又曰：

天行於不容己，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然非陰陽之遇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

又曰：

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大牛則非不善。因於造化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

以上之說，有可注意者：一則船山惟以氣說天，惟以一氣之陰陽變合造化者說天；故謂天惟有誠而不能盡善。變合之未盡善，亦不得謂天有不善，以天之造化本出無心，而僅由於一氣之變合之行於不容己也。船山此說，全本於易，而頗近莊子，船山殆可謂即本先秦觀念以言孟子之性善義者也。則其與當時孟子之真意較近，殆宜然矣。

既明於船山之辨天人，乃可進而言船山之辨理氣。船山之言曰：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

又曰：

陰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即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爲深切著明。

以上船山只認天地乃一氣之實體，而此體可以有變化；故謂濂溪下誠幾二字最合。誠即是此實體，幾即是此實體之變化也。船山謂此處尚著不得一理字，自更著不得一善字。蓋天理二字，本自明道始拈出，明道以前，濂溪尚不言天理二字。濂溪言誠，本於中庸，言幾本於易。今船山重申濂溪誠幾之旨，是亦本先秦舊見以闡孟子也。

船山又曰：

理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其始之有理，即於氣上見。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

明道言理，升而上躋之於天，船山言理，退而下躋之於勢。亦可見其旨趨之相異矣。

既明船山理氣之辨，乃可進而申述其致辨於性即理之說。船山之言曰：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犬牛類。人之性只是理之善。

此處船山分辨人性與犬牛之性不同。理有善不善，則性亦有善不善。孟子所謂性善，乃專指人性

言，則程朱所謂性即理者，其說固是，然不足以釋孟子之性善。蓋既曰天理，則宜無不善。既曰性即理，則犬牛之性亦是理，固非謂犬牛之性皆善不可矣。抑且理不先而氣不後，則朱子所謂理先於氣者，自不爲船山所贊可，而義理之性先於氣質之性之說，亦可不待言而知爲船山所不取矣。

於是船山乃繼此而辨貴性賤氣之說。所謂貴性賤氣之說，即謂義理之性無不善，自有氣質之性而始有不善是也。此說唱自張程而朱子承之。船山於橫渠之說則別有解釋，詳於其正蒙註，而於程朱所言則不表贊同，其言曰：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變合作氣看，即此便不知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

又曰：

離理於氣而二之，則以生歸氣，而性歸理，因以謂生初有命，既生而命息。初生受性，既生則但受氣而不復受性。其亦膠固而不達於天人之際矣。

此處所謂以生歸氣而性歸理，即朱子之繼承於二程而爲說者然也。又曰：

氣所以與兩間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爲誠，唯此爲不貳。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又安得導性以爲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

又曰：

貴性賤氣，以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而已矣。

船山之宇宙觀，亦可謂是一種唯氣的一元論，其說頗近於先秦道家莊老之說，然畢竟與莊老道家不同，因船山極致嚴於虛實之辨故也。船山之言曰：

氣之誠則是陰陽，氣之幾則是變合。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甚也。且如呼者爲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所吸，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這橐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什麼？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這風氣來？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上尋勢之所趨，孟子在亙古亙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如言潤下，潤一德，下又一德。此唯中庸鄭注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神義，水神信，土神知，康成必有所授。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不待變合而固然。氣之誠然者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實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言性，猶以月之明言性，卽一端以徵

其大全，即所自善以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

以上船山從唯氣的一元論，轉出德性的一元論，其所陳義，蓋本之易傳與中庸。就先秦思想言，唯氣一元，乃易庸與莊老之所同，德性一元，乃易庸之所獨，此乃後起儒家采取莊老道家之說以自成其儒家之新宇宙論者。船山取易庸以釋孟子，較之程朱天即理，性即理，以唯理一元說宇宙，終見其爲宋儒之說。居今而審辨之，船山之論性善，其較近於孟子當時之本意，蓋亦可無疑也。至其引鄭玄注中庸以五行說性，縱謂於孟子書中無此的證，要之五行說乃從陰陽說遞禪演變而來，漢儒之說如是，即濂溪太極圖說亦何莫不如是。下至明道，始以天理說性善，明道自謂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明謂天理之說，乃明道一己之所自創。今船山越過程朱以天理說性之新義，而重返於濂溪以前先秦兩漢之舊說，以思想傳統言，其爲較接近於孟子當時之真義，亦可無疑也。

然以上所引，所重乃在釋性字，說明性只在氣質之中，非於氣質之中之性之外，別有一義理之性以爲之本原，如此而已。至於性之善與不善，則請繼此再加引述。

船山論性之善不善，主要在其辨情才之說。船山之辨理氣，其說較習齋爲邃密。至其辨情才，其說益較東原爲深至。顏戴皆出船山後，皆於程朱有駁難，然以船山較之，則過乎遠矣。惜乎船山之說，湮沒不彰，學人之非難程朱，則僅知有顏戴而已。清代道咸以後，船山之書始行於世，然至此學術將變，遂亦終未有能整理船山之書以重提此一公案，此亦學術界一至可惋惜之事也。

船山之言曰：

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

又曰：

氣之誠則是陰陽，是仁義。氣之幾，則是變合，是情才。

氣不能無變合，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情才用事，而情才用事則無必善之勢，此爲船山言性最明通平實處。船山又詳言之，曰：

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一例竟直說箇善字，本文自明白。可以爲善，卽或人性可以爲善之說也。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卽告子性無不善之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卽性也。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而不言可以爲不善。言不善非才之罪，而不言善非才之功，此因性一直順下，從好處說，則其可以爲不善者，旣非斯人所必有之情，固但見其可以爲善，而不見其可以爲不善。若夫爲善雖非才之功，而性克爲主，才自輔之，性與才合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專歸功於性而擯才也。

船山言情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而爲善亦非才之功，此兩說者，當再詳引闡述於後。船山曰：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於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俱有者。孟子竟說此四者是仁義禮智，則卽此而善矣。卽此而善，則不得曰可以爲善。惻隱卽仁，豈惻隱之可以爲仁乎。有擴充，無造作。若云惻隱可以爲仁，則是惻隱內而仁外矣，若夫情則特可以爲善者爾。可以爲善，非卽善也。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節而後善，則不中節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學者須識得此心有箇節在，不因喜怒哀樂而始有，則性情之分迥然矣。

又曰：

惻隱是仁，愛只是愛，情自情，性自性也。情元是變合之幾，性只是一陰一陽之實。情之始有者，則甘食悅色，到後來蕃變流轉，則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種種。性自行於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爲情也。

又曰：

普天下人，只識得箇情，不識得性，卻於情上用功夫，則愈爲之而愈妄。性有自質，情無自質，故釋氏以蕉心倚蘆喻之。無自質則無恒體，故莊周以藏山言之，無質無恒，則亦可云無性矣。

以上引船山性情之辨，極爲深微，誠亦可謂發前儒之所未發矣。船山又於此極言之，曰：

釋孟子者，不察於性之與情，有質無質，有恒無恒，有節無節之異，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於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於氣，則誣一陰一陽之道，以爲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於釋氏海漚陽燄之說者幾何哉？愚於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託於虛。不寵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竊自意可不倍於聖賢，雖或加以好異之罪，不敢辭也。

後人專就歸罪於物欲排宋儒者，戴東原是也。專就賤氣以孤性排宋儒者，顏習齋是也。船山之說，已導顏戴之先路，至於歸其本於性情之失辨，而又舉有質無質，有恒無恒，有節無節以爲性情之辨者，則船山一人之創說也。

船山又曰：

集註謂情不可以爲惡，只緣誤以惻隱等心爲情，故一直說煞了。若知惻隱等心，乃性之見端於情者而非情，則夫喜怒哀樂者，其可以不可爲惡之名許之哉？

以上引述船山之情可以爲惡義。以下引述船山之爲善非才之功義。船山曰：

程子以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歸不善於才，又與孟子天性之說相背。

又曰：

程子全以不善歸之於才，愚於論語說中有笛身之喻，亦大略相似。然笛之爲身縱不好，亦

自與簫管殊，而與枯枝草莖，尤有天淵之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終始不相假借者，則才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獸所無。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者，亦惟人則然，而禽獸不然。若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雖細察之，人亦自殊於禽獸，而亦豈人獨有七情，而爲禽獸之所無，如四端也哉？一失其節，則喜怒哀樂所同喜怒獸所同怒者多矣。乃雖其違禽獸不遠，而性自有幾希之別，才自有靈蠢之分，到底除卻情之妄動，則性無不善，而才非有罪者自見矣。故愚決以罪歸情，異於程子之罪才也。

又曰：

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才之功矣。杞柳之爲桮棬，人爲之，非才之功。卽以爲不善之器，亦人爲之，非才之罪。

又曰：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而不可云不能盡其情。若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熾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才之所可盡者，盡之於性也。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於情而之於蕩也。惟情可以盡才，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盡。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體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於喜怒哀樂以導其所發，然後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節，則

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於情以爲作爲輟爲攻爲取，而大爽乎其受型於性之良能。

又曰：

不善雖情之罪，而爲善則非情不爲功。惟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爲善獎之，而不須以可爲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謂情善者此也。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後亦須在情上用功。既存養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爲功而免於罪。

又曰：

人苟無情，則不能爲惡，亦且不能爲善，如何盡得才，更如何盡得性。

以上所引，凡船山之致辨於情才者，大體已具，則請繼此而引述船山之辨心性。船山曰：

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此千年暗室一燈也。如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奕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惟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覲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孟子就四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徵天之微耳。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

又曰：

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爲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朱子曰：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自家二字，尤開無窮之弊。除卻天所命我而我受之爲性者，更何物得謂之自家也。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則必不可。情者，不純在外，不純在內，或往或來，一來一往，吾之動幾與天地之動幾相合而成者也。釋氏之所謂心者正指此。唯其爲然，則非吾之固有而謂之鑠，金不自鑠，火亦不自鑠，金火相搆而鑠生焉。

又曰：

必須說箇仁義之心，方是良心。但言心，則不過此靈明物事，必其仁義而後爲良也。心之爲德，只是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大端只是無惡，而能與善相應，然未必其善也。須養其性以爲心之所存，方使仁義之理不失。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皆言此仁義之心，雖吾性之所固有，而不必其恒存也。

又曰：

以知覺爲心，以收攝不昏爲求放心，不特於文理有礙，而早已侵入於異端之域矣。程子云：「纔昏睡，便放了」，朱子云：「收斂此心，不容一物」，看來都有疵病。求放心者，求仁耳。孟子喫緊教人求仁，程朱卻指箇不求自得，空洞虛玄底境界。異哉！非愚所敢知也。

又曰：

所放所求之心，仁也。而求放心者，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之也。仁爲人心，故卽與靈明之心爲體，而既放以後，則仁去而靈明之心固存，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心。以本體言，雖不可竟析之爲二心，以效用言，則亦不可槩之爲一心也。而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亦覺與釋氏無能無所，最初一念，卽證菩提，因地生果之說無以別。識得所求之心與求心之心本同而末異，而後聖賢正大誠實之學不混於異端。愚不敢避粗淺之譏，以雷同先儒，亦自附於孟子距楊墨之旨以俟知者耳。

又云：

朱子云：「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理事務。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又云：「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只教此知覺之心不昏不雜，此異端之所同，而非但異端也，卽俗儒之於記誦詞章，以至一技一藝之士，也須要心不昏雜，方能學習。求其實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而已。」朱子之釋此章，大段宗程子之說，程子規模直爾廣大，到魁柄處，自不如橫渠之正。橫渠早年，盡挾佛老之藏，識破後更無絲毫黏染。一誠之理，壁立萬仞，故其門人，雖或失之近小，而終不失矩矱。程子自得後，卻落入空曠去，一傳而後，遂有淫於佛老者，皆此等啓之也，此又善學古人者之所當知。

此處船山自述學統，一尊橫渠，而於程朱之說多所駁難，乃竟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以此較之習齋東原，意態之激，殆猶過之矣。惟船山之學，博大精深，其自述已見處多，其非難前賢處少，

至其讀四書大全說，學人研讀船山遺書者尚多忽之，故其異同之間，亦遂不易覺察耳。

以上略引船山之辨心性，請繼而再引船山之辨性命。船山之言曰：

愚嘗謂命日受，性日生，竊疑先儒之有異。今以孟子所言平旦之氣思之，乃幸此理之合符也。朱子言夜氣如雨露之潤，雨露者，天不爲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也。豈不與天之有陰陽五行，而人受之爲健順五常之性者同哉？在天降之爲雨露，在木受之爲萌蘖，在天命之爲健順之氣，在人受之爲仁義之心。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則今日平旦之氣，非昨者平旦之氣亦明矣。此豈非天之日命而人之日生其性乎？乃或曰：氣非性也，夜氣非卽仁義之心，乃仁義之所存也。則將疑日生者氣耳，而性則有生之初。抑又思之，夫性卽理也，理便在氣裏面，豈於氣之外，別有一理以游行於氣中者乎？天無無理之氣，而人以其才質之善，異於禽獸之但能承其知覺運動之氣，尤異於草木之但能承其生長收藏之氣，天之與人者，氣無間斷，則理亦無間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若云惟有生之初，天一命人以爲性，有生之後，惟食天之氣而無復命焉，則良心旣放之後，而但一夜之頃，物欲不接，卽此天氣之爲生理者，能以存夫仁義之心哉？

又曰：

愚於周易尙書傳義中，說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天命之謂性，則亦日日成之爲性。其說似與先儒不合。今讀朱子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間一語，幸先得吾心之所然。

今按：此一條錄自其大學說。命曰受，性曰生，此蓋船山之創說，船山極自喜之，故此兩章之說云云也。此見船山心中先自存有一番義理，然後再細按諸孟子而見其誠然，又細按諸程朱之說，而見其有不然，又細按之於橫渠而始見橫渠之說爲獨可遵而無弊也。若論船山此一番見解之來處，則疑若其有得於易者爲獨多。橫渠亦深於易，故船山之於橫渠，亦最所心契也。故船山之於宋儒，雖獨契橫渠，而余必謂船山乃主以先秦義說孟子，而不謂其乃一本之於橫渠以說孟子，知言之士，亦必首肯於吾言也。

船山又言曰：

在天則同，在命則異，故曰理一而分殊。迨其分殊，而理豈復一哉？其同者，知覺運動之生而異以性，生成性，性亦主生，則性不同而生亦異。

又曰：

孟子言性，從不以氣稟之性爲言，先儒論之詳矣。況孟子言君子所性與所樂所欲一例，則更何天命氣稟之別，豈衆人之欲樂陷於私利者，亦天使之然而不能自瘳耶？性者，人之同也。命於天者同，則君子之性卽小人之性也。衆人不知性，君子知性；衆人不養性，君子養性。是君子之所性者，非衆人之所性也。聲色臭味安逸，衆人所性也。仁義禮智，君子所性也。實見其受於天者於未發之中，存省其得於己者於必中之節也。不養則四德非不具於心，面背四體非不有自然之天則，足以成乎德容，而根之既仆，生以槁也。故性者，衆

人之所同也，而以此爲性，因以盡之者，君子所獨也。知性養性，是曰性之，惟其性之，故曰所性，豈全乎天而無人之詞哉？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惟其性焉，是以安焉。性云者，聖功之極致也，而豈獨以天分表異，求別於氣質之累不累者乎。孟子曰：「君子不謂性也。」義通此矣。

此一條似與上引一條有異，上一條言性不同，言天之生人，其性與物不同也。此一條言性者人之同，言人性則自大體相同也。究其極，則亦只當謂人性相近，卻不必說凡人之性必盡相同。此則就上引各條而微窺之，亦可見矣。

又曰：

不以氣稟言性，則猶言性在氣稟之中，而非氣稟之卽是性也。故曰：孟子始終闢「生之謂性」一種邪說，程子乃以「生之謂性」爲未是告子錯處，故其差異如此。

又曰：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作一直說，於性命無分。孟子說性命處，往往有分別。蓋天命不息，而人性有恒，有恒者受之於不息，故曰天命之謂性。不息者，用之繁而成之廣，非徒爲一人，而非必爲一理。故命不可謂性，性不可謂命也。孟子大言命而專言性，以人承天，而不以天治人。朱子注不謂之命，惟小註中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君子勉其在己而不歸之命一段，平易切實，爲合孟子之旨；其他言理言氣，言品節限制清濁厚薄，語雖

深妙，要以曲合夫程子氣稟不同之說，而於孟子之旨不相干涉。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氣稟爲不備矣，是孟子之終不言氣稟可知矣。

今按此處所辨甚細，船山只謂：

天以其理授氣於人謂之命，人以其氣受理於天謂之性。

故又曰：

一言命而皆氣以爲實，理以爲紀，不容析之，以爲此兼理，此不兼理矣。

故船山只謂性不當棄氣而言，理亦不當棄氣而言，而一言氣質氣稟，則又與僅言氣者不同，此辨深微，非通觀於船山立論之全體，則亦不易明此辨也。

蓋性命之辨，實亦猶天人之辨也，船山又言之曰：

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

此可謂一言而深闡及於孟子盡性知天之學之淵旨而無遺焉也已。

凡船山之闡述孟子性善之旨，其要皆以自附於橫渠，而於程朱之說則不能盡同，茲再引述一節，以見其要。船山曰：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幾爲心性，而以「未始有」爲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爲著明。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張子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釋之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氣之化也。」周易陰陽二字是說氣，著兩一字方是說化，故朱子曰：「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由氣之化則有道之名。然則其云由太虛有天之名者，即以氣之不倚於化者言也。氣不倚於化，元只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化言，固不得謂離乎氣而有天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爲理矣。以天爲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爲理之義始成。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夫天之爲天，雖未嘗有俄頃之間、微塵之地、蜎子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化也。化者天之化，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爲化之所自出，惟化現理，而抑必有所以爲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所以爲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賅而存焉，賅存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相統相含，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必由此不可由彼之當然者無迹，若是，固不可以理名矣。故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氣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惟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當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以理也。其既有內外之別者分，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爲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而不即以氣爲性。所以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者理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也。若夫天，則中庸固曰誠者天之道也。誠則能化，化理而誠天，天固爲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爲理矣。程子之竟言天一理

也，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若謂心一理也，則其弊將有流入於異端而不自覺者，尤不可以不辨。原心之所自生，則固爲二氣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而性以託焉，知覺以著焉，此氣化之肇夫神明者，固亦理矣。而實則在天之氣化自然必有之幾，則但爲天之神明以成其變化之妙，斯亦可云化理而已矣。以本言之，天以化生而理以生心；以末言之，則人以承天而心以具理。理以生心，故不可謂卽心卽理，誘人而獨任之天。心以具理，尤不可謂卽心而卽理。心苟非理，理亡而心尙寄於耳目口體之官。如其云心一理矣，則是心外無理，而理外無心也。以云心外無理，猶之可也，然而固與釋氏唯心之說同矣。父慈子孝，理也。假令有人焉，未嘗有子，慈之理終不生於心，其可據此心之未嘗有慈而遂謂天下無慈理乎？謂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固存於性則得矣，如其言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具有於心則豈可哉？故惟釋氏之認理皆幻，而後可以其認心爲空者言心外無理也。若其云理外無心，則隨所知覺隨所思慮而莫非理，將不肖者之放辟邪侈，與夫異端之蔽陷離窮者而莫非理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以言心之不易盡，由有非理以干之，而舍其所當效之能以逐於妄，則以明夫心之未卽理，而奉性以治心，心乃可盡其才以養性。棄性而任心，則愈求盡之，而愈將放蕩無涯以失其當盡之職矣。伊川重言盡心而輕言知性，則其說有如此。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不得謂之心一理也又審矣。告子惟認定心上做，故終不知性。孟子惟知性以責心之求，故反身而誠，以充實光輝而爲大人。釋氏言三界惟心，則以

無爲性。聖賢既以有爲性，則惟性爲天命之理，而心僅爲大體以司其用。伊川於此纖芥之疑未析，故或許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爲無過。然則欲知心性天道之實者，舍橫渠其誰與歸。

今按：此條辨析已甚詳明，語無遺蘊矣。循而讀之，辭旨皆顯，可不煩再加以闡釋。蓋自明道特拈一理字以統綜一切，而曰天卽理，性卽理。伊川晦翁循之益進。而陸王繼起，乃以心卽理之說與程朱之言性卽理者相抗衡，而理字固爲先秦儒家所言，今船山越過程朱，一依濂溪橫渠之說，會通之於易傳與中庸，於以闡發孟子當時之本義，宜爲得其近是。至明道之說，可謂其乃是開創此下理學一派，於濂溪橫渠本有差異，而朱子乃重爲之綜合，後人羣尊朱子，遂認爲濂洛關閩，只是一家，雖亦有加以辨析者，然終不能如船山之明顯也。

船山之致辨於張程異同者如上述，然二程分辨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一層，自謂襲自橫渠。橫渠之說，見於正蒙。其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船山既於明道言氣質之性者加以駁正，又謂橫渠之說，本與明道不同，其辨見於其所爲張子正蒙註，茲再引錄如下：

船山曰：

氣質者，氣成質而質還生氣也。氣成質，則氣凝滯，而局於形，取資於物以滋其質。質生氣，則同異攻取，各從其類，故耳目口鼻之氣與聲色臭味相取，亦自然而不可拂違，此有

形而始然，非太和絪縕之氣，健順之常所固有也。舊說以氣質之性爲昏明彊柔不齊之品，與程子之說合。今按張子以昏明彊柔得氣之偏者繫之才而不繫之性。此言氣質之性，蓋孟子所謂口耳目鼻之於聲色臭味者爾。蓋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知之理，下愚所不能滅。而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爲性。而或受於形而上，或受於形而下，理與欲皆自然而非由人爲，故告子謂食色爲性，亦不可謂非，而特不知有天命之良能爾。

以上釋橫渠氣質之性。又曰：

天地之性，太和絪縕之神，健順合而無倚者也。卽此氣質之性，如其受命之則而不過，勿放其心以徇小體之攻取，而仁義之良能自不可掩。蓋仁義禮智之喪於己者，類爲聲色臭味之所奪，不則其安佚而惰於成能者也。天地之性原存而未去，氣質之性亦初不相悖害，屈伸之間，理欲分馳，君子察此而已。

以上釋橫渠天地之性。又曰：

弗性，不據爲己性而安之也。此章與孟子之言相爲發明，而深切顯著。乃張子探求窮歸之要旨，與程子之言自別，讀者審之。

以上釋氣質之性君子弗性並兼釋全章。以下再引其釋氣之偏也數語，此卽船山所主張之性才之辨也。其言曰：

昏明彊柔敏鈍靜躁，因氣之剛柔緩急而分，於是而智愚賢不肖，若自性成，故荀悅韓愈有三品之說，其實才也，非性也。性者，氣順理而生人，自未成形而有形，成乎其人，則固無惡而一於善，陰陽健順之德本善也。才者，成形於一時升降之氣，則耳目口體不能如一，而聰明幹力因之而有通塞精粗之別，乃動靜闔闢偶然之機所成也。性藉才以成用，才有不善遂累其性，而不知者遂咎性之惡，此古今言性者皆不知才性各有從來，而以才爲性爾。商臣之蠱目豺聲，才也，象之傲而見舜則忸怩，性也。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移則才化，若性則不待移者也。才之美者未必可以作聖，才之偏者，不迷其性，雖不速合於聖，而固舜之徒矣。程子謂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爲二，其所謂氣質之性，才也，非性也。張子以耳目口體之必資物而安者爲氣質之性，合於孟子，而別剛柔緩急之殊質者爲才。性之爲性，乃獨立而不爲人所亂。蓋命於天之謂性，成於人之謂才，靜而無爲之謂性，動而有爲之謂才，性不易見而才則著，是以言性者但言其才而性隱。張子辨性之功大矣哉。

本文後船山子敬又加按語云：

動而有爲之謂才，才所謂心之官。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心之官爲才。

今按：船山性情之辨，備見於其孟子說，而性才之辨顧不詳，乃別見於正蒙註。可證正蒙註之成書，猶在讀四書大全說之後。今試設爲推想，方其說論語性相近習相遠章，已辨程子氣質之性之非是，而下語猶若有迴護之意，及其說孟子性善諸章，乃始於程朱之說辭而闢之者甚爲暢盡而不

再有隱焉，然猶於橫渠之分辨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者未有解釋，其所解釋之辭則備見於正蒙註，此雖著書體例宜然，然亦可見船山正蒙註之成書，當猶後於其爲讀四書大全說也。船山一人思想進展之迹，亦可於此窺見。今若再進而綜述船山關於張程異同之意見，則一言蔽之，乃是理氣問題之意見也。橫渠亦可謂是主惟氣一元，進而爲德性一元之說者，因其根據易傳與中庸而立說，則必歸於此也。程朱則主張唯理一元，或可說理氣二元者。此理字之特別提出，首由於明道，其實魏晉間如王弼郭象皆已特提此理字，此後乃爲釋家所援用，尤著者如竺道生乃及唐代之華嚴宗，伊川稱明道出入於老釋者十年然後乃歸求之於六經而得之，則明道之特提此理字，實不能謂其全不受老釋二氏之影響。至於橫渠年十八，范仲淹即授以中庸，及其在汴京初遇二程，已擁皋比講易，雖橫渠亦曾旁求諸釋老，然其於易庸濡染之深，亦可知矣。故橫渠之主張唯氣一元與德性一元之說，乃自先秦舊說來，而二程之提倡唯理一元，則於宋儒言義理中獨爲一種新說，此乃入虎穴而得虎子，拔趙幟而立漢赤幟之所爲也。惟主張唯理一元之說，終不免重於天而輕於人，陸王之反對程朱，主張以心即理代替性即理，亦不失爲一種側重於人本位之要求，而矯枉者過其正，船山不滿於陸王，乃追溯之於濂溪橫渠，求以矯挽程朱立言之所偏，即就本篇引錄者觀之，其意已可見。今若撇開其整個思想體系於不論，而專就其於天道範圍之內增重人事分量之地位一節言，則船山思想實亦與陸王相近，要之皆爲針對程朱過分尊重理的一觀念之反動，此一趨勢，即下逮顏戴，亦無以異也。

今試再雜引上文所未及者數條，以補申此義。船山曰：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盡性固盡人道也。論語言性與天道，性天之分審矣。直至贊化育、參天地，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焉。要其體天道者，亦以盡人道者體之爾。

船山此條，謂性與天道有分，盡性只是盡人道，持以與程朱天即理性即理之說相較，其異旨顯然矣。船山於天與人之外，又推以言物，曰：

物有物之性，終不可言物有物之道。今以一言蔽之，曰物直無道。若牛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不成牛馬當得如此拖犁帶鞍。儻人不使牛耕而乘之，不使馬乘而耕之，亦但是人失當然，於牛馬何與？乃至蠶之爲絲，豕之充食，彼何恩於人，而捐軀以效用，爲其所當然而必由者哉？故道者專以人而言也。

本條引自其中庸說。余嘗謂先秦兩漢之儒重言道，魏晉道家及以後釋氏重言理，宋儒程朱陸王皆重言理，故謂之理學則允。若如宋史特立道學傳，則名實殊未相符，因程朱所重實在理不在道也。若論理，則物理二字更是常用，卻極少用於人理爲辭者，故程朱喜言物理，如晦翁之格物窮理是也。格物窮理與人何涉，因性即理，物性人性同屬一理，故窮理即所以盡性也。橫渠正蒙開宗明義第一句即曰：「太和所謂道。」可見橫渠猶遵舊轍，與二程之特創新軌實有異矣。惟既言道，則誠如船山之說，物直無道可言，而又天道遠，人道邇，則人之分量地位自重矣。

船山又曰：

使馬乘，使牛耕，固人道之當然。若馬之性，豈以不乘而遂失；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爲下劑，爲人言也，鼠食之而肥。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尅伐而不以滋補乎？反之於命而一原，凝之爲性而萬殊。在人言人，在君子言君子，則存養省察而卽以盡吾性之中和，亦不待周普而同，求性道於貓兒狗子黃花翠竹也。

本條亦采自其中庸說。則船山之意，亦不認普通之所謂物性者之誠，可定爲此物之性矣。船山又言之曰：

卽可言物有物性，終不可言物有物道。如虎狼之父子，萬不得已，或可強名之曰德，而必不可謂之道。

船山又曰：

道者專以人言。

本條亦采自其中庸說。中庸開首卽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見橫渠正蒙正自中庸來，故船山亦不期而屢提此一道字。言道卽必關屬在人身，若言天道，則必明加一天字於道字之上矣。若言物，則物直無道可言矣。程朱惟其不言求道而言窮理，則天理之外必先及於物理矣。故此之一辨，實關重要也。

宋儒言理，又有一極關重要之觀念，卽理欲對立之觀念是也。凡理則曰天理，凡欲則曰人欲，而船山於此所抱意見亦極通明。船山曰：

不離人而別有天，不離欲而別有理。

又曰：

人欲中擇天理，天理中辨人欲。

若就人道之觀念言，則上引船山兩條之語，殆無可疑難者。但若轉就天理之觀念言，則程朱天理人欲不兩立之說，亦頗無可否認，此由思想立言之出發點不同，亦所謂言之各有當也。

本篇所欲引錄，大體已竟，凡所引錄，則亦僅以見船山一家思想有如是云云焉者而已。至船山所辨張程異同，其在張程之間其所異同，果一如船山之所辨析否？此乃另一問題，非本篇所欲深論。惟有一事當附帶述及者，船山之辨張程異同，主要在於性與天道，以今語說之，乃在形而上的問題上有所異同而已。其他程朱所言義理，爲船山所信服所稱揚者，卽就一部讀四書大全說看，已是竟體皆是。蓋船山仍是尊奉程朱，以爲闡發孔孟義理之真傳，雖有異見，不害其爲信守也。故船山又曰：

朱子於學庸章句論語集註屢易稿本，惟孟子註未經改定，故其間多疏略，未盡立言之旨。如是而已。若讀者見本篇所引錄，遽疑船山之於程朱，其態度亦一如習齋東原，此則大誤之尤，所不得不於此附及也。（註二）

又本篇所引錄，船山引據橫渠，上及易庸，以闡釋孟子道性善之意義，其果有當於孟子當時之原本真意否，此亦另是一問題，亦非本篇所欲進而深論者。惟船山之說，雖於張程異同有所別

擇，要之爲援據宋儒以立說，而張程之上距孟子已越千數百載，固不得謂其間絕無違異。卽易傳之與中庸，其書皆較孟子爲晚出，皆已雜有當時道家意見，以自成一套儒家之新說。在易庸作者，自可接受孟子思想之影響，然在孟子心中固尙不知有易庸，縱謂其時代相近，其間亦儘可有違異。故欲究孟子道性善之原本真意，最佳方法，自當專就孟子原書，卽就孟子所自言者，就其所用之辭語以闡說孟子自有之觀念，就其所用之事證，以證孟子真實用意之所在。晚清如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討論孟子性善，雖其見解或尙未能深入，要之其所用方法，較爲可取。船山猶守舊見，卽認易繫爲孔子作，中庸爲子思作，孔曾思孟四子之書，一脈相傳，一遵朱子之所定，宜其於孟子真義闡發多於辨認，則船山之言，正亦猶之橫渠之與程朱，謂其因於孟子書而自有所發揮則可，謂之卽是孟子之所見，則終有所不可也。凡治思想史者，當不河漢於斯言。（註二）

註一 舊著正蒙大義發微，曾指陳橫渠與程朱相異處，橫渠與濂溪相異處，又橫渠與先秦儒之相異處。並又指陳船山正蒙註仍不免遵循程朱遺說，而陷於誤解曲解處。本文主要在敘述船山一家意見，關於此等分析批評方面，凡已詳舊著正蒙大義發微者，此不贅及。該文收編在本書第五冊，讀者須取兩文參閱。

註二 舊著孟子要略，曾將孟子性善義，卽就孟子原書而加以闡釋者，其塗轍較與陳澧東塾讀書記相近。今此稿已彙印入四書釋義中。

六、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最先刊本在康熙丙午，僅州域形勢說五卷；今本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第九卷明代爲丙午本所無，餘亦詳略迥殊，亦有五卷中舊說而今本加改訂者。蓋丙午五卷本爲今本之初稿也。

丙午本有顧氏凡例一篇，與今本全異。自稱：

余方輿紀要凡七十二卷，而此編實爲之冠。……其繼此編而出者，曰兩京紀要，分省紀要，古今川瀆異同說，海防海運說，鹽漕屯牧合考，九州郡邑合考，十二州分野說。又集古今輿圖更爲訂正，職官輿程諸圖皆以類從，而後此書始成全構。

今本凡一百三十卷，視初本殆增一倍。計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各省一百十四卷，川瀆六卷而漕河海道居其一，分野一卷，丙午凡例尙有郡邑合考，則今本殆散入各省也。今本又附輿圖要覽四卷，凡海防、海運、鹽漕、屯牧、職官、輿程諸大端並約略附見焉。今本凡例云：「余初撰次歷

代鹽鐵、馬政、職貢及分野共四種，尋皆散軼，惟分野僅存。病侵事擾，未遑補綴，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以俟他時之審定」云云。疑原稿散軼，或當在祖禹南遊時。又祖禹爲黃守中六十壽序，謂「予辛酉病後，雖視息猶存，而神明未善」。庚申祖禹始客徐乾學家，則所謂病侵事擾，或其時語，然則今本凡例，殆成於祖禹五十一以後也。蓋今本總敘三篇成在前，凡例成在後，而皆在丙午刊本之後；輿圖要覽則尤晚成也。顧氏卒年六十二（據無錫縣志），少魏叔子七歲（據魏季子集先叔兄紀要），叔子卒於康熙十九年庚申，年五十七，是歲顧年五十，上推丙午，則顧年三十六也。今本彭士望序，謂祖禹之創是書，年二十九，則距丙午初刊，已歷八載。丙午本首頁，有「分省卽出」四硃字，則所刻雖僅五卷，而全書七十二卷之大體必已完就，蓋卽成此八年中矣。

閩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卷六下）謂「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其尊人耕石先生箸山居贅論」云云，下引其論黃河一大段凡數百字。今按祖禹父名柔謙，字剛中，耕石其別號也。據魏禧所爲墓誌銘，柔謙卒在康熙乙巳，年六十，則正在丙午前一年，今丙午刊本凡例自稱「棘人顧祖禹」，其證也。是柔謙及見其子箸書且潰於成，先後歷七年之久也。

柔謙以明遺民，抱宗國之痛，抗節不仕，祖禹亦棄舉子業。柔謙常教之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曰：「能。」「汝能以身爲人机上肉，不思報復乎？」曰：「能。」柔謙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矣。」（據魏禧顧柔謙墓誌銘）祖禹志節得之家訓，蓋不啻顧炎武之於嗣母也。而祖禹爲方輿書，亦以得於其父之教命者爲多。今本總敘第一祖禹自述先世，當明嘉靖間有光祿丞

顧大棟，爲祖禹高祖父，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其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奉使九邊，以論邊備中忌諱，仕不獲振。祖禹祖龍章，早卒，則所謂請纓有志，攬轡無年者。其父柔謙，得疾且卒，呼祖禹而命之曰：

「及余之身，四海陸沈，九州騰沸，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嘆乎！余死，汝其志之。」祖禹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

彭序謂祖禹爲是書，秉厥考之遺言，及先祖所爲之地志，九邊之圖說，卽謂此也。是顧氏一家輿地之學，祖孫相傳，淵源已歷五世，固非偶爾而然矣。然今丙午本卷首凡例，絕不道及其父隻字，何耶？蓋柔謙卒於康熙乙巳十二月之二十九日（據魏誌），而丙午刊書成於夏杪，歷時甚暫，祖禹斬焉在喪服中，悲痛未已，固無暇以詳也。

丙午本首列嘉魚熊開元，無錫秦沅兩序，熊序今本有之，秦序則已刪去。又首行列「三韓吳興祚伯成鑒，錫山華長發商原參」兩行，首頁又有「華府藏板」印，則是書乃華長發付刊者。今本有吳興祚序，謂「余因華子商原，始覩其書」，而丙午本無之，可證此本刊行甚促，吳序稍遲，故不及載耳。

又按丙午本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敘次迄於元末，今本則下及明代。今本總序，祖禹自述其「父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昧，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

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是祖禹之續爲此書，當在丙午後之三年，即己酉庚戌之間也。今本有魏禧序，已稱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則應尚在庚戌後。今按魏氏爲柔謙墓誌銘有云：

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

是顧魏相識，顧父已先卒，而魏氏於吳門所見紀要，殆即丙午刻本；否則未識其人，無由讀其全書之寫稿。及兩人既深交，乃得盡見其全稿而爲之序，乃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矣。魏氏長祖禹七歲，四十始出遊，至江浙，時祖禹年三十三，其父尙未卒，書亦未刊，兩人相識應在後。魏氏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又客吳（據黃子錫墓誌銘），上距庚戌又已三年，則祖禹書之自七十二卷擴大爲百三十卷者應在此三年內也。

祖禹抗節首陽，窮槁不仕，人知之。方三藩事起，而祖禹跳身走閩海，期興復，則知者甚少。近張子曉峯創爲祖禹年譜，親至膠山訪搜遺聞，得黃氏宗譜，有黃守中與祖禹交游踪跡，而其事乃大白。（詳見國風半月刊四卷十期膠山黃氏宗譜選錄專號）滇變作於癸丑，閩變起於甲寅，祖禹南遊當在癸甲之際，出魏氏作序後，故熊吳魏三序及祖禹自序，皆有「足不出吳會」之語。康熙丙辰，耿精忠復降滿洲，祖禹亦不久留。其在閩海，先後不出三年也。黃統爲其父守中府君行略，謂「顧子以雄才大略，慨然願有爲於天下，乃寄妻孥於吾父。吾父則以養以教，數年如一日」，即此矣。

今本復有彭士望序，謂「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又曰：「祖禹之創是書，年二十九，經二十年始成。藉資遊歷，更獲新勝，即改竄增益，雖十易草不憚。」今考彭氏年七十，當康熙十八年己未，時祖禹年適四十九。翌年魏禧卒，彭序成於今年，故述及魏序而未及其死。其稱述祖禹爲人，謂「其膽似韓稚圭，而先幾旁矚，不敢置勝負於度外」，則祖禹之不淹滯於閩可知也。又謂「其奇才博學似王景略，雖去桓溫必不爲苻堅所用」，尤明屬閩海歸來語。自丙辰至己未亦四年，祖禹之十易其草不憚者，應以此數年間爲尤勤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魏禧卒於儀真，而祖禹始客徐乾學家。彭士望徐氏五十壽序（按顧徐同年）云：

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

又曰：

公既延武林陸子矩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艇餼筆札書史，以相攸助。

是祖禹五十以後仍肆力此書。彭序謂經二十年始成者，仍非定稿也。

自是祖禹與徐氏往來之迹頗密。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清廷修一統志，命徐乾學爲總裁，徐氏羅致祖禹於幕下。閩氏尙書古文疏證（卷六上）謂「己巳與顧景范同客京師」，時顧年已五十九。翌年庚午，徐氏歸里設局洞庭，祖禹仍爲分纂，而其子士行亦在志局（見裘璉纂修書局同人題名私

記），既父子同硯席，又得恣意博覽四方圖冊，復與胡渭、閻若璩、黃鴻諸人上下其議論。越三年癸酉，卒（翌年徐亦卒）。此數年中，紀要一書當必又有所增訂。

然則祖禹此書，既上承其家高曾兩世之餘緒，又及身父子孫三代討論潤色。而祖禹則畢精萃力於其書者達三十四年，先則槁臥窮廬，搏心一志，繼則南遊嶺海，北上燕冀，遠搜博涉，又得徐氏藏書之探討，賓客之研窮，取精而用宏，體大而思深，宜其可以躊躇無餘憾矣。

然祖禹雖溷迹顯貴之門，其皜然不污之節，則固終其身無少渝也。姚椿通藝閣集顧處士祖禹傳略，謂「一統志書成，徐將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又全祖望鮚埼亭集題徐狷石傳後，謂「狷石最善祖禹，有事欲就商，會其在徐館中，狷石徘徊門外不入。適祖禹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徐乾學聞之，亟遣人出迎，則狷石已解維去矣」。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殷有三仁，固不在形迹之間也。

余觀今本首卷所列各序均無年月，此蓋不署永初之旨耳。又以「昭代」稱明，敘史跡亦至明而止，絕不涉建州入關，拳拳故國之情溢於言表。而祖禹自序及魏彭兩序，尤躍躍不啻探口出。雖祖禹詩文事蹟流傳極少，然此書幸免焚禁，不可謂非大幸矣。（四庫未收其書，殆時人未敢輕進也。）丙午本首頁即大書「吳伯成先生鑒定」，秦序、顧凡例皆著康熙丙午年月，益證祖禹自在喪中，事出華氏，非祖禹本意。今祖禹書傳布極廣，然其立身大節，及著書用意所在，與夫數十年辛勤之經歷，則人鮮知者，爰因讀丙午本而縱論之如此。

七、跋嘉慶乙丑刻九卷本讀史方輿紀要

顧氏方輿紀要最先刻本康熙丙午，僅刻州域形勢凡五卷，余既爲文論之，茲本亦祇刻歷代州域形勢，而已及明代，分九卷，與今本同，故書稱讀史方輿紀要，不稱廿一史，前列熊開元秦沅序及顧氏自爲凡例，仍五卷本之舊，惟吳興祚一序爲五卷本所無。

此書余見者凡兩本：一藏燕大圖書館，書前頁有「嘉慶乙丑新鐫，支蘭堂藏版」兩行，逐卷末頁有當塗彭萬程刊六字。又一本得之顧君起潛，無前頁而末多讀方輿紀要摘錄統論歷朝形勢一篇，署吳中朱棠。檢長元和諸生科第譜，朱棠字蔭南，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彭元瑞科試入吳縣學，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副榜。此書鐫於嘉慶十年乙丑，殆卽出之朱氏。燕大藏本脫其附篇。顧君所得則爲繙本，如吳興祚作吳典祥，似故意改之。又卷末當塗彭萬程刊六字均脫，惟卷八卷九有之，知原刊集。葉君揆初亦藏此書，書末有朱文，每卷後有當塗彭萬程刊字樣。則殆與燕大藏本

同爲初刊，而無缺者。以此本校今刻，大體盡同，惟卷九間有三異處則皆語涉避忌而改，如頁二十：

顧氏曰：「太祖挈漢舊壤，還之中華，比於去昏墊而之平成，功烈有加焉。」（按燕大藏鈔本作比之去昏墊而致平成。）

今本改中華爲職方。又如頁三十二敍土木之變一節：

北虜分道入寇。

今本作北部。

虜氛甚惡。

今本作兵氛。

虜自後追襲。

今本虜作敵。

次土木，人馬疲渴，虜鐵騎四合，死傷無算。

今本虜作而。則文理不明順。三十三頁：

是時東至遼東，西至陝西，皆虜騎充斥。

今本作敵騎。

未幾強胡款塞。

今本作強敵。頁三十四：

無以離戎虜之交。

今本作戎朔。頁三十五：

備羌禦胡。日不暇給。

今本作禦朔。頁三十五：

國初李文忠敗虜於豐州。

今本作敗元。

嘉靖以來，北虜部落益強。

今本作北邊。

虜酋吉囊。

今本作台吉吉囊。頁三十六：

虜旋入宣薊。

今本作敵旋入。而頁四十三，敍九邊後，有文兩節，凡四五頁字，薊藏顧氏定稿及燕大藏鈔本皆有之，而今本全刪。其文曰：

孫氏曰：太祖平天下嘗垂訓曰：「四方諸夷，其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者，但使彼不相侵擾，即當共安無事，慎毋恃中國強大，興兵起釁。惟胡戎密邇邊境，累代爲中國患，宜僅備

焉。」嗚呼！聖謨何洋洋也！成祖初定安南，本非利其土地，宣宗棄之，不害爲善守；獨是大寧廢而遼東薊州宣府之備多，河套失而太原大同榆林固原寧夏之患急，哈密棄而甘肅西寧洮河松茂之寇滋，然則祖宗成憲，洵未可輕變矣。君子觀於九邊之制而不勝升降之慨焉！（按此條大字正文，下一條雙行小注。）

王氏曰：昔狄梁公有言：「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控大漠，南界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三代以前，夷狄之患少，其備邊之制，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秦漢以降，更相角逐，生民之禍始烈；要未有迭主中夏，甚且天地一民，皆得而臣服（燕大鈔本作伏）之也。夫中原之不競，肇於和親，極於納幣稱臣。我國家張皇六師，式廓萬里，乃循秦漢之長城，九邊之定制，雪恥除凶，度越往古，然猶有虞者，封貢不降，互市不革，無以消奸民外誘之端，黠虜內窺之漸也。蓋虜必不能忘情中國者，以中國之多可欲，而非有內地叛民（燕大鈔本作氓）爲之鄉導，則其患猶可量。宋元以後之虜情，不可準以漢唐之舊制，乃欲高語來朝（燕大鈔本作庭），虛張歲市，養禍伏釁，而恃爲弭邊善政，不亦惑乎！嗚呼！削株掘根，毋與禍鄰，必也閉關折符，單使勿通也，投珠卻玉，匹馬勿入也，困機遘會，則西塹玉門，北固受降，東修柳城，隔絕其往來，杜塞其耳目，使中外之限，如九天九地，絕不可干也，庶足以紓悠悠之患乎！

又五卷本卷五末頁引：

劉氏曰：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真人出而撻伐之，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定，治亂相因，理則然已。

九卷本及今本卷八末「撻伐之」下多

起自東南，掃平氛翳，然後

云云十字，治亂兩句，今本作：

進取先後，因時乘勢。夫豈偶然之故歟。

而九卷本則作：

去茲草昧，復我光華，夫豈偶然之故歟。（此與鈔本合）

二本相校，尤可明其先後增易刪改之迹也。

又按卷九十頁汎掃幽燕條下：

下德州，（今屬濟南府）克長蘆，（即河南府滄州）逾直沽，（見前毛貴逾直沽）師舟步騎夾河而進。

今本脫克長蘆逾直沽兩語，而鈔本有之，葉君藏本，燕大鈔本均有，尤可證此本淵源有自，雖僅刻九卷，而尚存真相，殊足珍惜也。

又余讀燕大所藏鈔本，此九卷前有歷代州域形勢紀要序一篇，爲九卷本所無，而今刻足本則有之。（鈔本「存乎奕者之心手而已矣」，今刻本作「心思」，餘盡同。）惟鈔本又有「辛未立

冬前一日宛溪顧祖禹自序」十四字，辛未爲康熙三十年，宛溪年六十一，翌年宛溪卒，則此篇乃其晚年手筆，九卷刻本無之者，此或朱氏所據付刊之稿，尙是辛未前所傳鈔，故不載此文也。（又按葉藏顧氏原稿定本北直方輿紀要序首上方有眉注「辛未六月四日」一行，疑諸序頗多晚年筆。）

又九卷刻本不列魏彭兩序，未識何故，豈以熊吳秦三序本爲州域形勢作，而魏彭爲全書之序，乃以是爲取捨歟。抑此本底稿本無魏彭兩序，則其書傳鈔應甚早，顧魏締交，顧書已成百三十卷，則此九卷祖本之流傳尙在叔子一序之前。葉藏顧書原稿，惟此九卷無硃墨校改，此或亦證矣。

此稿刊載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責善半月刊二卷二十二期

八、陸稼書學述

自晚明諸遺老逝世，而清初理學之風漸熄。然尚有朱王之爭。在諸遺老間，不論述王反王，皆不失其宗邦之恫，有亡國之餘悲。繼起而尊朱者，則多朝廷顯貴，仰承帝王意旨，其制行多爲人指摘。而宗王者則多尙氣節，不爲權勢屈抑。余已略著其梗概於近三百年學術史李穆堂一章。清廷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特升朱子配享孔廟，雍正二年甲辰，陸稼書從祠兩廡，先後僅隔十二年。上距稼書卒歲則已三十二年。稼書兩爲縣尹，一任諫官，仕宦不達。魏環溪薦疏稱其清操如冰，愛民如子，彭定求序其書，亦謂其造履嚴苦，律己服官。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然樹乞糴壟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四庫提要稱其操履純正。蓋其爲人，頗自與當時朝貴尊朱者有不同。故清廷崇揚朱子，而特以稼書從祠。

然夷考稼書之爲學，於朱學後起中，如黃東發吳草廬羅整菴陸桴亭諸人，深沉博大遠不逮。

四庫全書收其三魚堂文集外集附錄共二十四卷，又讀朱隨筆四卷，三魚堂賸言十二卷，松陽鈔存二卷，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松陽講義十二卷，凡六種逾九十卷，可謂豐備。又四庫館臣爲提要，於宋明理學家言，掎摭無所不至。獨於稼書諸作，皆極稱道，絕無貶斥。勇於呵先儒，怯於違朝旨，此亦可見四庫館臣之爲態矣。

其實稼書於朱學，僅爲一種四書之學而止。朱子生平學問，用力四書最深。其指示後學，亦必先四書，謂五經爲可後。諸史百家自當更次。治朱學而特研四書，固不爲非。特當以四書爲主，從而求之則可，非謂逐字逐句讀四書，卽爲盡學問之能事也。徒解字義，在漢儒爲章句，在明儒爲講章，顯非朱子之學。稼書亦只是明末之講章家言，又烏得爲朱子之正傳。

治朱學而專重四書，其事遠有端緒。至明代永樂時之四書大全而集其成。清四庫提要略云：真德秀始采朱子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爲集編。祝洙仿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其後蔡模集疏，趙順孫纂疏，吳真子集成，薈粹衆說，不免稍涉泛濫。陳櫟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較爲簡當。櫟門人倪士毅合二書爲一，頗加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明永樂中，詔儒臣胡廣楊榮等編集諸家傳註之說，彙成一編，爲四書大全。御製序文，頒行天下學校。於是明代士子爲制義以應科目者，無不誦習大全，而諸家之說盡廢。然廣等撰集此書，實全以倪氏輯釋爲藍本。顧炎武謂其中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朱彝尊亦譏其專擴成書。惟是倪氏原書，義理明備，采擇精醇，實迥出他家之上。則當日諸臣據以編訂，

亦不爲無因。且明世解四書者，如蔡清之蒙引，陳琛之淺說，其折衷是正，皆以此書爲宗。

今按大全采摭諸儒名氏，首鄭玄孔穎達。宋自濂溪以下至於胡炳文陳櫟張存中倪士毅許謙共逾百人以上。夥頤沉沉，可見以研四書治朱學，宋末迄於明初，已成一大趨。四書與五經同尊，抑且猶增重要。朱子集註章句或問諸書，亦尊視如經注。治朱學者循此闡釋發揮，則如經注之有疏。四書大全乃如唐初之五經正義。朝廷功令所在，應舉求仕者罔不誦習。然自有大全而大全所收諸家書乃幾於盡廢，亦如有正義而正義所收南北朝諸經疏亦盡廢也。

倪氏書爲大全藍本，有汪克寬一序，亦爲提要所本，今並錄以資參證。序曰：

紫陽集諸儒之大成，作爲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而其詞渾然猶經。於是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而吳氏集成最晚出。同郡定宇陳櫟雲峯胡炳文，睹集成之書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撫其精純，刊繁補缺。定宇著四書發明，雲峯著四書通，而定宇晚年欲合二書而一之，未遂也。友人道川倪氏，實遊定宇之門，乃薈萃二家之說，鳩倂精要，考訂訛謬，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而求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

蓋朱子後之四書學，最先有成書者爲眞西山，黃梨洲評之，已謂其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繼此以下，大率盡然。大全之來歷與其梗概，據是可見。後有蔡清虛齋之四書蒙引，黃梨洲明儒學案稱其書，謂：

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繭絲牛毛，不足喻其細。蓋從訓詁而窺其大體，不爲訓詁支離所域。

四庫提要云：

此書本意，雖爲時藝而作，而體味真切，闡發深至，實足羽翼傳注，不徒爲舉業準繩。刁包稱朱注爲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陸之輔稱：說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其爲學人推重如此。與後來之剽掇儒先賸語以爲講章者，相去固霄壤矣。

梨洲學案又曰：

傳其學者有陳琛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陳琛爲四書淺說，林希元爲四書存疑，皆從蒙引來。後人讀蒙引，亦必兼及此兩書。

言朱子後之四書學，金華一派尤爲脈絡分明，傳緒秩然。黃全學案有北山四先生，始何基北山，爲黃勉齋門人。其學以熟讀四書爲宗旨。並曰：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又曰：

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

北山門人有王柏魯齋，年踰三十始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約語

錄精要，名曰通旨，以補勉齋通釋之缺。其於大學則謂無待補，於中庸則主分誠明以下別爲一篇，以符漢志中庸說兩篇之舊。

金履祥仁山，事魯齋而從登北山之門。宋亡，屏舍金華山中。有大學章句疏義兩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黃百家稱其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而非立異以爲高。

許謙白雲，長值宋亡，家破，往從仁山。嘗曰：

聖人之心具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

有讀四書叢說四卷，爲四書大全所收諸家之最後一人。

復有章元江四書正學淵源，蕭陽復爲之序，曰：

金華何文定先生，雖生朱子後，而口傳心授，得之勉齋。自是而傳之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僅二百年間，四先生踵武相承。凡四子書，悉爲之闡微疏奧，以翼朱註。國朝采集大全，書中溯其源流所自，謂非朱子之適傳不可也。

以上略述朱學後起研治四書之大概，其詳則不勝覲縷。讀者試繙明史藝文志及清代所編續文獻通考，一檢兩書中有關四書一類之書目，可以想像得之。直至明末，猶有陳明卿四書語錄一百卷，析義十卷，備考八十卷。張溥四書纂注大全三十七卷。則此一風氣，先自宋末，下迄明亡，歷久不衰，經亂彌盛，實爲宋元明三代學者心力所奔湊萃集之一淵藪，羣奉以爲學問嚮往之標的。論其實，則只限於朱子之集註與章句，闡釋復闡釋，演繹復演繹，不僅無逃於象山所譏之支離，北

山所憂之緩散，梨洲所評之無與於學問之事。抑亦如顏習齋所斥，字上添字，紙上添紙，率天下之文字而食天下之神智。以此衡評古今學術著作，固屬過激無當。以之指此一類趨，則實屬恰允。習齋初亦尊朱，殆亦未能脫此窠臼，倦而思變，故乃發此感切之深慨也。

晚明諸遺老，身嬰亡國之痛，激而反王學，實不過爲一部分人。而厭棄此種四書義講章之學者，則實爲清初諸儒之一般趨勢。遂有廢止科舉之主張。然其中有最激昂者如呂晚村，奇軍突出，乃即以宋末以來元明相傳四書義之外形，寄寓其深切之民族感，憑藉朝廷功令，以之激動一世。身後遭奇禍。余已略著其事於近三百年學術史。稼書較晚村生晚一年，其治朱學，亦受晚村影響。所著書，屢屢稱引及晚村。在其松陽鈔存中有一節云：

呂氏云：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成祖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輩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撫掇，多與傳注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樊籠。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

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

此引呂氏卽晚村。何王金許卽北山四先生。其謂襲通義之誤者，倪士毅著四書輯釋大成四十卷，又有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四十卷，通義出王逢。逢出洪初野谷之門。大全多本倪書，故晚村云云也。晚村此論可謂痛切。稼書雖加稱引，而其自下語則依違兩可，謂：

呂氏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背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非諸儒，則其樊籬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崇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

稼書爲朱學，其實主要工夫亦只在此。文集中有與席生漢翼漢廷書，指示爲學大要云：

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

文集中又有四書大全序，自述用功經過，謂：

舊本四書大全，舊所讀本。用墨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載而畢。

此六載乃自順治十五年至康熙二年，時陸桴亭已刊思辨錄，兩人同治朱學，而其高下淺深廣狹大小之異，則誠不可以相擬。稼書著有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彭定求爲之序，曰：

稼書先生既點定四書大全，輔以蒙引存疑諸解，羽翼傳注，深切著明。而遺篋中復有困勉錄前後二編，卽先生自題大全序所云：萬歷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冊者也。其高弟席子漢翼昆季，並梓以行。

此書功力，當開始在上述之六年間。其書之卒潰於成，則不定在何年。其梓行乃在身後，由席漢翼兄弟整理之。

至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稼書自序其松陽講義，已距其讀四書大全爲四書講義困勉錄之最先六年工夫相隔逾二十五年以上，然其講義中，亦時引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並亦屢引及於呂晚村。蓋稼書此三十年來，依然故我，實未見有大進步。雖獲締交於晚村，而受晚村啓沃之益者實不深。豈乃姿稟相距，無可強勉乎。

稼書之所以爲清廷特所引重，一則在其專力於四書學，上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以來，統緒皎然，有合於當時清廷重定科舉一尊朱學之宗旨。次則因稼書持門戶之見特深，於朱子後諸儒皆所排斥。其文集中有答某書，謂：

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

事矣。

昔自孔子之亡，楊墨莊老申韓百家言，羣起攻孔，乃有孟荀起而衛孔。孔學大昌，而攻孔諸家終亦存傳於後世。兩漢以後，魏晉清談，隋唐佛學，躋釋迦老聃於孔子之上，遂有北宋之理學，奮起相抗，而朱子集其大成。孔道又復昌，然釋迦老子道釋之學終亦存傳不輟。朱子後，理學中有陸王，清儒有漢學，皆與朱子爲敵。然此七百年來，朱子終巋然爲宗師巨擘。而陸王之學與漢學家言，亦皆存傳無可廢。稼書尊朱，其意雖篤，然果如其言，則人人可趨於不學，而朱子之所以爲精且大者，亦將隨以俱失。此則稼書一人之淺衷狹識，所以終無與於衛道之大任也。

稼書於朱學後起，最服膺薛瑄胡居仁。文集中與人書有云：

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

又曰：

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

又曰：

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

觀上引諸條，可知稼書爲學，固是循規蹈矩，惟謹惟慎。僅能欣賞薛胡，而必以羅整菴爲小疵，因整菴間有與朱子持異論也。只求入堂奧，不許關門戶。此乃稼書論學大旨。不知學問之事，正須能自關門戶，乃能入人堂奧。若只寄人籬下，則非能入人堂奧者。稼書不許人自關門戶，此卽

是其持門戶之見之最深處也。故稼書爲學，必一依朱子門牆，不能自樹立。凡與朱子相異，則必加辯斥。然所辯斥，亦非能有深見。其語多見於松陽鈔存與三魚堂牘言二書。如曰：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朱子分爲兩截，正相發明。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只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

又曰：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辭詖，嘉隆之際其辭淫，萬歷以後其辭邪，至今日其辭遁。

又曰：

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旨。

此謂高劉皆未脫陽明心學樊籠，其言似矣。然語多膚泛，並涉安排。謂陽明視理在心外，語既有病。謂高似周子主靜，劉似程子定性，語若分明，實非貼切。真能從事朱學者，正貴於前人書審思明辨，逐字逐句不放過，求其本義正旨所在，探其會通扼要之處。不當籠統配比，以孤辭隻語

作判。貌爲深微，而實屬臆測。此風若張，則理學將成莫可究詰之空談。

又曰：

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竟不要讀書，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

此又謂象山陽明指理在心外，而不見有所援舉，陸王究何曾持此說。今必認其如此，則須經明確稱引，曲折論辨，然後可以自成己說。寧能僅以一句話斷其如是。朱子論學，寧有此乎？又以象山景逸同爲主靜，陽明念臺同爲不分動靜，此尤漫汗排比，說不到四家學術精神與其異同所在。講學須能講到各家自所特有之精神，然後能辨其異同而判其得失。豈能自己拈幾個字面把來加在別人身上，此是以己見評前人，非能從前人真實處下評，豈能有當。驟看亦若配比得勻稱，然只是說話好看，說不上是學術之衡評。

又曰：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

求能衡評學術，惟朱子爲最善。其所崇重如北宋六先生，濂溪最少評騭，其他二程橫渠康節溫公，皆有從違。程門諸賢，謝楊游尹，抨彈尤嚴。歷古大儒，異同長短，多加衡別。雖孟子有不

免。然皆就其一節之是非，一辭之得失，剖析入微，以求於至當之歸。其致不滿者，宋儒中如荆公，如東坡，亦皆有稱揚。同時如象山，亦謂八字立脚，惟我兩人。卽如禪宗諸祖師，亦謂多魁傑人，爲我儒所不及。其於功業與節義，雖講學有異，亦必推許備至。若稼書能深研朱學，何至於明代理學特有難辨之感。惟因稼書持門戶之見太深，辨其學術，乃必就其功業與節義而爲一筆之抹殺，乃自感無以服人，而苦其爲難。如其辨陽明，除上引一節只爲空洞之膚語外，每引羅整菴因知記與陳清瀾學蔀通辨兩書，作人云之亦云，更又稱引及於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則可謂不知別擇之甚。尙不知羅、陳、張三人之高下得失，又何從而辨陽明之是非。

文集中有一段辨高顧，謂：

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樊籠。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

此辨亦似嚴而實妄。若論朱子正脈，則其學必求體大而思精，雖釋老亦多有可采。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卽能明白抉出其亂眞處，亦當確切認識其近理處。如陽明論學，豈得謂其更無近理處乎。高顧東林講學，意欲挽王返朱，其所以糾王之失而求重發朱子之是者果何在。能從此發明，則朱子正脈益張，而王學之與東林，要皆非無可取。何事乎堅立門戶以拒人，必爭正脈於一線乎？三魚堂贖言亦曰：

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矣。

此條語多恍惚。既謂看得性儘明白，又謂不認得性中條目，更又謂所謂性體亦是指心。朱子本橫渠言心統性情，性體豈不當從心上見。如孟子言心之四端，豈不即從心上認性中條目。若論靜坐，二程固常以此教人。必欲辨景逸之學與程朱大異，豈能只就靜坐一節，用三兩語含糊滑過。此皆只是門戶之見，非所謂審思明辨之學也。

又曰：

高景逸名尊朱子，而亦以大學古本爲是，是不可解。

又曰：

呂氏謂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略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可謂確論。

此引晚村，謂程朱改定大學，勝過古本，若專就義理言，謂程朱所發明增補之義理，勝過了大學古本中之義理，此亦可成一說。但稼書自己所云，究持如何意見，則並不明白。若但謂尊朱便不該以古本大學爲是，則王魯齋早已謂大學無待補，豈尊朱者便不該於朱子所言有一字之更動乎？

文集有書古文尙書考後，謂不佞平生於吳草廬諸書皆不敢輕信。又謂朱子於古文尙書固終信之不敢疑。此等辨古書真僞，更非稼書學力所及。於古文尙書則不敢疑，於古本大學則不敢信。多烘淺陋如此，寧得爲朱子之正脈？

文集又曰：

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

能救陽明之失斯可矣，何以必求脫盡陽明之範圍。稼書此處下語，謂名爲救陽明之失，其意似認高劉實不能救陽明之失也；然未見有明白之指說。治義理，貴能在義理眞實處審思明辨，不當依恃門戶，僅憑自己之意見。自己意見非卽義理。有門戶可恃，則若意見卽義理，不復深入尋求矣。

賸言有一條云：

黃太沖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爲斷。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此條亦未說明如何乃興起之師，如何乃爲成德之師。蕺山一代之端人正士，節義凜然，豈亦以其講學未脫陽明樊籠，故未得爲成德之師乎？余讀稼書書，每感其盡是架空立說，未見着落處，殆因其無眞知實見也。

賸言又曰：

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義理是非且不論，余讀孫黃陸三氏書，語言涵義最不清楚者乃是稼書，決非孫黃。實緣其心中所得本不真切曉暢也。

賸言又云：

陸桴亭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卽至善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不知高子此語，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

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一無極。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備，亦非謂冲漠無朕之外別有一萬象森然之境界。卽太極而卽無極，卽萬象森然而卽冲漠無朕，不必於此兩面強作分別。今謂無聲無臭卽至善，則不煩更立無善無惡一境，桴亭推說景逸立語之義極簡明，極透切。稼書乃必肆繞繳之浮辨，又何從而知景逸之只知無極不知太極乎。此須通觀景逸書，通論其爲學之詳，乃能定其是否如此。並謂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則陽明亦爲只知無極不知太極乎？本屬明白可爭辨之一事，乃必提致於渺茫無可究詰之玄虛中，此最理學界中惡習。朱子於此等最所不喜。爲爭朱子正脈，排陽明又排景逸，而不知自己乃陷於朱子所深惡之惡習中，此之謂不知務。

賸言又云：

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

了不雜氣質一邊。

此辨不能謂不是。然則高景逸主張無聲無臭卽至善，豈又是只說得朱子不雜一邊，而略了不離一邊乎。誠細讀景逸桴亭書，皆獨特有所發明。不必全合朱子，而自於朱子正脈有助。稼書一意欲求朱子之正脈，於朱學乃不見有發明。其於朱學之無所發明，卽觀其讀朱隨筆一書而可知，今不再詳論。要之凡上所引，如吳草廬、羅整菴、顧涇陽、高景逸、劉蕺山、孫夏峯、黃梨洲、陸桴亭，其成學著書，皆遠出稼書之上。稼書不能廣集衆長，顧皆致不滿。其所折服無遺辭者，則惟胡敬齋薛敬軒。然兩人之書，皆和粹惟自道其踐履，稼書則繳於言說，肆於抨彈，蓋一誤於大全講章之學，一誤於門戶之見持之已深。若以梁谿蕺山諸人爲興起之師，而稼書又烏得爲成德之師乎？

松陽存鈔有稼書自舉必讀書一條，謂：

必窮十三經，必閱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此學者之本務。但亦當循序而漸進。

讀史只舉綱目與通考，讀文只舉正宗，較之東發草廬梨洲桴亭，遠見爲枯瘠而骸鯁。其於諸子書，則全不措意。所得於六經者亦甚淺。舉爲必讀書，特以裝門面。其治朱子，實以大全爲主。如此爲學，豈得爲朱子之正脈。稼書每譏陸王不讀書，實亦何以相踰。

四庫提要評其三魚堂牘言有云：

賡言十二卷，一至四卷皆說五經。五六卷說四書，而附太極圖說近思錄小學數條，七八卷皆說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說子史，而亦閒論雜事。昔朱子博極羣書，於古今之事，一一窮究其原委而別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論，皆悉有根據，不爲懸揣臆斷之談。隴其傳朱子之學，爲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注唐疏，爲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其於朱陸異同，非不委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觀於是編，可以見其造詣矣。

清廷既特升稼書從祠孔廟，四庫館臣之於此編，乃稱之曰國朝醇儒第一，又曰一代通儒，可謂稱揚備至，與其他書之肆意抨擊者不類，其果爲由衷之論乎？其書首數卷言經籍者，較之清初順康時代他儒之所言，已遠不逮，更遑論於往後。在稼書亦特以備數。其文集中，特有讀金史九篇，雖無創見，豈不以滿清上承金統，故特著此數篇以裝門面，此已當膺心術之誅。其說諸儒兩卷，皆由讀梨洲學案而來，上引已見一斑，可勿再論。稼書又自稱不屑爲詩古文詞，今再摘錄其文集開始第一二兩篇有關於討論理學上之大問題者，以殿斯篇，亦以見稼書在理學上之真底蘊。

一太極論。其文曰：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

又曰：

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現流行，循環而窮。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

濂溪太極一圖，開出宋元明三代理學上一絕大問題，自朱子以來，討論此一圖者，元明迄於清初，可謂實繁有徒。今稼書獨化艱深爲淺易，謂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豈不己將濂溪一圖輕輕勾消。不悟天地之太極不明，則人身之太極究當何指。將一實在問題，化成一落空虛談。貌若切近，反落玄虛。此誠可與俗人談，難爲知者言也。

其第二篇理氣論略曰：

理氣之辨，不難乎明萬殊之理氣，而難乎明一本之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

又曰：

理氣之在吾身，其本在心。天地不可謂之有心，又不可謂之無心，此一本之在天地，所以難見。理氣之在天地，其一本者，亦曰有心而無心焉耳。

治朱子學，理氣之辨又爲一大問題。今稼書又若化艱深爲淺易，謂不難明萬殊之理氣，而難明一本之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而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是則朱子大學補傳可以不作，其格物

窮理之教，乃爲導人於難明，而忽人之易見。又將朱子平生再三申辨之一問題輕輕勾消。而象山主張先立乎其大者，乃爲得聖學真傳。稼書云云，亦如其所譏陸王高劉之以心爲籠罩也。

舉此兩例，即可證稼書論學，實是強不知以爲知，徒在字面上掉弄，在朱子則必斥此曰花言，謂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稼書之所以不脫爲一種舉業講章之學者亦正在此。驟視之，若無可非刺。深究之，則空洞無物。此乃理學中一鄉愿，而依傍門戶以自高。清廷特舉以爲治朱學者之楷模。宜乎後起諸儒益滋反感，相率以反朱自見，而稼書乃特不爲後人所稱道。惟道光時吳廷棟特重之，謂：

歷觀朱子以後之大儒，其篤信好學，深造自得者，固大有人。而真知心性之辨，而不惑於似是之非者，惟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

同時唐鑑爲國朝學案，亦盛推稼書，然此皆梨洲所譏無與於學問之事也。

九、呂晚村學述

余在四十年前，草爲近三百年學術史，述及呂留良晚村之四書講義，根據朱子，闡揚民族思想，引起曾靜之獄。清廷特爲頒發大義覺迷錄於天下學宮，令舉子人人必讀。嗣又禁絕，不許流行。而晚村乃遭斷棺判屍之奇禍，其家人亦遣戍關外，成爲清代文字獄中最特出聳聽聞者。晚村因講四書而嬰此冤酷，亦爲自宋以下理學史中所少見。同時陸稼書服膺晚村，乃獲清廷褒獎，從祠孔廟，成爲清代第一醇儒。清政權之高下在手，予奪從心，治清初學術史，與清廷高壓懷柔政策之兼施，此兩人之事，殊值注意。此篇稽之晚村文集，撮記其生平，以附本編稼書一篇之後，並以補往年學術史舊著所未詳。徐世昌清儒學案撫述張楊園陸稼書兩家著述有關晚村生平者數事，殆似未見晚村集也。余撰學術史時，亦已據晚村文集，惟今所述，與學術史詳略互異，讀者可參閱。

晚村文集卷一復黃九煙書，謂：

某少時不知學，狎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悔恨，不但俠邪浮薄，惡之不爲，卽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悔恨者。

又文集卷七孫子度墓誌銘，謂：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雜沓千餘人中，重志節，能文章，好古負奇者，僅得數人焉，孫君子度其一也。越三年，子度擇同邑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余年十三，子度竟拉與同席。時外禍內訌，國勢頽壞。門戶之鬪復興，靡然敝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

是則晚村幼年初學，卽已與當時社事有關。文集卷五東臯遺選序詳論之，曰：

自萬歷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吾兄所主之澄社。予年十三，與同里孫子度十餘子爲徵書，予之交陸雯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囿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脩名檢，畏清議，案驗皂白，故社多而不分。及是則士習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

搏軋。鏃頭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嫺戚不復相顧。塗遇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牛耳，奪選席。販夫牧豬，皆結伴刊文。社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

晚村早年既預社事，自交陸雯若，又預選事。結社敝風既如此，晚村又嘗極論當時選事之敝。文集卷五今集附舊序有曰：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躡取爲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

又戊戌房書序有曰：

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何書。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黠者割首裂尾，私立門類，沿襲鈔撮，俄而拾取青紫，高車大馬，夸耀閭里。蓋嘗以爲起祖龍於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盡燒之，則秦皇且爲孔氏之功臣，誠千古一大快事也。

文集中論及當時選事者尙多，而晚村之耗精力於選事者亦不少。晚村於清順治十年就試爲諸生，與陸雯若同爲選事，則在順治十二年乙未。至康熙十年棄諸生，以不應試除名，特其留心選事則如故。自謂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則在康熙之十二年。文集卷四與董方白書有曰：

選文行世，非僕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

蓋晚村乃以批選八股成名，亦以此彌縫其生事。惟晚村之批選八股，乃與當時之以批選爲業者大不同。文集卷五有東臯遺選前集論文一則，備見晚村對有明一代三百年科舉文之評騭，而其從事評選，所大異於時俗之選手者，亦卽此可見。其文曰：

洪永之文，質朴簡重，氣象濶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蔑以加矣。嘉靖當極盛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宏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歷乎。丁丑以前，猶厲雅製。庚辰始令限字，而氣格萎蕤。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湖已下，不能留也。至於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刦，意見龐逞，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名構甚多，此猶未備也。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此皆本於文字以窺人心，覘世運，深得朱子論文之淵旨。與一般從事選政，徒以獲取利祿爲標的者大異其趣。

晚村既早年即從事於此，並於清初應試爲諸生，時年二十五，則晚村亦若爲一熱心舉業中人，而其實不然。晚村之悟入理學，崇奉朱子，正從其誦讀朱子四書而來。文集卷二復王山史書有曰：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即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於世。所謂理學講道，則概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八股制義，於所謂古文詩詞，亦概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友，故友朋絕少。甯人兄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他可知。

僅知信朱子四書註，僅知爲八股制義文，此乃晚村之自謙，抑亦其自傲之所在。晚村自謂理學講道，概乎未聞，此則其與當時理學家不同處。晚村又嘗與吳孟舉選刻宋詩鈔，又豈得謂於古文詩詞概乎未聞。而晚村爲人之兀傲不羣處，亦即此可見。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謂：

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慙慙批點。人遂以某爲宗宋詩，嗜時文，其實非本意也。

此證晚村之答山史，乃其過激之言。要其爲學，自朱子四書注入門，亦深喜宋儒，而乃深不喜於當時理學家之講學所爲，亦未能如亭林梨洲諸人之轉途深治經史，而始終落在時文圈套中，乃獨以批選時文成爲中國學術史上一特出人物，此則晚村之所以爲晚村也。

文集卷一答潘用微書，亦謂：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聞也。

篤信朱子而上及二程以及孔孟，此卽理學也。而必自辨爲不好理學，未嘗有聞，此乃晚村必欲自置身於朱子以下之所謂理學之林之外也。又答吳晴巖書有曰：

某平生無他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眞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闡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是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闡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卽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而已耶。況某村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初非謂制舉文字當爾也。

又曰：

某之尊信朱子，又親於孔孟。

蓋當時人率分理學舉業爲兩途，治舉業則尊朱子，而講理學則當別有用心，而晚村非之。謂治舉業亦當辨理道，闡聖學，而講理學亦無過乎朱子。故晚村自入清以來，雖亦應考，雖仍留心當時

制舉文字，然亦卽以此爲辨理道闡聖學之藉手。而其主要信仰，則在朱子一人。不如一般理學家之門戶紛張，異同雜起。其答葉靜遠書有曰：

醫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一事。卽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譖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不免胡亂差卻路頭耳。若謂弟逐蠅蠅生計，弟雖不肖，不至汙下如此。

晚村深惡明代正嘉以下之講學紛紜，而一意獨尊朱子四書章句集註，謂卽此可見義理，故批點時文亦所以闡理義。若一意看輕了經義，則如明儒正嘉以下之講學，又何嘗遽勝於講章制藝。同時顧亭林有言，經學卽理學也，捨經學，又烏得所謂理學哉。其實晚村之意亦復如此。惟晚村乃專以朱子四書注爲學，則實爲理學史中所特有之格局。原書後幅又曰：

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注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煨水磨之功，卽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注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注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

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注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不覺其自墮於邪異。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注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注始。此某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

此處以正嘉以後講學家爲異學，以與村師俗學並譏。而謂講學之興，正爲村師俗學所激。其指陳當時學界實病，極值注意。而晚村自所致力，乃轉若於村師俗學爲近，而於當時講學家言，若不勝其鄙薄之意。今姑不論晚村自己爲學之是非，要之論明儒學術者，不可不注意及於其同時制舉講章之所爲，與其相激相盪之情勢，則晚村之語，實是深可推敲也。

又文集卷五程墨觀略論文有曰：

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畸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

又曰：

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羣情之所欲流，起而挾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徒，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攻背朱注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

此處晚村直指朱學之流而爲講章，而以講章之陳腐，激起異端之高論。遂使有明一代學術，成爲異端講章綺互勝負之局。晚村此一見解，可謂隻眼獨具。明代以厭薄講章而激起良知心學，及清代晚村以下，講章家言漸衰退，然考據漢學，亦復爲朝廷制舉空疏所激起。乃與明代心學，同以攻背朱注爲事。雖清儒之考據經學，不當與元明講章家言相提並論，亦不與良知心學同條共貫，要亦有其病害之不可勝言者，則又晚村所未及見也。

然晚村於當時講章家言，雖極致其鄙薄之意，而其自所致力，則終不出講章一途。在彼之意，實欲拔趙幟，立漢幟，借講章之途徑，正儒學之趨嚮。文集卷五戊戌房書序有曰：

漢元光五年，徵天下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所謂當世之務，卽今之對策，所謂先聖之術，卽今試士之經義耳。愚以爲欲興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而後可。計庸腐之儒，海內可數十萬人。此數十萬庸腐之儒者，其耳目無所開，其心思無所用，游談妄議，武斷鄉曲以爲蠹，如此而人心不壞，教化不亂，事業不損，衣食不耗，而無害於國家者，未之前聞。愚生長草莽，不知忌諱。竊冀當世之名公鉅卿，留心時務者，當輶車之採

焉。

戊戌爲順治十五年，乃晚村始從事於選事後之第三年，亦晚村從事應試後之第五年，其時晚村意態如此。逮後乃發揮君臣大義，夷夏大防，其見於身後其弟子後學所編之晚村四書講義者，余旣已著之學術史，蓋其意態前後有不同。而乃驚風駭浪隨之而起，可證晚村之一意於四書講章之翻新，實是於世局可有大影響。不論講章家言與良知心學家言，乃及考據漢學家言，要之存於心斯著於外，發爲事業，蔚爲世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誠之不可掩如此。此卽程朱理學所欲發揮之大義理所在，又烏可以晚村之所爲乃屬制舉講章之習套，而輕加忽視乎。然而晚村則竟以此罹奇禍，斯亦晚村所未前料也。

文集卷二與某書有曰：

某本村鄙，業無淵源，特守童時誦習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非其所知，亦平生所憎疾而不欲聞者也。拙選止於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目下收拾有明三百年之文爲知言集，雖布衣社稿皆與焉。但生存不錄，以人物界限，必蓋棺論定也。

是晚村選時文，一以明代爲斷，入清以後，卽不復論。謂人物界限必蓋棺論定者，值易世之際，人之品節，或出或處，爲遺民抑爲貳臣，非蓋棺有不可知。是晚村之旨亦嚴矣。

文集卷一復高彙旃書，有曰：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

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義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

彙旃乃高景逸子，來書辨朱陸，晚村復書乃推廣辨及夷夏。致慨於德祐以後天地之變，許平仲吳幼清，名為治朱子學，而實失朱子之傳。講理學正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而豈理氣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誠偽，判是非。此一主張，乃暢發於其四書講義中，亦可謂當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為善述朱學也。

文集卷三有答陳受成書，謂：

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為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為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者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

晚村如此論學，如此解格物，則值晚村之世之所謂學者，自當無大無急於在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朱子之教格物，此卽其當務之大且急者也。

文集卷四有與董方白書，有曰：

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宦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爲。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爲幕師，卽於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日趨於閃鑠變詐之途，自以爲豪傑作用，而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一總壞盡。驕諂並行，機械雜出，眞小人之歸。其家人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爲也。

晚村勸人莫作宦，且處館。又勿爲幕館，只爲書館。此等處，只是家常平實，所謂卑之無甚高論，然吾儒之正業，格物之大訓，豈不於此等處正當熟慮明辨乎？

文集卷二與高且中書，有曰：

聞醫行鄰邑當事，得直足資薪米，甚慰甚慰。然此中最能溺埋，壞卻人才不少，急宜振拔灑脫爲善。念頭澹薄，自然刪落。若不甘寂寞，雖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爲進，趨利如鶩，此中徑畛甚背懸，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堅坐之具，身有攬取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塌脚，不難入無底之淵，故不禁其言之屑屑耳。

明遺民之在清初，其生事皆備極艱困。文集卷八有賣藝文一篇，備述高且中以醫自活，並兼養其

友黃晦木，其文作於順治十七年，已略引於學術史，茲不贅。翌年，復爲反賣藝文，有曰：

嗚呼！知予之賣藝也非衒奇，則其不賣也，亦非高價以絕物。吾知後之哀其賣者，又不如哀其不賣者之痛深也。

晚村本亦賣醫爲活，後乃絕不爲。觀其誠且中書，亦可想見其痛深之一斑矣。

文集卷八客坐私告有曰：

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卽不敢復近。心有恐懼，習久性成耳。二曰名士，向苦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而變相傍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賓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敘聲氣，方技託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接與不接，總獲響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卽終日大幸。三曰僧，生平畏僧，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人託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邇年以來，頗見託迹者開堂說法，誦事大官，卽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託迹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於僧矣。

此下復舉九不能，一寫字、二行醫、三酬應詩文、四批評朋友著作、五借書、六薦牘、七宴會、八貨財之會、九與講會。觀此，知晚村之孤介自守，乃亦不免於任氣傲物，憤世嫉俗，若有背於儒道之中行，然晚村固謂時中之義別須嚴辨，知人論世如晚村，固不當以常格衡之也。先是浙省以鴻博薦，晚村誓死得免。嗣又舉隱逸，乃剪髮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文集卷六有自題

僧裝像贊曰：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袂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然雖如此，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唱曰咄，嘮叨箇甚麼，都是畫蛇加足。

晚村處此世變，而兀傲縱恣有如此，亦幸其不壽而獲終天年。否則不待曾靜之獄，其晚節所遭遇，蓋亦有不可以逆料者。晚村殆是以狂者之性格，而勉爲狷者之行徑。今在三百年後讀其遺集，猶不勝有惋惜之餘情，亦可爲同時晚明諸遺老致同樣之追念也。

當晚村之世，以理學大儒而嚴斥晚村，非斥晚村之爲人，乃斥晚村之爲學，以其人與晚村初不相識也。其人乃衡陽王夫之船山。其搔首問有曰：

近世有崇德人呂留良，字用晦，極詆陸王之學以衛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稱道三蘇不絕。三蘇豈敢望陸王之肩背者。

又其識小錄有曰：

俗學之遵朱子，適以褻侮朱子爲大愿耳。朱子之注聖經，初非爲經生求名計，況倚以選刊時文教人選捷徑而自牟利乎？若呂生者，讀陸子靜白鹿喻義章講說，不知尙有恥心存焉否也。奉朱子之緒論，遂敢目空今古，其無忌憚也，不但辨陸王而止，且譏康齋之欲入內

閣，白沙之應召拜官，君子出處之節，豈雌黃時文，教人作倚門妝以射書賈之利者所能識也。甘泉念菴並遭非毀。薛文清羅文毅，猶不在其意中，鬻虛名，牟厚利，是鐵門限門外人，不知量，不思咎，喋喋煩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況錐刀爲小人之已細者乎？

船山持正論，其嚴且酷，尤甚於雍正之大義覺迷錄，後人讀大義覺迷錄，則未有不同情於晚村者。船山蠖居三湘，其守夷夏之防，豈不一如晚村，然而猶有義理之防。若義理墮而人才喪，則又於何辨夷夏乎？辛亥復國，人人知尊船山，至於晚村，乃供歷史之憑弔而已。此又讀史論道者所不可不知也。

此稿刊載於民國六十二年元月故宮圖書季刊三卷三期

一〇、讀張穆著閻潛邱年譜再論尚書古文疏證

回憶民國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學講近三百年學術史，編撰講義，先期分發。翌年春，撰及閻潛邱，竊意尙書古文一案，早成定論。惟敘述此案，不當不兼及毛西河，因比讀冤詞疏證兩書。初謂是西河駁潛邱，乃疏證中明明是潛邱駁西河，心大疑惑。兩百數十年來學人，亦絕未提及此事。時值春假，首尾七日，在二道橋寓廬第二進一小書室中，閉戶思索，窮七日夜之力，完成一篇，快怵無窮。距今已四十四年，猶回憶如新。一日神倦，隨手再翻張穆閻潛邱年譜，觀其摭拾叢碎，排比詳整，余爲學術史時，張譜亦一重要參考，頗加徵引。然辭尙簡要，棄而不取者尙多。讀余學術史者，同時未必兼讀張譜，余言創闢，乃有疑其取證若嫌未足者。今年力已衰，精心鉤稽，媿不如前，姑就張譜，再事鈔撮。亦足爲余四十四年前舊稿添助證，然苟細讀余學術史，則此篇實如買菜求益，大可不必。姑爾成篇，聊資消遣而已。

張譜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潛邱年廿歲。

錢傳：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卽疑其僞。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

行述：著尙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

康熙十一年壬子，潛邱年三十七歲。

疏證卷二：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蹟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

爲是說矣，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又疏證卷七：憶余晤寧人壬子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曰否云云。

今按自二十歲至是十七年，時疏證似未成書，然信力則已臻堅定矣。

康熙十二年癸丑，潛邱年三十八歲。

疏證卷八：鄒平馬公驢，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尙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尙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釋史，引及尙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觀此條，似疏證至是仍未有成書。

康熙十四年乙卯，潛邱年四十歲。

劄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

潛邱是年始爲劄記，似當較草創疏證略後。

康熙十七年戊午，潛邱年四十三歲。

疏證卷四：余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眞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

是年，清廷詔開博學鴻儒科，潛邱徵詣闕下，獲識同應薦者王山史，張譜以疏證卷四一條附見此年，殆此年疏證已成四卷，乃託山史攜此卷歸華頂也。

康熙十八年己未，潛邱年四十四歲。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閻生並州彥，徙宅清淮濬，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咕呻。疏證卷五上：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又疏證卷八上：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戊午己未間，潛邱疏證至少當得四卷，並徧示同時諸學人也。

又按：張譜引黃梨洲有尙書古文疏證序曰：

淮海閣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

此文見南雷文定而無年可考，張譜亦未定其年歲。然似在戊午未赴京前在淮安所寄。

又按：潛邱子詠撰潛邱行述，稱潛邱著古文疏證自二十歲始。又曰：諸子史集，亦自是縱

學，無不博覽。蓋其辨尙書古文之僞，所論不限於尙書，牽涉至廣，故歷二十三年而始成書四卷，觀梨洲一序，可想見其用力之勤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潛邱年四十八歲。

疏證卷一，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璞乎。越次日達岸。

疏證第一卷定本，寫於此年，距其初有意於辨古文之僞者，則已二十有八年矣。其距疏證第四卷成書，至少亦當五年。鄭重若此，並引東坡碇宿海中遇險爲例。其成書之不易，其珍視之亦可想。

康熙三十年辛未，潛邱年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尙書爲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潛邱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

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眞謬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眞，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馮山公與潛邱同斥古文之僞，而潛邱斥之若此。厥後毛西河辨古文非僞，而潛邱反付以閤默，其間所以，亦大可思。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潛邱年五十八歲。

疏證卷八：癸酉冬，薄遊西泠，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僞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小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西河與潛邱論尙書疏證書：昨承示尙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尙書爲僞書耳，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牛不及，而忽詬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

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邱交。暨至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邱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旣而謝去，出所辨尙書二十五篇，挾之遊錢塘。時潛邱亦垂老，毛髮極極，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矣。乃取所爲文讀之，謂之曰：君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寧

叟，則出之遠矣。

康熙十七年戊午，舉博學鴻詞，潛邱至京師。疏證第四卷初成，由王山史置其一本於太華山頂，則其時疏證方在草創中。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又淨寫疏證第一卷。事均詳前。至是又十年，疏證八卷殆已成書。西河送潛邱序文，於戊午京師相見，僅言觀其所著書，而不提及疏證。至是年始云出所辨尙書，則西河或至是年始讀其疏證也。又西河與潛邱論尙書疏證書，亦僅辨朱陸異同，不及古文真偽，是西河於此問題，當時亦尙未深加注意耳。又考今疏證，不見詬金谿姚江語，是潛邱已以西河書而徑自削去矣。又疏證引姚立方，散見卷二卷四卷五卷七卷八，則潛邱疏證，此年或已有八卷之本。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潛邱年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得梨洲黃先生凶問。先生愛慕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遂做聶雙江故事追稱弟子。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竹垞及毛檢討兩先生，時時過從，商榷學問事蓋最多。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潛邱年六十四歲。

李恕谷年譜：己卯，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尙書，堪曰：毛先生有新著。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

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塏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尙書事，想已屈服矣。

毛西河寄潛邱古文尙書冤詞書：近蠡吾李塏，寓居桐鄉，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尙書真僞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愜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後，始快快。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尙書定論四卷，其中徵及潛邱，並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邱。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牴牾，啓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

劄記題古文尙書冤詞：孔穿曰：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尙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尙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辨，而但付之閔默耳。

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

毛西河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始見閻潛邱疏證，至是六年，始成冤詞。蓋引起於恕谷也。今冤詞中亦多引恕谷語。其先於此案並未注意，故潛邱引何邵公語相擬。然潛邱意乃以康成自居，以西河擬邵公，故曰今日豈其然也。潛邱自謂但付之閔默，而余考潛邱疏證，實有轉駁西河冤詞中語，是所謂不復與毛氏辨者，乃欺人語。西河冤詞中有擊中疏證弱點，潛邱乃默自追改舊稿，使後人讀之，一若疏證無不是，冤詞無不非，潛邱之計亦狡矣。潛邱卒在六十九歲，距此前五年，非無時間改其舊稿。其子詠所爲行述，於潛邱年五十四時，引胡朏明語，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飫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書云云。則潛邱見冤詞後，斷無不理之理。且疏證中前說有誤後加改定者，亦多有之。若使潛邱肯注明因見西河冤詞，自知有誤，因加改定，豈不證大賢無我從善之公心雅量，當更使後人佩服。潛邱不此之務，誠可惜也。

又按疏證卷二有一條，或問：子書尙未成，何不舉前說之誤者而悉削之。余曰：此以著學問之無窮，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近見世之君子，矜其長而覆其短，聞有商略者，輒同仇敵，余用是數困於世。潛邱之言若此，而獨於西河冤詞之指摘其書，一語不提，復於確中其短者，則削去改爲，此非自覆其短乎。又西河於順治末年已在淮上初識潛邱，潛邱年僅二十五、六，故西河謂

其年損而學多。及後兩人往返，先後達四十餘年，疏證引述平生交游相識，備極詳悉，獨於西河僅一條，見卷五下，並絕與學術著作無關，豈非其視商略如仇敵乎。而復故掩其迹，特著此條以釋後人之疑，是何其心計之工耶。

又按疏證卷六卷七兩言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是潛邱自知疏證必傳，非劄記可比，西河冤詞直接與疏證有關，潛邱顧不以見於疏證，而獨載於劄記，又見其用心之若揭矣。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潛邱年六十八歲。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拙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冤詞相抵。其後拙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曆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誤說而又誤者。余因於衆中大擲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

攻古文尚書之僞一案，自南宋吳棫朱子下迄元明兩代，絡繹有人，然考據精詳，後來居上，則必首推潛邱。西河冤詞歷舉朱子吳澄郝敬歸有光，獨不及潛邱。猶曰：彼妄言之，姑妄應之，其同時附和，解語雷同者，概不置辨，省詞費耳。是其經蔑潛邱之意，溢於言表。恕谷出示其書，潛邱語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蓋冤詞明駁疏證，而不加指明，其意甚毒。潛邱不能忍，故於疏證中亦絕不及西河，而曰付之閔默。然冤詞指摘疏證疎失處，潛邱乃追改舊稿，以求完美。若遽

加發刊，而不註明因西河之指摘，則西河必更肆擲擲。然亦不能對此案不作一交代，故遂有意合刻朱子以下攻古文者爲一集，此誠不得已而思其次之委曲心情也。乃其事又爲西河所悉。此證自西河冤詞行世，潛邱實時時爲此操心，其追改舊稿，自可想像得之。又張譜逐條引述疏證載及同時學人諸節，亦止於西河發刊冤詞之年，此下即不再有。然疏證卷五下實亦引及竹垞一條，即有關潛邱有意合刻朱子以下攻僞古文一事，惟未注年月，故張譜未引。然配合西河此年與恕谷書，則其事亦應在冤詞發刊之後。是今八卷本疏證，既明有冤詞發刊後所增入者，亦自可有冤詞發刊後所追改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潛邱年六十九歲。

墓志：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劄氏，餘將次第爲表章，而先生不起矣。

行述：執不孝手命曰：吾一生著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尙書古文疑、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尙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聞蒙殿下序而行之，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

此兩處舉潛邱著書，乃有朱子尙書古文疑，而無劄記，大可注意。所謂朱子尙書古文疑者，是年

五月，其子詠刻於京師。序云：

家大人徵君先生，著尙書古文疏證若干卷，非之者亦復不少。徵君意不自安，曰：吾爲此書，不過從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耳。因命詠取語類四十七條、大全集六條，彙次成編，名朱子古文書疑，就京師刻以行世。

是潛邱於是年力疾赴京，僅兩月而卒。朱子古文書疑，乃命其子詠彙次朱子語五十餘條，亦不成著述。蓋因疏證在追改中，乃以此上呈皇四子，以張門面。及潛邱卒僅三十六日，其子詠卽以刻之京師，固因篇幅無多，易付剞劂，然其子云：家大人著尙書古文疏證，非之者不少，徵君意不自安；此卽指西河怨谷，而潛邱之意不自安，亦於其儘先刻此一卷之事而可知矣。

又按潛邱次孫學林，詠出，刻尙書古文疏證成，事在乾隆乙丑之秋，上距潛邱卒已四十一年，距西河卒亦已二十九年，距怨谷卒十二年。其識文有曰：先君子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來，微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泫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嗜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淮揚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蒞事。回憶學林之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十二年於茲矣。又跋曰：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是潛邱有子有孫，疏證之身後付刻，事極艱難，而其子若孫於先人遺書之鄭重謹慎，則確可信徵。今疏證八卷中，第三卷全缺，第二卷闕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條，七卷闕第一百二、一百八、一百九、一百十條，卷八闕一

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七條，有目僅空存者，有並目而闕者。四庫提要謂若璩歿後，傳寫佚之。然觀其子詠行述，明記潛邱遺命，諸書未刻成者，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又言一生著書，未成者爲尙書古文疏證。則今刻疏證，乃潛邱生前因有追改而闕，故曰未成也。又詠刻朱子古文書疑序明云：尙書古文疏證若干卷，不云八卷，則第三卷已先闕無書。若是傳寫佚之，不應一卷全佚。又其他各卷，亦不應皆整條全闕，而且所闕或有目或無目，此已詳論於學術史，蓋正因其子若孫謹遵潛邱不可妄改一字之遺命，所以有此。若是傳寫佚其一卷與諸條，學林亦當於刻書時註明，何更無一字及之。又疑潛邱生前不刻疏證，其用意所在，其子詠必知之。其孫學林知否不可知。據學林云：癸卯己酉，兩至京師，先人舊好寥寥數人云云，是詠卒必在雍正元年癸卯前，時西河方卒六年，與詠卒當相近，而恕谷猶健在，是詠之欲板行疏證而未有成局，實因仍有顧忌耳。四庫提要又云：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不知潛邱此書，自二十歲迄於六十九，前後已逮五十年，豈得仍云草創。抑且其書前四卷，當潛邱四十八歲時，已多副本在京師，若佚其第三卷，儘可卽在京師訪求，亦正因其書多有副本流傳，故潛邱自經追改，第三卷全刪去，而不欲早刻，特恐人發見其痕迹。此卽潛邱自云不欲示人以璞也。其子詠在潛邱卒後十五年左右，終不刊行此書，亦爲此故。情事宛然，夫復何疑。

張譜又載潛邱劄記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並曰：
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遂致漫無體例。

又引茶餘客話：

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遊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硃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余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

今按：潛邱生平著述，尙書古文疏證最所珍重，劄記較最輕視，兩書付印同在最後。劄記亦未散失，其後人過於謹慎，務求一字不遺，遂遭譏評，豈疏證轉有傳寫之佚？可知提要爲猜測不可信之辭矣。

又按：方中德古事比前刻有答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嚴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潛邱此書，不知在何年，然自見西河冤詞後，其疏證亦必有應時改定處可知矣。

一一、記姚立方禮記通論

尙論古代學術者，每謂秦皇焚書而學術中燬，下迄漢武，乃始復隆。夷考其實，殊不盡然。昔章炳麟爲秦獻記，粗發此意，而猶未盡。伏生尙書終於秦誓，此明爲秦博士媚秦而作。秦誓之文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又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此已戰國晚年乃至秦人統一，政府有丞相之制始有之。春秋穆公時，貴族世襲並峙，何有乎此一個臣？然則秦誓乃秦博士作而上託之於穆公也。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夫其身。」此卽李斯焚書口脛也。故舉名山則曰華嶽，其爲秦時人作無疑。祭義用黔首字，殆亦出於秦代。漢文令博士諸生作王制，卽今戴記所收，故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又曰：「史以獄成告於正。」漢有平正丞，承秦所置。此皆鄭玄已言之。呂氏春秋尊師篇列舉古聖帝王始自神農，最爲遙遠矣，而易大傳於神農之上復有庖羲，則大傳出呂氏後也。然秦人焚詩

書，獨易爲卜筮書不焚，則易在當時，尙不與詩書伍，儒言驛入者當尙少。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稱四術不稱六藝，與此後淮南、董仲舒、司馬遷之言不同。易大傳之出，當與王制相先後，或猶在王制後也。樂記集於河間獻王。大學引秦誓，而言平天下特斥聚斂之臣，則似當出武帝時。學記屢言大學之教，當與大學略同時。此皆後世羣尊以爲聖經賢傳，儒教經籍，微言大義典章制度之所寄，而實錯落雜出於秦皇漢武之間，則其時學術之未全燔，而別有其演化轉變之甚大者，可勿煩詳論而知矣。或者將疑此等皆宏篇鉅著，何由產於其時，而又不得其主名之人？則試問呂覽淮南，此亦百家之卓越者，豈成於呂不韋劉安之手乎？是皆產於其時而不得其主名，則何獨於儒書而疑之？（戴記中月令明堂位，相傳由馬融增入。又曲禮王制禮器郊特牲大傳樂記祭義，文皆有與何氏公羊傳注相同，而何氏並不標以禮名。曹廣權疑何劭公別有所據，而纂禮記者亦據以增入。此亦必漢人語，而戴記之成今書，則尙在東漢矣。）

有清初葉，學者疑古辨僞之風驟張，而錢塘姚際恆立方尤推巨擘。獨爲九經通論，惜不盡傳，其禮記通論則散見於杭世駿所編續禮記集說中。其書於小戴所收諸篇，逐一考其著作之先後，辨析其思想議論之所從來，若者爲儒，若者爲墨，若者爲道，而第其高下，判其是非得失，雖不盡當，要異於拘常守故之見也。姚氏既不信羣經盡出一源，而能辨其先後眞僞，故於後儒執禮解禮，混周禮、儀禮、禮記爲說者，尤致掊擊。曰：「讀書而不能知人論世，有以辨夫作者之後先，亦奚當哉？」（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六喪大記篇）又曰：「禮言不必盡同，古人文字，亦欲各出

其能，不爲雷同也。後儒乃欲寸寸而合之，銖銖而較之，豈不愚哉？」（卷八十祭義篇）姚氏不信周禮，以爲乃劉歆王莽所僞造，故曰：「說者多以周禮王制孟子三書並言，爲之較量異同，此無識之士也。乃有信周禮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禮王制疑孟子者，尤無識之甚者也。」又曰：「周禮出於王莽、劉歆，寧足敵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漢文令博士所集，又寧足敵孟子之書？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與孟子異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卷十九王制篇）夫謂孟子所言皆周制之真，謂周禮乃歆、莽所僞，此俱未可爲定論。然謂以周禮王制並言，爲之較量異同，皆無識之士，則真確論也。晚清經師不明此意，乃謂漢儒今古文經學分家，全本禮制。今文家宗王制，古文家宗周禮，一切壁壘由此而判。既知周禮王制不可合，復將以其他一切經說，分別合之周禮王制，豈不誠無識乎？漢儒說禮，遇不可通處，又往往以夏殷周三代異禮爲說，姚氏力斥之，曰：「嘗嘆鄭、孔於王制之不合周禮者，皆以爲夏殷禮。今於禮器亦然。孔子於夏殷禮已無徵，而周末秦漢之人反能徵之。噫！愚亦甚矣。」（卷四十三禮器篇）又曰：「記中如舊稱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三年問荀卿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漢博士集，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大抵不出周、秦、漢初人也。夫以周、秦、漢初之人，其於載籍所遺留，耳目所覩記，不過周之中葉以後爲多。若文、武之制，固已邈若隔代，況能及於文武以前孔子所歎爲不足徵者乎？鄭氏以誤信周禮之故，其注禮記，凡於周禮不合者，或曰殷制，或曰夏、殷制，或曰虞、夏、殷制，……一切武斷，紊亂禮文，莫斯爲甚。」（卷九曲禮篇）此皆深著漢儒無徵曲說之病也。

姚氏又曰：

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言儀也。此（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似放其語，然亦失之。夫經禮者，五品之人倫盡之矣，安得有三百乎？自有此說，而後之解中庸者，又據此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誤之誤也。然此經禮曲禮，亦不過謂禮之大小有如此耳，初未嘗指一書而言之也。鄭氏則以周禮爲經禮，朱仲晦則以儀禮爲經禮。夫作禮器者，大抵周、秦間人，其時周禮未出，安得預指之？至於儀禮，其書本名爲儀，正是曲禮之類，乃反以爲經禮，何耶？且必欲各憑臆見，求一書以實之，古今陋學，洵有同揆矣。（全上）

姚氏同時萬充宗有言：「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通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姚氏之治禮，則在分析諸經而各得其通，較之萬氏所謂以經通經者，其意又別焉。且姚氏不徒於儀禮周官與小戴之間爲之區別也，卽小戴四十九篇亦一一分別觀之，甚且於一篇之中，亦每就文爲說，而有不務爲強通者。其說曲禮云：

前文云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則諸侯子未除喪，稱嗣子某矣。此又云適子孤，是有兩稱。卽一篇之中，其不合如此，況他篇他經乎？益可見其不可執禮以解禮矣。（卷九曲禮篇）

又曰：「曲禮本雜取諸說，不必組合。」（卷十曲禮篇）其說禮之態度如此，雖所釋未能全是，要

可謂葛籐盡斬，蹊徑獨闢矣。故姚氏深不喜後儒解經之說。曰：

嘗謂經之有解，經之不幸也。曷爲乎不幸？以人皆知有經解，而不知有經也。曷咎乎經解？以其解之致悞，而經因以晦，經晦而經因以亡也。其一爲漢儒之經解焉，其一爲宋儒之經解焉，其一爲明初諸儒墨守排纂宋儒一家之經解而著爲令焉。噫！果其爲聖人復起不易之言以著爲令，可也。今之著爲令者，然耶否耶？夫經解與著令，其事大不相同。其君若相，不過以一時治定功成，草草裁定，初不知聖賢真傳爲何若耳。乃使天下之學人，耳目心思，卒歸於一途，而不敢或異。是以經解而著令，不又其甚焉者乎！窮變物理自然，材智日新，寧甘久腐？苟以漢、宋諸儒久悞之經解而明辨之，則庶幾反經而經正，其在此時矣。此以經解名篇，正是漢儒之濫觴，漢以前無之，則吾竊怪夫斯名之作俑也。（卷八

十三經解篇）

姚氏此論，深可代表清初一輩學者之見解。深惡朝廷功令，思有以一變之，一也。直窮本經，不問漢宋，皆所揚棄，二也。當時不乏努力欲爲新經解者，厥後清廷仍遵程朱取士，不敢爲大變。

而在野學者則高譽鄭、許，揭櫫漢學，以與朝廷功令相抗。雍乾以下之學風，始與清初絕然異趨焉。

時閻百詩遊西泠，毛西河告之曰：「此間有姚立方，子之廖僂也，不可以不見。」嘗論三人學術，互有其同，亦互有其異。百詩辨古文尙書之僞，立方亦辨之，然謂古文尙書僞者，特別出魏晉以下僞造之篇文於相傳經典之外，於原來經典大體猶無損也。毛氏力辨宋儒程朱以來義解之

失，姚氏亦辨之，然謂程、朱之訓釋非經典本義，特程、朱之訓釋無當，於經典本義亦無傷也。而立方所論，猶有與閻、毛兩氏異者。如其辨易繫，辨戴記學庸諸篇，則經典之有偽，不始於東漢之後，而已起於西漢之前矣。此其與百詩之辨偽古文者異也。易繫學庸諸篇，宋儒所深尊高推，以爲聖經之精義在是，而自立方言之，固乃晚周先漢之沉溺於道墨顛倒於老莊之徒之所爲，不僅宋儒之訓釋無當，乃其本書之自有病也。此又其與西河之辨程朱訓說者異也。由斯而論，百詩所見，不如姚氏之大，西河所論，又有遜於姚氏之精。其排擊舊說，自創新趨，立方之視二氏，尤爲深沉而有力矣。同時浙人有陳乾初，疑大學，有潘用微，疑中庸，而立方則於學庸並施攻駁。其辨大學也，自謂聞「海昌陳乾初有駁大學書，惜予未之見」。（卷九十七大學篇）而所論乃頗多暗合。其略曰：

明明德古無此語，……以明德爲本體，明明德爲功用，便墮入空虛，同於釋氏。……單主心體，遺卻事爲，與吾儒有毫釐千里之別。

又曰：

聖賢之學，知行並重，未有惟言知而遺行者。今云自知止而后定靜安慮而得之，則一知字直貫到底，便已了畢，全無所用其行，則其所得者果何物耶？非忽然有省摸著鼻孔乎？

又曰：

孔、孟皆言正身，……主乎踐履行事，以正心言，則專主心體上說，恐人墮入陰界。

又曰：

以正屬心則淪於虛，以誠屬意，且失理而難通矣。……意爲心之所向，或爲心之所發。……心發爲善則善矣，心發爲惡則惡矣。……然則誠意兼乎善惡，不可獨以誠意爲善事。且唯心正然後心之所發者自無不正，當云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意誠。乃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非倒說耶？……所以明儒劉念臺曾反之，以意爲心之所存。夫意字自有一定之義，爲存爲發，相去懸絕，可以任人游移亂拈如是乎？亦可見大學說理未確，故致此弊。

又曰：

聖門之學，未有單重知而遺行者。……聖賢之言知，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皆實地用力，未有空言致知者。空言致知，非佛氏離語言文字，一惟明心見性之學而何？

又曰：

格物二字晦澁之甚。物字不知指何物，格字不知是何義。聖人教人，從無鶻突語。況爲大學之首功，爲平天下之要務，而顧用格物二字，豈可通哉？（以上所引均見卷九十七大學篇）凡此所論，以大學爲禪學，謂不當重知遺行，謂誠意格物語自不可通，大體皆與乾初之辨相類。可徵一時風氣，其議論傾向自相符也。

立方所駁詰尤力者在中庸。特稱之曰僞中庸，其言曰：

予分出此帙以爲僞中庸者，蓋以其爲二氏之學也。然非予之私言也，實有左驗云。禮記漢儒所定，中庸在第三十一篇，自劉宋戴顒，始從記中摘出，撰中庸傳二卷。考史顒傳云：「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父達善其事，顒亦參焉。」唐李綽尚書故實云：「佛像本外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晉宋之世，士人競尚佛教，顒與父首爲雕塑之制，蓋深信篤敬，乃能如此。……又梁武帝撰中庸疏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梁武之崇佛，世所共知。……至唐李翱益尊信是書，而論說之，創爲滅情復性之說。其生平篤好禪學，五燈載其爲鼎州刺史謁藥山問道云云。……迨至宋儒，益復從風而靡。周茂叔受學於東林禪師，東林授以中庸，與言中庸之旨，一理中發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茂叔受之以授程正叔，正叔嘗言之，今章句載於篇端者是也。於是程門游、楊之徒多爲中庸解，朱仲晦相承以爲章句，乃復抵其師說爲淫於佛老。（見章句序）孰知其說殆有甚於游楊之徒者哉？若夫橫浦慈湖一輩，又無論焉。近時明代相傳猶然。薛以身贈三峯藏詩云：「知君問我參同處，請看中庸第幾章。」羅念菴習禪學者，詩曰：「何人欲問逍遙法，爲語中庸第一章。」徐世溥與克明上人書曰：「三乘五車，本無二諦，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尤展成文序曰：「中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尤近不二法門。」故昔人謂熟讀三十三章，已見西來大意。觀此則大概可知矣。然則好禪學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禪

學。中庸之爲異學，其非予之私言也，不亦明乎？

又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予謂不謂之中，謂之空可也。……堯舜允執其中之中指理言，此以未發爲中指心言。指理言則共之於人，故孔子言舜用其中於民。指心言，則獨用之於己，合眼低眉，參悟而已，於他人有何交涉耶？明僧蓮池竹窗二筆曰：「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中，意此中卽開牖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知覺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云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峭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法塵之粗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真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寂以前自己，尙隔遠在。」按蓮池此論，予於大學云：「學庸僅得禪之粗迹。」正指此耳。喜怒哀樂未發，禪之下乘也，北宗近之，龐居士所呵爲峭然機是也。要悟空寂以前自己，禪之上乘，南宗也。吾嘆宋儒終日觀未發氣象，祇得禪之下乘耳。

又曰：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所謂說大話，裝大冒頭者也。其實皆禪也。何則？禪則其理虛無，故可以任意極言而無礙。若吾儒，則事事切實，豈可言此？言之則中和未致，天地

萬物將不位不育耶？中和既致，天地萬物如何位如何育耶？此非虛無而何？今歷取諸佛語證之！華嚴經云：「法性偏在一切處。」楞嚴經云：「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又云：「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此天地位注脚也。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此萬物育注脚也。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又云：「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鑑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又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此皆天地位萬物育注脚也。

又曰：

引魚鳶之詩，亦一例語義。鳶魚物也，以其飛躍之上下察，而言道，……此老莊之以氣化爲道也。告子生之謂性，其於犬牛無別，鳶魚卽犬牛類也，飛躍卽生之謂也。……唐時僧問法眞禪師曰：「學人向恁處駐足？」師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朱仲晦跋其後曰：大丈夫不可無此氣象。）德章禪師對宋仁宗曰：「空中求鳥跡，水內覓魚蹤。」覺通禪師曰：「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雪峯問克勤禪師，前三三後三三音旨何如？師曰：「水中魚，天上鳥。」淨慈寺門聯云：「魚躍鳶飛皆妙道。」殷邁侍郎作佛偈曰：「窗外鳶魚活潑。」陳白沙、王陽明，禪學也。陳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王詩曰：「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凡此

之類，可爲明證。（朱仲晦曰：此卽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眞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

又曰：

中庸一書，自宋以來，尊信之尤者，非朱仲晦乎？而世所共尊信者，非因朱仲晦之尊信而尊信之乎？乃閱其文集與蔡季通曰：「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校，再說不來。）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係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與未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嗟乎！予閱此書，因嘆人有是心，無不皆同，第一時惑溺于師承瞽說，先入其中，又無明識以照之，遂至牢不可破，乃忽于昏沈睡夢之中，微覺醒悟，時露一星兩星，如石火電光，旋復旋息，可畏哉！渠蓋不知僞中庸之文，直是亂道。依費隱字解，末節造端夫婦是隱，察天地是費，如此卻是隱而費了。卽或謂造端夫婦是費，然察天地仍是費，如此又是費而費了。前後文理乖違不通如此。渠欲順文理解書，則思以造端夫婦屬費，察天地屬隱，所以云百種計校再說不來，於是不得已模糊了事，以三字注之，曰結上文。吁！其平居所私疑如此，乃作爲章句之書，不露所疑之意，陽爲尊信以示天下，豈非所謂失其本心哉？

又曰：

能盡人之性，此句先未允。夫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堯舜之家而子皆不肖，豈能盡人之性耶？孔子於博施濟衆，於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猶病，此足證矣。能盡物之性，此句

尤舛。……夫於民且猶病，況物耶？……又檢論語無一物字，記者但曰鈞曰弋，於廐焚曰不問馬，則其於物，固已不惜戕殺之而膜外視之矣。孟子書始有物字，其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物曰愛，乃爲仁民親親陪說，非重物也。……帝王之治天下也，唯以人爲本，勢不能兼全乎物。故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驅蛇龍鳥獸之害，然後民可以居，可以食，而其物之不爲民害者，則又任人制射獵網罟之屬以取資焉。於是取禽獸以爲飲食，取蠶絲以爲衣服，取材木以爲宮室。人之不能無飲食衣服宮室也，則自不能全物之命也。夫物之命且不能全，而況曰物之性乎？……夫物之性且不有，而況曰盡之乎？……故此義唯同佛氏之說。涅槃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金剛經曰：「我應滅度一切衆生。」又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無有，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凡此皆足以證。雖然，佛氏之說，猶未嘗言盡物性也。盡物性一語，不獨其義乖舛，且實有不通處。吾儒二氏皆不可用。何也？據盡物性者，使之順適其性，同歸於道之謂也。然則豺狼虎豹之屬，其性噬人，人亦將順適之以同歸於道乎？

又曰：

或曲解盡物性爲處之各得其當，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夫既已斬之，入而取以烹之，獵而取以戮之，胡云盡其性乎？且如期斬木

取禽獸，是順天明以裁物，非盡物性之謂也。是王者食時用禮之政，非至誠學問心性之功也。義隔天淵。

又曰：

贊化育，參天地，同爲一種大話，聖賢從無此語。

又曰：

程正叔曰：「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鹽非苦，費多少言語？」按程乃首尊中庸之人，今將來與釋氏並說爲一理，豈非真實供狀乎？

凡姚氏之辨中庸，其要點略具是。故曰：

大抵佛之與老，其形迹似同而指歸實別。僞中庸之言，旁趨於老氏，預啓夫佛氏。其言有類老者，有類佛者。有一言而以爲老可者，以爲佛可者，則從其形迹而論也。

又曰：

中庸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今僞中庸所言，無非高遠之事，何曾有一毫卑邇來？與子思之言，不啻若冰炭。

又曰：

聖人教人，舉而近之，僞中庸教人，推而遠之。舉而近之者，只在日用應事接物上，如孝

弟忠信，以及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推而遠之者，只在幽獨自處，靜觀參悟上，如以不睹不聞起，以無聲無臭終是也。

又曰：

學者依孔孟所教，則學聖人甚易，人人樂趣喜赴，而皆可爲聖人。依僞中庸所教，則學聖人千難萬難，茫無畔岸，人人畏懼退縮而不敢前。自宋以後，中庸之書日盛，而語孟日微，宜乎僞道學日益多，而真聖賢之徒日益少也。此古今世道升降一大關鍵，惜乎人在世中，絕不覺之，可爲浩嘆！

又曰：

僞中庸一味裝大冒頭，說大話。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此則言遠指近，恰與相反。語孟之言極平常，而意味深長，一字一句，體驗之可以終身行之而無盡。僞中庸之言，彌六合，徧宇宙，細按之，則枵然無有也。非言遠指近而何？（以上所引，分見卷八

十六至卷八十九中庸篇。）

昔宋儒盛推中庸，而歐陽修首辨之，立方曰：「予書成後六年，閱其文集始見之，既喜予說之孤，而又媿予之寡學，得見之遲也。」清儒疑中庸出孟子後，非子思作者，有崔述，尙在立方後。然歐崔之爲辨，皆不如立方之峻激。夫大學中庸，本出於秦皇漢武之間，不知誰何人之手。而中庸論性，泯人物而齊之，以氣化爲大道，其爲儒道兩家思想混合之迹，皎著無疑，且毋寧謂

其道家之氣息尤濃。宋明儒好言中庸，故往往陷於道釋兩家之囿而不自知。今姚氏剖析語孟學庸而二之，實足爲先秦儒學劃一較謹嚴之界線，而凡宋明儒之所以不盡同於孔孟者，亦可自此而顯也。

姚氏辨學庸外，又辨樂記，樂記亦宋儒所重也。姚氏之言曰：

樂記一篇，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取文子荀子呂覽諸書湊集而成，其言多駁雜不純。大概揚之過高，反失其實，求之過遠，反昧其用。……聖賢之言禮樂，無非從生民日用倫常上見，所以皆切實可行。秦漢諸儒，……言禮樂，皆非禮樂之義，與聖人之言恰相反。禮樂固皆由中而出，然自有先後本末重輕之分。如禮云樂云，如禮何如樂何之類，此先後也。如立于禮成于樂之類，此本末也。如言治道爲國以禮，道之以禮，言學問約之以禮，過庭問禮之類，而皆不及樂，此重輕也。自夫諸子繁興，異端並起，老子毀禮，喪乎禮者也。墨子非樂，喪乎樂者也。……此篇之言，如知樂則幾，樂中出而禮外作，樂合情而禮飾貌，樂應天而禮配地，樂率神而禮居鬼，樂動內而禮動外等語，皆是先樂後禮，本樂末禮，重樂輕禮，故曰與聖人之言恰相反也。其意欲擡高樂，卻抑下禮。祖老子之毀禮，既大失禮之義。闢墨子之非樂，併不得樂之實。禮樂交喪，罪浮老墨，何樂記之足云哉？

又曰：

人生而靜四句，此文子引老子語也。（說詳古文尚書大禹謨仲虺之誥）此節之說，其誤者有四。一言性也，一言知也，一言好惡也，一言天人理欲也。人生而靜四句，此言性之誤

也。謂靜是天性，動是人欲，豈可截然如此區分？人生才墮地便是動，便是感，寧遂失卻天性，而徒有性欲乎？（宋儒因此有纔說是性便不是性之謬說）……如其說，必將常不動，常寂無感，然後可。此老氏之致虛守靜，釋氏之面壁九年也。一也。物至知知，知誘于外，此言知之誤也。孔子言生知學知，孟子言良知，知豈是攘物而惡之乎？此卽莊子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列子無知是謂真知之說也。……二也。然後好惡形焉，至人化物也，此言好惡之誤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言平旦之氣，以好惡爲相近。今遺卻本來好善惡惡之真好惡不言，而但言後起偏私之好惡，正與性欲之說同符，其勢必將至于無好無惡而後已。此卽莊子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之說，及釋氏絕去愛憎二境之意也。又謂物之感人無窮，此語固是。然須先示以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大者之義，令學者本原之地預有主宰，臨時自不爲所動搖。今不及此義，但以人化物爲言，然則欲不化物，必將逃于空虛無人物之境而後可乎？三也。人化物也者二句，此言天人理欲之誤也。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陸象山之論，獨爲有識。自餘宋儒譌謬相承，動以天理人欲爲言，嗚呼！其于聖賢之學，何其悖也！四也。大抵聖賢之學，皆從最初者而言。二氏之學，皆從後起者而言。從最初者以教人，自使人歡忻鼓舞而不自知其進于善。從後起者以教人，則不惟忌人，勢且疑己。頭頭險地，步步畏機。是故以人心爲危，以人性爲欲，不得不重難以制乎己，而任權挾詐以禦乎人。所以道德之意，一變爲刑

名法術，若再變爲虛空寂滅，而人道絕矣。斯其理勢首尾一貫，夫復奚疑？嘗謂天人之旨，心性之理，一亂于僞尙書襲道經人心道心之語，再亂于樂記引老子靜性動欲之語。加以宋儒外假儒術，而內實根柢于二氏，故于此二書之語，深信篤好，闡發詳明，以彰著于天下，而天下後世咸信之。致使異學湔漬吾儒，如油入麵，永無出理。由是天人之旨，心性之理，晦昧無餘，而猶謂之道學之傳，何哉？（卷六十八樂化篇）

姚氏又辨表記虞夏殷周文質之說曰：

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畏于匡，有文不在茲之歎。而卜天之將喪未喪斯文以自解。聖人尊周若此，重文若此，初未嘗有咎其時文勝之說也。自老子尙一切元妙清虛，惡周之文，思古之質，欲以無爲變之，于是以聖智仁義巧利三者謂之文，而絕棄之，欲一歸于素朴。（老子曰：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其惡文之深也，併謂殷爲文之至而尊夏。其思質之深也，併謂夏爲厚其子而尊虞。皆異端之說也。……夏殷之禮，孔子尙歎無徵，彼何人斯，乃能歷歷言其所尊所敝所尙諸端，如此之詳且悉耶？……夫文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安其倫，萬物之各得其理，而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也。天地自黃農而後，固有日開其文之勢，而帝王之治天下，不可一日無文。孔子言唐堯之煥乎文章，……非唐虞之文乎？孔子于三代獨美周文之郁郁者，誠以文至周而尤盛，非謂周有文，二代無文也。況曰監于二代，正監

其文耳。……蓋質者，文之質也。文者，質之文也。二者不可相離。……自古帝王，未有不兼乎文質而爲治者。孔子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也。使虞、夏而徒有其質，不將不得爲君子乎？茲語流傳失實，以至緯書諸說，分三代爲忠敬文，或忠質文，皆不經之言也。其謂周之質不勝其文，其道不勝敝，後儒因此有周末文勝之弊之說，尤大謬不然。斯文爲人安其倫，物得其理，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雖歷千古而無弊。周法之弊，在于諸侯強，王室微，非文勝也。……孔子序書述詩，作春秋，傳論語，皆在定哀之世。孟子七篇，闡明聖道，出于戰國。凡此者，其文之爲功于天下萬世者何如？……而謂之文勝之弊乎？……老莊惡文思質。（莊子曰：文滅質然後民始惑亂。）游虛蹈無，棄絕聖智仁義禮樂而文始亡。……故謂周之文勝而敝者，是卽老莊之徒厭惡其時之孔、孟而爲是言也。然則奈何以吾儒之書而存是言也乎？（卷九十表記篇）

其他如論禮運，則曰「乃道家的脈」，論禮器，則曰「乃當時之儒而雜老氏之教者」。他不備舉。要之姚氏所論，近之浙人如陳乾初，潘用微，毛西河，遠之湘西如王船山，河北如顏習齋、李恕谷，一時議論意氣，率多近似。此亦學術風會之變，雖豪傑之士有不能自外者。惟姚氏抉出小戴記文字出於秦、漢，非先秦儒家之真，則陳、潘兩家言之未盡，而毛、王、顏、李有所不知。其言或有過當處，要之戴記文字最早亦當出荀卿後。六家之論，余學術史已有敍列，故復約記姚說資並覽焉。

一二、續記姚立方詩經通論

立方又有詩經通論，其自序有曰：

詩之爲教獨大，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閒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卽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體。揚雄太玄、王通元經，眞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爲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么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於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六經之教，惟詩爲大，斯惟立方獨發之。然觀清代，學不逮古亦莫如詩。不僅遜於漢唐宋明，卽元亦不如。蓋詩者，性靈之教。滿族統治強於蒙古。故中國人之性靈窒塞，亦惟清爲甚。詩人傑出，兩百四十年，寥寥可數，厥以此也。

立方又云：

釋詩獨難。自東漢衛宏始爲詩序，首惟一語，本諸師傳。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自爲集傳，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及之。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予以爲傳箋可略。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惟序則昧者尊之，集傳則今世宗之。予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於衛，及於他國。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攬入，同於目不識丁。他何言哉。

竊謂清儒自負在釋經，然皆腐心故紙堆中，與性靈無涉，故於詩尤爲遜。僅務反宋，一意尊漢，毛傳鄭箋之外，又旁及齊魯韓三家。師法卽門戶，訓詁卽大義。文學性靈，渺不相涉。

立方之詩經論旨又曰：

人謂鄭康成長於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故不得詩之意。予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有。苟使眞長於禮，必不以禮釋詩矣。

立方此書，成於康熙四十四年。清廷之盛尊朱子，乃在雍正朝。儒生慌於朝廷之文字獄，不敢反功令，乃尊漢抑宋，尊鄭抑朱，其風煽於後。立方亦諸生，然年五十乃曰：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以十四年之力而成九經通論。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是立方雖非遺民，要亦不務仕進。其爲學，乃平視漢宋，自出心眼，惜其書無刻本，不傳於世。乾嘉學者風氣不同，遂少稱述。若非毛西河言之閤百詩，並世殆將不知其人。若非張穆爲潛邱年譜，後世亦將不能言其梗概矣。是誠大可惋惜之事也。

立方詩經論旨又曰：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峰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始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己，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

乾嘉以下，皆以經學視詩。及同治朝滇南有方玉潤，作爲詩經原始。因其人僻在邊裔，未染蘇皖經學家習氣，乃亦能繼立方之後，以文學視詩。清代兩百四十年，則亦僅此兩人而已。然朱子詩集傳，亦正爲能以文學視詩，故使立方玉潤，同走此路，而有同異。自民初以來，提唱白話詩，則如立方所云由其辭以賞其義旨者，詩辭既所厭惡，義旨亦無可賞。而近人言文學，又特賞男女戀愛，又必尊民間草野。故既鄙斥宋儒，而又必循晦翁集傳而更進一層，一若凡詩均能說成是民

間之自由戀愛而後快。立方所謂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者，不三百年，而其用固已窮矣。蓋今人之尊洋抑己，更甚於乾嘉之尊漢抑宋，此皆內心鬱結，激發而爲門戶，而皆失其性靈之真。余讀清初諸儒書，如亭林船山諸家，竊謂賞其性靈，當尤更重於求其旨義。旨義有辨，而性靈則同。如立方蓋亦性靈中人也。較之潛邱，遠爲勝之。潛邱可謂之讀書人，然不能爲讀詩人。乾嘉以下，殆皆爲讀經人，非讀詩人。今以後人，殆亦將不能讀詩，故余讀立方之詩經通論而不禁有深慨也。

本篇禮記部分，成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刊載於是年六月國學季刊六卷二期。詩經部分，增補於六十六年之九月，前後相距，亦四十年矣。

一三、王白田學述

朱子學之流行，大要可分三方面言之。一曰性理修養之學。一曰經史考據之學。一曰章句注釋之學。陸王心學，僅就第一方面與朱樹異，其第二第三方面，皆致輕蔑不重視。迄於晚明，王學爲害，士不讀書，理學已成弩末。亭林黎洲爲學重點，顯然自性理轉入經史，重啓讀書一路。船山僻在湖湘，亦同此傾向。桴亭最守理學舊矩矱，然經史學成分亦重，並亦旁涉詩文集部。呂晚村生於明莊烈帝崇禎二年，陸稼書生於崇禎三年，於諸遺老中爲晚輩，可謂乃遺民，非遺老。惟晚村獲交於黃梨洲張楊園，得聞理學家緒言，其學則一本朱子四書，不免爲章句注釋之學。稼書追隨晚村，然晚村立志爲遺民，稼書則進身清廷爲循吏。晚村棄諸生之年，卽稼書舉鄉試之年。此兩人治學途徑相似，而立身志節不同。自此以下，理學益衰。而有畢生專治朱子學，可爲宋明六百年理學作殿軍者，則爲白田王懋竑予中。白田生於清康熙七年戊申，滿族入主已逮二十四年，其心情意氣，自不能與明遺民相提並論。其時學風，正是經史考據學漸盛，性理修養學日

退，而清廷方提倡朱學，一承元明，奉爲科舉功令之準繩。白田於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已五十歲矣。其前六年，康熙五十一年，清廷特升朱子配享孔廟，續修朱子全書。前一年康熙五十六年，御纂性理精義成。後五年，雍正元年，白田奉特旨進見，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書房行走。翌年，雍正二年，陸稼書從祀兩廡。雍正七年，曾靜案發，呂晚村戮屍。白田之卒，在乾隆之六年。故白田乃以經史考據之業治朱子，而亦不脫章句注釋之圈套，此其大較也。

白田治朱學之最大成績，在其朱子年譜一書。最先爲朱子年譜者，乃朱子門人李果齋方子。魏了翁爲之序，與黃勉齋所爲行狀並傳。然其後年譜寢有增改。明正德丙寅，婺源戴銑更爲實紀。及嘉靖壬子，李古冲默仍更名年譜。逮清康熙庚辰，洪璟重刻其兄去蕪所爲朱子年譜而序之曰：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敘次朱子言行。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洪宣景間諸人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古冲在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然古冲所修，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與陳龍川來往，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略者。家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中和三變之書，合爲一編。其書舊刻於金陵，因序述而傳之。題曰重刻，仍其舊也。

康熙庚辰三十一年，白田年已踰三十，其爲朱子年譜，當受洪氏影響。白田門人喬汲，爲其師朱子年譜後序曰：

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已稍合者，著爲晚年定論，又爲道一編，年譜不可不作。向有李氏洪氏兩本，皆訛舛滲漏，淄澠莫辨，先生憂之。遂據李洪二本，缺者增之，誤者刊之，並擇朱子晚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閑關錄學部通辨，意則同，而纂訂加詳。未第時，卽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汲汲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年譜屢易其稿，直至易簀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喬序在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尙有王安國序在乾隆十七年壬申。其文曰：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明知其痴而嗜之，以致真僞之辨，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間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

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辨論之迹，考據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然後朱子生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歿後十年，子箴傳出以授梓，而屬爲之序。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其成是書，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慎又如此。

白田爲此書，不及自爲序，故備引王喬兩序如上。方是時，清廷一意提倡朱學，而在野學術界，則有厭薄功令，主張復古之風。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新修寶應學記有曰：

論者以爲今之學與古大異，卽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故學僅同於官署，而於古者所云皆廢不復講。余綜其實，則固不然。國家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爲準式，而一本於程朱子之訓注。士子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章句誦說之習。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後，演繹敷暢微言奧義，亦具載於其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

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而今特以爲口耳之資，譁世取寵之具。至其行事，往往謬戾而不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循乎其名，而忘乎其實也。

知其時，在野學者固已於朝廷功令一意尊朱有不滿。乾嘉以下漢宋門戶分張，實卽是此種意氣激盪之成果，而白田則無寧是站在政府一邊。雍正卽位，白田以一府學教授奉特旨召見，授翰林編修，在三阿哥書房行走，亦以講正學而獲在朝顯貴之舉薦，見清廷之宏揚朱學，而終亦無以平息在野之反對。白田草堂存稿卷八有偶讀私記一篇，謂：

詳策問之意，雖並舉程朱之說，而有不大不滿於朱子者。凡今之講學家類如此。

此策問之內容，今已無考。惟白田既舉策問之說而詳加闡辨，又爲之直抉其心意，可以想見當時反朱學之風氣，不僅已潛滋暗漲，亦復隨地吐露，惟與爭朱王門戶者用意又別，此則論學術思想，所以必參會之於時代現實，乃可深曉於其消長起伏之所由也。

又存稿卷二十四有和星渚日昃之離詩前後共二十四首，其中一首云：

黃氏節鈔文集語，平湖隨筆徧丹黃，儒門規矩依稀在，可是流傳一瓣香。

平湖指陸稼書，白田認其與黃東發依稀同是儒門規矩，瓣香流傳，則白田之同情稼書可見。至於當時一般學術風氣，亦可於本題其他各詩之感慨中見之。乃余考白田奉特旨召見改官翰林之年，卽戴震東原之生年。越後乾隆二十一年，東原館於王春圃安國家教其子石臞念孫。春圃自其父祖奕世相傳講理學，觀其爲白田朱子年譜序，其尊朱子甚至。而東原屢不得志於科場，屢次參加會

試不第，卒以賜進士出身入四庫館，而以經學考據名掩一代。激而曰使戴某在，終不許朱子再喫孔廟冷豬頭肉，語見同時章實齋引述。其爲孟子字義疏證，乃謂宋儒言理，不啻以意見殺人，復使人不能置辨。清末章太炎謂其激於曾靜之獄大義覺迷錄一書之頒布而然。而在春圃邀館其家時，尙在東原始草緒言前十三年，距孟子字義疏證成書尙二十年。儻春圃早知東原往後議論，決不延其教子。而石臞與其子伯申引之，父子兩世治字義訓詁，絕不涉及漢宋門戶，與夫經學理學之是非得失。亦因家教師教，乃有絕不相通者，故寧默置不談。今爲抉而出之，亦可見當時學術思想界之激盪流變，其事不可逆料。而學者之內心，與夫風氣之時尙，又當分別而觀。所以知人之必貴於論世也。

白田治朱子學，所信重固在義理，而其探討之方法與途徑，則一如當時之學風，主要在考據與注釋之兩者。存稿卷十一答朱湘洵書有曰：

弟少小時，亦嘗讀洛閩之書，略有志於學，而無嚴師友教督之。重以世故汨沒，奔走不暇，其於涵養省察克己窮理，未嘗有一日之功。迨今老病昏忘，凡所記憶，都已廢棄。胸中昏昧雜擾，無擬定收斂之力，少深潛純一之味。應事接物，混混然與庸俗人無異。顧以數年來繙閱朱子文集語類，以考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略有窺於立教之指，似與長兄所論有不盡合者。

又曰：

弟生平惟以考訂異同解釋爲事，於此略有所窺，不敢自隱。

又卷二十頒朱子書謝恩呈看詳有曰：

惟我文公之出，論其道，實孔子以後一人。比其功，亦生民以來未有。乃刪脩纂輯之作具有成書，而文章議論之垂未曾裁定。全集別集續集之不無煩雜，池錄饒錄建錄之或有混淆。詮次者博采廣搜而未考其前後。編次者件分條繫而未辨其異同。間入他文，且增贅語。勉齋果齋之承學，誰能不負其傳。西山鶴山之勃興，亦祇無失其舊。因循既久，散軼莫釐。至於四書之訓說最多，尤生平精力所寄，而諸家之抄撰不一，乃後世學術所關。集編止於學庸，略而未備。纂疏及於陳蔡，擇焉不詳。雲峰之通，頗爲紛舛。道川之釋，未極刪除。彼何王金許之云，尙疑醇醲之異味。況胡楊蕭陳之輩，何止黑白之殊觀。制雖重於膠庠，說或同於燕郢。致使外伺者得窺閒隙，並令墨守者轉見瑕疵。橫肆舐排，公行刪削。譏摸索之影響，誚辨析以支離。考亭之書，幾爲厲禁。尼山之旨，別入旁門。

此一節備述朱子文集語類之內部本身涵有不少問題，而元明以來懸朱子四書爲功令，如四書大全之類，其中所涵問題更多。前一項重在考訂異同，後一項重在文義解釋，實則此兩項工夫，歸根只是一項。非仔細解釋文義，卽亦無以辨別其異同也。

存稿卷十三與朱宗洛書有曰：

病中閱語類論學數卷，多有可疑。卽葉味道錄，以朱子語格之，亦閒有不然。程子遺書，

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又不經門人高弟子手。勉齋於池錄金去僞，猶多擬議。後來者但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竊謂學朱子之學者，宜詳加區別。卽未必盡當，亦可以俟後人之訂正。歐陽公云：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薛文清公嘗引其端而未竟其旨，今其書尙略可考，其必有申明之者也。

白田之意，於語類，尤當下考訂疑辨之功。惟其尊朱之甚，故欲於朱子之一言一語，一字一句，莫不深細考訂，詳審解釋。而於此深細考訂詳審解釋中，自不免有所疑，有所辨。薛敬軒最號於朱子能墨守篤信，已有此意。白田旣篤信朱子，其於朱子書，尤如文集語類，所下考訂解釋工夫，則固遠超敬軒之上。亦值其時經學考據之風已熾，白田以時人之治經學者治理學，乃得此成績，而惜乎其亦無繼起。其實朱子書中所值考訂疑辨者尙多，而白田終爲能以考據治朱學之唯一人物，此亦一可憾事也。

存稿卷十與方靈皋書有曰：

弟近年來，於朱子文集語類皆嘗考訂，而年譜較正爲多。

其實此兩事亦卽一事。欲於年譜有較正，則必於文集語類有考訂。姑舉數例言之。存稿卷七有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朱子答江書有曰：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白田考定此書在甲申，獲親有道，指李延平，而陳清瀾學蔣通辨謂朱子四十前

皆出入釋老之學，乃不載江書，可知其誤。正學考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則亦無據。其答薛士龍書，白田考定在壬辰，書中有云：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壬辰朱子年四十三，陳清瀾據以爲朱子四十後始悟老釋之非，白田據答江元適書駁之，又謂答薛書二十餘年二字爲衍文。嗣又謂以癸酉見延平，至壬辰適二十年，概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二字非衍文。謂兼指佛學亦未然。今按答薛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據書中比乃之語，自當下數至壬辰，不得謂二十餘年之二字乃衍文。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乃承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言，故曰求之不得其術，亦不指老釋。白田又曰：

朱子悟老釋之非在再見延平後，與汪尙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考。通辨不載江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爲四十以前出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正學考始，余因而申之，然皆不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考，而立說之未可以輕也。

於是白田又旁考答陳正己何叔京汪尙書李伯諫許順之各書，以及語類鄭可學輔廣錄各條，以證答江書之所云。又旁考答程欽國許順之何叔京張敬夫羅參議石子重程允夫曾裘父林擇之劉子澄陳師德各書，以及觀列子偶書諸篇，以證答薛書之所云。又附與呂士瞻書方賓王書一篇，並及語類楊道夫葉賀孫陳淳沈僩廖德明錄各條，說明朱子對延平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一語之意。

見。關於此一問題，白田頗贊陳清瀾之通辨。自陽明作爲朱子晚年定論，同時羅整菴雖持異議，卻未深入詳作探討。直至陳氏通辨始爲翻案，極得晚明學術界重視。白田爲駁正通辨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一語，繁稱博證，牽連會通，一篇文字至於盈卷，此爲向來理學家集中所少見。一般理學家運思構想，皆爲義理探索，極少能如白田，一似考訂經史，實事求是，遙同於後起乾嘉漢學家所謂樸學之軌轍。惟白田此篇所論，亦不全是。如辨中和舊說之年歲問題，卽大堪商榷。而白田以後，乏人繼起，理學中此一門徑，終於闕寂，此則大可惜也。

又存稿卷六玉山講義考，專爲辨正李果齋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一語。又因玉山講義兼及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又牽及答方賓王答或人兩書，又及語類呂燾錄余國秀問一條，認爲此條所錄斷斷非朱子語。因而疑及文集答余國秀書，乃曰：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蓋以此也。

此處指出語類文集多有不可盡據者。而黃勉齋謂當信平生手筆之書，此亦不盡然。有答某書在前，答某語在後，朱子思想見解先後有變，則語類所收，其可信價值或有更出文集手筆之書之上。此自勉齋至白田所猶未及細論也。白田此篇末又引語類沈憫錄一條，乃與呂燾錄同聞而別

出。以沈錄與呂錄對勘，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益明。此則卽就語類各條而考訂其異同也。

存稿卷十二重答朱湘洵書有曰：

定性說未詳何年，亦是中年之作。文集雜著中如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太極說絕不及太極陰陽五行，並疑題目之誤。其編次龐雜，殆不可辨。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卽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句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今雖讀朱子之書，而於文集之龐雜、語類之訛誤，尙不能以盡辨，而謂能發明朱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以顯今傳後，其自處太高，而自任亦太重矣，不幾於僭且妄乎。

白田朱子年譜後附考異四卷，莫非就文集語類，考訂異同，闡訓文義，以定李洪兩譜之得失。又附論學切要語二卷，亦皆就文集語類中摘取，而此兩卷中亦附考異。可見白田對朱子文集語類，隨處加以考訂闡釋，以求其會通合一之精神與努力不懈之所至矣。

不僅如此，白田對朱子其他著作，亦同樣加以考訂闡釋工夫，而隨處有其發現。存稿卷一有易本義九圖論，認此九圖非朱子作。其言曰：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

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何以絕不致疑。

又曰：

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

又考儀禮與筮儀不同，而曰：

朱子豈不見儀禮者，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

又有易本義九圖論後，詳列本義啓蒙流傳諸本異同，而曰：

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爲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

又曰：

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爲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傳，其更改次序，見鄱陽董氏所述。）以易爲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爲設教。（見勉齋黃氏答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

又曰：

天臺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啓蒙後，語錄亦云啓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爲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

又存稿卷十二書重答湘洵書後，據文集董叔重問，疑叔重所引乃本義元本，而今本則後人誤改。此皆白田對朱子易本義一書所下之考訂與疑辨也。

又存稿卷二爲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三篇，皆辨家禮非朱子之書。其言曰：

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

又曰：

按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爲附託無疑。竊恠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

又曰：

性理大全家禮注，廖子晦陳安卿皆有刊本。家禮決非朱子書，以文集語錄考之，略無所據。而究其所從來，則沉淪詭秘，而無確然可據之實，乃朱門諸公絕不致疑，而相率尊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是尙何論哉。

白田乃一仔細審慎之人，惟此辨則甚大膽。其後夏忻心伯述朱質疑，亦承白田以考據治朱學，而

於白田此辨特加糾正，余已詳其說於朱子新學案，此不贅。至於今傳家禮，是否即是朱子沒後所復得爲廖陳所刊行之原本，是否其後續有僞羈及改動，此則關於版本內容問題，白田未經提及。

白田不僅對相傳朱子著作如易本義前九圖及家禮等書盡其考訂辨僞之工作，並於朱子語認爲有誤，亦坦率加以辨正。存稿卷一尙書雜考，謂：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晁錯受伏生，而故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以此參考，則伏生書出於屋壁，斷斷無疑。孔安國書大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

白田又兼及對於朱門弟子之批評，卷十一答朱湘洵書，謂：

尙書考訂，志之十年，至今未克成編。懶惰成癖，君子所棄。記嘗見黃氏日鈔言蔡傳最爲精密，無復異同。此語未盡然。息齋余氏有蔡傳疑一書，今未見之，大全略有數條耳。一得之愚，閒有所及，而未敢輕出。此事大不易，正不知何時得成就其書也。

是白田於蔡傳與朱子異同，亦必有說，惜今其書不傳，未可詳稽。

又存稿卷十一與喬星渚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錄有兩說。銖錄，大雅伯羽壯祖錄同，賀孫錄，螢錄

同。銖錄在丙辰以後，賀孫錄在辛亥以後。螢錄在戊申，大雅戊戌以後，伯羽庚戌。疑當以銖錄爲定。賀孫錄有兩條，唯螢錄與之合，而賀孫錄又有一條，又與銖錄合，故知前兩條非定論。近來據雙峯語，必以賀孫錄爲定論，是皆懲象山之失，而未深求孟子之意集註之旨也。

又曰：

饒氏引勉齋說，世以勉齋爲朱子嫡傳，競信其說，於集註之旨反有所違戾而不復顧。

此處以集註爲據，分別語錄各條之從違。而朱弟子如黃勉齋饒雙卿諸人語亦得有所折衷。又曰：或問盡心知性事大，語類賀孫錄淳錄砥錄，又賀孫錄謨錄道夫錄凡六條，反似集註爲未定之論。讀之不能無疑。後讀文集答李飛卿書，乃知或問爲初說，語錄爲中間所改之說，其後卒定從初說。故集註與或問同，非文集所載明白，無以斷斯疑。

此處又以或問集註與語類各條比較異同，而從文集獲得其結論。凡此等所討論，皆係理學家共同探究之心性問題，而白田則一本之於文字闡釋，並考定其年歲先後，比較異同，而歸於一是。存稿卷十三答朱宗洛書謂：

常欲以文集語錄，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

又曰：

陽明晚年定論之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

此見白田治朱子學之主要用力所在。考據訓釋，本亦朱子所重視，而清儒分立漢宋門戶，必謂考據爲實學，義理爲空談，不知朱子本已緝此二者而一之，惟傳其學者各有偏長，固不當專以考據歸漢學也。

白田治朱子書，亦旁及於考史。其考史，亦一依朱子書爲主。存稿卷三孟子序說考，謂：

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齊宣王當爲齊潛王，此爲晚年定論。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考焉。

又曰：

新安陳氏謂孟子以齊潛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訛，略如語錄之說，而不引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修，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

又存稿卷五讀史謾記謂：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孝經刊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目仍通鑑之舊，蓋未及正。綱目成

於壬辰，而刊誤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更定綱目而
未及，其載於黃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此論梁惠襄齊宣湣年代，以後清儒考辨尙多，至余先秦諸子繫年，可謂始得定論。欲有意於考
古，豈能即依朱子語爲斷。白田所辨，可謂朱子意如此，非古代史實即如此也。至論綱目，白田
似未見全謝山鮎埼亭集。篇中比論通鑑與綱目處尙多，茲不備引。

又卷三書楚辭後謂：

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考。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朱子辨證，
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爲一，失之不考。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襄王爲
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註仍本之者，蓋偶失之。

此則據史記疑朱子。惟其釋楚辭各篇，亦多未愜。

又卷四論陶長沙侃，謂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云云，是亦本朱子而加考辨也。又卷六記邵
氏聞見錄語，亦備引語類文集爲論。此見白田考史論史，率多從朱子語觸發引伸，非能從史籍自
有超卓潛深之研究，此乃治考據學者一通病。乾嘉以下清儒治經，自標以爲漢儒之經學，然於古
經籍大義乃及漢儒通經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綱宗。徒於散末處枝節分別，以考以
辨，用力雖勤，而所得實微。此亦如講理學者，競務空言，不尊實學，高心空腹，亦復何補。惟
措心於義理之精微，而能弗忘經史之實學。有意於經史之考證，而能會通於義理之大全。內而心

性，外而治平，本末兼顧，一以貫之，自宋迄清，惟朱子能達此標準。白田專以考據治朱子，衡其所得，宜自有一限量也。

與白田生同時、同里閭、同爲潛心朱子學者，有朱澤澣湘洵。嘗言：

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

湘洵有止泉文集，集中有與白田書五通，白田覆書見存稿卷十一者凡三通，又卷十二爲重答朱湘洵書，乃在湘洵卒後追答，而所答湘洵之原書則不見於止泉集，蓋已遺失矣。存稿卷十七有祭朱湘洵文，卷二十四有題湘洵秋林讀詩圖詩，詩後綴一贊，曰：

深潛純一之味，收斂凝定之神，此生平之所用力，學問緣之以爲本根。常閉戶而精思，中縣縣其若存。追古人於千載，脫去世俗之埃塵。固獨有所適然而自得，不在於語言文字之紛紜。

是知止泉之所用力，蓋與白田有微異其趣者。湘洵子宗洛，從學於白田。存稿卷十三有答朱宗洛書，謂：

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

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白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愍分明矣。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見南軒書，必曰主靜見廣仲書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非學問之通津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卽此可覘白田止泉兩家論學相歧之點。白田多在文字語言上用功，偏近道問學一邊。止泉規以向內用心，偏近尊德性一邊。若專從語言文字上考求，則誠如白田之說。但若轉就實際用功上分辨，則止泉之說亦未可厚非。朱子常以向尊德性一邊偏了規象山，而其賞重象山者亦在此。朱子又常以向道問學一邊偏了自規，而治王學者遂舉以爲朱子之晚年定論。止泉與無錫顧昀滋交好，

又曾親至共學山居，其學風有近於東林之高顧。文集中有朱子未發涵養辨，若專以此爲說，白田亦未能加之以非難。然兩人學風亦畢竟有其相近處。止泉有朱子聖學略一書，其工夫亦在彙合朱子語類文集，分別考定其年歲先後，而後加之以闡述。惟所闡述，比較側重心性修養。然其書之體貌，則固已不似宋明理學家著作，而實近於清儒經史實證之學之所爲。學術隨時代而轉變，止泉白田兩氏之闡揚朱學，亦復如是。厥後變而益遠，如阮芸臺釋敬，幾於謂敬在事不在心，不知明道固言，我寫字時一心在寫字上，但亦不是要字好，卽此是敬。則敬固在事，同時亦在心。寧有心不在而事得敬之理。惟一心在寫字上，未必卽是敬，又須要能並不要字好，始有當於明道心中敬字之境界。今止泉謂從主敬透主靜消息，證之濂溪太極圖說自註無欲故靜，寫字時不是要字好，此卽無欲之靜也。則止泉之意，亦如謂由一心在寫字上再透到不是要字好，既主一，又無欲，此始是敬，亦卽是靜。於濂溪明道乃至朱子之說，並無違失。若必謂不是要字好，只一心在寫字上，其序則逆。人當實下工夫時，必先求一心在寫字上，再透到不是要字好，其序則順。白田種種駁議，或尙未獲止泉內心之所欲云也。大抵白田釋朱子，多得之於文字言語，而亦頗有未得其心之缺憾，此則讀白田書者不可不知。

其他有關白田止泉兩氏說朱學，已詳余舊著中國近三百學術史，茲不贅。

一四、記鈔本戴東原孟子私淑錄

戴東原氏緒言孟子字義疏證兩書先後異同，余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之已詳，最近又得照曠閣鈔本孟子私淑錄，題休寧戴震撰。書分三卷，卷上十一條，卷中四條，卷下八條，大體相當於緒言之上下二卷。私淑錄上中二卷，即緒言之上卷，私淑錄卷下與緒言卷下略同，而缺緒言卷中各條。量其成書，當在緒言之後，字義疏證之前，正爲兩書中間之過渡作品也。

知私淑錄成書在緒言後者，緣兩書相同，其字句偶異，皆以私淑錄爲審當，故知私淑錄乃緒言之改定本也。姑舉數例如下：

緒言卷上問朱子本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條，（安徽叢書本頁十三）

近思錄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也，朱子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

在形氣之中，（私淑錄作氣質。）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宋儒剖析至此，皆根於理氣之分，以善歸理，以有惡歸形氣。（私淑錄無此二十三字。）然則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

性善，若就名爲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之中，烏得斷之曰善？（私淑錄此下有注一節：程子云孟子言性當隨文看，本以告子生之爲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以後，謂之性耳，後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由是觀之，將

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不是性，（私淑錄作皆失其本體。）孔子

以不似性者言相近，（私淑錄作以不全是性之本體者言相近。）乃論性不論氣不明，（私淑錄無此八字。）孟子以未可名性者言

性善，乃論性不論氣不備。（私淑錄無此八字，有於孔子不敢顯言不明而直斥孟子不備十六字，下又增小注一節，凡二百零七字。）

又緒言卷上問知覺運動不可概人物而目爲蠢然同條，（安淑叢書本十六頁）

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物皆同，此生生之機原於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生之

氣則不同。（私淑錄作所資以養者之氣，下兩見均同。）

又緒言卷下問荀子之所謂性條，（安淑叢書本頁一）

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思。（私淑錄作欲。）有爲以後事，而其保此

性也，主於無思無爲。（私淑錄作無爲自然。）

凡上所舉，其小有異同處，皆私淑錄下語較審當，故知私淑錄爲緒言改定本。復有證者，字義疏證有仍緒言而微易其文者，按之私淑錄亦然，故益知私淑錄應在緒言後，例如：

緒言卷上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條，（安淑叢書本頁二）

又如：

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解上（此六字疏證作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十字，私淑錄同疏證。）又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亦非爲道器言之，疏證亦作本，私淑錄同。又形而下猶曰形以後句注，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疏證引鄭箋上有如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九字，私淑錄亦同。

又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分，而宋儒翫言之，又以道屬之理。（疏證作遂以陰陽屬形而下，私淑錄同。）實失道之名義也。

緒言卷上問宋儒嘗反覆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氣條，

（安徽叢書本頁五）

聖人而後盡乎人之理，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然而已矣。

語陰陽而精言其理，猶語人而精言之至於聖人也，期於無憾無失之爲必然，乃要其後，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語其不可譏議，奈何以虛語夫不可譏議指爲一物與氣渾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也。

私淑錄於語陰陽而精言其理句下改成

推而極於不可易之爲必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宋（疏證作後）儒從而過求，徒以語其至者之意言思議，目爲一物，（疏證作視如有物）謂與氣渾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疏證無此六字）聞之者因（疏證無因字）習焉不察，莫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也。

按緒言此條疏證無有，而私淑錄改定語則又見疏證卷上問自宋以來謂得於天而具於心條下。

又私淑錄卷上問朱子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條爲緒言所未有，而其文有見於疏證者，如：

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道之實體，卽理之精微，易言（此十一字疏證作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十字）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質言之此道，精言之卽此理。（疏證無此十一字，此下一大節並見疏證卷下道字條。）

此皆私淑錄一書在緒言字義疏證之間，爲其過渡作品之證也。而比觀三書，則私淑錄大體仍與緒言爲近，而與字義疏證爲遠，何者，疏證卷上辨論理欲諸條，東原極自鄭重，緒言私淑錄皆無之，一也；又

緒言卷中間孟子答公都子條，

（安徽叢書本頁九）

孟子所謂善者，初非無等差之善。

（私淑錄此處有非盡人生而爲堯舜也九字。）

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

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其趨於善也利，而趨於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也。

（私淑錄此處有而非以善概之於物八字。）

所謂故者，以私爲本，去其利乃性之本然也，順而非逆，是以利也。

（按孟子答公都子一問，私淑錄無之，此一節乃并入問

宋儒以氣爲理條下。

今按緒言此條，疏證已散入別條中，上引數語，略見疏證卷中間論語言性相近條下，其文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非謂盡人生而堯舜也。（按此用私淑錄語。）自堯舜而下，其等差凡幾，則其

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按此上同，此下異。）然人之心知，於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

知羞惡，知恭敬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於其知惻隱，則擴而充之，仁無不盡；於其知羞惡……

以上所舉，緒言私淑錄皆就人性之利逆言，疏證則就端緒與擴充言，此又私淑錄近緒言而與疏證爲遠之證二也。

今按緒言草創在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完成在三十七年壬辰，及四十一年丙申，程易疇曾影寫之。（以上論證具詳學術史。）是其時尚未有疏證，亦當未有私淑錄。東原丁酉與段若膺書云：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觀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極矣。……今人以不出於私卽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聊舉一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謁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其從前訂於字學經學者。（安徽叢書所收東原遺墨）

此書在正月十四日，據其暢論後儒以意見爲理而生民受其禍一節，正是疏證卷下各條所極論，而東原云聊舉一字言之，又曰乞假南旋，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是其時疏證似尙未成書也。又同年四月廿四日一書乃謂：

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邪正，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是疏證成書應在正月至四月間。東原以疏證示彭尺木，尺木來書討論，東原復之，亦在四月，惟陸朗夫復東原言理欲書則云：春杪接書，舉近儒理欲之辨云云，不知其時疏證已有成書否。大抵疏證成書定在正月中旬與段若膺書之後，在四月杪再與段書之前，而私淑錄既未及理欲之辨，則其書應在丁酉四月前，在程易疇影抄緒言後，大抵在丙申一年間，而惜不能的知其爲何時也。

東原自言十七歲卽有志聞道，求之卅餘年，考其著述，先原善三篇，嗣擴大爲三卷，又爲緒言三卷，又刪並爲私淑錄三卷，又增訂爲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前後縣歷踰二十年，用心不可謂不深。惜乎並世人，徒詫其爲轎夫之強力，而不能識其爲轎中人之安坐。而東原平日言談亦不免矜勝誇上，故惟章實齋能賞之，而復疑其人心術之不正。又以水經注一案招來身後謗議，雖雅重東原者不能爲昭雪。然就書論之，要爲近世傑作，乾嘉以來，未有能駕出其右者。縱言思之偏尙不免乎多瑕類，而終自不掩其精光。若使東原得永其壽，學與年進，磨礱芒角，蹈於中和，被濯染習，一臻平正，其修辭立說，必有異矣。東原旣成疏證，緒言私淑錄皆其所棄，身後遂泯沒不

顯。緒言猶有程易疇影抄，並得刊於伍氏粵雅堂叢書中，後世尙多知之，私淑錄則更無道者。余得此稿，已值故都淪陷，方謀脫身遠行之資，以書估索價昂，遂錄副藏行篋中，携之入湘，遵海轉滇，頃又挾而入蜀，特爲刊出以廣其傳，庶於東原晚年學思精進轉變之跡，窺考有籍，而爲粗識其涯略如此。

此稿刊載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四川省立圖書館圖書集刊創刊號

〔附〕 孟子私淑錄

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朱子引程子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據此，似論語所謂性，與孟子所謂性者，其指各殊。孔子何以舍性之本，而指氣質爲性？且自程朱辨別，孰言氣質，孰言理，後人信其說，以爲各指一性，豈性之名果有二歟？曰：性一而已矣。孟子以閑先聖之道爲己任，其要在言性善，使天下後世曉然於人無有不善，斯不爲異說所淆惑。人物之生分於陰陽氣化，據其限以所分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謂之性。後儒求其說而不得，於是創言理氣之辨，其於天道也，先歧而二之，苟知陰陽氣化之爲天道，則知性矣。

問何謂天道，曰：古人稱名，道也，行也，路也，其義交互相通。惟路字專屬途路，詩三百篇多以行字當道字，大致道之名義，於行尤近，謂之氣者指其實體之名，謂之道者指其流行之

名。道有天道人道，天道以天地之化言也，人道以人倫日用言也。是故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言人道也。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流行，生生不息，非程朱所目爲形而下者歟？曰：氣化之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爲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爲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爲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爲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如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而下，如

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形之氣，人物咸稟受於此，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日五行，中庸言鬼神之爲德，舉陰陽即賅五行賅鬼神，舉五行亦賅陰陽賅鬼神，而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卽物之不離陰陽五行以成形質也。由人物邇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辨，而宋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寔失道之名義也。

問宋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云：「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雖形字借以指氣，洵有未協，而上而下，及之謂謂之，亦未詳審，然太極兩儀出於孔子，非卽理氣之辨歟？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太極兩儀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言之耳，非氣化之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於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稱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羲氏觀於氣化流行，而以奇偶儀之象之。孔子贊易，蓋言易之爲書，起於卦畫，非漫然也，寔有見於天道，一陰一陽，爲物之終始會歸，乃畫奇偶兩者，從而儀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氣化之陰陽，承上文明於天之道

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品之流形，莫不會歸於此。極有會歸之義，太者，無以加乎其之上稱，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爲陰陽，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由生，豈孔子之言乎？謂氣生於理，豈其然乎？況易起卦畫，後儒復作圖於卦畫之前，是伏羲之畫奇偶，不惟未備，抑且未精，而待後人補苴罅漏矣。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見於理氣之辨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也，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也。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流行同歸之粗，而空言乎理，似超迹象，以爲其精。是以觸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恍然覺寤理氣之辨如是，不復詳審文義。學者轉相傳述，於是易之本指，其一區別陰陽之於品物，其一言作易之推原天道，是生卦畫者，皆置不察矣。

問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其於達道五舉孟子所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實之。又答呂子約書云：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無朕者也。如是言道，故於易稱一陰一陽，中庸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似語未備。且其目之爲性，目之爲道者，已屬純粹以精，故於修道不可通，以

修爲品節之而已。至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道與修身並言，兩修字不得有異，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其舉孟子之言，寔天下之達道五也。在孟子稱教以人倫，是親義序別信，明屬修道之教，既曰率性之謂道，又曰修道以仁，如後儒之云，率其仁之性，率其義之性，豈可通哉！然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後儒殆通於此而閼隔於彼歟？曰，日用飲食之謂道，亦如陰陽氣化之爲道也，據其實而言謂之事，以本諸身行之不可廢謂之道，天地無心而成化，非得理失理之可議也。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道之實體，卽理之精微，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質言之此道，精言之卽此理。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爲道之寔事，率性之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人倫日用之事，實責諸身，觀其行事，身之修不修乃見，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必協乎仁，協乎義，協乎禮，然後於道無憾，故曰修道以仁。舉仁以賅義禮，便文從略，故下即詳及之。此道之寔事與理之精微，分而爲言，質言之此道，精言之循而得理，斯乃道之至，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者，中正不失，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之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中正不失，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彼釋氏棄人倫以成其自私，不明乎此也。易列仁義以配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在天地質言之，而

在人必精言之。然則人倫日用，固道之實事，行之而得，無非仁也，無非義也，行之而失，猶謂之道，不可也。古人言道恆貶理，言理必要於中正不失，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動，理屬靜，如大戴禮記孔子之言曰：「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理」，道謂用其心知之明，行之乎人倫日用而不失，理謂雖不見諸行事，湛然有其心而不放，或道生統，理生分，或道貶變，理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爲，而非言夫實體也。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羅，不謂之道，是顯指中庸天下之達道五而背之，而別求諸冲漠無朕，惟老釋謂萬事爲幻，謂空妙爲眞則然，奈何以老釋之言，衡論易中庸之言，而粗視君臣父子哉！彼釋氏之棄人倫而不顧，率天下之人同於禽獸者，由不知此爲達道也。

問宋儒嘗反覆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氣，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朱子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又譬之二物渾淪，不害其各爲一物，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一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及主宰樞紐根柢之說，目陰陽五行爲空氣，以理爲之主宰，陳安卿云：「二氣流行，萬物生生不怠不底，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爲男女萬物生生之本，饒仲元云：「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聖人以陰陽五行闢闢不窮，而此理爲闢闢之主，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抑似寔有見者非歟？曰：非也，陰陽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通乎其必然不可易，所謂理也。語陰陽而精言其理，猶語人而精言之曰聖人耳。聖人而後盡乎人之理，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推而極於不可易之爲必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宋儒從而過求，徒以

語其至者之意言思議，目爲一物，謂與氣渾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聞之者因習焉不察，莫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也。況氣之流行，既爲生氣，則生氣之靈，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體是也，豈待別求一物，爲陰陽五行之主宰樞紐？下而就男女萬物言之，則陰陽五行乃其根底，乃其生生之本，亦豈待別求一物爲之根底，而陰陽五行不足生生哉！

問後儒言理與古聖賢言理異歟？曰：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是謂理。後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則，而轉曰理無不在，以與氣分本末，視之如一物然，豈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以歸於必然，理至明顯也。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諸古賢聖之言，牴牾不協，姑舍傳注，還而體會六經論語孟子之書，或庶幾矣。

問古人言天道天德天理天命何以別？曰：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則曰道，主其生生言則曰德；道其寔體也，德卽於道見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不於此見乎！其流行，生生也，尋而求之，語大極於至鉅，語小極於至細，莫不各呈其條理，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故舉生生卽賅條理，舉條理卽賅生生，信而可徵曰德，徵而可辨曰理，一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不過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人之於天道至孔子而極其盛，條理得也。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天理不於此見乎！凡言命者，受以爲限制之稱，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故理義以爲之限制而不敢踰謂之命。氣數以爲之限制而不能踰亦謂之

命。古人言天之所定，或曰天明，或曰天顯，或曰明命，蓋言乎昭示明顯曰命，言乎經常不易曰理，一也，天命不於此見乎？

問理之名起於條理歟？曰：凡物之質，皆有文理，亦呼文縷，理縷，語之轉耳。粲然昭著曰文，循而分之，端

緒不亂曰理，故理又訓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字偏旁從玉，玉之文理也。蓋氣初生物，順而融之以成質，莫不具有分理，得其分則有條理而不紊，是以謂之條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達末，又別於幹爲枝，綴於枝成葉，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地氣必上至乎葉，天氣必下返諸根，上下相貫，榮而不瘁者，循之於其理也。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皆循經脈散布，周漑一身，血氣之所循流轉不阻者，亦於其理也。理字之本訓如是，因而推之，虛以明乎不易之則曰理。所謂則者，匪自我爲之，求諸其物而已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理也者，天下之民，無日不秉持爲經常者也，是以云民之秉彝，凡言與行得理之謂懿德。得理非他，言之而是，行之而當爲得理，言之而非，行之而不當爲失理。好其得理，惡其失理。於此見理者，人心之同然也。

問理爲人心之同然，其大致可得聞歟？曰：孟子有言，「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可以察理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爲之條分委曲，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夫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準。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惟其爲人心之同然，故一人以爲不易，天下萬世以爲不易也。所以爲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尊是理而遂謂天地陰陽不足以當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以上卷一。

問宋儒以氣爲理所湊泊附著，

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

又謂理

爲生物之本，

朱子云：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人與禽獸得之爲性也同，而

致疑於孟子。

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

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字未甚察。

今據易之文證明一陰一陽，卽天道之實體，其爲氣化，未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

上，及旣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下，然則古賢聖所謂性，專就氣稟言之歟？曰：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孳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分言之，曰陰陽，曰五行，又分之，則陰陽五行，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行，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物各成其性，明乎性至不同也。語於善成與天地繼承不隔，語於性則以類區別，各如其所受。六經中言性統舉人物之全，見於此，人物之生，本於天道。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所受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是也。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不曰天

道，而曰天命者，人物咸本於天道，而成性不同，由分於道不能齊也，以限於所分，故曰天命，從而名其稟受之殊曰性，因是日用事爲皆由性起，故曰率性之謂道。身之動應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如體物而不可遺之可，君子不使其身動應或失，故雖無事時，亦如有事之戒慎恐懼，而不敢肆，事至庶幾少差謬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可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之性善，非盡人生而堯舜也。自堯舜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其趨於善也利，而趨於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而非以善槩之於物。所謂故者以利爲本，出於利，乃性之本然也，順而非逆，是以利也。然孟子故專言人之性善，且其所謂善者，初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宋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閼隔。在天道爲陰陽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質各殊，材質者，性之所呈也，離材質惡觀所謂性哉！故孟子一則曰，非才之罪，再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材，古字通用。人之材得於天獨全，

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必然，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又言犬馬之不與我同類，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斷其性善明矣。材與性之名，一爲體質，一爲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卽材之美惡以知其性，材於性無所增損故也。合易論語孟子之書言性者如是，咸就其分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奈何別求一湊泊附著者爲性，豈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幾焉。

問朱子本程子性卽理也一語，釋中庸天命之謂性，申之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其釋孟子云：「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兩解似相闕隔。其作中庸或問有云：「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合觀朱子言性，不出性卽理也之云，故云告子不知性之爲理。旣以性屬之理，理卽其所謂仁義禮智之稟，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故釋中庸，合人物言之，以物僅得形氣之偏，故釋孟子言豈物所得而全，言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或問一條於兩注可謂融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子言性，專屬之理，而又及形氣之偏，皆出於程子也。程朱之說，謂理無不善，而形氣有不善，故以孟子道性善，歸之本原，以孔

子言性相近，下而及於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悉歸氣質之性，是荀揚韓皆有合於孔子。

朱子答門人云：「氣質之說，起於張程，韓退之原性中但說三品，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說得本原處，下面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又以告子之說為合於荀揚，

朱子於告子杞柳之喻云：「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用紛爭。」

程子云：「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孟子將不辨之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明云氣質之性，

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只是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謂性也。」

將與告子荀子諸人同歟？此宋儒之說，雖極完備，彌啓後人之疑。近思錄程子云：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

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中，不

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然則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

就名為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之中，惡得斷之曰善？

程子云：「孟子言性當隨文看，本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

受生以後，謂之性耳，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論人之性，皆失其本體。孔子以不全是性之本體者，言性相近，孟子以

未可名性者言性善，於孔子不敢顯言不明，而直斥孟子不備。

朱子云：「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

陳器之云：「孟子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併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

宋儒剖析至此，愈令人惑，學者習聞宋儒之說完備剖析，以孔子所言者一性，孟子所言者一性，任其閼隔，不復

求通。苟還而體會易論語中庸孟子，於傳注洵疑惑不解矣。宋儒之所以失者安在？曰，性之名，自古及今，雖婦人孺子，亦矢口舉之不謬者也，本盡人可知之通名也，儒者轉過求失之。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坼，根幹枝葉，爲華爲實，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即俗稱桃仁杏仁者。形色臭味，無一或闕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分於道而有之，成其各殊者而已矣，其不同類者各殊也，其同類者，相似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亦即別於氣類，盡人而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自歧爲二哉！於告子生之謂性，必致辨者，成則各殊，徒曰生而已矣，將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告子聞孟子詰之，不復曰然者，非見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而語塞也，犬與牛之異，又豈屬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哉！況朱子言性之本，物與人同，至形氣之偏，始物與人異，是孟子又舍其理之同，而就形氣以爲言矣。且謂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在告子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告子亦窮於知覺運動不可槩人物而目爲蠢

然同也，觀孟子以氣類之殊詰告子，知孟子未嘗謂性之爲理亦明矣。

問知覺運動不可槩人物而目爲蠢然同，其異安在？曰：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得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原於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者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者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及所資以養者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內爲一，其得於天地之氣本一，然後相得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其自然之知覺，合於人之所謂理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無不全也，全而盡之無憾者，聖人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於義外之說，必致其辨，以人能全夫理義，故曰性善，言理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人之生也，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

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至乎物，美惡是非之知，思而通於天地鬼神，凡日用事爲皆性爲之本，而所謂人道也。上之原於陰陽五行，所謂天道也。言乎天地之化曰天道，言乎天地之中曰天德。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者，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故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中者也。故在天爲天德，在人爲性之德，然而非有二也。就天之化而語於無憾，曰天地之中，就日用事爲而語於無失，曰仁義。凡達諸天下而不可廢者，未有非性使之然者也。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但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於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諸性而非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謂孟子以理爲性，推而上之，以理爲生物之本，匪徒於道於性不得其實體，而於理之名亦失其起於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使人茫然求其物不得矣。

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歟？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

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氣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爲理義。聲色臭味之欲，察其可否，皆有不異之則，故理義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因乎其事，察其不異之則，所謂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問人物分於陰陽五行，其成性各不同。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則亦肖乎天地之德，物之得於天者，非稟氣而生，遺天地之德也。而孟子道性善，但言人之異於禽獸，槩舉之，獨人之性善，其故安在？曰：耳目鼻口之官，各有所司，而心獨無所司，心之官統主乎上以使之，此凡血

氣之屬皆然。其心能知覺，皆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凡血氣之屬所同也，雖有不同，不過於此有明闇耳。就其明闇以制可否，不出乎懷生畏死者物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齧，進乎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本天地生生之德，發乎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觀於生生，可以言仁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非別有一物以與人而謂之仁。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惟條理所以生生，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言禮矣。失條理則生生之道絕，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言義矣。亦非別有其物，而謂之禮，謂之義。合而言之，舉義可以該禮，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舉禮亦可以該義，而舉仁貴全乎禮義。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是也。若夫條理之得於心，爲心之淵，然而條理則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無或失其條理，不智者異是。中庸言：「修道以仁。」連舉義又連舉禮而不及智，言以達德行達道，舉智仁勇而不及禮義，互文也。禮義有愆，由於不智。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卽其生之謂性之說，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也。彼以自然者，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老聃莊周告子及釋氏皆不出乎以自然爲宗，惑於其說者，以自然直與天地相似，更無容他求，遂謂爲道之至高。宋之陸子靜，明之王文成，及才質過人者，多蔽於此。

孟子何嘗以自然者非性使之然哉！以義亦出於自然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之言乎自然，異於告子之言乎自然。蓋自然而歸於必然，必然者不易之則也，非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也。天下自然而無失者其惟聖人乎？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者，自然也。不踰矩者，歸於必然也。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古賢聖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貴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爲用心於外，及乎動應，如其材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之處：不過材質之美，偶中一二，若統計行事，差謬多矣。且一以自然爲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謬之多，不求不思，以此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君子惡其害道也。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說，貴其自然，同人於禽獸者也。聖人之教，使人明於必然，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爲明之盡。人與物咸有知覺，而物之知覺不足與於此。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遠於物之不可開通。禮義者，心之所通也，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定人之智大遠乎物。然則天地之氣化，生生而條理，生生之德，鮮不得者，惟人性開通，能不失其條理，則生生之德，因之至盛。物循乎自然，人能明於必然，此人物之異，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舜，斷其性善在是也。以上卷二。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

子合。然指爲性者，寔古今所同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朱子謂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歟？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咸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欲有爲以後事，而其保此性也，主於無爲自然，卽釋氏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寔一說而非有三說。

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爲性？曰：神氣形色，古賢聖一視之，修其身期於言行無差謬而已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行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幾如物之蠢然，是不踐形也，於人之道無憾無失，斯爲踐形耳。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其立說似參差，大致皆起於自私，皆以自然爲宗。彼視一身之中，具形氣以生，而神爲之主宰，因貴此神，以爲形氣之本，究之神與氣不可相離，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其言乎天地間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從此而分陰陽，一生二也，陰陽與此而三，二生三也。言乎人物三者，咸具陰也陽也，沖氣以爲和，卽主宰之者也。彼見於氣可言有，神存乎其有，而不可謂有，又不可謂無，然不離氣者也，故曰沖氣。上之原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道，不離氣而別於氣，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莊子言神之主宰於身，則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曰：「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繼之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言此神受形而生，則不去以待，形化而有血氣乃有情欲，皆足以戕之，趨於速敝也。又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言求諸外者，徒勞其神者也。又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人壽有修短，雖不死之日，不知保此心，為形君之神，至與形俱敝也。釋氏人死為鬼，鬼復為人之說，與莊子此條同。老氏言長生久視，釋氏言不生不滅，語似異而以死為返其真，視形體為假合，從而空之，不過恐害其神之自然，指歸不異也。告子同於釋氏，以神識為性，釋氏謂之曰真空，謂之曰作用。謂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謂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故言空是性，又言作用是性。釋氏書中，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皆生之謂性之說也。固無取乎善惡之分。其顯然道破處，如云「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宗指。後世禪家不云「不思善而渾其語，如傳燈錄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即老子所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彼饑食困眠，聞之即可大笑，此即致虛極，守靜篤，即勤而行之也。致虛未極，守靜未篤，乃若存若亡也。其說大都主於一切空之，便妙用無方。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立言不同，而同出一轍如是。宋時如陸子靜，楊敬仲，及明王文成諸人，其言論皆如此。子靜之言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闕欠。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敬仲之言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嚙，鼻能臭，所以能嚙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王文成之言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又曰：「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文成釋格物為扞禦外物。在老聃莊周告子直據已見而已。故告子言無善無不善，言無分於善不善，言義外者，後人因孟子嘗辨之，則以此為善，已無可復加，為仁義禮智皆備，且所稱者出中庸大學孟子之書，以飾其說，學者不可不辨別疑似也。

問邵子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此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所謂道所謂性，而邵子亦言之，何也？曰：邵子之學，深得於老莊，其書未嘗自諱。以心爲性之郭郭，謂人之神，宅此郭郭之中也。朱子於其指神爲道，指神爲性者，皆轉而以理當之。邵子之書有曰：「道與一，神之強名也。」幾以道爲不足當神之稱矣。其書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以神周乎一身，而宅於心爲之統會也。又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此卽導養之說，指神之惛惛而不昧者爲性，性之綢繆而不息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立說亦同。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其所謂性，似同於程子云「性卽理也」。與邵子指神爲性者有異。陳器之云：「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然以虛指理，古賢聖未嘗有是稱，不幾猶釋氏言空是性歟？曰：釋氏所謂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言作用是性，則指神在形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然則「由太虛有天之名」者，以神而有常爲言。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已足，張子有見於必然之爲理，故不徒曰神，

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分理氣爲二，視理爲如一物，故其言理也，求其物不得，就陰陽不測之神以言理，以是爲性之本源，而目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擾，乃雜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寔體也。性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合於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神天德，化天道。」道以化言是也，德以神言非也。彼釋氏自貴其神，亦以爲足乎天德矣。張子之書又有之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語可參觀。以人物驗之，耳目百體會歸於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統攝於心，是神不可分也。夫天地間有陰陽，斯有人物，於其推行謂之化，於其合一謂之神，天道之自然也。於其分用爲耳目百體，於其合一則爲心，生物之自然也。是故就天地言，化其事也，神其能也，事能俱無憾，天地之德也。人之血氣本乎化，人之心知配乎神，血氣心知無失，配乎天地之德無憾無失，夫是之謂理而已矣。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目形體爲假合，以性專屬之理，則謂纔說性時，已不是性，皆二本故也。

問宋儒言「稟理然後有性，稟氣然後有形」，雖虛揣以爲說，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寔求其物，不得若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言。夫性則確有指寔，不過區別於形氣之中，言其主之者耳。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求之一身，儼然如三物，凡血氣之屬，未有或闕者也。

荀子謂「性者天之就」，雖專屬形氣之自然，固不遺夫神，而以為非天之就也。其稱性也，兼以惡槩之，而伸其重學崇禮義之說。何以論荀子，則曰不知性之全體而已。論告子釋氏，則斷為異說，何也？曰，性者分於陰陽五行，品物區以別焉，各為之本始，統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而名之，非以知覺運動者名之。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為言曰形曰氣曰神者，材也，易言「精氣為物」是也。心為形君，耳目百體者，氣融而靈，心者，氣通而神，告子貴其神而不知性者也，其不動心，神定而一無責焉之為不動也。性可以根柢言，材可以純駁清濁言，由其成性也殊，則其材亦殊，成是性，斯為是材。神可以主宰樞紐言，思可以敏鈍得失言，知可以淺深精粗言，皆根於性而存乎材者也。理譬之中規中矩也，氣通而神，是以能思，資於學以導其思，以極其知之量，古賢聖之教也。荀子不知性之全體，而其說至於重學崇禮義，猶不失為聖人之徒，特未聞道耳。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為宗，不知性之區別，而徒貴其神，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為已足，與古賢聖立教，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無差謬者異，是故斷之為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問周子通書有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與老氏「為道日損」，釋氏「六用不行，真空妙智」之說，及陸子靜言「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是理」，王文成言「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者，立言

不殊。後儒於周子則以爲切要之指，莫敢違議，於老釋陸王則非之，何也？曰：周子之學，得於老釋者深，而其言渾然與孔孟相比附，後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爲二程子所師，故信之篤，考其寔，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言「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其不得於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嘗師事亦明矣！見周茂叔後乃出入於老釋。張橫渠亦訪諸釋老之書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猶馳心空妙。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釋爲借階，雖終能覺寤老釋之非，而受其蔽，習於先入之言不察者亦不少。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問程子朱子以性爲足於己，其語學則曰復其初，程子云：「聖賢論天德，蓋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朱子於論語首章，復其初之云，出莊周書，莊子繕性篇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知於大學明明德，皆以復其初爲言。」又曰：「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無異釋氏所謂本來面目，然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豈彼以神言，此以理言，不嫌於語同而指歸異歟？曰：「孟子言性善，非無等差之善，不以性爲足於己也。主擴而充之，非復其初也。人之形體，與人之心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方其幼小，非自有生之始，即嬰疾病小之也。今論心性而曰其初盡人而聖人，自有生之始即不污壞者鮮，豈其然哉！形體之長大，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心性之資於問學，進而賢人聖人，非復其初明矣。形體無虧闕，故可以長大，而夭傷者失其可長大者也。赤子

之心，皆有仁義禮智之端，可以擴充，而不充之者，失其能充之心者也。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人異於物者，其性開通，無不可以牖其昧而進於明，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得於天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謂得之以性皆同其神，與天地等量，是以守己自足，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充之。宋儒或出焉，或入焉，故習其說者不得所據，多流於老釋。讀古人書，所慎尤在疑似，此亦當辨之大端也。

問神爲形氣之主宰，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神，而傳稱鬼猶求食，及伯有爲厲；又宇宙間怪見不一，愚夫婦亦往往耳聞目見，不得不惑於釋氏所云。而言仙者，又能盜氣於天地間，使其神離血氣之體，以爲有。故其言性也，卽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卽氣之絪縕而不息者，有所指寔也如是。老聃莊周告子釋氏靜以會夫一身，見莫貴於此，莫先於此。今以形氣神統歸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樞紐言，理則譬之中規中矩，不以神先形氣，不以理爲主宰樞紐根柢。老釋之說，宋儒之說，指歸不同而失同何也？曰：孔子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爲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氣散而死，可以反終而知也。其生也，精氣之融，以有形體，凡血氣之屬，有主則能運動，能運動，則能知覺。知覺者，其精氣之秀也。人之知覺，能通乎天地之德，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無往非仁，無往非禮義矣。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非

他，其精氣之能知覺運動也，是以又謂之神靈。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也。至於形敝而精氣猶凝，是謂游魂，言乎離血氣之體也。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後之有敝有未敝也。變則不可窮詰矣。彼有見於游魂爲變，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盜天地生生之機者爲己之本體。彼之以神先形氣，聖人所謂游魂爲變中之一端耳。在老釋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氣，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推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遂求諸無形無象者爲寔有，而視有形有象爲幻。在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於天，推而上之，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象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象爲粗。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禮義與性爲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爲二本，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神與形體爲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子告子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寔害聖人之教者也。

問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一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朱子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

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京叔二書，意見乃與釋氏不殊，信彼爲有寔得，此爲支離，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及五十內外，所見漸定，不惑於釋氏。合觀程子朱子張子皆先入於老釋，究之能覺寤其非何也？曰：四君子皆志賢聖之志者也，其學本乎求是，故於此於彼，期在自得，不在虛名。考之六經，茫然不得性道之實體，則不求諸彼矣。求諸彼而其言道言性確有指實，且言夫體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說性周法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故朱子嘗馳心空妙，冀得之以爲衡鑒事物之本，極其致，所謂明心見性，不過六用不行，彼所以還其神之本體者，卽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混無欠闕矣，寔動便差謬。在彼以自然爲宗本，不論差謬與否，而四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持以衡鑒事物，故終能覺寤其非也。夫人之異於物者，人能明於必然，百物之生遂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見夫天地人物事爲，有不易之則之爲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致虛極守靜篤，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至於道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爲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卽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爲必然，而以理爲太極，爲生陽生陰之本，爲不離陰陽，仍不雜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爲性，爲不離氣質，仍不雜於氣質。蓋不知理者，自然之極則也。視理儼如一物，加以主宰樞紐根柢之說，一似理亦同乎老釋所指者之於人爲本來面目。朱子

之辨釋氏也，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就彼言神識者，轉之以言乎理，尊理而重學，遠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協乎此，故指孔孟所謂道者非道，所謂性者非性，增一恍惚不可得而推究之主宰樞紐根柢，因視氣曰空氣，視心曰性之郭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氣之上，郭郭之中，此奉一必然之理，居此空氣之上，郭郭之中也。苟知有物必有則，不以則與物二視之，庶幾於孔孟之言道言性者始可通。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謂理，宋儒借階於釋氏，是故失之也。凡習於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覺，宋儒言道爲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爲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氣質，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其終遠於老釋，而近於孔孟，則彼以自然爲指歸，此以必然爲指歸也。

以上卷三。

一五、讀姜白巖尊行日記

清儒戴東原論宋明理學，深斥程朱，越後戴望爲顏氏學記，嘗謂其說本諸習齋。近人因疑東原思想淵源於清初之顏李，余舊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疑其說無據，頗加駁論。然謂東原思想未必本之於顏李，此一說也。謂東原生前，絕未聞顏李緒論，此又一說也。余固謂東原思想，不必本諸顏李，然亦未謂東原生前，絕未見顏李書，絕未聞顏李緒論。蓋學者著書流傳是一事，後人治其學，稱引其書，闡述其遺說，則屬另一事。近人因顏李之學，稍後稱引者少，遂謂其學不顯，一若其書絕少流傳，世無見者，遂疑東原之或可得聞顏李之遺說於程縣莊，此則混並兩事而一說之，實無證以見其必然也。余近讀清儒姜炳璋所著尊行日記手稿，有：乙亥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八日，於江西友人魯絜非處，假得顏習齋四存編一條，此下卽摘要錄述四存大意，下月又備記恕谷父洞初與習齋交游，及命其子恕谷從學事。是姜氏固亦曾見顏李書，而不以治顏李學名，魯氏

藏有顏李書，亦不以治顏李學名。兩人與程縣莊同時，然則豈必縣莊乃爲獨見顏李之書者？魯氏交游於姚惜抱，姜氏與錢竹汀紀曉嵐同年成進士，姚錢紀三人，皆與東原熟稔，東原又何必獨於縣莊所而獲聞顏李之說乎？又按恕谷與方望溪交好，絜非治古文辭，亦可因望溪集而探討及於顏李，書籍之流布，學人之窺尋，如水銀瀉地，如獵犬逐兔，安知其所必循之塗轍哉。且是時顏李書流傳至江西，又何獨於北京首善之區，人文薈萃，乃必不得接聞於顏李之遺說，獲見於顏李之遺書乎？然則東原若見顏李書，固不必定自縣莊也。

尊行日記又有爲柴子亭石作書上鄧令宗公，推薦全謝山修鄧志，書中有曰：謝山跼蹐之才，英鋒四出，固當事未甚許可者也。又曰：尊意未免慎重其間者，亦以謝山往往不理於口。生竊觀其著者舊集時，痛斥張東沙之偏狃，王一辰之穢賂。凡故家子弟，投金而欲附其祖父之詩文者，輒以爲人不足取，詩不足傳，悉麾去之，亦以此取怨於人。大抵平居影響之間，不無招謗。而著作傳後之事，極其堅忍。是謝山當日在鄉里，似譽評亦不甚美。此亦博學奇才，時所難免。東原早年，被逐於宗黨，遂襤被至京，此後絕不返故里。其事之詳不可知。汪容甫在江都，亦極招鄉里非議。戴汪皆高才尙氣，而少孤赤貧，其傲岸自樹，藉以自洩其內鬱不平之氣，而以招來里閭俗人之譏排，此自無傷於其治學立身之大節。戴氏之可議，在其成學立名之後，如婺源老儒之稱，如大典水經注之發現，此則固不當與早年鄉評一例而論也。

偶讀尊行日記，輒於有關於討論東原學行，而誌其所感如此。

一六、錢竹汀學述

竹汀晚年著十駕齋養新錄，同時阮元芸臺爲之序，有曰：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元初學者，不能學唐宋儒者之難，惟以空言高論易立名者爲事，其流至於明初五經大全，易極矣。中葉以後，學者漸務於難，然能者尙少。我朝開國，鴻儒碩學，接踵而出。乾隆中學者，更習而精之，可謂難矣，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蓋有九難。先生講學上書房，歸里甚早。人倫師表，蹈履粹然，一也。深於道德性情之理，持論必執其中，實事必求其是，二也。潛研經學，傳注疏義，無不洞徹原委，三也。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譌，四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五也。校正地

志，於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六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聲音文字之本，七也。於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考覈尤精，八也。詩古文詞，早歲久主壇坫，冠冕館閣，九也。元嘗服膺曾子十篇矣，曰難者弗辟，易者弗從。若立一說，標一旨，卽名爲大儒，恐古聖賢，不若是之易也。

阮氏此序，實可爲當時推重竹汀爲學之代表。竹汀身後，潛研堂集刊行，段玉裁懋堂爲之序，所言亦無以大異乎阮氏。在竹汀亦自言之曰：

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疏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抱經堂記，時年六十。）則竹汀固自以博學標學的也。空疏之學，爲竹汀之所斥。然博學尤貴有的。竹汀又曰：

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尊德性之功者哉。（策問）捨問學而言尊德性，固爲竹汀所不許。然道問學正以爲尊德性，則捨德性而言問學，更尤爲竹汀所不許也。阮氏列舉九難，首之曰人倫師表，蹈履粹然。次之曰深於道德性情之理。以此爲竹汀揄揚，可謂知先後之序矣。

在阮序中，尤可注意者，乃在無一辭涉及漢學宋學之分野，竹汀論學，卽不認有此分野也。故曰：

濂溪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耻也。儒者讀易詩書春秋之文，當主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崇實書院記）

此以濂溪二程張朱爲能崇實學，故無媿乎大儒之名，則曷嘗有菲薄宋儒道學之見存其心中乎。

惟竹汀極不喜宋史於儒林外別標道學傳之名，特爲文爭辨，有曰：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爲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爲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徇爲道學傳，列於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能無疑。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於五子。（跋宋史）

是竹汀特反對宋史之別標道學傳以列於儒林之前，非反對周程張朱之創爲道學也。故曰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又曰：諸儒自不得並於五子。其軒輊顯然矣。學者固當尋五子之學以究其道，非謂此五子者，乃不得預於學問之門，不得列於道統之傳也。竹汀又曰：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徇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愚意當總題

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不分優劣。既遵古式，又息爭端。（鄞縣志局與同事書，時年六十。）此爲與人論修志書，不僅欲廢道學之名，並亦主去儒林之目。此皆論史法，非於道學儒林爭優劣，尤顯然矣。而竹汀之於朱子，則尤致其佩仰之情。故曰：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朱文公三世像贊）

此文直以朱子爲孔孟後一人，而曰斯文在茲，百世之師。可謂是至高無上之讚辭矣。所以然者，豈不以朱子窮理致知由博返約之教，特於竹汀之爲學有深契乎。故又曰：

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溪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十駕齋養新錄）

竹汀又特爲此條標題曰朱文公議論平實，此又見其平日論學特所嚮慕之一端。又竹汀日記鈔卷三策問有一條云：

孔孟之書，儒者童而習之，孟子道性善，性之善，於親親敬長見之，所謂良知良能也。而宋儒乃謂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其似異而同之故，果何在歟？明儒主良知者，又與孟子之意異，果有當於聖學否？宣尼四教，不越文行忠信。學問之後繼以思辨。非徒異也。紫陽以窮理爲致知，此爲聖學真傳。而或者轉譏學問爲支離，毋乃與孔孟之旨相刺謬乎？

今按竹汀長吳郡紫陽書院，始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上距雍正六年戊申竹汀生年，適花甲一週，竹汀年已逾六十。其長紫陽凡十六年，此條策問不知在何年，要之已在竹汀之晚歲，而以朱子爲聖學真傳，則與前引兩條無異趣。其不滿於陸王，亦與上引養新錄一條相發，此皆竹汀晚年之見也。潛研堂集又特爲王白田作傳，是竹汀之心香一瓣所在可知矣。

然竹汀論學，特戒詆毀之爭，又不喜門戶之見。故曰：

論學術不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不爲黨同醜正之心。（養新錄）

又曰：

歐羅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贈談階平序，年五十二。）

斯可謂情見乎辭矣。又曰：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突喻）

又曰：

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養新錄）

又其評論衡有曰：

其書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問孔之篇，倚撫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跋論衡）

又曰：

安石心術不正，卽在好非議古人。（養新錄）

又曰：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善讀書而已矣。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不讀書而鑿空師心，既爲竹汀所深斥。而好立門戶，竹汀又謂之不善讀書。必祛此二弊，而後竹汀論學之淵旨乃可見。故又曰：

聖人議論公而度量大，王者知此，可無乏才之歎。儒者知此，必無門戶之爭。（養新錄）

又曰：

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名箴）

其與人論史記有曰：

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尋其用意之所在，不肯執單詞以周內文致也。（與梁耀北論史記書）

又其論吳廷珍新唐書糾謬有曰：

新史舛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跋新唐書糾謬，時年四十七。）

觀於上引，竹汀爲學，主於持論執中，實事求是，決不願見學術界有輕肆詆毀菲薄前人之風，更不願有門戶出入主奴之私爭。此在當時學術界中，洵可謂一特立獨出之人物。

余讀十駕齋養新錄，有一條云：

朱文公與陳同甫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

此條僅錄朱子語，更不自下一辭。竊意在當時，漢宋門戶意氣已一時全起，竹汀孤懷獨抱，明照炯然，既不願與時人競肆辨詰，亦不願爲古人一一分疏，誠所謂省得氣力，脫灑磊落。朱子此言，在竹汀必極有所感慨，故備錄之，而更不自著一語，則尤值後人讀其書者之神往也。此條在餘錄，已在竹汀七十六後之晚年，其對當時學術異同上之情懷，亦大可想見矣。

然竹汀論學，雖不喜立門戶，啓詆爭，亦非爲鄉愿無所是非之謂。故曰：

學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

又曰：

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答王西莊書）

其爲答問，論語之部，申古注，辨朱子集注者不少。又其讀大學篇，並有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之說。又曰：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不傳，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萃之力。後之人詆譏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蹠，其亦弗思甚矣。（論子思子）

得魚兔，忘筌蹠，竹汀謂之弗思。則寶筌蹠而忘魚兔，更非竹汀所許可。又曰：

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日記誦爲俗生，訶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便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尚。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囿。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與晦之論爾雅書）

此書所主，則曰通經博物。所斥，則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既不許師心自用，亦不欲爲一人一家所囿。其所輕則爲有明三百年學者，而所重則在清初以下諸儒。謂其直接宋元以來，此頗與顧亭林之說爲近，阮氏序養新錄特舉五經大全爲說，似與竹汀自言者有辨。竹汀論學辨虛實，阮氏又以難易說之。博學實學自爲難，意氣空言則自爲易，然竹汀似未有譏斥元儒之意也。竹汀所舉清儒，首亭林，此必有會於亭林經學卽理學之說，而措辭尤爲持平。其曰吳江陳氏，乃陳啓源

長發，作爲毛詩稽古三十卷，亦清初一經儒也。其特可注意者，卽竹汀論經學，亦與清儒一般言經學者有不同。其言曰：

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己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呵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並有不讀經而號爲博學者。（抱經樓記）

此所謂經緯天地，上以淑世，次以治身，此始爲治經宗旨，非必以學漢儒說經爲治經宗旨也。

又曰：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並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此亦與亭林之見相同，乃指陳宋元以下之學弊，固不以宋元儒之言性理道學爲學弊。亦固不謂經學經師則卽以能讀漢唐注疏爲能事已畢也。

又曰：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菴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書，乃詆以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

言，其實自注疏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儀禮管見序）

此文指出經學上有尊古注與空談義理好爲新說之兩途。然如朱子，後人奉以爲宋儒言義理之大宗，亦崇信鄭注。言禮不能屏理不談。言理亦不能捨禮不問。余爲朱子新學案，備著其說於朱子之禮學篇。清儒如焦循里堂，乃謂漢儒言禮不言理，宋儒言理不言禮，此乃門戶之見，非學術之真。竹汀所分辨，可謂明析。阮氏序竹汀養新錄，特舉難易之辨，而不分漢宋，特指其流弊始於元儒，殆即據竹汀之斥敖氏以爲言也。又竹汀言漢儒專家之學，僅舉鄭氏，至於上推西京，與一宗公羊，盛推今文，皆是此下推波助瀾之言，當非竹汀所許。

竹汀又特論鄭玄之爲人，有曰：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厥功偉矣。荀慈明委蛇臺司，未有匡時之效，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鄭康成年譜序）

竹汀以此推尊康成，較之並時漢學家專尊家法，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

竹汀又舉宋儒孫明復而闡論其治經之意，有曰：

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己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

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是則以能習注疏爲通儒，亦特是元明學弊後始然。而通經貴在明道，貴在能復三古之治，貴在能自有心得，不僅憑於注疏之墨守。其所讚歎於宋儒治經之意趣者又如何乎？此又何嘗有絲毫尊漢抑宋之意存其胸中？其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極稱宋儒胡安定之教法，又引朱子之言以爲闡說。又其跋四書纂疏，辨白趙潤孫未仕元代，謂關係格庵名節，恐爲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此尤足爲竹汀並不贊許當時學術界攻擊宋儒道學之風一明證。此跋成於竹汀六十八之年，尤見其爲晚年思想也。

竹汀又直陳當時言經學者之失，有曰：

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傳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可以言道。（贈邵治南序，時年四十四。）

是則治經求以明道，而通經明道，則既貴有學，尤貴能思。豈僅暖暖姝姝於漢儒一家之言，所謂家法師承者所能膺此好學深思之名，以任此道之寄乎。

竹汀又言之，曰：

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過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讀先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世諱序，時年五十七。）

此文直斥宋儒以下之語錄，主張經世實用，經史實學，而不滿於宋以下語錄之多言性與天道，其意略似顧亭林。與空言經學者不同，與分漢宋疆界以言經學者尤不同。竹汀極慕亭林，其爲養新錄，亦效亭林之日知錄，惟博學多聞爲相似，而經世實用若爲微遜。然此乃時代限之，亦殆才性有辨。竹汀要爲有此意，與同時之尊漢抑宋，專在注疏與家法爭是非短長者絕不類，此當爲之抉發也。

竹汀又論易學有曰：

古之聖賢，求易於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事。後之儒者，求易於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與程秀才書）

此又竹汀論學，一本之於人事與義理，不以漢宋爲疆界，不以注疏爲終極也。

當竹汀之世，論學者已樹漢宋之壁壘，而又爲經史分門庭。若論史學，則必羣推竹汀爲巨擘。然竹汀論學，固常盛推經術，其言已如上引。而竹汀之論史，亦與時風衆趨有不同。其與邱

艸心書，論征誅與禪讓，而謂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民慮。其自爲二十二史考異作序則曰：

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撻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讐。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痕瘡。不問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考異序，時年五十三。）

是竹汀實一本其平日所揭櫫之論學宗旨以治史，在其心中，並不見有經學史經之鴻溝，更亦絕無以史學名家，求與當時經學相抗衡也。嘗稱方正學有曰：

予獨愛其論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莫難於不得其源三語。先生之學，正以未嘗自高，而所得益深。世徒見其舍生取義，浩然與日星河嶽爭光，而不知至大至剛之氣，直養無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矯強憤激而爲之，斯爲聖賢素位之學。（跋方

正學溪諭草稟摹本）

竊謂竹汀之論學，亦一如其論人。勿自高，勿自狹，而貴乎得其源。凡沾沾以一業自名專家，以爲人莫之尙者，此皆自高又自狹，而不得其源之爲患也。其評班史古今人表曰：

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夔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論語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啓於此。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爲丈夫矣。（跋漢書古今人表）

此卽著史學之本源也。曰正學，曰名教，古今以史學名家而能識此意者，復有幾人。又曰：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史記志疑序，時年六十。）

此其推奉史記以爲史學宗主，而曰述作依乎經，議論兼乎子，繼春秋成一家言，言不煩而意無窮，所謂得其本源而弗自狹者，俱在是矣。然固不見有自高之意存乎其間也。又曰：

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徐健菴通鑑，多采善言。（養新錄）

以如此意態讀史，以如此意態評人史書，可謂迴不猶人。試問古今以史學名家而能具此胸襟抱此意態者復有幾人。竊謂竹汀之爲學，固不限於史。其成學之所至，亦不得僅以史學名。其學浩博無涯涘，不得已而必爲之名，則不如直承清初諸大儒如亭林之儔而名之曰經史實學，庶乎近是。此猶是清儒學風未大變時之所有也。江藩著漢學師承記，亦以竹汀列名其間，不知竹汀固未嘗以漢學自居。當時以漢學自負，以漢學相號召者，復有竹汀胸襟意趣之髣髴否？江氏之稱竹汀又曰：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

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此言亦無徵。謂竹汀乃通儒之學，則然矣。謂其治史乃有爲而作，此則仍是經學史學分門別戶之見爲之作祟，斷無當於竹汀爲學之意趣也。同時章學誠，欲標史學與戴震經學相代興，而貽書竹汀，極陳其義，謂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鍼芥之投，寧無暗合，（章氏遺書上辛楣宮詹書）此亦未免門戶之見好啓爭詆，今潛研堂集中不見有復書，是竹汀固不以實齋爲知音也。

竹汀於經史外，又注意文章之學，嘗爲秦蕙田味經窩稿作序，有曰：

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名士倡。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目濡耳染，聞道最高，顧不欲居講學之名。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書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輦悅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味經窩類稿序）

此其論學，實欲滙道學儒林文苑而一之。經術性理文章，皆通儒實學所宜備，又豈當時爭門戶，

分漢宋，別經史者之所與知乎？故曰：

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竹汀之論文，在當時亦爲特出。嘗曰：

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與友人書）

此書乃與友人論桐城方氏所稱古文義法。竹汀極不喜方氏，謂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又有跋方望溪文一篇，譏望溪以時文爲古文。然竹汀雖不喜方氏，於方氏所推尊之歸有光，則亦所佩服。嘗謂：

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歸震川先生年譜序，時年六十。）

此其持論執中，實事求是之意，於此亦見一斑。較之因薄唐宋經學，遂並韓歐陽之文章而忽之者，意量相去，過乎遠矣。又曰：

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菑畲，以義理爲溉灌，胸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卽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半橋齋文稿序，時年六十九。）

論文本義理性情，最爲名通。其論詩，亦如其論文。有曰：

詩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掃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胸羅萬卷，采色富瞻，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真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尙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春星草堂詩集序，時年五十八。）

又曰：

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真才人，大才人也。（同上）

又曰：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歐陽子之言曰：詩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王邵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李南澗詩集序）

又曰：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秀水朱氏譏之云：詩雖

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謂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自成一大家。（甌北集序，時年六十三。）

竹汀論詩文，率具如是。當時經學漢學家，能知玩情肆意於詩歌文章之林囿者，固已少矣。然竹汀之論詩文，即必源本於性情，植根於經史，而尤關心於教化。乃特不喜於自明以下之小說。其言曰：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正俗）

此一理論，實可見竹汀論文之又一面，此其所以爲通儒實學也。今若謂清儒治漢學，皆是故紙堆中學問，則竹汀固不爾。平心論之，當時所奉漢學魁傑，其實亦不盡爾。如惠棟定字，其所著述，自諸經外，別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此關史學。又有王漁洋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此關文學。竹汀比之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又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竹汀亦稱之，謂其箋注古雅，自成一子，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時年七十。）又曰：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古文尙書考序）此乃推稱惠氏，非卽尊崇漢學，辨文理者必能知之。又如王鳴盛西莊，與竹汀科第同年，又有婚嫻之好，竹汀稱之曰：

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樸學自好。祖述後鄭，升堂覩奧。（西莊先生墓誌銘）

此謂立言非一，所重經術者，乃竹汀自爲言。謂漢人說經必守家法者，乃稱述西莊言。而又曰：

經明史通，詩癖文雄。（同上）

是西莊之學，亦經史文章三者兼擅。縱謂治經必守漢人家法，非謂學問卽盡於是也。其他一時學人，兼擅經史文章者，尙亦不乏，而竹汀尤爲之冠冕。阮氏養新錄一序，言之備矣。顧當時戴震東原乃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此語引於江藩漢學師承記。江氏又曰：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採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

是江氏爲竹汀抱不平。然東原初至京師，困於逆旅，竹汀爲之延譽，稱曰天下奇才，舉世始知有東原。及東原卒，竹汀爲之傳，首舉其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之論，（戴先生震傳）而於此一義，竹汀乃終身稱道。如曰：

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左氏傳古注輯存序，時年六十。）

又曰：

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時年六十六。）

類此之言猶屢見，而暢發於所爲經籍纂詁序。其言曰：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詁訓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詁訓之外者也。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尙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學問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儀徵阮公，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必通訓詁，而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戴東原實剏此議，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學術正而士習端，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經籍纂詁序，時年七十二。）

謂治經必通訓詁，此固然矣。謂有訓詁而後有義理，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此則大不然之甚

者。若謂治學必以訓詁爲主，訓詁必以漢儒爲歸，如此則學必昧其本源，而門戶之已狹。學問只在故紙堆中，而所見之已小。實不與竹汀平日論學素旨相合。竹汀論學之淵懿，余既備引其說矣，唯此一義，實堪疵病，而實襲自東原。既奉以爲治學之最要途轍，則無怪乎東原之毅然以第一人自居，而以竹汀爲第二人也。竹汀以一代通儒，而襲此謬論，迄於晚年，曾不悟其非可與向所持論之夙旨相溶洽。由此推衍，則孔孟義理無其原，而漢宋門戶不可泯。余誦潛研一集，每不禁於此而爲竹汀致惋惜也。

此稿刊載於民國六十年三月故宮文獻季刊二卷二期

一七、讀段懋堂經韻樓集

段玉裁懋堂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從戴東原講學，投札稱弟子。時年二十九。東原以非宋訾朱自負，懋堂則以小學名家。然考經韻集卷八，有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其文成於嘉慶十四年己巳，懋堂年七十五。跋中有曰：

癸亥，先君子見背，今又七年所矣。歸里後所讀書，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誼逐。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聖之可法者，胥於是在。或謂漢人之言小學，謂六書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尤悖。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之教童蒙，本末兼賅，未嘗異孔子教弟子之法也。

東原言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一時風氣，羣以治六書訓詁爲學問唯一大門徑，懋堂尤畢生萃精許叔重說文一書。其所爲說文解字注之付梓，在嘉慶十八年癸酉，僅在此後四年，乃謂老大無成，追悔已晚，是其內心憤悱之情，實有大堪注意者。

懋堂跋朱子小學文，在己巳之三月，而同年正月，又有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序，亦在經韻樓集卷八。其文有曰：

余以謂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爲異說，簞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

東原舉義理考據辭章爲學問三大綱，而以獨能言義理自務。懋堂承其師說而變之，謂學問當首重考覈。考覈當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覈輔之，其意首發於爲其師東原集作序，而及是又發之，與其師所言，意趣有異，蓋其心猶不忘宋儒之理學也。

同年，又有答顧千里書，見經韻樓集卷十一，書中有曰：

顏氏家訓曰：今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如此以學，求益反自損，不如無學。子朱子小學取之。顧涇陽誨錢牧翁曰：汝自謂讀書多，我有書二本，汝卻未讀，乃小學也。未有無人品而能工文章者。足下姑讀小學，何必一再言。

是卽考覈身心倫理而以讀書之考覈輔之之意。既曰學者所以學爲人，又曰：未有無人品而能工文

章者，斯誠宋學宗旨所在。其跋朱子小學，必曰恭跋。其稱朱子，又必曰子朱子，斯其一瓣心香之深入骨髓可知矣。

又按懋堂爲戴東原集序有曰：

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其利以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此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懋堂編東原集而爲之序，事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懋堂五十八歲，尙在爲嚴久能作序前十八年。是懋堂雖深佩其師之學，而於其師之說，必重有引伸，加以發揮，而又反復言之，此非有意於背師，乃其幼年濡染於理學，尤其於朱子之言，至老而不能忘。其謂盡天地民物之理者，卽朱子之格物精神也。故曰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覈輔之也。此亦猶朱子言讀書卽格物之一端也，而豈僅經籍訓詁之務乎？

懋堂又與劉端臨爲好友，曾爲劉端臨先生家傳，有曰：

君生有至性，六歲，母朱宜人卒，哀毀如成人。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几席，終其身

如是。少穎悟，九歲作顏子贊，長老無所點定。十餘歲，潛心理學，於其室設宋五子位，朝夕祀之。入里巷，目不旁視，時人有小朱子之目。年十六，補縣學生員。院試前夕，漏數刻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

懋堂與端臨爲友，在其四十七歲時。其對東原正式定師弟子禮在三十五歲。東原爲孟子字義疏證尙在前，而與懋堂通函稱述此書，則在懋堂之四十三歲。懋堂編東原集作序，在五十八歲。可證懋堂雖師事東原，然其崇重朱子之意，則至是終未變。懋堂特認東原言義理，於宋儒外別有發明而已。固未以東原言易宋儒，亦顯未以當時之經學與有宋理學作對抗也。至劉端臨卒，則在懋堂之七十一歲。其爲端臨家傳，應卽在此年或稍後不久。而是年有與王石臞書，云：弟落魄無似，時觀理學之書。又謂說文注近日可成。則懋堂雖萃精許氏說文，而其崇理學尊朱子之意，則固未變。其爲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及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序，則在懋堂之七十五歲，尙在此後。會合而觀，則懋堂之學術途徑與其思想向背，自始以來，顯不以經學理學相對抗意。而其同門如王石臞，至好如劉端臨，亦皆絕不作此想，此可知當時之學風也。懋堂與劉端臨書有云：

孟子字義疏證所言，實能發明孔孟之旨，而非宋人所能見到，足下以爲然否。

是懋堂亦疑東原所言與宋儒有背，疑未能定，乃以詢之於端臨也。又一書云：

白田先生集及已刻之書，能爲致之否。竹汀著有白田傳一篇。

是懋堂一面稱道其師之字義疏證，一面仍留心王白田，卽是仍不忘朱子宋學也。蓋懋堂心存依

違，而終無定見。有如是。

其與王懷祖書則曰：

東原師曾與弟書云：僕生平著述，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今詳味其書，實實見得宋儒說理學，其流弊甚大，閣下可曾熟之覆之。

懋堂此書，自言年七十有六。在其恭跋朱子小學之後一年。是懋堂爲朱子小學跋以後，心終不安，又再熟覆東原之疏證，乃終覺宋儒說理學之流弊，與其以前與劉端臨書，僅謂東原所言，非宋人所能見到者，語意又不同。竊疑懋堂思想轉變專主東原殆始於是。雖未明白暢論，而迹象已不可掩失。

又按經韻樓集卷三有在明明德在親民說一篇，有曰：

經之不明，由失其義理。義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訓，或失其音讀。三者失，而義理能得，未之有也。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語近佛氏本來面目之云，特以理字易心字，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耳。復初之云，始見於莊子，大學言充積，非言復初。失古經句度故訓，以私定之句度故訓釋經，非大學之指也。至於程子之讀親民爲新民，則又失其音讀者也。往者東原師作大學補注，爲予言開宗二句之義，而其書未得見，因述以詒後之人。

此文明據東原駁程朱。謂經中義理，必由句度故訓音讀而得，此正東原意，與懋堂向所言求盡天

地民物之理者有不同。其說明明德，謂明明猶煌煌赫赫之類，以明其明德爲非，此終爲誰失其句度故訓乎。惜此文著作年歲不可考。其下一篇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亦駁朱子章句，題注庚午三月，在嘉慶十五年，正是懋堂七十六歲時。此兩篇當係同年所作。則懋堂意見確於此年始有轉變也。

又經韻樓集卷九有十經齋記一篇，作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懋堂年七十八，文中有曰：

余耄矣，近者亦閉戶一室中，以二十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

是懋堂老而益尊其師也。其謂二十一經，乃於十三經外，欲廣之以大戴禮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八種，謂：

學者誦習佩服既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顯題，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然。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

此於十三經外又增八種，首大戴禮，末尾算經兩種，皆其師東原所曾親校也。至朱子四書集註，乃當時人人必讀書，顧攢不得預。又懋堂常用理學字，至是乃改稱道學，而曰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是懋堂至是年，乃始一遵其師東原之意，至謂可以有經學，無理學，並道學之名亦可無。而懋堂之說文解字注，亦於是年授梓，殆可謂至此年而懋堂意見之定於一是者益顯也。

又經韻樓集卷七東原先生札冊跋有曰：

哲人其萎，失聲之哭，於茲三十有八年矣。思先生而不可見，於是修先生年譜一卷付刻，又哀先生札得十四，付裝潢。

是年，懋堂八十歲。其爲東原年譜，乃遲至東原卒後之三十八年，其於年譜與裝潢之札，尤拳拳於字義疏證一書，則知懋堂意見之確然獨奉東原一家言以爲定論者，乃自其七十六至八十之年而大定也。而翌年，懋堂年八十一，五月，說文解字注全部刊成，九月亦溘然逝世矣。

又按東原年譜載，先生與朱文正公善，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文正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裁往。朱文正公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朱石君卒，在嘉慶十一年丙寅。經韻樓集卷七，有闕文兩篇，一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又一爲上大興朱中堂書。考經韻樓集始刻於道光元年辛巳，距懋堂卒已六年，疑此兩文不爲懋堂身後刻其集者所刪，殆懋堂生前自刪之也。蓋懋堂官卑，配享之議不獲親上，乃貽書石君，懇其上之。石君於嘉慶七年爲協辦大學士，十年，拜體仁閣大學士，以至其卒。懋堂上書稱中堂，卽在此數年間。尙在其跋朱子小學前，殆石君卻之，議未獲上，事旣不成，懋堂臨老，又改變初見，一意尊東原，遂沒其稿。又懋堂東原集序，及爲東原年譜時，已不再提及此意。今經韻樓集亦不收此序，此必懋堂自刪之。而於恭跋朱子小學，則猶存其文。於請東原配享朱子，則猶存其題，此以誌往年之心迹，皆見懋堂稟性之敦厚也。

皮錫瑞經學歷史，據議配享及跋小學兩文，乃謂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又爲惠江戴段爲

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撥，不知慎修在前，恪遵朱子矩矱，與東原自不同。懋堂幼年受程朱影響，至老依違兩者間，及七十六之後至於八十之年，乃始一尊東原，細讀其集，可以推知。石臞乃其同門，然出理學家庭。其父於石臞幼年，館東原於家，命之受學，乃終其生專心小學訓詁，絕不一語及義理及經學理學異同。其識解明通，似過懋堂。及懋堂之卒，乃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以讀書人稱重懋堂，可謂恰切。蓋石臞亦敦厚人，其父其師爲學途徑不同，故語有分寸。皮氏所言，粗疏已甚，特附辨於此。

又按：王石臞敍端臨遺書有曰：

端臨邃於古學，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旨所在。比之徵君閻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於壤蟲也。

石臞之贊端臨，正取其兼采漢宋。百詩尊朱，東原反朱，而石臞並列齊稱之。易疇與東原，同師於婺源江氏，其學亦漢宋兼采，途轍近於師門，與東原之呼婺源老儒者異矣。石臞親受業於東原，尊之曰先師，而特以與亡友程易疇合引，又增之以百詩，豈石臞不瞭於此三人論學之意見。又謂端臨學識於此三人可相伯仲，是石臞深賞端臨，而於其師東原轉若未爲特加重視，又豈如懋堂自謂於端臨爲至好，與石臞爲同門，而特尊其師東原，以爲超出有宋程朱理學之上，卽此一端，亦可覘端臨石臞懋堂三人之學識深淺矣。

又石臞敘懋堂說文解字注有曰：

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

此曰小學明而經學明，乃承其師東原之說，然不曰經學明而理學可廢，則與懋堂之尊其師者爲有間矣。

又石臞行狀稱其子伯申年十歲，石臞卽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置案頭省覽。暇則講解朱子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是則石臞之教其子，正猶懋堂七十五歲恭跋朱子小學時之心情也。然石臞似未嘗如懋堂之必明辨朱子小學爲眞小學，而聲音訓詁爲不得稱小學也。

又懋堂甥龔定菴爲王伯申墓表，有曰：

士珍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

是伯申明承其家教，以小學非卽大道，不作訓詁明而義理明之說。而石臞伯申父子，亦豈誠於所謂大道者絕不理會，而又懵無所知乎？

又劉寶楠，字楚楨，端臨從子。爲論語正義，時人稱其蒐集漢儒舊說，益以宋儒長義，及近世諸家。成孺寶楠傳有曰：

楚楨雖從事漢學，然推崇朱子，絕不蹈非毀宋儒之習。

是楚楨殆能確守其從父端臨之教者。其子劉恭冕叔俛，續成其父所爲之正義，作爲後序，亦曰：

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

是寶應劉氏自端臨楚楨叔俛三世，家教相傳，正猶如高郵王氏，自安國石臞伯申三世之家教相傳，治經學而不蔑理學也。陳碩甫謂：

高郵王氏三代經學，庋架無唐以後書。

其然，豈其然乎。碩甫受學於懋堂，雖登王氏之門，似未甚稔於王氏之家風也。

又端臨弟子苗之鉉，字劍鈺。寶應儒林傳稱其

少時讀鄉先進劉練江王白田朱止泉遺書，卽慨然慕其爲人，而於端臨尤所親炙。嘗舉朱子小學近思錄及劉戢山人譜示生徒，曰：此最切要。舍此則無以爲人。

又朱彬，字武曹，寶應人，有禮記訓纂。林少穆序之曰：

先生承其鄉先進王氏懋竝經法，又與劉端臨臺拱，王石臞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故編中采此四家之說最多。

白田亦寶應人，其朱子年譜，石臞父安國爲之序，高郵寶應兩邑，有此學風。懋堂與石臞爲同門，與端臨爲至好，然及其晚年，終以尊其師過甚，似與端臨石臞之爲學，有不甚相契者矣。後人並稱戴段二王，不知戴段與二王之間，有此分歧，因爲附識於此。

一八、記鈔本章氏遺書

書肆挾鈔本章氏遺書來國立北京大學求售，余携歸燈下檢讀，疑是實齋子華紱所錄副本也。何以言之？道光壬辰，華紱初刻文史通義，跋云：「先君子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及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先後付梓」云云。今鈔本適裝十六冊，與華紱言合，一也。初刻文史通義外篇三，有答甄秀才論修志兩書，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二書，修志十議，天門縣志藝文考五行考學校考三序，查劉刻本知爲王氏原目所無，而此鈔本皆有之。（與甄四書在卷十通義外篇四，修志十議以下四篇在卷十八方志略例三。）華紱所謂王目所遺尙多，其合二也。又鈔本偶有夾附別紙評識，

字跡皆出一手，不知何人所評。惟史注篇原注「義詳叙例篇」，附錄云：「叙例篇內篇未見，外篇亦無其名，豈見他篇耶？似當注明。」旁附別一手字跡云：「正文已云太史叙例之作，是叙例乃太史公篇名，然史記有自叙無叙例，或是自叙之誤。師陸記。」師陸卽洪洞劉子敬，時爲大梁書院山長，與姚春木同定通義篇目者。則其他評識，是否係姚春木筆，雖不可知，而此書曾爲劉子敬過目，其合三矣。本此三證，故疑此本當係華絳所錄副本也。

此本文字，有王本有目無文，劉刻於他處搜訪得之，而此本明有其文者，如評沈梅村古文之類是也。有王本有目無文，劉刻亦搜訪未得，而此本有之者，如與孫淵如論學十規之類是也，有王目所無，劉刻有之，此本亦有者，如說文字原課本書後之類是也。亦有王目劉刻有之，而此本轉缺者，如此本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目錄最後一篇爲禮教，有目無文，劉刻遺書附錄王宗炎復實齋書，有「禮教已著成否」之語，是實齋當時先已擬有禮教篇目，而文則後成，或華絳副本乃從其兄杼思所寄原草寫錄，故此文亦未補入也。（此本所見，亦有目無文。）亦有王目劉刻皆無之，而獨見此本者，如史考摘錄，清漳書院留別條訓諸文是也。有可以校補劉刻之誤者，如論課蒙學文法一篇，劉刻采自汪如瀾小方壺彙刻，乃自「故初學藉以爲資」下脫去原刻一頁，凡六七百字，逕以隔頁之首字直接上頁之末字，遂使文理不通，讀此本始見其全文之真相。凡此之類，若彙而刊之，近有二十篇，誠可爲愛讀章氏文者一極可喜之發現矣。

章氏通義，生前曾刻其一部分。余前讀燕大圖書館所藏章氏遺書鈔本，篇目均附小註，載列

年月，亦有注「已刻」者，即指實齋生前所刻也。此本凡遇已刻，即分頁散訂，不再鈔寫，遂可得章氏生前所刻文字之全目及其書樣，亦此本一貢獻也。今寫其目如下：

易教上中下

書教上中下

詩教上下

言公上中下

說林

知難

評沈梅村古文

論課蒙學文法

與邵二雲論文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與史餘村論文

又與史餘村

答陳鑑亭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凡二十二篇。王本自評沈梅村古文下至又與史餘村凡六篇皆有目無文，答陳鑑亭則並目失之，殆因文已前刻，故未寫錄乎？（劉刻據雙藤花館所藏文史通義鈔本補入，亦由未見章氏生前通義刻本也。）

然頗有極有關係之文，而王本失之，劉刻遂亦不知有此文，未能搜訪補入者。如此本卷九與史餘村文章經世之業一篇，又答邵二雲「來書於戴東原」一篇，皆評戴東原學行及自道爲學制行本末，爲考論戴章兩人學術異同極可貴之材料，而王本並目無之。疑當時學人不知實齋論學深意，嫌其貶戴太過，恐召戴門後學之鬭爭，故遂諱之。卽實齋原文，亦謂「此時未可舉以示人，恐驚一時之耳目。」又曰：「辨戴諸說，不欲遽爲今人所知。」（上引與史餘村）又曰：「藏其稿不敢示人，恐驚曹好曹惡之耳目。」（上引答邵二雲書）今大典本水經注行世，戴氏偷竊趙東潛書假託欺世之事大白，則實齋論戴氏專從其心術隱微處著眼者，其意庶亦可以取諒於人也。

卽如與孫淵如論學十規，劉刻本附錄臧鏞堂丙辰山中草跋，謂「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辨諸篇，偉論閎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穀膳先生以此冊惠讀，（按卽指丙辰山中草）卽以鄙見質之」云云，則王穀膳處固明明有此諸文，不應此後獨失十規一稿，殆亦諱而滅之耳。此本論學十規，不知由何人貼去十規二字，將原文第十項批評袁簡齋一節，墨筆鉤去，是此人之意，亦欲改十規爲九規。蓋原書第八本規孫氏攻摘古人太甚，

並謂「請於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亦不必過責其人」，且云「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之甚，今已知悔，多所刪改。」而第十規即醜詆簡齋，目之爲「名教中之罪人，不誅爲幸」。所以規人與所以自悔者，乃一篇之中，不踰數百言而即自犯之。故疑今王本無其文，乃由王氏逕爲刪去，非如酒誥之俄空也。

此本婦學篇書後，「近日無行文人」，又「彼浮薄文人」，又「人首畜鳴，創爲風趣之說」，又「今淫邪之人」，皆旁筆改「不學之徒」字樣，又「非聖無法」下，本有「罪不容於死」五字，亦加筆抹去，末句「其視浮薄文人直穢豕爾」，旁筆改，「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此亦皆後人所爲，而章氏之評詆逾量，蓋尙有雖悔之而未盡改者。（華絳刻其父書亦多刪削，即如詩話篇詩話論詩非論貌也以下全減去不刻，是也。士習篇，王有目無文，此本并目無之，豈亦砭世有太甚耶。）

此本言公篇，係已刻本散頁訂入，篇首有一行云：「道聽塗說，爭名趨詭，腑械心窻，斯文如燬，著言公上中下篇。」黏紙云：「此行宜刪。」今華絳刻本無之，劉刻本亦無之，此亦後人之意。今考實齋與邵二雲論學，有云：「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遊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剿其意，幾於李義山之敝縑，身無完膚，杜子美之殘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慚，亦可慨

也。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此函所言，正可與原刻言公篇首行互相發明，使讀者知其當時下筆之動機。然苟誠意謝名，則篇首一行固可刪去。惟居今而論，則留此一行文字，亦未始不足爲知人論世之一助也。

此本又有「又與朱少白」一書，謂「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爲之言，不盡爲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振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沈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此文收入文史通義卷九，王目劉刻，乃並篇目而失之，豈亦以中論史考一案，牽涉及於當時勝流名士種種實相，遂亦有所諱而滅之耶？余爲近三百年學術史，於實齋文史通義淵旨，頗多抉發，時風衆勢之慨，身世隱微之感，賞弦外之音於聲塵寂寞之後，惜乎子雲不作，身後桓譚，竟不知其亦見許否爾。讀此文，自比其著作於老杜之歌詩，不禁深喟長吁，若想見乎其人。余以其生前刻本流傳，皆非著作深意所寄，及身後愛重其學者，爲之搜刻全書，而此等關係文字，仍多湮滅不彰，爰亟寫錄其軼文不傳者，彙爲一卷，而記其涯略如此。

附補抄篇目：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鈔本卷九）

又與朱少白論文（全上）

又與朱少白（全上）

與史餘村（全上）

答邵二雲書（全上）

與史氏諸表姪論策對書（鈔本卷十）

史考摘錄（鈔本卷十五）

「書宋孝女」附錄案牘（卷二十二）

書李孝婦事（全上）

書李節婦事（全上）

家石亭封君七十初度屏風題辭（鈔本卷二十六）

許可型七十初度幢子題辭（全上）

清漳書院留別條訓（鈔本卷二十七）

定武書院教諸生識字訓約（全上）

定武書院教諸生集經傳文字異同凡例（全上）

寇難（鈔本卷三十二通志稿）

熊倩（全上孝友傳）

附 記

余早孤家貧，年未冠，即爲鄉村小學教師。一日，偶見報載北京大學招生，有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一條，因向書肆購讀，始知其時有章戴之爭，明遺有顧黃之異，爲學有經史之別。讀而好之，每存余心。忽一年，夢登一樓。樓南向，三面皆有廊，惟背北一面爲樓梯。東西北三面倚壁皆書櫃。中放一長桌，玻璃面，下亦放書。瀏覽皆章著，乃有人間未見者。醒後常記其事。越後讀書漸多，章氏書幾無不過目。民國二十五年，授教北京大學。一日，圖書館主持人携鈔本章氏遺書一大篋來詢余，此書值購否，因北平書肆，亦時有此書鈔本出售，定價四十元，不爲貴。余曾見燕京大學亦藏此一鈔本，目錄附注有年歲，爲刊本所無。因囑送余家，細閱之。念此書有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一篇，有目無文。劉翰怡重刊此書，登報徵求，亦無獲。乃此鈔本赫然有之。大喜二十年前所夢不虛。又檢書中夾一大紅名片，不識其人姓名，然題洪洞，知必與助校此書者洪洞劉子敬有關。乃澈底細校，得未見文凡十許篇，又刊本一文中缺六七百字。翌晨，窮日夜力鈔錄，乃以鈔本還北大圖書館，囑速購珍藏。是時，余近三百年學術史方付印，乃補入孫淵如一文，又增補學術史多條。又別爲一短記，是年冬，登之圖書季刊三卷四期。越年，抗戰起，余携所鈔各篇離北平，輾轉滇蜀，由成都四川省立圖書館出版兩百冊分贈友好及學校圖書館。及避赤禍至香港，乃見大陸已翻印此本，而沒去余之名字及所鈔來歷。嗣又見大陸印文史

通義，已將此所鈔散入。然余聞此鈔本實未藏北大圖書館，乃由圖書館主持人購贈之胡適之，今已不審其所在。余所鈔撮，窮日竟夜，出之倉促，或尙有遺漏，則待得此書者重加校覈，故特識其經過於此。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一九、崔東壁遺書序

距今一百四十四年以前，大名老儒崔東壁應禮部試至京師，有雲南舉人陳履和遇之逆旅，讀其所著書上古、洙泗考信錄而大服，北面請師事，相懽遊如父子然。如是者兩月餘而別去，自此不復相見。越二十有五年，履和重來省其師於彰德之里第，則東壁已先五月卒，無子嗣。家人聞叩門聲，曰：「是雲南陳舉人乎？」出遺囑哭授。遺囑曰：「吾生平著書三十四種，八十八卷，俟滇南陳履和來親授之。」履和再拜柩前，捧全書去如京師，遂次第付梓焉。當是時，世稍稍知有大名崔東壁也。嗚呼，學術之精微，其相契於心髓，相要以生死，有如是哉！

然東壁之學傳矣而不廣，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沒於書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於今而始大顯。初，胡君適之自海外歸，唱爲新文化運動，舉世奔走響應惟恐後。胡君於古今人多評騭，少所許，多所否，顧於東壁加推敬，爲作長傳，曰科學的古史家崔述，流布僅半篇，未完稿，然舉世

想見其人，爭以先覩遺書爲快。胡君友錢君玄同，主廢漢字爲羅馬拼音，讀東壁書，自去其姓而姓疑古，天下學人無不知疑古玄同也。而最以疑古著者曰顧君頔剛。顧君爲胡君弟子，亦交遊於錢君，深契東壁之治史而益有進，爲古史辨，不脛走天下；疑禹爲蟲，信與不信，交相傳述。三君者，或仰之如日星之懸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獸之泛濫縱橫於四野，要之凡識字人幾於無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於三君乎見之。而東壁以百年前一老儒，聲名閤淡，乃留遺此數十種書，得身後百年如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顯於天下。其遇合之奇，較之當日陳舉人之叩門拜柩，抱遺書而去者，其爲度越又何如耶？

顧君於東壁書，謀爲標點行世，顧鄭重其事，不欲倉卒潰於成，積十年乃卒業，而所收遺稿視前益豐。本約胡君錢君同爲之序，值錢君病腦，不能構思，胡君牽於事，顧君亦冗忙，均自恨不能盡其意。一日，告余曰：「東壁書標點久定，方脫版，子試有以序其端。」余於三君無當爲僕役，惶慚不敢遽諾。他日，顧君又敦促。余念亦聞三君者之風而始讀東壁書，並稍稍識其涯略，義不當固辭。而是時華北之風雲驟緊，日處危城，震盪搖撼，奇譔蠱起，所見所聞，疑非人境，則亦何意於爲之！及事稍定，而北平各大學青年愛國運動驟起，牢獄之呻呼，刀刃之血滴，觸於目，刺於耳，而傷於心，一室徘徊，胸沸脈竭。而顧君之限期既屆，則我又將何以序崔氏之書而應顧君之命乎？

無已，請捨崔氏書而言時事；時事之壞無足言，請言其所以壞。夫時事之所以壞，其來有

漸，非一日也。爲窮源探本之論者，乃研討及於吾中華民族文化之真價。此其事若明若昧，反覆縈繞於吾學人之胸海，自晚清以迄今茲，亦既數十年。獨至胡君乃始大聲疾呼，戒國人勿以已往之文化自傲自安，而錢君顧君承之。古史者，吾民族自謂四千年光明燦爛文化所託始，又羣認以爲黃金時代所在也。我民族之光榮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價何在？曰，在古史。唐虞三代孔孟幾於爲後世想慕追求之極規，而三君者起而疑之。其爲辨僞考信，夫亦曰將告人以我民族文化淵源真相乃不過若是而已；其有取於崔書，夫亦曰辨僞考信之事昔人已爲之，不徒以爲解嘲，亦將以資起信而已。方其時，三君之立說固已深慮夫國難之無日，而思大爲之申傲，則今日者國難雖殷，崔氏之遺書，顧君之深意，固猶當有待於洗發也。

主於尊經而爲之考信，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古史之骨幹，此崔書之要旨也。然古史果若是乎？曰，不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傳統載於六經，傳之儒家，而六經之結集，儒家之獨尊，其事始於漢，中衰於魏、晉，復於唐而定於宋，未必遽爲古史之真也。漢武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兩漢四百年利祿之途在是，而學術亦在是；宋人以經義試進士，迄元、明、清勿革，千年來之利祿在是，而學術亦在是。合乎是者謂之正學，背乎是者謂之邪說。雖有一二大儒雜出乎其間，未嘗以學問牟祿利，而其所以爲學者卒亦無以大異乎朝廷之功令。崔氏之書，蓋亦是也。

顧君之辨古史則異是，疑乎尊經者之爲見，蔑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

爲統而辨之者也。是其立說果何若？曰，此在古已多有，先秦如莊周、韓非，下及魏、晉之際，凡異乎儒說者皆然。稱道堯、舜，固非自今而始開懷疑之口也。二家之辨，易辭言之，一則考諸經以信史，一則求於史以疑經，其對於經學之見解不同，斯其對於古史之觀點亦異爾。

然則儒家之所傳，六籍之所載，固於古史爲若是其不可信歟？曰，又不然。儒家亦古學一大宗，六經亦古籍一大類，儒家之與六經，其自身卽爲古史一大部，謂必捨此二者而後可以求古史之真相，我未見其有當也。治東周不能無取於春秋與左氏，治西周不能無取於詩書，此皆儒家所傳，六籍所統，可信多於可疑，司馬遷所謂載籍極博猶必考信於是也。唐、虞不敢言，請論三代。孔子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又曰：「夏禮我能言，杞不足徵；殷禮我能言，宋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此孔子以夏殷周爲三代之說也。此西周之君臣已言之，其在周書之召誥有之，曰：「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有夏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則三代受命之說其來甚早，非孔子之創說也。司馬遷爲股本紀序列自契至湯十四世，今安陽出土甲骨頗多爲之互證者；馬遷夏本紀又載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與自契至湯相當。馬遷論殷事可信，何以論夏事不可信？馬遷記殷事有據，何以記夏事獨無據？馬遷之所覩記，其不復傳於後者夥矣，若必後世有他據乃爲可信，則是馬遷者獨爲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於夏、周之大爲欺僞者

耶？曰「桀、紂之惡不如是之甚」，此孔門已疑之；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則孟子又稱之；然而曰「湯、武革命」，則歷古相傳，初不以稱述於儒家，記載於六籍，遂遽失其可信之價值也。然則上古雖未能如嬴秦以來之一統，而君臣大小上下之分，不惟周文王之於殷紂有之，即商湯之於夏桀已早有之矣。此三代之說所由來也。

何以言周文王與殷紂有君臣大小上下之分也？曰，此周人自言之，著於詩書，歷有其徵。詩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此殷周早相聞接之證也。書召誥曰「大國殷」，此召公言之也；多士曰「天邑商」，此周公言之也；顧命曰「大邦殷」，此康王言之也；大誥曰「小邦周」，此成王言之也。以此合之於三代受命之說，當時殷、周國際往還，其爲有君臣大小上下之分顯然矣。今出土甲文乃有「命周侯」一片，不足證詩書之非無稽乎？

夫殷周之爲國，既非絕不相聞接，而復有君臣大小上下之分，歷有年數，則紀年所傳文丁殺季歷，諸書所載商紂囚文王，其說亦與季歷娶於商摯，文王受命爲西伯等耳，烏見彼可信而此必不可信？若謂詩書不言，此或周人之自諱；此如建州入關，往日告天七大恨，避而不述，弩爾哈赤寧遠之創，諱而不布，自謂「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義切同仇，用申弔伐」也。以後例昔，豈必建州知之而周人不知！今既謂見於六經，傳於儒家，其說未必絕不信，亦豈得謂六經不載，儒書不傳，即盡爲無稽不根之說耶！

崔氏之於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崔氏因不信文丁殺季歷，文王囚羑里，而遂謂周之立國與商無涉。又謂「今日修貢，明日擾邊，弱則受封，強則爲寇，曾謂聖人而有是？蓋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彼不知三代之與漢、唐固不如天壤之懸絕，百家之與經傳亦並非即是非之分限；以「曾謂聖人而有是」之見治史，此所以終不免於信之深而疑之勇也。

崔氏深信經傳，常以「曾謂聖人而有是」之見遇之，此我所謂其信古太深也；而結果所至，遂不得不並經傳而疑之，此我所謂其疑古太勇也。崔氏先橫一後世君臣之倫理於胸中，遂謂文王必不立紂之朝而爲紂臣；因不肯信紂囚文王之事，因亦不信有文王見幽演周易之說。然易之彖傳有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引此非以証周易演於文王，特証紂囚文王之說，儒者亦言之也。）崔氏則曰：「易傳本非孔子作。」然文王見幽不僅見於易傳，卽左氏亦有之。崔氏則曰：「余寧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然周書之無逸明言之，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亦言之，曰：「文王受命。」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而崔氏轉引歐陽氏之說以爲辨，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然崔氏又曰：「論語所謂『服事』，乃湯事葛，文王事獯鬻之類，與稱臣不同。」夫文王於紂不稱臣，既可自稱西伯，又何獨不可以自稱王？凡此之類，皆轉展矛盾，無法相通。崔氏乃據此生信，據此獻疑，

進退失守，兩無可立。是則崔氏之病在於所信之過狹，其弊遂陷於所疑之過多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已言之。然輕立一例以判往古之真偽，則其所謂真偽者固得古人之真乎？殷鑒不遠，卽如崔氏之辨紂與文王之事者是已。夫崔氏所疑未必是，卽古說之相傳未必非。周之爲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四世相傳垂百年，雖僻處豐鎬岐周之地，而國際交接乃遠逾其東至於千里之外，有國於淇洹之間者，其相與往還，略相當於後世天子之與方伯焉。而此爲當時所推天邑大邦受命爲元子之共主，則自盤庚以來迄於受辛，已歷七世十二帝，垂三百年，一線相承，繼繩不絕，此自最近出土甲骨文證之當時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而可信者。則縱謂文武周公之爲大聖乃詩書六經之誇詞，儒家孔孟之飾說，而當時我先民之立國於大河兩岸，上自渭，下及淇，東西廣土，其規模之恢宏，垂世之永恒，必別有其相當之文化。固不得謂抹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君賢相之傳說，中國古史卽全是一段草昧，其見之文字傳之載籍者全屬自古之虛謠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系非古史真相，然亦古代一學派卽儒學理想之所寄，治古人學術思想者仍不能不講究。）

言古代哲學者每據易謂易經四聖時歷三古，此其說今人已無信者。謂十翼非孔子作，則崔氏已辨之。然姑捨十翼，就周易上下篇六十四卦言之，縱謂易是卜筮書，然卜筮之判吉凶，孰爲吉而孰則凶，其事有出於卜筮之外矣。乾之初九何以當爲潛龍之勿用？九二何以在田而利見大人？九三何以必終日乾乾夕惕若？九四何以或躍在淵而无咎？九五何以在天而亦利見大人？上九何以

亢龍有悔？循是推之，周易六十四卦各有其教訓，即各有其義趣，寧得不謂是古代關於人生哲學一部甚有價值之經典乎？今苟不能確定周易上下篇亦戰國人所偽造，則治古代哲學思想者烏得不援引及之耶！

故謂六經不盡出於孔孟可也，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統無當於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將從事於古史，儒家要為古學一大宗，六經要為古籍一大類，儒家之與六經要為佔古文中主要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觀點為已狹；若將排攢乎是而求以窺古史之全體，其必無當又斷可識也。

且豈僅於古為然哉！儒家之與六經，自秦以來迄於今茲，歷二千年，蓋無往而不佔我國史最要之一頁矣。故將有志於治國史而探討我民族已往二千年文化之積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說，不究乎六經之旨，是猶登山未躋其巔，涉海未達其岸，終必將晦黯而有所不覩，茫洋而有所未逮矣。

當漢之初興，君相在上以黃老清淨主無為，百官小吏奉行於下，則因循苟簡，一遵亡秦之成法。不安於野而思騁其智力者，則奔走諸侯王國，師戰國之縱橫；或侍從飲宴遊獵，惟迎導其主之侈心奢慾為容悅，而習為辭賦。當是時，有唱禮樂教化之為治，一反乎因循苟簡，跨越亡秦而上希三代，以開一世人之心思才力而進之歷史文化之域，探天人之大原，立仁義之正軌，而使策士縱橫，文人辭賦，皆有以自見其操術之卑下，此則賈、董、公孫之功也。故博士惟限於經術，而後方技神仙旁門雜流始不得預學官之選；博士有弟子員，郡國守相歲得察舉，而朝廷始彬彬有

文學，代軍功任廕貲選而進仕。兩漢文治之隆，不得謂非儒術之明效也。今人率謂漢武表章六經，窒思想文化進展之途，是未明當時之情實矣。

迄乎漢季，儒術衰熄，法家之名檢激而爲老莊之放蕩，然名士風流，一時眉目，既盡隨典午而南渡，衣冠之留北方者大率猶守晚漢之經術。五胡雲擾，一線未絕，東及遼燕，西暨秦涼，下迄元魏，而儒學卒於復興，建周隋之規模，啓唐室之盛運。北朝儒統雖不能媲美炎漢，而其守先待後，以自完於亂世，使民生未盡塗炭，生機待之萌發，其間線索，治史者固猶可按指也。

唐人以科第取士，門蔭漸衰，家教亦落，進身之資決於詞華，稍事學問則皈依佛氏，風俗日偷，弊害日顯。天寶以往，內亂外憂紛起迭乘，陷極於五季，宛轉於北宋，而乃有大謀所以振起之者，於是而爲北宋中葉以下之學術。（宋代種種積病，上起唐玄宗時，下迄宋眞宗，久已根深柢固。宋學起天聖以下，乃欲拯拔而無力。後世謂當時情勢全由學術，誤也。）其始也，范仲淹、歐陽修之徒振於上，胡瑗、李覲之倫應於下；其繼也，乃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以此爲抱負，亦以此爲學業，精究之於伊洛，大成之於南宋。輓近世之學術、人才、政事，胥於是焉奠之基。或者謂近世之中國乃程朱之中國，其言殆非盡誣。故不通儒術，不明經義，終無以見國史之精神，亦無以澈悟我先民文化之眞態也。

蓋嘗論之，中國二千年來之人才幾於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來之歷史亦不啻儒術之歷史，二千年來之文化亦不啻儒術之文化也。而儒家之所誦習則曰六經，所稱道則曰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孟，故中國之古史遂爲學者所必治，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遂永爲古史之骨幹，爲後世所謳歌而夢想。（古史之真相爲一事，某一時代人對古史之想像爲又一事。當知某一時代人一種活潑之想像，亦爲研究某一時代之歷史者一極端重要之事項也。）迄乎今，以國運之日頹，憂時之士途窮思變，而儒術遂爲衆矢的。而崔氏之書固一本乎儒家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見以爲之者，乃未顯於當身而忽行於今日，此又遇合之奇之不爲崔氏所逆料者也。

曰懷疑，曰辨僞，曰考信，此顧君之深有取於崔書者也；曰儒術，曰六經，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此顧君之未必有取於崔書者也。然嘗試取顧君書而讀之，凡其所辨，大要仍是儒術之與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與孔、孟焉。故疑，可也，信，可也，考而辨之，無不可也，要之治古史不能不通儒術，不能不知經義，不能不牽連而及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則固顧君之所不能大異於崔書者也。數年以來，有聞於辨僞疑古之風而起者，或幾於枝之獵而忘其本，細之搜而遺其鉅，離本益遠，歧出益迷。彼以爲儒術之與經義，此我之所吐棄不屑道者；然「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瑣瑣之疑，節節之辨，豈所謂能疑辨者耶！

夫一民族之文化，有其長不能無其短，有其利亦不能無其病；故一民族之歷史，有其盛即不能無其衰，有其漲即不能無其落。當此民族歷史入於盛漲之期，即此民族能善運其文化之長處優點

而發揚光大之徵也；不幸而陷入衰落之期，卽其民族不能善用其文化之長處利點而遂發露其弱徵病態之候也。（東漢博士章句誠爲經學之末路，然不得并西漢董劉諸儒之學術而一例譏之。明人八股爲中國近代之病害者深矣，然與程朱學術不能混爲一談。西漢立五經博士，宋人以經義取士，皆利害互見，不能一概論。要之利病一源，得失同體，不明此意，終搔不到國史痛癢也。）苟此民族而盡喪其固有之文化，卽盡忘其已往之歷史，而民族精神亦日萎枯以盡，而前途之生命亦竭。此如人之罹大病，病在其身，而所以爲健復之資者亦卽在其身；捨身而求健復，身之既死，健復何由！良醫治病，亦曰治其所以病，不能曰病在其身，必去身乃可以去病也。今日者，我誠大病且死之候矣，然有良醫，必求其病之源，病源何在，必在其受病之日，不能謂在其有身之辰也。

然則我民族今日之病源何在？曰，在吾當躬；推而上之，曰在我父若我祖之世。求之於近百年近數十年之際則得，遠索之數千年之上，而輕曰其病在我民族整個之文化，是不啻曰病在吾身，始於吾有生之辰也。或曰：「我民族篤古情深，遂窳自新之機。」此亦未盡然。夫思古之情，亦懷生之倫所同具耳；惟他族之有史不能如我之縣歷久遠，繼繩不絕，遂若我爲於古獨殷焉。然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之於歐西英、法諸邦，孰與唐、虞、夏、商、周之在我？不聞彼邦學者蔑古不談，亦不聞彼邦學者以研古窳其自新。我不能深識我今日之所由病，雖絕口不道古，無益也；我能深識我今日之所由病，而痛洗滌之，民族自有其向上之機，不必先遺棄忘失其民族之古史於不聞不問之境而後可也。若曰：「我族之有古與彼不同，凡我之不能自新向上皆古

人遺毒浸沉，必奮迅脫去而後可。」是不啻曰我之有身與彼不同，苦我之病，羨彼之強，乃忽然欲脫身以爲快也。夫文化之演進時時有其創新，卽時時有其轉變，遠古遺骸何足以遙制歷史命運於數千載之下！以古擬古，我未見絀；以今準今，我乃實遜。我不自負責而巧卸其罪於古人，古人寧受之耶！然則尊古固失之，譴古亦烏得爲是哉！

一民族之復興，必將於其民族文化自身爲內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內力之新生者又必於其已往之歷史有清明之別擇。崔氏之書止僅於古代，不足以窮國史之演變；繼自今沿流尋脈，自秦以下蓋莫不有待於國人之闡發。必使我民族文化演進之真態昭然豁然，重顯露於國人之前，如宿醒之乍醒，如久矇之忽視，而後奮躍踴興，灑然不知沉疴之既去。及是而反視己身，乃將恍然失笑於往日之求脫此軀以爲快者之無當也。

然則我國史之重光，文化之更新，國運之轉步，胥將於顧君之鄭重介紹此書於國人者發之端。謹述此意，以請教於顧君，並質之國難深重下之讀是書者。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錢穆謹序於北平。

二〇、讀古微堂集

晚清今文學驟起，以樹異於乾嘉經學，其主要人物，羣推魏默深與龔定菴。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詳龔略魏，斯篇乃以補其缺。已見於舊著者，此不復詳，讀者其兼觀焉可也。

乾嘉經學考據之業，盛於吳皖，而默深崛起湖湘，故其最先治學，受吳皖之濡染者少。姚永樸爲魏默深傳，謂其年十五，補諸生，乃究心陽明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從胡承珙問漢儒學，從姚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桂敷龔自珍相切劘。然其最先著作，如大學古本孝經集傳及曾子章句諸書，皆帶宋學氣息。似受姚學塽影響更大，亦與其先所從入者有關也。及道光十一年，代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由此留心時務，志在用世。此亦湘學影響，與吳皖有異。及屢遊京都與江浙，交遊日廣，濡染既深，乃始從事經學考據。其首先一書爲詩古微，自述受朱子以下迄於王船山諸人之影響，則其泯除漢宋門戶，顯仍與

吳皖經學異趣。其次一著作，當爲董子春秋發微，古微堂外集卷一載其序，有曰：

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莫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森，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蓋彼猶泥文，此優柔而鑒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扶聖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

吳皖囿於古經籍，以訓詁考據爲主。默深則治經必通之史，又不忽視古人之專家著述，其意實欲會經史子三者而一之，故能重視董仲舒尤過於何休。與乾嘉諸儒之嫻嫻於經學一觀念之下者宜異其趣也。

古微堂外集卷一又有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其言曰：

余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馬賈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喟。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易則施孟梁邱，皆能以占變知來；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春秋則董仲舒雋不疑之決獄；禮則魯諸生賈誼韋元成之議制度；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傳輔道。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說高祖，賈誼新書爲漢定制作，春秋蕃露尙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

揚雄太元，皆以其自得之學，範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而東京亦未有聞焉。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嗚呼二君，惟六書三禮，並視諸經爲閎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鄭氏旁釋易詩春秋，皆創異門戶，左今右古。其後鄭學大行，駁淫遂至易亡施孟梁邱，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絕學。識緯盛，經術卑，儒用絀。晏肅預謚頤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並起持其後。東晉梅賾僞古文書遂乘機竄入，並馬鄭亦歸於淪佚。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之學絕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其道果孰隆孰替哉。

默深長於史，其言經，亦以史證。斯篇分別兩漢經師今古文家學，皆援據班范，事實具在。所謂微言大義者，即前漢諸儒之通經致用。其研窮遺經之功雖尙疏。然其在實際政治上之發揮應用，所謂爲漢制法之精神，則後漢諸儒，遠非其匹。默深嘗謂，能使壅情之人，皆爲達情之人，則天下無不起之疾苦。（治篇十一）默深生值乾嘉以後，滿清異族政權之高壓，已臻極端，經學考據，僅資逃避，此皆壅情之人也，默深有意於使之皆爲達情之人，其寄懷於前漢之微言大義，以求一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者，亦其情若揭矣。

又書古微例言中有曰：

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

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是，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講章也。宋儒表章四子書教士，望其學聖有塗轍，不岐於異端俗學。豈知功令既頒之後，至明而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約之講章，鄉會之程墨，鄉社之房稿，定待閑在之選本，皆至於汗牛充棟而不可極。其敝於利祿，亦何異漢士說堯典稽古者乎？故以馬融之貪肆，而公詆歐陽生爲俗儒。猶今之淹博詞章者，詆業科舉之士爲俗儒也。以彼今文家皆利祿之徒，而古文家爲高材博學之徒矣。夫歐陽夏侯不敝，而諸生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敝之。馬鄭斥利祿之輩爲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於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而臆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斯篇亦根據史實，發爲持平之論。不僅爲兩漢今古文經學作平議，亦爲漢宋之學作平議。不當以說堯典稽古兼棄伏生大傳，亦不當以蒙引存疑而兼斥朱子之四書。是則晚明王學空疏，正可與乾嘉博雅同譏。而功令祿利之引導俗學，則古今皆然。章實齋懲於乾嘉經學流弊，主張六經皆史，謂六經皆古代之官書，雖亦以糾挽乾嘉諸儒之埋首故紙堆中以逃避現實，然乾嘉諸儒亦尙能違功令，輕祿利，以媚古自安。今求其通經致用，而不陷於功令祿利之牢籠，則仍待於此下新學風之繼起。默深之學，兼采漢宋，並重古今，誠已傑出於當時，然終亦留情考覈，不脫乾嘉遺躅。默

深又曾謂更有國家之大利大害，上下非有心壅之，而實亦無人深悉之者，（治篇十二）此則必待有高瞻遠矚深識達觀之新學術新思想之興起，而默深於此，亦實無能補其憾。

外集卷四武進李申耆先生傳有云：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釃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卽皆擯爲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其論學無漢宋，而惡夫以餽釘爲漢，空腐爲宋也。以通鑑通考二書爲學之門戶，弟子蔣彤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與陸桴亭思辨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一人而已。

是見默深論學，主要並不在辨兩漢經學之今古文，而尤要在辨乾嘉經學之無用。故主融經史，會漢宋，求爲一有用之通儒，而謂當時惟李申耆當其選，並以與陸桴亭相提並舉，此誠在當時一稀邁之獨見也。

外集卷一有論語孟子類編序，其言曰：

經有奧義，有大義。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足。沉論語孟子顯白之文，奚必待傳注而後明哉。自明以來，學者爭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爭漢宋。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諍。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

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云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託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爲壹行，以詁經爲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爲困勉之學。今即以孔孟曾思之書條貫示之，其肯相從於鄒魯否，尙未可知也。

如默深意，乾嘉經學，固無當於西漢諸儒之通經致用，更亦無當於宋明儒深研孔孟四書之大義，而主要之病，則尤在其屏斥躬行。默深主張經世，此亦躬行之一端。而宋儒所言之尊德性，此亦躬行之一端也。默深繼是又曰：

孔子教人，專主博文約禮，而仁在其中。故不言心而心自存。此合德性問學爲一者。孟子直指人心，體驗擴充存養。孔子動言禮樂，孟子則不但無一言及樂，亦從無琴瑟弦歌之事，陶冶禮樂之化。即博學詳說之語，七篇中亦僅一偶及焉。不必下學而自能上達，此尊德性多於道問學者也。然聖門中四科七十子，狂簡斐然，極一時之盛。孟子則一生所造就，僅樂正子一人。遂使後世有軻死不得其傳之嘆。正猶陸王之學，皆不再傳而決裂，遠不及程朱源流之久遠。又何說也。謹質所疑，俟知德君子折衷焉。

是默深論學，主尊德性必兼道問學，此皆所謂大義，非奧義也。默深上溯之於孔孟，又於孔孟兩人間作分別，又爲程朱陸王作分別，此等意境，乾嘉諸儒固不能有，即如章實齋龔定菴以下之新學風，亦所未有，故若專以今文學家目默深，實不免乎淺視默深矣。然觀其著作，如詩古微，書古微，董子春秋發微之類，皆確然爲古文學破其蔀，爲今文學樹其幟，則此下今文學之起，固於

默深有深賴焉。而默深之爲學所志，則實不盡於此。

外集卷四張鐵甫墓誌銘有曰：

君子之學，太上明之心，次尊見，下徇習。以本爲淵，以用爲權。匪膠乎一，惟是之全，渾渾以圓，卒符人所羣然，此明之心之事也。以己爲樊，以性所近爲沿。雖不軌乎大同，自信甚專，能使物靡然從焉，此尊見之事也。以衆爲鵠，以耳爲目，以時地所邇爲屬，易以自足，此徇習者之事。

如此言學，乾嘉蓋無其例。

外集卷三皇朝經世文編叙有曰：

事必本夫心，心必驗於事。法必本於人，人必資於法。今必本於古，古必驗於今。

此言兼通之心與事，人與法，古與今，豈乾嘉諸儒之所預聞乎？

外集卷一庸易通義有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主敬卽尊德性之事，精義集義卽道問學之事乎？致廣大而盡精微，此敬以致知，而精義之學備焉。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敬以篤行，而集義之事全焉。溫故而知新，此專言道問學中之致知。敦厚以崇禮，此專言道問學中之篤行。

乾嘉言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實則尊德性道問學皆不在訓詁，而義理則不可外此而明，乾嘉諸儒能

知此者又誰歟。故曰默深之學，固不止在以今文爭乾嘉之古文也。

古微堂內集三卷曰默觚，分上中下，中卷學篇十三，下卷治篇十六，上篇不別標題，蓋通學與治，而尤以人爲之主。其書爲體略似濂溪之通書，此蓋魏氏有意自成一言，故編之爲內集。其他文字皆入外集。其遺稿雖經後人整理，非默深生前所定。然疑其蓋本之默深之己意也。其默觚上有曰：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猷猷樂堯舜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傅巖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爲尊德性。學傳說之所學，是爲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乾嘉學尙經，默深則必由經通史。故其言學，兼覺與效，卽兼尊德性與道問學。如此言之，經必成爲史，史必上承經。卽所謂心必驗於事，事必本於心，人必資於法，法必本於人，今必本於古，古必驗於今之旨也。是其言史，亦異乎如章實齋之言矣。實齋必分亭林梨洲而兩言之，默深極尊亭林，然不謂亭林之學偏於經，實則乾嘉經學，依默深意，亦決不許其能上承亭林。凡外乎史而言經，皆無當於默深之意，此默深之所以爲卓也。

默觚中爲學篇，下爲治篇，茲姑雜引數則以概其餘。

卷二學篇十一有曰：

氣質之性，其猶藥性乎？各有所宜，卽各有所偏。非煅製不能入品，非劑和衆味，君臣佐

使，互相生克，不能調其過不及。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足以償事。賢智之過，有時與愚不肖相去唯阿。況以利欲濟其氣質，但有不及，無太過乎？今夫迂厚剛介寬審，賢智之過也。今世之士，患迂患厚患剛患介患寬患審者幾何人？患俗患薄患柔患濫患隘患狃疏者則滔滔皆是。求如賢智之過且不可得，矧望其純德性之用，而無氣質之偏耶。非學胡匡，非學胡成。

此條非甚深於理學者不能言，默深論學如此，求諸乾嘉，洵如空谷之足音矣。

卷二學篇十二有曰：

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君子之立志也有然。甯以一善成名，毋學聖人而未至，君子之下學也有然。故未能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未可輕硜硜信果之小人，與貌爲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之狂士，甯爲糙糙篤實之君子。

內集卷三治篇一又曰：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後儒特因孟子義利王伯之辯，遂以兵食歸之五伯，諱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賦，皆聖門之事，農桑樹畜，卽孟子之言乎？

又曰：

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爲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於俗吏。託元虛之理，以政事爲粗

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亦同於異端。彼錢穀簿書，不可言學問矣。浮藻餽飭，可爲聖學乎？釋老不可治天下國家矣，心性迂談，可治天下乎？

治篇三又曰：

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敝太盡，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驟，聽言太輕，處已太峻，亦有能發不能收之者矣。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斯治國之庖丁乎？

又內集卷三治篇四有曰：

郡縣生員二論，顧亭林之少作，日知錄成而自刪之。限田三篇，魏叔子三年而後成，友朋詰難而卒燬之。君子不輕爲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復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

晚清諸儒，競以今文學言立法變法，若知默深此義，爲禍亦不若是其亟。

又治篇五有曰：

莊生喜言上古，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代，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無他，親歷諸身而已。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又使天下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治篇七又曰：

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動以能爲才，非也。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才臣疏節濶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燭有餘，遠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勝大變。欲求救時之相，非才臣不可。

治篇十一又曰：

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氣運。乘氣運而生者，運盡則息。惟教化出之無窮。

又曰：

鄙夫之害治，猶鄉愿之害德。聖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愿，豈不深哉。

此外不具引。卽上列諸條，義旨深允，而包蘊宏達，不僅乾嘉諸儒不能言，卽此下今文學家，亦鮮能窺及。蓋因前後所爭皆在經，惟默深通之史，前後所重惟在聖言，默深會之於當前之世事，此其不同也。所惜者，默深爲學，殆可謂有其志未竟其業，引其端，未伸其緒，樹其門牆，而尙未備其百官宮庭之美富。而時變已亟，羣震於其海國圖志之類，方競於通洋務，又如河漕海運，鹺政銀制，凡默深所用心者，後人馳逐其小節，而茫昧其大體，是亦氣運所乘，而教化之功有所不遑。晚清一代之學運，讀默深古微集，誠使人感慨於無既也。

今當一探默觚三卷之著作年代。竊謂默深之學，前後可分三大變。最先乃由宋學入，而有志

於經世，如上舉皇朝經世文編以前諸著作皆是。此亦湘學自有淵源，至默深而始見爲彰明較著也。此可謂之是儒學，而尙未臻於深入。其次屢遊京都，獲聞吳皖考據訓詁之風，如詩古微董子春秋發微諸書，皆其中年著作，可謂自儒學轉入於經學，而默深於原先從入之途，並未放棄，其默觚三卷，則其中年有志益進所學之蘄嚮。余觀其默觚中下兩卷，每條下必引詩曰云云，疑其模倣韓詩外傳，或是詩古微成書以後所爲。其外集又有孔孟年表，有周程朱陸楊慈湖王文成高劉諸人贊，疑皆爲中年著作，卽其治經學後未嘗或忘儒學之證。惟其不忘儒學，斯必志切經世，其海國圖志之類，皆其中年作品也。然學風之變，其事不易，新學術之開創，斷非一人一時之所能完成。默深所志，乃在通經史，融漢宋，會古今，而又情切於當前之致用。凡其獲得當時交遊間之欣賞讚譽者，終限於經學考據與經世實用之兩途。其閱識孤抱之較深入者，急切未得他人之共解，而默深亦未能沉潛以求，退默以成，內心不免於鬱悶搖惑，乃移情於老釋，而卒爲雜學之歸，是爲默深之晚年期，當於此下再詳之。

默深晚年，曾輯淨土四經，每經作一序，又作一總序，教人禪淨兼修，自稱菩薩戒弟子。又貽書友人，囑刊四經，謂利益非小。蓋默深於三十五歲時，曾遊杭州西湖，得聞禪理。及是年六十，太平軍佔鎮江揚州，皖北又捻亂大起，默深知高郵州，遭革職示懲儆，乃始研求釋典。淨土四經，乃其六十一歲時所輯。六十三歲遊杭州，又寄居僧舍，以參禪爲事，翌年卽卒。此乃其晚年佞佛之證。惟其序其書，皆不刊入古微堂集，要其平生之學，主張融會經史漢宋，通古今而濟

世用者，至是乃見其無歸宿，而卒陷入空門，良可惜也。但書古微一書，完成於六十二歲，元史新編則在翌年成編。是則默深逮其晚年，終不能擺脫乾嘉考覈之餘緒，回視其爲默觚時意境，終使人有精神不能貫徹之憾也。

又按：默深有老子本義，其序收外集卷三。據袁昶跋，其書在默深生前似無刻本，袁氏刻之於光緒己亥，上距默深卒當已四十年。亦不知默深此書成於何時，然觀其書首論老子之二有云：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

之四有云：

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

玩其語氣，默深當時，尙有意於用世，惟聖人六經，雖爲經世大典，而急切未獲張施，乃轉而注意及於老子救世之書。其序文大意，力辨莊老之相異，又援引史實，歷證黃老無爲可以治天下，乃注此書，以爲養心治事之助。故曰：老之與佛，合之兩傷，離之兩美。蓋默深此時，已認佛可養心，但不可以治事。而老子書則可以治事，可以救世。似默深之老子注，當在其默觚三卷之後。默觚治篇之一明曰：釋老不可治天下國家。及其注老，乃其思想之一變。又轉而輯印佛經，

則其思想之第二變，此皆有關其治學之根本綱宗者。而後人言默深，惟主其追隨乾嘉經學，而目之爲今文家言，與其論運漕水利鹽政海防外務夷情，而目之爲經世之學。此皆在晚清學術思想界發生影響作用，而不知尙有佛學盛行，亦與默深有關。如康有爲依據佛學爲大同書，爲其治國平天下之大典。章太炎亦從佛學入，而以薊漢微言爲之殿。是清末民初，不論主今文或古文，除經學外惟佛學，端可見矣。如默深中年以前想像之通儒境界，則音沈響寂，終無嗣韻。及胡陳新文化運動起，主張全盤西化，則佛學經學，亦一掃皆空，更不論儒學矣。然自龔魏下迄胡陳，其意皆主經世，則經世之學，又豈易言哉。默深沒，迄今已一百二十歲，國運日替，民生日瘁，使默深復起於地下，又不知將何以爲懷也。

二一、羅羅山學述

清代經學考據，盛於吳皖，而湘學猶知重義理，尙經世。羅山羅澤南，當推巨擘。惜其在軍旅中，年五十而卒，其能潛心於學者，乃四十以前事。其學宗紫陽，黜姚江。茲鈎稽其語，以見梗概。

羅山論學最有貢獻者，當推其闡申氣質之性。其言曰：

告子論性諸說，後世言性之失者，皆不出其窠臼。杞柳，性惡之說也。湍水，揚子性善惡混之說也。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之說也。性無善無不善，蘇氏胡氏之說也。孟子辨明其謬，以未言氣質之性，無以解諸子之惑。宋儒發明氣質之性，而陽明復謂心之體無善無惡，佛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之言，固釋氏之邪說，亦告子之眞派也。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氣

稟之各異也。氣稟拘於生初，物欲蔽於後起，物與人分明暗，聖與凡分通塞，變化之道，在乎人爲。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

以上兩節，錄自其讀孟子劄記。又曰：

宋儒分言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雖曰天命之理不離乎氣之中，要之理自理，氣自氣，實有不相蒙者。陽明曰：性卽氣，氣卽性。又曰：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是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之作用是性矣。孟子之書，其言性與氣者亦多矣。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其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而行之也。王子之居移氣，孟施舍之守氣，氣與理是一是二，不待辨而明矣。血氣未定，血氣方剛，血氣既衰，君子之戒色戒鬪戒得，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孔孟之言理與氣，早已判然。且夫理至一，氣不一。氣運有古今，道不以古今而殊。風氣有南北，理不以南北而異。氣數有壽夭窮通，理不以壽夭窮通而增減。氣稟有智愚賢否，理不以智愚賢否而加損。陽明言理卽是氣，則人有躁氣暴氣乖氣戾氣惰慢之氣囂張之氣邪靡之氣噍殺之氣，皆不得謂之爲非理。匪特主持風氣，挽回氣運，與自立乎氣數之學，可以不必；卽變化氣質之功，亦可以不用矣。尙得成其爲人乎哉。明儒中亦有詆陽明爲禪爲佛者，而於理氣合一之說，終不敢以爲非，抑亦未之思耶？

上一節錄自其姚江學辨。羅山文集又有性理篇，以朱子言理氣分異者，又推本之於濂溪之太極圖

說，其言曰：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即得太極之理以成性。但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恒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源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夫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不同。然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則爲剛健之人也。自古至今，得氣之極清而爲聖人者少，得氣之極濁而爲下愚者亦少，其餘，奮其力皆可以爲聖賢，縱其欲皆可以爲庸昏。蓋從容中道者，渾然太極也。修身體道者，復反此太極也。困知勉行，百倍其功，以至於明。至於強者，仍不失此太極者也。聖學不明，人性日失，牛山之木，徒供伐牧，可勝惜哉。

羅山言氣質之性，大意如是。其先湘人王船山言性，分日生之性與日成之性言。日生之性屬先天，日成之性屬後天。日生之性，自今言之，可謂是自然之性，日成之性，自今言之，可謂是人文之性。人文之性，不可背於自然之性。然自然之性，非即人文之性。貴能化之育之，本乎天命以自成其人之文，此則大聖人爲民立極之功也。故宋儒言氣質之性，乃指自然言。其謂天命之性，則乃人文化成之性也。若以理氣分言，氣屬自然，理則寓諸人文。人文原於自然，亦不得違離自然，而仍須回歸於自然。但人文與自然終有別，不得謂可一任自然，而自成人文。則此文，非理想所存之人文。率性亦將以違性。故氣質之性，即性之自然也。義理之性，則寓有人文

理想，必待化育而成。然不得謂人文理想即背其自然之性，即謂理義決不在氣質中。故朱子言理氣，既分言之，又合言之。明儒以下，即尊朱者，亦有主理氣合一，而不明理氣之必有所分異，故羅山之說，可謂於朱學有甚大之貢獻也。

既辨理氣，乃可進而辨心性。羅山在此方面，乃力辨陽明之非是。其言曰：

良知二字本之孟子，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之所謂也。人之爲人，有心有性有情。仁義性也。愛敬情也，知愛知敬者心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即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爲心。心之爲物，虛靈不昧，性之具於中者，能燭照而不差。事物之來，心即運此理以應之。能知者，氣之靈也。所知者，心之理也。孟子言良知，隨明之曰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欲人即此知之自然者，以見仁義爲吾性之固有，非謂良知即天理也。四子書言知德知道知禮知止知性知天，道德禮止性天指理言，未有以知爲理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即本體，蓋誤認氣爲理，誤認心爲性矣。

上一節亦錄姚江學辨。陽明混理氣心性而一言之，不僅不合於朱子，抑亦不合於孟子，羅山分疏極明晰。心有能知，有所知，羅山謂能知者氣，所知者理。理固在氣之中，然不得謂氣即是理。羅山又謂聖學不明，人性日失，反而言之，人性之得有待聖學。荀子主性惡，謂聖學非人性。陽明主良知即天理，乃謂能知即聖，不待有學。若知氣質之性，聖凡有通塞之辨，百兩之金知之通，一兩之金知之塞，豈可不論分量，但論成色，謂孩提之良知，即聖學之知性知天，而更無區

別乎？孩提之成聖在乎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象山陽明論學，必提孟子，卻不知其違於論語，則甚矣其不學之過也。

羅山既辨理氣與心性，乃又本此以辨朱子與陽明。其言曰：

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其本體異，其大用異。朱子以性爲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爲無善無惡。朱子以性爲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爲性，吾心之靈覺卽天理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爲心之表德也。此本體之所以異也。若夫善念之發，朱子以爲率性，陽明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惡，朱子以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陽明則謂心之本體本無一物，著意去好善惡惡，又是多了這分意思也。萬事萬物，朱子以其理皆具於心，日用倫常，各有當然之則，陽明則以事物爲外來之感應，與心體無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爲揣摩測度於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異也。蓋惟性善則實，實則萬事無不實，故必下學上達，而後能優入於聖域，此格物致知所以爲明善之要也。性無善則虛，虛則萬事無不虛，故一悟本體，卽是工夫，此卽物窮理，陽明所以視之爲外也。兩家意旨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勢有不可兩立者。

上一節，亦錄自其姚江學辨。從來辨朱王者，多從格物致知上立論，無有如羅山此條之扼要而透徹者。今試再略申之，朱子認人心中有性有理，性與理始是天地萬物之本體所在。故朱子謂不得已而必爲理氣分先後，則當曰理先而氣後。依其言申之，若必爲心性分先後，亦當曰性先而心

後。故除卻氣與心，若理與性無可見，然理與性實有其真實不虛之存在也。故言氣質之性之上尚有義理之性。義理之性，乃屬先天存在，此層雖王船山似亦不認真辨認。以船山最後信奉橫渠正蒙以氣爲太虛，與濂溪太極圖說氣上復有太極之說異也。然濂溪又謂太極卽無極，與朱子謂離氣卽理無存在之說，皆似玄而實實。非細索之，不易明其立意之所在。陽明以心爲性，以心爲理，而心實只是一虛靈之體，有心無性，則天地萬物無不虛。於是我心之工夫所在，不啻卽天地萬物之本體所在矣。此非狂禪之意態而何。

於是羅山繼此而又作虛實有無之辨。其言曰：

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理至虛也，而有至實者存。理至無也，而有至有者在。天地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得此理以成。聖人順此真實之理以達其用於天下。今陽明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陽明自幼酷好二氏，五十歲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自謂千聖相傳一點骨血。聖賢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人苟不深格致之功，確見聖道之所在，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

上一節，亦錄自其姚江學辨。常識皆認天地爲實有，以心知爲工用，亦因此而長陷於惟功利之爲見。故有以天地爲虛無，以一心爲本體者，則人盡高之矣。如羅山之意，不深得於朱子格致之功者，無不惑於其說。此格致之所以爲聖學也。

羅山又曰：

陽明之學，佛氏之學也。陽明之良知，卽佛氏之本覺。佛者覺也。覺有始覺，有本覺。本覺者，常住不動，真性如如者也。始覺者，由悟而入者也。佛經多言慧言智，曰真識，曰善知識，曰藏識海，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識宅，皆指其本體而言。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故以智慧言本體也。陽明奉此邪說，自以爲絕大神通。曰良知卽天理，卽本體，真性如如之本覺也。曰覺得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都自消融，由悟而入之始覺也。達摩不立語言文字，卽心卽佛，陽明掃除學問，主良知以立教，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抑亦入達摩之室乎？

上節亦錄自姚江學辨。自來攻擊陽明，未有如羅山之嚴正明快者。然陽明不僅以良知爲卽性與理，並認草木瓦石亦有良知，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儒家傳統自來無此說，卽莊老道家亦無此說，象山並亦無此說，只楊慈湖始有之。在中國思想史上，惟佛家始主張是，則不得不謂陽明之說同於釋氏也。羅山又謂：

草木猶有生機，瓦礫則無生機矣，頑質蠢魄，冥然罔覺，碎之則痛癢無關，存之亦情意胥絕，陽明固何從見瓦石之亦有良知乎？陽明以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用真心中物也。不知性屬於理，知屬乎氣，氣既不同，靈頑各別，固無害乎此氣此理之同。草木瓦石雖無知，亦無害於此氣此理之一。陽明矜言萬物一體，實不明乎萬物一體之道，故其言遂如是之牽強耳。

萬物一體，可從氣上言，亦可從理上言。但不當心上言。心知萬物之氣之理之一體，仍是萬物理氣之一體，非心知之一體也。陽明又言儀秦亦窺見得良知妙用。羅山曰：

良知，本乎天理之自然而出者也。機械變詐，不循乎理之當然，良知之賊也。古之人，性道精明，義理昭著，陰謀詭譎，概不敢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詐與不信，亦自能先覺。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妾婦中之慧而黠者也。三代而還，正學不行，事變之來，人多師其故智，以僥倖成功。是以禮義日見其喪亡，人心日見其偷薄，所以錮蔽其良知者甚非淺鮮。陽明於儀秦之智，稱之爲聖人之資，爲窺見良知妙用。蓋陽明以虛爲性，不肯講求義理，惟憑此心良知，矜爲妙用，自闔自關，自舒自卷，自以爲絕大神通，是以於儀秦之故智，津津樂道之。孰知其所以揣摩人情者，正所以戕賊其天理哉。

陽明傳習錄儀秦一條，當時其門弟子亦多非之，不敢信據。攻擊陽明者，亦以非大義所關而略之。不知陽明之病，正在其認性爲虛，認心卽理，於是此心之用，遂若無往而不是。故陽明雖亦謂儀秦用之於不善，而終認其爲窺見了良知之妙用。不知良知妙用，應無不善。聖人之資，可謂在良知，不可謂在儀秦之妙用也。故羅山又曰：

孔孟之精微，非朱子無以發。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掃功利，排佛老，摧陷肅清，義精仁熟，此功直在萬世。

蓋羅山謹守朱子駁陽明，嚴斥陽明衛朱子。言理學而主張門戶，則其所窺於理學者必淺，然固不

得以此疑羅山也。以上諸條，皆采自其姚江學辨。蓋羅山之辨王申朱，皆確然有見，非拘拘於門戶之爲見也。

故羅山雖力辨陽明，然羅山亦深知心之爲用。其言曰：

立一身之主宰，而提萬事之綱者，其維心乎。心者，理之與也。事物未至，理具於心。事物既至，卽運此理以應之。其靜也，動之理所由存。其動也，靜之理所由發。心之爲物，靈變不測。出入無定時，因應無定在。放而縱之，茫然莫知所至。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動靜交修，內外夾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之道，皆以求放心也。後人誤會此旨，遂謂不必講學讀書，只要存得本心。吾不知學問之功不深，此心何由而存，幾何而不流於異端哉。

上節錄自其讀孟子劄記。孟子主由學問求心，故道性善則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若曰吾心與堯舜孔子同，明吾心卽可以爲堯舜孔子，此乃主於心而不煩學，所以爲異端也。

又曰：

天地人同一太極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極也，分之殊也。其分殊，其理一。分之有畛，合之無間也。太極之在天地，遠而難明。太極之在吾身，近而易見。明乎吾身之太極，天地之太極不外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節錄自其人極衍義。又曰：

西銘之理一不難知，分殊難知。分殊不難知，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之道難知。然豈知之而遂已哉。古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向使於分殊之處一毫有所未善，則此一理之渾然者，遂有所虧而莫周。義之不盡，又以爲仁之至哉。

上節錄自其西銘講義序。凡羅山之學，上自孔孟，下至周張，非有新論奇說，而止以程朱之說說之。羅山之學盡此矣。羅山以四十後始補廩，此下乃以醕儒爲名將，一時部曲，多其講學門徒。而卒於軍中，功業未畢，亦可謂其學業亦未竟也。禍亂既平，世變日亟，西學東漸，羅山之著述，遂在若存若亡間。竟亦無大影響於後世，鈞稽斯篇，感慨何極。

二二、朱九江學述

晚清之儒，有廣東南海朱稚圭次琦，人稱九江先生。亦知確尊朱子，惜其著書無傳，今據其弟子簡朝亮所爲九江年譜，略撮其論學語，以覘一斑，以爲余研朱餘瀋一書之殿。其言曰：

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變久矣。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滅學，幸猶未墜。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皆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嗚呼！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彼考據者，獵瑣文，蠹大

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吾今爲二三子告，蘄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

清儒漢宋門戶之見，自嘉道以下，已漸知於康成外尙當有朱子，然其視朱子，實尙在康成下。稚圭始謂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又謂其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其視朱子，已在康成上。又曰治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尤爲大見解。非深識儒學大統者，不易語此也。

又曰：

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掌故者，古今之成法也。本經史之用以參成法，則用法而得法外意矣。性理非空言也。性理者，所以明吾學之大皆吾分也。用之無所驕，不用無所歉。古來才大而器小，或矜伐自用，若管仲姚崇李德裕張居正者猶譏焉。吾以爲性理之書誼如懿戒，足以自箴矣。歐陽氏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文章非及物者乎？君子之學，以告當世，以傳來者，書以明之，詩以歌之，非文章不達也，皆及物者也。南宋而後，古文之道寢衰，天下必當有興者，二三子其志於斯乎！

乾嘉專經而不能通之以史，所以致於叢脞而無用。章實齋魏默深皆已微窺其意，至稚圭乃始明白昌言之。稚圭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故治史必通經。又分史與掌故爲二，蓋史明事變，掌故以通制度，卽李申耆以下，以通鑑通考爲二通之說也。章實齋六經皆史，皆謂王官之所掌，此則

偏掌故言。又謂浙東史學皆本心性，此史指事變言。程主分而二之，則更明顯矣。程主言理學，義旨更宏達。理學中本應包經史掌故。凡以經世致用之學，皆吾分內事。若管姚李張諸人，非無功業，而滋詬病，以其不知理學也。故務功業者不能不通理學，而理學中自應有功業，非可排除功業以自成其爲理學也。理學家忽視文章，特爲一病。程主於經史掌故性理之外，又特增辭章一門，更爲宏達之見。其前如戴東原姚惜抱，言學皆分義理考據辭章，曾滌生又加經濟一項，以程主意繩之，皆爲未當。乾嘉諸儒意欲以漢學攢宋學，遂言考據。考據乃治學中所有事，豈能自成爲學，程主言五學，獨不及考據，其識卓矣。抑且五學實一學也，如戴姚之割裂而三分之，決無當於孔子論學之道，亦無當於朱子論學之道也。

又曰：

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良知可也。學者行之，流弊三百餘年。夫良知良能，皆原孟子。今舉所知而遺所能乎？既不讀書，何以致良知也。不讀書而致良知，宜姚江不以佛氏明心爲非也。此心學之弊也。子路佞於孔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子之讀書爲學其常也。姚江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姚江之學，由讀書始也。故其知且知兵，其能且能禦亂。

陽明知兵能禦亂，才能功業，皆非理學所拒。陽明言致良知，亦從讀書來。苟不讀孟子書，何知良知一言。書亦天地間一物也，豈一草一木庭前竹子爲一物，五經四書獨不得爲一物乎？草木中

皆有理可格，豈聖經賢傳中獨無理可格乎？不讀書，不格物，知又何從而致。於是陽明乃轉有取於佛氏明心之說。蓋佛氏明心在菩提樹下，本不在書中物中也。陽明因格庭前竹子不通，遂亦不以讀書爲格物。程主謂陽明心學流弊三百年，蓋乾嘉諸儒亦不以讀書爲格物。乃以訓詁考據爲讀書，其言曰訓詁明而義理明，分訓詁考據與讀書爲二，乾嘉諸儒之讀書，已非孔子朱子之讀書矣。要之不知讀書爲學，故程主亦歸納之爲心學之流弊耶。姑誌吾說於此。

又曰：

陳文恭之學，非不尊朱子也。文恭自謂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此其所以入德也。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朱子所法乎孔子者也。文恭之教，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法乎孔子者也。程主以白沙不赴景帝時之禮闈，許其知出處之大誼。知修身，卽是知讀書矣。乃分其學與教而兩言之，則自來論白沙者，所未有也。

又曰：

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經之學，所以踐迹也。踐迹而入於室，善人之道也。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陸子靜，善人也。未嘗不學，然始事於心，不始事於學，而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善人乎，其非善人之道也。

經學所以踐迹，象山不主讀書，不主踐迹，乾嘉諸儒之訓詁考據，以爲治經要端在此，亦不知踐迹也。雖乾嘉諸儒中亦有善人，惟亦同非善人之道。故陸王乾嘉同反朱子，稚圭乃亦同反之矣。

又曰：

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由體及用，簡其大法，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

稚圭於明遺老獨尊亭林，亭林有言，經學卽理學也，捨經學安所得理學哉。亭林於稚圭所分經史掌故辭章諸學，皆所囊括。而經學其主腦也。自稚圭言之，此四學者，皆吾分也，此可謂是理學之積極面。亭林又言，博學於文，行己有耻，其抗節西山，可謂有耻矣。自稚圭言之，性理之書誼如懿戒，此可謂是理學之消極面。朱子以後，尊朱子而能超越理學家格套者，稚圭以前端推亭林，此外朱舜水亦近之，惜乎舜水羈旅海外，不能如亭林之終老祖國以成其學。此外又有陸桴亭亦近似，惟仍帶理學格套，故皆不爲稚圭所稱。

又曰：

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嗚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

以阮元紀昀同等律之，尤見稚圭論人論學之特識。

又曰：

小學非六書而已也。紀文達必從漢志，非也。朱子小學，小學之道也。大戴禮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略同。是故小學養大學。

稚圭上采大戴禮尚書大傳以證朱子之小學，較之紀昀及其他乾嘉諸儒之僅從漢志，以六書爲小學者，遠勝矣。是稚圭之尊朱，可謂亦卽漢學而稽之也。

又曰：

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裨於經矣，雖然，何偏之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大誼何由而明乎之類，今不采。書以國朝爲目，當時之儒，非盡漢學也。若方靈皋者流，乃一言之不錄也。

稚圭駁斥紀阮，亦皆考據家言。故知考據僅爲奴，爲工具，不得預於稚圭所舉五學之類。

又曰：

宋儒言去欲，漢學者以爲非，曰：所欲與之聚之，孟子誼也。彼漢學者，東眡不見西牆矣。人欲有公而有私。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其宜去乎，抑不去乎？

當時漢學者駁宋學，莫過乎理欲之辨。稚圭引樂記明白分天理人欲，則不煩多言而判矣。是亦所謂卽漢學而稽之也。

又曰：

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補嘗辨分齋之非。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著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明經誼不能治事，治經學不能名儒，皆非真經誼真經學也。乾嘉之治經，其不能治事，不得名儒者多矣。乃當時學者，誤認其施於經之訓詁考據，卽爲儒者所當治之事，失之遠矣。

又曰：

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傳外立道學傳，則宋史之失所尊也。

因於儒林道學之分，遂啓漢學宋學之分，故爲稚圭所不取。不能外於儒而自成爲道學，此則稚圭意也。

又曰：

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經則通經將以致用也。董子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此董子之能通經也。孟子言詩皆無達詁。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今之漢學，其免班氏之譏否也。

乾嘉諸儒自號漢學，乃其所治不免如班氏所譏，是亦治經而不通之史，自號漢學，不能卽漢學而稽之也。

又曰：

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乎？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

稚圭尊朱子爲百世師，乾嘉諸儒固不能然。然苟能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是亦可矣。何必效孟子之拒楊墨耶？此皆門戶之見害之耳。

又曰：

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百王史法，其流也。正史紀傳，書也。通鑑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

以此較章實齋六經皆史，浙西治經浙東治史之說遙爲深允矣。

又曰：

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

乾嘉以下，亦有知讀司馬氏通鑑與馬氏文獻通考者，然其治史，治古而不治今，是不通何足以致用。稚圭治史主其近，引史記六國表序，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此與乾嘉諸儒不敢言近必引而遠之者大異。

又曰：

掌故之學至賾也，由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

咸豐二年，洪楊軍破武昌安慶金陵，北至揚州，時稚圭年四十六，其卒在光緒七年，年七十五，洪楊已平。胡林翼曾滌生之業績，稚圭蓋有深感焉。

又曰：

知掌故而不知經史，胥吏之才也。

章實齋謂六經乃古代王官之學，若不明稚圭此條之義，則六經亦古者胥吏之學也。

又曰：

古無所謂理學，經學卽理學也，顧氏之言是矣。雖然，性理諸書，刪其繁枝，固經學之佐也。

乾嘉諸儒，治經學不治理學，猶治史有二通不治五史九通之類也。五史詳後。

又曰：

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非猶乎文人無足觀者矣。

僅文無足觀，僅掌故爲胥吏，僅性理爲陸王心學，僅經爲乾嘉考證，僅史是亦吏矣。凡稚圭論學大旨要如此。稚圭著述有七，曰國朝名臣言行錄，法朱子。曰國朝逸民傳，曰性學源流，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元明以資今。曰晉乘，如程大昌雍錄，尙有論清代儒宗者，不分漢宋，有紀蒙古者。臨卒前，盡自焚之。卽觀其書目，其學蓋本性理以通之史，而尤要在人物。卽其所標修身讀書之實也。

然稚圭論學，在當時要爲孤掌之鳴，從學有簡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學，仍是乾嘉經學餘緒耳。康有爲則登其門而未能受業，轉主今文經學，又旁騖於佛典，其去稚圭論學之意益遠矣。繼此新文化運動起，辭章則曰白話文，掌故則曰二千年專制政治，性理則曰禮教喫人而倡非孝。其曰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則持襲乾嘉考據以治史。乾嘉以反宋，而今之考據則以反中國。遂循至於不讀書，不修身。則稚圭有意提倡一種新學，實乃爲舊學之殿也。余之爲斯篇，誠不勝感慨系之矣。

二三、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

余十年前，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南海康氏，詳著其思想先後之激變，顧未稱引及其歐洲遊記。抑南海思想之激變，實亦歐遊有以啓之也。今年夏，避暑灌縣靈巖寺，偶於友人家攜得此書，繙閱既竟，重加摘錄，以補學術史之未備焉。

南海第一次遊歐，以行篋無書，未詳其在何年，其再赴歐則在光緒三十年甲辰之二月，以五月至意大利，由是轉瑞士、奧、匈、德、法、丹、瑞、比、荷，而至英。（此據十一國遊記總目推之。）是年冬至南海在美洲，有十一國遊記序。翌年七月又自德轉法，有法蘭西遊記。再翌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自瑞典至柏林，十二月渡來因河，有來因觀壘記。復有西痕故都記。再翌年丁未，十月自巴黎入德，有蔑士記，士遮士卜記，渡顛湖記，刊士但丁記諸篇。是年冬補德國遊記序，自謂遊德久，且多，九至柏林而四極其聯邦也。再翌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四

月有波士淡舊京記。五月自北冰海還，六月自瑞典東裝赴南歐，遊塞爾維亞，布加利亞，復自羅馬尼亞乘船泛黑海至突厥，七月自突厥往雅典。是年冬，有突厥遊記序。至塞布兩國遊記序則成於民國二年癸丑之二月。凡南海歐遊蹤迹可考者如此。

其十一國遊記，自序在光緒三十年冬至，時居美洲北太平洋城多利之文島也。其第一編刊成於三十二年二月，爲意大利遊記，編首有海程道經記共二篇。據其總目錄，尙有瑞士，奧大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各編，並附錄歐土政俗總論，中西比較論，物質救國論三篇，則皆未刊。其十一國遊記之第二編爲法蘭西遊記，據原目當爲第六篇，其開端卽云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夜自德之克虜伯砲廠往法國，則此卷乃成於乙巳，文中亦並無再遊之說，然則三十一年甲辰草十一國遊記序日時，實未嘗有諸編遊記之成稿，逮其再遊法京，而草此記，筆墨文字間又實似初遊乍到者，洵可恠也。其丁未補德國遊記，自謂甲辰遊德，曾草遊記，失落數卷，然今可考者，如來因觀壘記，亦在丙午，其他各篇尙在後。然則甲辰遊記眞可考者，亦惟意大利一篇而已。其補德國遊記及突厥遊記，歐東五國遊記各篇皆刊於不忍雜誌中。

南海早年，實爲歐洲文明之謳歌崇拜者，其轉而爲批評鄙薄，則實由其親遊歐土始。故曰：吾昔嘗遊歐美，至英倫，已覺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爲之失望。今來意甫登岸，而更爽然。又曰：吾昔聞羅馬文明，尤聞其建築妙麗，傾仰甚至。及此遊，親至羅馬而徧觀之，乃

見其土木之惡劣，僅知用灰泥與版築而已。其最甚者，不知開戶牖以導光，以王宮之偉壯，以尼羅之窮奢，而其拙蠢若此，不獨無建章之萬戶千門，直深類於古公之陶復陶穴。又曰：往聞巴黎繁麗冠天下，頃親履之，乃無所覩。宮室未見瓌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比倫敦之湫隘，則略過之，且不及柏林之廣潔，更不及紐約之瓌麗遠甚。又曰：吾居遊巴黎之市十餘日，日在車中，無所不遊，窮極其勝，若渺無所覩，聞而可生於吾心，觸於吾懷者。厭極而去，乃歎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又曰：雅典區區片土，實爲大地文明誕育之場，吾嚮往久之，故裹十日糧而來。而徧遊兩小時，吞雅典者八九，則意興與遊觀蕭然而盡，卽決歸矣。天下凡有盛名之事，蓋莫不類此也。

凡此皆可見南海親遊歐土後之觀感，故曰：南海思想之激變，實以歐遊爲轉紐也。今根據遊記而分析南海之思想，其所以對於歐洲文明開始敢萌其批評與鄙薄之意者，厥有數端。一則見歐洲各地文物高下至不同，未必一一盡勝於我也。其初至意，卽知意人至貧，多詐，而盜賊尤多，既見其檻樓之情，顛連之狀，乃曰：未游歐洲者，想其地皆瓊樓玉宇，視其人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徧野若此哉，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一則知歐洲之治平康樂，乃最近百年以內事，而以前則不然也。故曰：徧覽歐土大進化，皆在此百年內，百年前屋多低小，亦與中國同，則亦無可深媿者。又曰：以巴黎之盛，當我宋明，尙如彈丸，卽路易十四雄霸，在吾國初，亦不及今巴黎二十之一，何雄麗之云。故時民居多丈許茅屋，學者耳食巴黎之盛，切勿以今日之法比

例百餘年之法也。柏林六十年前，僅七萬人，今逾三百萬，新世進化，古無可比，吾亦驚嘆，但當知彼百年前，不如吾中國遠甚耳。又曰：徧觀歐洲各國博物院，皆於十二三世紀後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觀歐人進化之序，故曰：吾國人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遊外國地，以互證而兩較之，當不至爲人所恐嚇而自退處於野蠻也。

南海所謂讀中國書，游外國地，互證相校，而爲其所注意留連者，大率不外於兩端，一則在於宗教藝術古建築古器物方面者，又其一則歐洲政治風俗歷史文化演變之跡乃至其所以然之故是也。歐洲古建築古器物之瓌奇精美，南海傾倒稱羨再三而勿置，然論及歐洲政俗文化之根源，則殊爲南海所不滿，南海既鄙薄於其後者，乃更轉而批評其前者，乃曰，凡迷信神道者，宗廟必極壯麗，自埃及巴比倫希臘印度皆然，而緬甸之野蠻，尙有黃金廟數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爲全球所無，豈得以緬甸爲文明耶。又曰：凡迷信神道者，宮室偉麗，凡多立貴族者，器物精奇。我之宗廟不麗，器物不精，益以見我無神道之迷信，無侯國之壓制，尙道德而貴廉讓耳。比之歐土之舊，不益見進化之高乎。又曰：德意志本甚野蠻，今其金寶刻劃，精工珍異，豈不近於文明，然蒙古王珍器，亦復金珠燦爛，達賴班禪與西藏諸大僧寶器皆精工，以王者教主之力，雖極野蠻，自能致其精異，與全國之文明無預，統觀其政俗，金甲石壘，與蒙古無異，未能以區區金珠之物，殿宇之精而稱之也。

南海既抱若是之見解，故其遊記中所著意者，乃不在其對於各地所見古建築古器物之描寫，

而實在其推闡各邦古今政俗推演進展之所以然而衡量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南海此書，雖屬遊記，而其精心結撰處，則實爲對歐洲文化史之闡述與批評。綜其大者，厥有數義，一者評論古羅馬文明之得失以與中國秦漢時代相比較，一者評論歐洲之中世紀，三則評論法國大革命，四則闡述英國憲政之由來。

南海謂羅馬與中國之比較，羅馬不如中國者有五。一曰治化之廣狹。終羅馬之朝，皆以意大利境爲內國，其餘高盧，西班牙，不列顛，西西里島，迦太基等，爲藩屬地，遣都護治之，如我伊犁，蒙古，西藏，東三省之將軍都統領隊大臣然，故皆縱恣暴虐，而民得自行其舊俗，實與未開化等。若埃及，亞西里亞，亞美尼亞諸國，則以虛名職貢，如安南高麗之比。其將相吏士之所自出，文人學士之所發生，政事禮俗之所盛行，圖書戲樂之所開發，繁華盛大之集會，實只有羅馬一城之內，並不能遠及於意大利之封域。羅馬極盛時，學者號稱六七萬，亦不過羅馬城中人士耳。意大利全域僅當今雲南一省。而當羅馬時尙雜蠻族未開化者，則正雲南之比。我漢時禹域百郡皆爲內國，人民平等，不限奴隸。郡國皆有學校，皆立大學掌故，縣鄉皆有三老以掌教化。特設科舉，郡國皆歲舉孝廉茂才，學術徧於全國之鄉野，此一也。二曰平等自由之多少。羅馬開國千三百年，而貴族平民之爭歷數百年，其後乃得少予權利而通婚姻，設護民官，然此乃同城之拉丁人得之，其意大利人仍數百年爲奴，終羅馬之朝，意大利半島奴隸百餘萬。其他藩屬人民，則如英之待印度。至末世乃稍予權利，而羅馬之紐亦解矣。若我漢世，內國人民，人人平等自

由，既無世爵，人人得徒步而至卿相執政權。羅馬限於一城數十萬人之內，我漢擴之百郡萬里五千萬人之遠，此二也。三曰亂殺之多寡。羅馬內政無紀，先則有豪族平民之爭，次則有三頭政治之爭，又次則有百年內亂，即號稱羅馬盛世，自愷撒被弑，其開國諸帝自奧古士多外無一能自保者。其後軍隊擁立之帝二十五，僅四人考終，而大亂亦頻數，於是三十暴君之代而入於末世之亂。統觀羅馬一統八百年中，當國有位號者以百數，能保全者不及十主。而爭亂分離以數十計。其女后之亂政弑君亦復無數。比之我十六國五季尚不如。每讀晉書及五代史，哀其時君臣人民之慘殺酷戮，爲之掩卷，而羅馬一京世載亂離，乃視爲朝餐夕飯，豈不哀哉。此其三。四曰倫理之治亂。羅馬以家族爲治與中國同，而其俗淫亂，則不及我國遠甚。觀邦泮家人屋壁圖書多寫淫具，則鳥獸之亂甚矣。此其四。五曰文明之自產與借貸。羅馬實爲武功之國，不得爲文明之國，文明本非其自產，乃借貸於希臘而稍用之，與北魏金元之入中國稍同。豈與漢世，上承三代，儒墨諸子，皆本國所發生，百郡人士，生來已習，濡浴已深，無煩假借，此其五。南海又曰：來因河畔多羅馬古蹟，羅馬非不刻意經營，而一敗不振，並本國而永遠沉淪焉。若我國則拓外之力，暗寓於無窮。足知羅馬政理不如中國，而今羅馬律則有間接而入於我者，此我子孫之不克振拔也。

南海之論歐洲中世，尤爲慨乎言之，而暢發其意於來因觀壘記。記曰：未遊歐土者，想像而推測之，以爲善見之天，妙音之國，極樂之土，金堂玉宇，而神仙聖賢也。以吾徧遊歐洲，熟觀其博物院及王宮之珍儲，則舉目所見者，金鐵之甲冑戈盾也。遊於其國內山野之間，則接目而觀

者，巍巍之戰壘也。其壘突兀於雲表，縱橫於江邊，憑險據隘，式製詭奇，誠吾國人所未覩。又曰：遊歐者，徒觀其大都會，文物之殷賑闐溢，宮室之奇麗閎敞，則震而驚之，曰文明哉，文明哉。然此其最新之迹耳。試與遊奧國帝羅之阿爾頻山，奧匈間之多腦河上，又與遊德國漢那諸州，乃若蘇格蘭阿爾蘭山野中，則屹然蒼然於山間雲際者，皆壘也。然遺跡疏落，尙未能惻然動遊者之心，至於循來因河邊數百里河道中，波浪泱泱，崇岡截嶺，夾河對岸三數里間憑險相見者，果何物哉，則皆壘也。壘也者，故侯之宮，而爭戰之場，歐人之白骨所築，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若其壘制奇詭，憑山顛而俯絕壁，峻聳入雲，處處斷而續以橋，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圓，可通可絕，可降可升，不知幾經戰爭乃得此式。故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以區區小國寡民，憑險守隘，雖有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莫之誰何。故德意志千年帝主，自路多父平九十壘以外，無有能定之者。自非中國創火藥火炮自蒙古突厥而西漸，則封建之爭至今存可也。傷心哉，吾國之古戰場可弔者有幾，而來因河畔，則接目皆古戰壘，五十年前之歐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慘酷，吾至今猶爲歐民哀之。

南海既歷歷描繪歐洲中世紀故壘之遺跡，而想像其千年戰鬪之慘酷，於是又進而述當時各國侯封之數字，以推論其政理之破碎與民生之憔悴焉。故曰：當時全歐皆封建貴族，法十萬，英一萬五千，奧二萬，普及日耳曼各國三十萬，除此四十三萬五千貴族及數十萬大僧外，其餘數千萬人皆佃民奴隸，無立錫之地。政不逮下，學亦不逮下，一切人權不逮下，內事壓制，民不聊生，外

事戰爭，殺人盈野。此三百年中，歐洲始如破蒙昧也。而南海於此，其敘述法國者尤詳，蓋此卽大革命之所由爆發也。南海曰：法地僅二十萬英里，視吾四川一省，僅較大四萬英里耳。此四萬英里作國王自領，而全法國有貴族十萬，是猶吾四川百縣，每縣有一千封建小國也。法民當時二千五百萬，是每封建國平計不過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時，侯封尙四萬，則每縣尙有四百小侯，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其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全國六百萬，則每侯國僅百五十人耳。破碎微小，僅如中國一小地主，而貴族與公侯之號，尊驕佚侈，在此么麼境內，皆有專制君權，設家宰，張警吏，稅官捕役，法吏書記皆備。牢獄絞臺，生殺刑威自專之。恣意徵稅，任情徭役，以此數百之民，而供應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故南海曰：吾以法封建情狀推之吾中國，無有可比者。吾國人未知法國百年前之俗，未知歐土五六十年前之政事，遊滇黔及南洋爪哇，觀巫來由諸王與土司治民之政俗，如同一縮影也。

夫歐洲中世紀以來之政理，其破碎黑暗有若是，則法國之大革命，事所應有，亦無足怪。南海繼而論之曰：以歐洲萬里原陸之地，英德奧法四大國，將二萬萬之人民，而有地農主只此四十餘萬人，其餘皆無立錫。加以舊教愚民之法，壓制種種，皆可爲種怒之因而種民變之禍胎。中國聽人民自有田地，蓋自戰國，乃在羅馬未出現以前。孔子之道，以自然爲教，絕無壓制，又豈若天主教乎。故中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餘年矣。若使我中國而尙有十萬淫暴之諸侯，占國地三分有一，又有專橫之寺僧，舉中國平民不得任權要之職，則鄙人必先奮筆焦唇而唱自由，攘臂

荷戈而誅民賊。革命乃吾國自有之義，豈待譯書之入，先盧騷福祿特爾而力爲之矣。以此南海乃深不樂當日國人之慕效法國，輕言革命。其法蘭西遊記描述法國大革命之經過及其慘禍，尤爲詳備。南海曰：法國革命，恐怖狂戮，賢革同焚，流血百二十九萬，禍垂八十餘年，實爲法國當日革命志士始料所未及。南海於此尤深歎而切論之，曰：今夫弈，小數也，能弈者不預知六七著，不能圖勝。卽僅知三四著，可謂深遠矣，然下棋立敗，何況國政民變之深遠繁奧，有預算千萬著不能盡者。大革命之事，古今所鮮經，常道所少由，卽諸志士當開議抗王命時，亦未嘗逆計夫大革命之全局，當革命時變狀若何，既革後變狀若何，變若何來，若何因應。且雖有知者欲逆計之，而事變之來，如風吹火焚，實不能料。則預爲因應之法亦無所施。而及倫的黨在當時，實見寸行寸而爲之，譬猶庸醫未識病症而敢妄用砒霜毒藥，大黃瀉劑，其不妄殺人者幸耳。

南海之遊突厥，適值其頒新政，召國會，南海顧深憂之，曰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太去甚，以漸行之。如求盡去，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大亂耳。突之青年黨，久遊法國，日事破壞，徒口耳革命之名，而未盡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豔炫歐美之俗，而未細審風俗之宜，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非不快也，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效，非突人所能驟受也，於是國人不知所以措手足，惟亂舞傞傞而已。

其次請略述南海之論憲政，凡論歐洲憲政必推原於古希臘。南海曰：孟德斯鳩稱希臘先創於海寇，亞洲大陸國，海寇無所容，而地中海萬島杈枒，又無大國，故能以海寇崛起。以其起自海

寇，故分職必均，雅典公民分公帑而公議事，民權憲法之興，亦卽在是，所謂臭腐神奇，今以爲普天之洪範，而其初至不足道也。凡一切政化，皆地勢使然，故余常曰水流沙轉，非人爲也。其論羅馬則曰：羅馬起於部落，當我春秋之始，人口不過數千，蓋以三十族開基。羅慕路之王五世，僅治羅馬城一隅，同一酋長，故其爲治亦同部落，諸族分權而治，無名義以相統，其有不可廢而棄之，貴族本自平等，孰肯以大權歸一人之手。此王權之所以永廢。其論中世紀日耳曼諸邦之議會，則曰：日耳曼當吾漢晉，尙爲森林之野番。開創之始，攘闢山林，粗開部落，未成國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羣族相鬪，必開會謀之，凡稱戈之卒皆得預議，不能荷戈者不得預會，所議公舉頭目將軍及編兵之事。預會者僅有贊否，無發言權。焚火射矢以集衆，集於邱陵林叢或神前，可者舞蹈，不可者擊器以亂之，大不願者投戈於地。此等集會，只可謂之部落械鬪會。今人以後世文明，蒙之以國會二字。今吾粵僻處，各鄉械鬪，亦必鳴鑼大聚鄉人而公議之。若苗僛黎僇各種，分據山洞，各立酋長，至有戰爭，亦射矢舉火爲號，傳集各洞，公議其事。以宋史土司傳考之，日耳曼史開創時，乃如一轍。至歐洲中世封建時，日耳曼帝僅以虛名擁位，其時國會皆豪族，如諸侯大僧有領地者列席焉。所議爲和戰教宗嗣王及國際大事，此等會議，猶我春秋時列國諸侯大會，凡非大一統之世，衆國並立，必有此等會議，固吾國行之二千年矣。其論議會制度之獨延於英邦，則曰：此有二故，一則小國寡民，其克林威爾之革命，亦不過如春秋列國之廢逐其君。晉厲宋殤之弑，魯昭衛輒之出，衛人立晉乃出於衆，貴族柄政蓋視爲常。二則地僻

海隅之一島。羅馬及東方之制度亦不廣播，故能傳其舊俗。及文明大啓，則國會已堅，又有希臘羅馬議會舊事會合之，此爲議會制度獨延於英之二因。若在歐洲大陸，則早爲羅馬大國之政制所束縛，君權久定，國會奚從發達，故國會必小國寡民，王權不尊，而後始有。假令羅馬而一統至今，則英倫三島，亦中國之瓊臺慎黔耳，爲羅馬之郡縣，奉羅馬之政法，何從而有國會。何從而漸精漸進以成今日之憲政。此爲歐亞歷史之大異點，非中國人智之不及，而地勢實限之，不能爲中國先民責也。物無兩大，有其利必有其害。中國萬里數千年已享一統之樂利，歐洲列國分立，經黑暗中世千年，戰爭慘禍，酷矣，乃得產此議院以先強，則有其害者亦有其利。然中國苟移植之，則亦讓歐人先獲百年耳。何傷乎！天道後起者勝也。

南海對於歐土政俗文化演變之觀感，俱如上述，於是往昔以歆羨西化而主全變速變者，至是乃譏斥之曰夷狄，曰野蠻，而笑畏外媚外之爲愚，其言曰：自明成化以前，法國內則侯爭城堡，人民土沙，外則與英班日戰，暴骨如莽。夷狄之政，野蠻之行，無足比數。卽觀其十四五世紀以前之器物，蓋亦絕不精巧。今學者無中外之學，不考其本來，徒觀其外蹟，震其百年之霸，而畏之媚之，何其愚哉。卽當前之歐洲，南海亦評之曰半仁半義，而不認其爲圓足標準之文明。其言曰：吾觀今歐洲之人心風俗，由分爭而漸趨於一，由級別而漸趨於平，由好利而漸尚於名，由好禮義而益底於文明。其中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甚多。如各國戰不能弭，而戰時國際之條約，則不殺降，醫夷傷，半仁半義之事極多，乃極可笑，其自誇以爲文明而異於野蠻者卽在是。此與宋襄

之不重傷，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何異。又曰：吾昔者視歐美過高以爲可漸至大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尙未至也。孔子於今日，尙爲大醫王，無有能易之者。又曰：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舍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爲文明而師之，豈知得失萬端，盈虛相倚，觀水流沙轉，而預知崩決之必至，苟非虛心以察萬理，原其始而要其終，推其因而審其果者，而欲以淺躁一孔之見，妄爲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至是而南海觀點，乃顯著有激變，其於一切之論評，乃有轉向內裏實事求是之意，與一時之盛誇西俗以爲模準者相異焉。其言曰：萬法之對於人羣，無得失是非，惟其適宜，譬猶藥之補瀉，亦無得失是非，惟其對病，苟不對病，則服人蔘一斤，亦可發熱而死。且藥必製煉乃可用，不製之藥，反可生病。民權固爲公理，然不知所以製之，以不教之民，妄用民權，此則誤服人蔘十數斤，誤飲補酒百石，只自速其死。況服砒霜飲烏頭，而又無分量之限度乎。死矣死矣，不可救矣。又曰：苟但執驗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審夫病者之老幼強弱，表裏虛實，則天下執一驗方新編，人人可以爲名醫矣。況診一國之病，其理尤難，而謂可妄執他國之驗方，以望瘳己國之痼疾，其可得哉。南海於此，猶有言之極憤慨者，曰：昔有貴人，有癰而割之，血流股席，有貧子，美好無病，慕貴人之舉動，乃亦引刀自割，貌爲呻吟，已而剖傷難合，卒以自斃。今妄人媚外，發狂呼號，不幾類此。

至是而南海不得不仍折還於自敬國本之論，而往昔之所謂速變者，今日乃自厭而自吐之。其

言曰：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壓愈甚，於是有千年之黑暗。吾敷教在寬，故不敬教，而教無壓力，故變化最速。吾過英惡士佛學堂，各國遊學其間者，突厥只有一人，而波斯無人焉，吾國甫通歐西，而今已十餘人矣，後日益多。雖然，速變則速變矣，吾患其無自立之性也。各國於其本國言語文字讀史風俗宗教，皆最寶愛之，敬重之，保存之，而後人性能自立，一國乃自立。故各國學堂獄醫，必有其敬禮國教之室，不如是則殆比於野蠻人。讀者繼此再披尋其以後不忍雜誌之思想與理論，則宛如天衣之無縫矣。

此稿刊載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思想與時代月刊四十一期

二四、餘杭章氏學別記

餘杭章炳麟太炎，爲學博涉多方，不名一家。音韻小學尤稱度越前人。然此特經生之專業，殊不足以盡太炎。或艷稱其文章，太炎論學頗輕文士，於唐宋文人多所譏彈，謂學貴樸不貴華，枝葉盛而根荄廢。自稱爲文特履繩蹈墨，說義既了，不爲壯論浮詞，以自蕪穢。謂百年以前，學者惟患瑣碎，今正患曼衍也。又謂非爲慕古，欲使雅言故訓，復用於常文。其自述文章能事塵此。或又以經學稱之，太炎論經學，僅謂六經皆史，說經所以存古，非所以適今。過崇前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亦值並世今文家言方張，激而主古文，時若不免蹈門戶之嫌，然後世當諒其意也。今論太炎學之精神，其在史學乎。

太炎論史大義，約而述之，可歸三塗：一曰民族主義之史學也。嘗謂惟人能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姓，其條例所繫，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又謂凡在心在物之

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於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爲典型，不能取之域外。又曰，歷史斷無可以與人相通之理。故史者，上以存國性，下以紀成敗。人不習史，愛國之念必薄，出而行事，猶冥行索途也。又曰，民族意識之憑藉，端在經史。史卽經之別子；承平之世，有賴儒家，一至亂世，史家更爲有用。國亡再起，非歸功史家不可。民族主義如稼穡，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遼變猝起，繼之以淞滬之戰，舉國震動，或問有可永久寶貴之國粹否？太炎答曰，有之，卽其國已往之歷史也。嗟乎！廬斯一言，足以百世矣。二曰平民主義之史學也。嘗論伯夷與盜跖，同爲上世之無政府主義者，以春秋貴族之世無俠名，而盜跖以爲盜。又深推儒行，謂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包之。擊刺者，當亂世則輔民，當平世則輔治。又盛稱五朝法律，爲之索隱，曰五朝律重生命，恤無告，平吏民，仰富人，損上益下，抑強輔微，此可以窺其旨矣。三曰，文化主義之史學也。曰仲尼賢於堯舜，惟在作春秋，修六藝，布羣籍，廢世卿。又曰，孔子賢於堯舜，由其出身編戶。孔子以前爲帝王立言者多，爲平民立言者少。孔子於中國，爲保民開化之宗，不爲教主。然則太炎論史，三塗同趣，曰歸一於民族文化是已。晚近世稱大師，而眞能有民族文化之愛好者，其惟在太炎乎！

太炎早歲卽奔走革命，故論史亦每與世事相發，而論政俗尤深切。嘗謂政治之於生民，猶乾矢鳥糞之孳殖百穀，百穀無乾矢鳥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至治，猶去乾矢

鳥糞而望百穀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猶見百穀之孳殖，而并以乾矢鳥糞爲馨香也。又曰，以法令化民，是聞隳括足以揉曲木，而責其生梗楠聆風，民未及化，而夭枉者已多矣。時主變法者，力尊黃梨洲有治法無治人之論，太炎深非之，爲非黃篇以見意。謂有時弊非關法弊者，以法救世，正如以孝經治黃巾。吾儕志在光復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立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爲之，非義所任，情所迫也。太炎頗疑代議制之實效，爲代議然否論，曰中國欲圖強，不可苟效憲政，當除胡虜而自植吾夏人。是則太炎之從事於革命，亦一本其民族之觀點而然也。

故太炎雖從事革命，而所希冀於政治者至穀。曰英雄之言，與鬼神等，世有其名，本無其實也。今日言治，以循常守法爲先，用人亦當敍次資勞，不以驟進；法雖有疵，自有漸進改良之日；若有法不守，精粗又何足言？資勞固非至善，驟欲破格，適長奔競之門。爲政於今日，兩言蔽之，以資勞用人，以刀筆吏守法而已。中國民智之弱，民德之衰久矣，欲令富強如漢唐，文明如歐美，正如夸父逐日之見。吾輩處之，正能如北宋，次如東晉耳。

然太炎之望於政者雖穀，而期於俗者則深。常屢爲分異政俗之辨，曰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與行己者絕異。行己欲陵，而長民欲恕也。言欲不可絕，欲貴卽爲理，乃竦政之言，非飭身之典。以道蒞天下者，貴乎微妙玄深，不排異己。不知其說而提倡一類之學，鼓舞泰甚，雖善道亦以滋敗。蓋所失不在道術，鼓舞甚而僞托者多也。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途，使人苟

儉。中國學術，自下唱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矣。

昔顧亭林有言，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風俗人心，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缺。太炎早歲卽慕亭林，其嚴種姓，重風俗，皆與亭林論學之旨相近。而其評論歷代風俗人物進退得失之故，則頗有不與亭林同者，亦各據其世而爲言也。謂東漢可慕在獨行逸民諸傳，其黨錮不足矜，獨有范滂李膺，已近標榜，張儉輩無可道矣。而盛推五朝，謂馳說者不務綜終始，苟以玄言爲詬，玄學固不與藝術文行悟，且扶翼之。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五朝諸名士皆綜之。其言循虛，其藝控實，故可貴也。學術當辨誠僞，世說雖玄虛，猶近形名，其言間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中說時有善言，其長夸詐則甚矣。魏晉老莊形名之學，覃思自得，政事墮於上，民德厚於下。進士之科，日崇其僞，敢爲大言，不疑，一自以爲俊傑，一自以爲聖賢，浮澤故慮憲衰，矜居之夸行故廉讓廢。其敗俗與科目相依，而加勁軼焉。

又爲思鄉愿，所言益沉痛。曰古之狂狷者，自才性感慨。唐以降之狂狷者，自辭章夸詐。辭章於人，教之矜伐，予之嚴飾，授之詆諆，致之朋黨。鄉愿多持常訓之士，高者卽師雒閭。大抵成氣類則僞，獨行則貞，雖有矯情，未如飾狂狷者甚也。故輔存程朱，將以孳乳鄉愿，上睢庸德，令邑有教誨之賢，野有不二之老，則人道不夷於鶉鵲，利澤及乎百世。非欲苟得狂狷，爲史書增華也。

凡太炎論政俗，大意率具是，其評騭諸家學術，亦可準此推。謂學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親民，不以干祿。孔氏之學，本以歷史爲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以前王成迹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又曰執禮者質而有科條，行亦匡飭。禮過故矜，平之以玄；玄過故蕩。禮與玄若循環，更起迭用。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孫卿莊周也。深賞莊周齊物，謂論有互負，無異門之釁，人無愚智，盡一曲之用，所謂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者。其論宋明諸儒，曰定性書順衆而無誠，格物論博觀而無統，至德惟匹夫可以行之，持是長國家，適亂其步伍。故程伯子南面之任，朱元晦侍從卿僕之器，王文成匹夫游俠之材。四民分業，不必兼務，亦不可相非。自學術觀之，諸科平等，但於一科中有高下耳。近人專守一術，詆他人爲無用，此未知舟車之異宜也。其自道則曰莊生之玄，荀卿之名，劉歆之史，仲長統之政，諸葛亮之治，陸遜之諫，管寧之節，張機范汪之醫，終身以爲師資。

少年著燭書，自擬仲長統。孫詒讓見之，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逮民國以還，所造益深闊，自述爲學經過，謂少時治經，謹守樸學，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於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囚繫上海，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居東釋莊子，癸甲之際，厄於龍泉，始玩爻象，重說論語。又以莊証孔，知其階位卓絕。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遜順。此其所自負也。

當其時，與爲論敵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極恢奇，而太炎則守平實。故康欲上攀孔子爲教主，稱長素；而太炎所慕則在晚明遺老，有意乎亭林之爲人，而號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則力呼革命。康唱爲變法，太炎又諄諄期循俗焉。太炎之於政治，其論常夷常退；其於民族文化，師教身修，則其論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輕立門戶，蓋平實而能博大，不爲放言高論，而能真爲民族文化愛好者，誠近世一人而已矣。

此稿草於民國二十五年

二五、太炎論學述

太炎之學，可分四支柱：一爲其西湖詁經精舍俞樾蔭甫所授之小學，一爲其在上海獄中所誦之佛經，一爲其革命排滿從事政治活動，而連帶牽及之歷代治亂人物賢奸等史學理論，一爲其反對康有爲之保皇變法，而同時主張古文經學以與康氏之今文經學相對抗。而其崇信印度佛學，則尤爲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一因其文字詰屈，讀其書者不多。一因其縱觀博覽，所涉既廣，而民初以來讀書風氣已衰，讀其書者，如泛大海，僅求其船之靠岸而止。大海渺茫，固非意存。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爲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而主持新文化運動者，亦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近世則羣敬以爲大師，或目以爲怪人。然固無知其立論之怪。余爲近三百年學

術史，止於南海康氏，太炎尙在世，因未及。太炎逝世，余在燕京大學曾作演講，介紹其學術大概。然於其怪誕之論，則未有及。此已四十年前事矣。頃讀章氏叢書以外絡續發行之各書，乃知太炎此等理論，畢生持守，終始不變，是終不可以不述，以爲考論民初學術思想，及有意知人論世者作參考，固非好指摘前賢也。下之所引，僅其梗概，備讀者之自究之。

太炎最先著作有齊物論釋，又有重定本，烏目山僧爲之序，有曰：

近人或言，自世說出，人心爲一變。自華嚴出，人心又爲一變。今太炎之書現世，將爲二千年來儒墨九流破封執之肩，引未來之的，新震旦衆生知見，必有一變以至道者。

此序，實可發揮太炎此書之宗旨。否則太炎傲視倫儕，決不許他人之序其書也。然則太炎意，中土惟莊生道家陳義，同於印度之佛教，其他如儒墨九流，則皆等而下之，此書出，乃可使國人開其知見以變而至道也。

齊物論釋重定本成於辛亥，繼是乃有國故論衡，其及門弟子黃侃季剛爲之贊，有曰：

方今華夏彫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盪滅舊貫。懷古君子，徒用盡傷。尋其瘠殘，豈誠無故。老聃有言，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然則持老不衰者，必復丁乎壯矣。於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

黃侃乃太炎得意弟子，其贊論衡，猶烏目之序釋義，皆可謂得太炎著書宗旨者。太炎深不喜西學，然亦不滿於中學，故其時有國粹學報，而太炎此書特稱國故，此國故兩字，乃爲此下提倡新

文化運動者所激賞。季剛之贊，亦僅曰國聞，則其於中國文化傳統之評價可知。論衡者，乃慕效王充之書。太炎對中國已往二千年學術思想文化傳統，一以批評爲務。所謂國故論衡，猶云批評這些老東西而已。故太炎此書，實卽是一種新文化運動，惟與此下新文化運動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

太炎既主批評中國二千年來一些老東西，自不免首及於孔子與儒家。太炎最先有尙書，其批評孔子，殆有甚於後起新文化運動及更後共產黨之所謂批孔運動。蓋後二者，皆不學，徒恣空論，而太炎則具甚深之學術立場。惟不久卽自悔其書，不再刊布。繼國故論衡而成書者有檢論，其中亦仍有訂孔上下篇，較之尙書，遠爲平實。其言曰：

仲尼，良史也。談遷嗣之。孔子歿，名實足以抗者，漢之劉歆也。

康有爲主今文經學，尊孔子爲聖人，斥劉歆爲作僞之人。太炎主古文經學，力反康氏，乃謂孔子乃一史家，司馬父子嗣其業，劉歆則名實皆足與孔子抗。孔子僅與劉歆爲伍，可謂千古創論。然太炎意，孔子究不失爲一良史，亦非一筆抹殺。康氏尊孔亦尊佛，奉公羊春秋爲其變法張本，自創大同書，欲使人奉爲治國平天下之終極規模。其書雖多鈔襲佛書，然必歸之小戴之禮運，然孔子實未縱言及此，故康氏自認已所造詣已踰孔子，自號曰長素，乃以素王長兄自居。太炎則以左傳言春秋，孔子僅一良史，而已則通印度佛學，所造遠踰孔子之上。民初大儒意態如是，則此下學風演變自可知。

檢論又有學變篇，盛讚王充之論衡，其言曰：

有所發摘，不避上聖，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尠有能逮者也。

孔子僅似劉歆，而國人兩千年來皆不能有所發摘，此誠國人之恥。惟王充能振之，太炎自爲書曰國故論衡，即承充意。然幸中國全部學術，亦非專尊孔子。檢論又有通程篇，其言曰：

善作述者，其惟二程邪。言道之情，非鄒魯所能盡也。顧未能方物釋老耳，雖雜釋老何害。

程氏尊孔，卻能雜釋老，此所以爲善，獨惜其所得於釋老者猶淺，未能髣髴耳。

太炎於宋明理學中，獨推陽明。檢論有議王篇，其言曰：

文成所謂致良知，不下帶而道存。

凡晚明諸遺老，如顧亭林王船山攻王學者，太炎皆爲之解釋。又曰：

嘗試論之，古者王官散而爲九流，晚世諸子，本材性以效王官，前民用。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侍從鄉僎之器也。王文成，匹士游俠之材也。

此承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而謂儒統卽王官之學。大程能雜老釋，故可當南面。朱子辨老釋以衛儒，故得爲卿佐。惟陽明假老釋以飾儒，又明白主張三教合一，其言於老釋時有甚深契會，故如匹士游俠，於儒統帶有革命精神，故爲太炎所深賞。

繼檢論後有荊漢微言。論衡檢論，檢討國故，屬太炎學之旁面。荊漢微言明倡佛學，乃太炎

學之正面。微言起乙卯，訖丙辰初春，當民初四五年之間，其言曰：

論語所說勝義，大抵不過十許條耳，其餘修己治人之術，乃在隨根普益，不主故常。因情利導，補救無盡。謂本無微言妙義者非也。謂悉是微言妙義者亦非。

其言較之專以劉歆相擬，似尤較平實。又曰：

陽明之學，展轉傳變，逮及台山尺木，遂不諱佛法矣。

是不啻謂陽明本佛法，特諱言之耳。

太炎又分別中土師儒之差等，其言曰：

明道白沙，見理亦未究竟，故謂純亦不已，勝於前後際斷，此乃分別法，執所見，然其受用已足，當是二乘不趣寂者。陸子靜楊慈湖王陽明，知見高於明道白沙，而受用不如，當是大乘十信將發心者。晦庵之說，雜有二乘人乘外道，是爲不定種姓，信分微劣者。濂溪康節，純是天磨，而受用尚多，是爲外道已成就者。橫渠亦純是天磨，而受用不如，是爲外道未成就者。陶靖節則近部行獨覺矣。陽道州則近麟角獨覺矣。焦先則近苦行頭陀矣。

太炎於中國歷代人物，一一憑佛義，判其高下，定其差別。後起新文化運動，一尊西法，亦如太炎之一尊印度。惟諸人嬾治故籍，故於中國固有，汗漫揮斥，一邱之貉，曾不再加以剖辨，則於太炎爲遜耳。

以上諸書外，尚有文錄別錄。別錄卷二有答鐵錚書，其言曰：

足下不言孔學則已，若言孔學，願亟亟以提倡歷史爲職。

又曰：

孔氏舊章，其當考者，惟在歷史。

又曰：

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爲宗。

又曰：

僕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爲臬極。佛學王學，雖有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說約之，自可鑄鎔爲一。

又曰：

足下主張孔學，則禪宗與姚江一派，亦非不可融會。

以上，皆收入民國六年浙江圖書館所刻章氏叢書內，太炎論學宗旨，約略可見。

越後民國二十一年，其弟子錢玄同吳承仕等又爲叢書續編，刻於北平。至民國三十二年又由成都刻行，中有荊漢昌言六卷，其一條云：

問曰：王學末流，昌狂亦甚，如李贄之徒，蓋與近時爲新說者無異。答曰：贄之昌狂，卒以法逮捕，不食而死，是當時朝野未嘗容此。豈若今之舉止自便者邪。然陽明論學，蓋專爲高明者言，未及提倡禮教也。禪宗狂者，至於呵佛罵祖，而行止未嘗踰軌，則以戒律持

之也。上蔡象山慈湖白沙之倫，其弟子亦未有昌狂者。蓋宋世儒者多崇禮教，明代崇禮不如宋人，白沙則有名節爲藩籬之說。故四家之學，行之或百餘歲，或幾二百歲，卒未聞其徒有破檢者。所惜陽明未慮及此耳。

此處因新文化運動驟起，遂悟陽明講學有偏。又曰：

陽明之說，所以有效，由其服習禮義已成乎心也。若施於婆羅洲殺人之域，其效少矣。施於今之太學，其效更少矣。

是謂當時之大學，尚不如婆羅洲殺人之域也。其深惡於新文化運動者有如此。

又曰：

戴東原之學，根柢不過二端，曰：理麗於氣，性無理氣之殊，理以絜情，心無理欲之界，如是而已。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東原蓋深知此者。使其宰世御物，則百姓得職，人材不遺矣。陽明東原，其術相背，以用世則還相成也。

陽明東原，皆能闢朱子，易言之，皆能反儒統，故皆爲太炎所取。惟東原言，求理於事物，不專主心卽理，故謂其與陽明相背。

又曰：

羅整菴於氣見理，羅近溪得力於恕。東原辨理似整菴，歸趣似近溪。

太炎於陽明後亦取近溪。整菴論理氣反朱子，故太炎亦稱之，觀是知太炎論學大旨，實與前無大殊。

又有太炎文錄續編，不詳始於何時，卷二有王文成公全書題辭及後序兩篇，皆成於民國十三年，則在叢書編印後又七年。題辭之言曰：

宋世道學諸子，刻意欲上希孔顏，及明王文成出，言心卽理，由是徽國格物之論瓦解無餘。文成之徒，以羅達夫王子植萬思默鄒汝海爲過其師。達夫言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子植言，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謂生生之真機，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二公所見，則釋氏所謂藏識恒轉如瀑流者。宋明諸儒，獨二公洞然燭察焉。然不知藏識當捨，而反以爲當知我在，以爲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貴無首，而坤惡堅冰。資生之後，不能順乾爲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爲堅冰，是爲有首，所謂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識非我，由意根執之以爲我。然又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爲主宰，是固未能斷意根者。所謂儒釋疆界邈若山河者，亦惟此三家爲較然，顧適以見儒之不如釋爾。

又言：

汝海謂：天理不容思想。顏淵稱如有所立卓爾，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無方體，何可以方體求得。今不讀書人止有欲障，而讀書更增理障，一心念天理，便受纏縛。爾祇靜坐，放下念頭，如青天然。無點雲作障，方有會悟。又言：仁者人也。識仁者，識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見。毋求其有相，惟求其無相，此與孔子無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及釋氏所謂智無所得爲住唯識者，義皆相應。然汝海本由自悟，不盡依文成師法，今謂文成優入聖域，則亦過矣。

觀此，知太炎言學，儒不如釋之定見，始終執持，迄未有改。儒家中陽明所言最近釋，故太炎最所心折。及讀書益多，乃知羅念菴王塘南萬思默鄒聚所諸人，所言更近釋，乃更謂諸人過於陽明，而陽明亦未得謂優入聖域。所異者，更不聞太炎平生亦曾爲此等靜坐禪定之功。遊其門者，治小學文章經史，更不聞有治理學，治釋典逃佛學者。言教不如身教，固宜及門之多不厝情於斯也。

題辭又曰：

當今之士，所謂捐廉恥負然諾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釋之同異。與夫優入聖域以否，於今爲不亟。亟者，乃使人遠於禽獸。必求孔顏以爲之師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則又多義解，少行證，與清談無異。且佛法不與儒附，以爲百姓居士於野則安，以從政處都市涉患難則志節墮。徑行而易入，使人勇改過促爲善者，遠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起賤儒爲志

士，屏唇舌之論以歸躬行，斯於今日爲當務矣。

此亦太炎感慨於當時之士風而發。又曰：

宋儒視禮教重，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

又曰：

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

太炎之意，遂若教人學陽明，不若教人學子路。因又特舉儒行篇，曰：

漢世奇材卓行，若盧子幹王彥方管幼安者，未嘗談道，而岸然與十五儒方，蓋子路之風猶有存者。

然則太炎之意，殆如教人誦儒行學子路，卽可以移頽風而易末俗也。此因長素高擡禮運，故太炎特提儒行，在其爲尅書時已言之，太炎往往固執一見，歷數十年不變有如此。

又王文成公全書後序有曰：

今學者浸重物理，置身心不問，本末倒絜，以身爲形役。徽公窮至物理之說導其端也。清未言新法，未幾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專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如削趾適屨。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是則徽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誠所謂洪水猛獸，文成力爲之閑，不驗於明，而驗於今之世。

太炎謂清末言新法以及當時新文化運動皆由朱子導其端，真不知何從說起。抑若王學復盛，新法

新文化兩運動隨即消散。且太炎明言教人學陽明，不如學子路，奈何又言陽明之閑洪水猛獸，其言將驗於今。抑亦未聞太炎生平有宏揚王學之意，豈其所爲齊物論釋荊漢微言，爲功尤在宏揚王學之上乎？此見太炎不切事實，憑空立論，不惜高下古人以就已意，豈此卽是陽明所主心卽理之具體表現乎？

文錄續編卷一又有伯夷叔齊種族考，定夷齊爲鮮卑人，而曰：

種類不同，禮俗素異之人，有能化及中原，永爲世範者，自釋迦以前，未有過於伯夷者也。此亦太炎感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盛唱西化而發。夷齊是否鮮卑人，不深論，要之太炎之崇重釋迦至老不衰。其意亦謂當時提倡新文化運動者，不能如伯夷釋迦，故亦無以達其所期望也。

卷一又有格物致知正義，其言曰：

鄭君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鄭君之說，上契孔子，而下與新建知行合一之意適相會。

又曰：

鄭王二說，皆深達心要，又不違於孔孟。佛家說五識，身外與境觸，以逮善惡成就，前後相引，略有五心。初率爾墮心，無間引生尋求心，決定心，此物格而知至也。決定心後，於怨住怨，於親住善，於中住捨，命之曰染淨心。於此持續，有善不善轉，命之曰等流

心。此皆誠意也。

太炎主古文經學，乃以反康有爲。今以鄭王同說，而又以佛說爲衡，則所學益條貫矣。

又有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其言曰：

王子雍僞作古文尙書及孔叢子，古文尙書所云人心道心，宋儒悉奉以爲準，然尙非其至者。孔叢子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微特於儒言爲超邁，雖西海聖人何以加是。故楊敬仲終身誦之，以爲不刊之論。前有謝顯道，後有王伯安，皆云心卽理，亦於此相會焉。

此又推尊及於僞古文尙書與孔叢子。要之一言同於釋氏，卽皆千古不刊之論。太炎與康氏所遭時變同，惟康氏讀書不如太炎之多，而論學則前後多變。太炎可謂終身蠹書叢中，而持論則少所變。曰古文經，曰陽明心學，曰佛學，幾皆終身焉。此見康章兩人性格之異，不得以變爲非不變爲是，亦不得以不變爲非以變爲是也。然兩人皆用世心亟，亦同於崇佛，亦皆不修居士行，而亦同是近代士風之楷模。欲知近代學風之所起，誠於此兩人不得不有知也。

太炎又有國學畧說一書，由其門人孫世揚校錄，乃在蘇州講學時，最值太炎之晚年，然其論學要旨則仍無變，茲續招數條作例。其一云：

孔門弟子，獨顏子聞克己之說。克己者，破我執之謂。顏子之事不甚著，獨莊子所稱心齋坐忘，能傳其意。然論語記顏子之語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顏子始猶以爲如有物焉，卓然而立。經孔子之教，乃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如當作假設之辭，不訓似。此卽本來無物，無修無得之意。絕四之說，人我法我俱盡。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除法我執矣。此等自得之語，孔顏之後無第三人能道，佛莊不論。此謂儒統雖遜於佛莊，然除孔顏外亦無第三人。又曰：

德充符言，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知者，佛法所謂意識。心者，佛法所謂阿賴耶。阿賴耶恒轉如瀑流，而眞如心則無變動。常心者，眞如心之謂。以止觀求阿賴耶，所得猶假。直接以阿賴耶求真如心，所得乃眞。此等語，與佛法無絲毫之異。世間最高之語，盡於此矣。

又曰：

內篇七篇，佛家精義俱在。

此則較齊物論釋益爲推廣。

又曰：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後之言佛法者，往往以此斥老子爲外道，然非外道也。佛法有緣起之說，唯識宗以阿賴耶識爲緣起，起信論以如來藏爲緣起，二者均有始。華嚴則稱無盡緣起，是無始也。其實緣起本求之不盡，本無始，無可奈何稱之曰始，無可奈何又稱之曰無始，故曰无通於元。儒家無極太極之說，意亦類是。故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語本了然，非外道也。

又曰：

太史公孔子世家，老子送孔子曰：爲人臣者毋以有己，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空談無我，不如指切事狀以爲言。所以舉臣與子者，就事說理。華嚴所謂事理無礙矣。唯聖人爲能知聖，孔子耳順心通，聞一卽能知十，其後發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論。顏回得之而克己，此如禪宗之傳授心法，不待繁詞。然非孔子之聰明睿知，老子亦何從語之哉。

太炎長於小學，而不精訓詁，如有所立卓爾，解如爲假說辭，將實作虛，乃不知古人無此語法。太炎博極羣書，而不擅考據，如認史記老子告孔子，而不知與作爲五千言之老子不相類。要之以佛書爲準繩。通於釋，卽皆名論定論也。其好莊尤甚於老，而喜顏亦若尤甚於孔，以其尤爲出世，與佛書近也。

其論陽明，曰：

格物致知之說，王心齋最優。蓋陽明讀書多，不免拖沓。心齋讀書少，故能直截了當，斬斷葛藤。心齋解在止於至善，謂身名俱泰，乃爲至善。殺身成仁，便非至善，其語有似老子。

傳統論學，必爲儒道分疆，而太炎絕不存此意。似老則境界尤高，語非貶辭。

又曰：

羅念菴辭官後，入山習靜，日以晏坐爲事，謂理學家關佛乃門面語，周濂溪何嘗關佛哉。

陽明再傳弟子萬思默，語不甚奇，日以晏坐爲樂。王塘南初曾學佛，亦事晏坐。然所見皆高於陽明。塘南以爲一念不動，而念念相續，此卽生生之機不可斷之意。思默自云：靜坐之功，若思若無思，則與佛法中非想非非想契合。鄧定宇語王龍谿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張陽和謂此言駭聽，定宇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胡正甫謂天地萬物皆由心造，獨契釋氏旨趣。前此理學家謂天地萬物與我同體，語涉含混。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當。

此謂王學後起優於王，亦太炎舊見。惟又謂陽明讀書多，不如心齋讀書少，而太炎讀書之多，則明末除顧亭林等極少數外，殆無倫匹。爲學固當多讀書，抑少讀書，此問題未見太炎有所明言。又陽明主卽知卽行，事上磨練，而羅念菴以下，萬王胡鄧，皆務默坐，又不聞太炎好爲默坐功。太炎惟因此諸人一語近佛，遂不問向來學術界傳統意見，卽認爲其所見皆高於陽明，豈不如當時新文化運動，只求一語近於西方，亦盡排傳統，刻意尊之。而太炎又極惡此病，則誠不知何以爲善也。

太炎又曰：

印度地處熱帶，衣食之憂非其所急。不重財產，故室廬亦無多用處。自非男女之欲，社會無甚爭端。政治一事，可有可無，故得走入清談一路而無害。中土不然，衣食居處，必賴勤力以得之，於是有生存競爭之事。團體不得不結，社會不得不立，政治不得不講。目前

之急，不在乎有我無我，乃在衣食之足不足耳。故儒家道家，但務目前之急，超出世間之理，不欲過於講論。非智識已到修養已足者，不輕爲之語也。此儒道與釋家根本雖同，而方法各異之故也。

此論似嫌浮薄。人生主要重在心，不在衣食。若謂中土人生所重應在衣食，則同時新文化運動所主西化，豈不遠勝印度之佛法乎。太炎謂莊子七篇，佛家精義俱在，其實內篇所闡，豈盡超出世間之理乎。至論政治，太炎則曰：

政治之論，老子已足。

又曰：

老子譬之大醫，醫方衆品並列，指事施用，都可療病。五千言所包亦廣矣，得其一術，卽可以君人南面矣。

又曰：

若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爲高。

是太炎果得志於政治，亦追隨老聃荀況而止耳。如儒統所爭王霸義利之辨，恐非所厝意。亦未見其於當時，能有大興起大作爲也。要之儒不如釋之一見，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當清末民初之際，學者菲薄傳統，競求一變以爲快，太炎與南海康氏，其表率也。皆無師承可言，然亦可微窺朱九江俞曲園之未嘗無其影響矣。深識之士，亦將有會於斯篇。

二六、清儒學案序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吾國家民族文化縣歷，迄五千年不弊，厥有一中心力量焉爲之潛持而默運者，則儒家思想是也。儒家思想淵源於上古，成熟於先秦。在兩漢以迄隋唐則曰經學，在宋明以迄清季則曰理學。理學之興，淺言之，若爲蔑棄漢唐而別創。深言之，則實包孕漢唐而再生。苟非漢唐諸儒補緝注疏勤懇於前，則宋明理學何所憑藉而產茁？當唐之季世，下逮五代十國，天下壞亂已極，而佛學之來東土，漢末以來，亦垂八九百年矣。爲宋人謀之，苟非有大振作，將無以起衰而救弊，開物而成務。故宋學者，實依然沿續漢唐經學精神，特因時代之激刺而一變焉者也。宋明理學之盛，人所俱曉，迄於清代，若又爲蔑棄宋明重返漢唐。故說者莫不謂清代乃理學之衰世，夷考其實，亦復不然。宋元諸儒，固未嘗有蔑棄漢唐經學之意。觀通志堂經解所收，衡量宋元諸儒研經績業，可謂蔚乎其盛矣。清代經學，亦依然沿續宋元以來，而不過切磋

琢磨之益精益純而已。理學本包孕經學爲再生，則清代乾嘉經學考據之盛，亦理學進展中應有之一節目，豈得據是而謂清代乃理學之衰世哉？大較而言，清代理學，當分四階段論之。一曰晚明諸遺老。當明之末葉，王學發展已臻頂點，東林繼起，駸駸有由王返朱之勢。晚明諸老，無南無朔，莫不有聞於東林之傳響而起者。故其爲學，或嚮朱，或嚮王，或調和折衷於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聽而並觀，博學而明辨，故其運思廣而取精宏，固已勝夫南宋以來之僅知有朱，與晚明以來之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其所躬修之踐履，有異夫宋明平世之踐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講所學，有辨之益精，可以爲理學舊公案作最後之論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於理學舊習套而別闢一嶄新之蹊徑者。不治晚明諸遺老之書，將無以知宋明理學之歸趨。觀水而未觀其瀾，終無以盡水勢之變也。其次曰順康雍。遺民不世襲，中國士大夫既不能長守晚明諸遺老之志節，而建州諸酋乃亦唱導正學以牢籠當世之人心。於是理學道統，遂與朝廷之刀鋸鼎鑊更施迭使，以爲壓束社會之利器。於斯時而自負爲正學道統者，在野如陸隴其，居鄉里爲一善人，當官職爲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則論學不免爲鄉愿，論人不免爲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往者楊園語水諸人謹守程朱渠鑊者，寧有此乎？充其極，尙不足追步許衡吳澄，而謂程朱復生，將許之爲護法之門徒，其誰信之。其轉而崇陸王者，感激乎意氣，磨蕩乎俗僞，亦異於昔之爲陸王矣。又其次曰乾嘉。理學道統之說，既不足鑒真儒而服豪傑，於是聰明才智旁迸橫軼，羣湊於經籍考訂之途。而宋明以來相傳八百年理學道統，其精光

浩氣，仍自不可掩，一時學人終亦不忍捨置而不道。故當乾嘉考據極盛之際，而理學舊公案之討究亦復起。徽歙之間，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東林傳緒，學者守先待後，尙宋尊朱之風，數世不輟。通經而篤古，博學而知服，其素所蘊蓄則然也。及戴東原起而此風始變。東原排擊宋儒，刻深有過於顏李，章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洵爲確論。然實齋思想議論，亦從東原轉手而來，蟲生於木，還食其木，此亦事態之常，無足多怪。理學本包孕經學爲再生，今徽歙間學者，久寢饋於經籍之訓詁考據間，還以視夫宋明而有所獻替，亦豈遽得自逃於宋明哉。故以乾嘉上擬晚明諸遺老，則明遺之所得在時勢之激盪，乾嘉之所得，在經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補宋明之未逮，彌縫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又其次則曰道咸同光。此際也，建州治權已腐敗不可收拾，而西力東漸，海氛日惡，學者怵於內憂外患，經籍考據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經世致用之志復切，乃相率競及於理學家言，幾幾乎若將爲有清一代理學之復興，而考其所得，則較之明遺與乾嘉皆見遜色。何者？其心意迫促，涵養浮露，既不能如晚明諸遺老之潛精抑彩，歛之有以極其深，又不能如乾嘉諸儒之優遊浸漬，涉之有以窮其廣。徒欲懸短綆而汲深井，倚弱篙而渡急湍，則宜乎其無濟也。量斯時之所至，其意氣發舒，若稍稍愈乎順康雍之慘沮鬱紆則已耳。要之有清三百年學術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不當與漢唐經學等量並擬，則昭昭無可疑者。抑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兩漢經學，亦非能蔑棄先秦百家而別創其所謂經學也，彼乃包孕先秦百家而始爲經學之新生。宋明理學，又豈僅包孕兩漢隋唐之經學而已，彼蓋並魏晉以來流布

盛大之佛學而並包之，乃始有理學之新生焉。此每轉益進之說也。兩漢博士之章句家法，自有鄭玄之括囊大典而途已窮。魏晉南北朝之義疏，自有唐初諸儒之五經正義而途亦窮。至於理學，自有考亭陽明，義蘊之闡發，亦幾乎登峯造極無餘地矣。又得晚明諸遺老之盡其變，乾嘉諸儒之糾其失，此亦途窮當變之候也。而西學東漸，其力之深廣博大，較之晚漢以來之佛學，何啻千百過之。然則繼今而變者，勢當一切包孕，盡羅衆有，始可以益進而再得其新生。明遺之所以勝乾嘉，正爲晚明諸遺老能推衍宋明而盡其變，乾嘉則意在蔑棄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轉不過爲宋明拾遺補闕。至於道咸以下，乃方拘拘焉又欲蔑棄乾嘉以復宋明，更將蔑棄陽明以復考亭，所棄愈多，斯所復愈狹，是豈足以應變而迎新哉。今世運之變，又亟於道咸，一世方激盪旋轉而開生人未有之新局，吾國家民族文化所以縣歷五千年迄今未弊者，又將重回洪爐，再經煅煉，以重成其爲衛國家福種姓之所賴。夫豈抱殘守缺，蹈常習故者之所能勝其任？且學統猶治統也。譬如諸方分峙，蜀不能并魏吳，豈足以爲魏吳之統，宋不能并金夏，豈足以爲金夏之統。夫亦各成其爲偏方之暫局而已。今既世界逮通，五洋如同堂，六洲如合宇。他日人類大同，安知治統學統不有日趨於一之勢。然而劉禪之奉表，趙構之屈膝，則終爲天地所恥鄙，不足以語此。吾國家民族獨擅五千年文化優秀傳統，回念諸聖先哲，光明燦爛，豈得不憬然動，惕然勵，而知所自負荷也乎？吾中央正值抗戰艱險之際，有意合刊宋元明清四朝學案簡編，頒之中外，其意可深長思矣。惟清儒學案，雖有唐徐兩家成書，而唐書陋狹，缺於闕通，徐書泛濫，短於裁別，皆不足追

蹤黃全之舊業。穆奉命承乏爲清儒之役，因重加編訂成若干卷，而敬述其大義於卷首。

例言

昔江藩子屏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爲紀載清代理學之開始，或譏其漢宋分編之不當，然就實論之，亦復未可厚非。義理考據，境界固屬互通，分編敘述，轉可各盡其勝。惟江書僅迄乾嘉，又詳漢略宋，殊嫌不備。嗣起者爲唐鑑鏡海之學案小識，其書專重宋學義理，而篇末亦附經學，經學之名復與漢學有別，卽宋明諸儒，豈得謂其非經學乎？唐書於黃梨洲顏習齋諸人，均入經學，則何以如顧亭林王船山諸人又獨爲道學？分類之牽強，一望可知。其編道學，又分傳道、翼道、守道諸門，更屬偏陋無當，魯一同氏評之已詳。唐書盡于道光季年，亦未窮有清一代之原委。最後有徐世昌菊人之清儒學案，全書二百八卷，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迄於清末，最爲詳備，然旨在搜羅，未見別擇，義理考據，一篇之中，錯見雜出。清儒考據之學，軼出前代遠甚，舉凡天文、曆算、地理、水道、音韻、文字、禮數、名物，凡清儒考訂之所及，徐書均加甄采而均不能窮其闡奧，如是則幾成集錦之類書，於精於博兩無取矣。昔秦蕙田氏有言，箸書所患，在既不能詳又不能略，竊謂唐書患在不能詳，徐書患在不能略也。本編所錄一以講究心性義理，沿續宋明以來理學公案者爲主，其他經籍考據，概不旁及，庶以附諸黃全兩家之後，備晚近一千年理學升降之全，此乃箸書體例所關，非由抑漢揚宋，別具門戶私見也。

梨洲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大略分之，僅得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九宗；而

於姚江復分浙中江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其崇仁白沙，爲姚江之源，止修泰州甘泉東林，爲姚江之流；不相入者，河東三原而已；若授受在九宗之外者，別爲諸儒學案統之，（此采惲子居說）此乃梨洲一書大綱領，亦卽其書宗主所在，論列明儒而專主性理，又於抉發性理中專宗陽明。其實陽明亦自爲明儒之眉目，明儒學詣亦自當以研究性理爲宗極，固非梨洲專爲自尊其一己傳統之私而然也。至宋元學案，梨洲原本僅以三十五人標案，案中小傳，兼取各派，故免疏隘之病。（此采鄭東甫說）全謝山修補而成百卷，每卷各爲一序錄，亦復備見全書宗主，故能約而不陋，詳而不蕪。至論清儒，其情勢又與宋明不同，宋明學術易尋其脈絡筋節，而清學之脈絡筋節則難尋，清學脈絡筋節之易尋者在漢學考據，而不在宋學義理。唐書傳道翼道守道之分，既不可從；徐書仍倣黃全兩家舊例，於每學案必標舉其師承傳授，以家學、弟子、交游、從游、私淑五類附案，又別出諸儒學案於其後，謂其師傳莫考，或紹述無人，以別於其他之各案，其實亦大可不必也。姑舉一例論之。如費密徐書入諸儒，然費氏之學，先得其父經虞之家教，亦復問學於孫夏峯，則非無師傳；有子錫璜，近代貫道堂集雖不傳，然章實齋文史通義固曾論列，其議論大體，亦能傳其父緒，亦非無紹述，奈何列爲諸儒？又如劉獻廷，其學真不見師傳所自，亦不見紹述之人，斷當自成一家，依徐氏例，歸之諸儒允矣，而顧附之萬斯同之下。繼莊之與季野，信爲交游，然交游未必可以相統，附劉於萬，於義何取？如此之類，不勝編摘。故編次清儒學案最難者在無統宗綱紀可標，在無派別源流可指；然因其聚則聚之，因其散則散之，正不妨人各一案，轉自肖其真象

，雖異黃全兩家之面目，實符黃全兩家之用心，何必亦顰亦趨，乃爲師法？本編竊取斯旨，每人作案，不標家派，不分主屬，至其確有家派主屬者，則固不在此限也。

清儒理學既無主峯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然亦並非謂如散沙亂草，各不相繫，無可統宗之謂也。竊謂尋前有清三百年理學大綱，莫如分爲晚明遺老，與順康雍諸儒，以及乾嘉與道咸同光之四部分。其大別已詳於篇首之總序，其各家異同，則分誌於各卷之小序。讀者由此認入，庶易得有清一代理學之派別與流變耳。

黎洲明儒學案發凡有言，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本編竊慕斯義，凡所纂錄，亦皆從各家全集鉤貫成之，務求可以透露其精神，發明其宗旨，然此特就大家巨儒言之。人之爲學，深淺廣狹不同，一言一節，時有可取，此編亦加采列。此如一邱一壑，各有風光，可以欣賞，不必名山大川，始足言遊。或以見一時之風尚，或以備多方之啓悟，義各有當，不妨兼羅並存也。讀者誠以此意求之，則本編所列諸家，一二萬言不爲多，三四百字不爲少；要在讀者之自具慧眼，自有會心也。

昔章實齋有言，爲學不可有門戶，而不可無宗主。本編取舍權衡，絕不敢存門戶之見，或漢或宋，或朱或陸，一體采摭，異同互見，見仁見智，俟之讀者。惟漢學而專爲考據者不錄。朱陸而各務謾罵者亦不錄。斯道之在斯世，本如日月光明，人所共覩，亦有語自圓正，而落格套近空

洞者亦不錄。又如全謝山所譏，其書雖純乎經，而其人則純乎緯者亦不錄。亦有其人確乎醇儒，言行無疵累，堪爲後世矜式，而本編亦多棄置；此則限於篇幅，與其人人備列，而人人省略，不如詳其一二，使可爲親。此如人之親師取友，豈得遍天下之名師益友而遍師遍友之？凡欲遍謁天下名師，遍交天下益友者，此必不名一師，不擇一友之人也。若讀者以爭論從祀聖廟之意見責備本編，則疏漏之罪，所不敢辭。

亦有其人本非理學名家，其立言陳義，亦若有偏駁，而本編頗加采錄者。誠以斯道之在天地，雖曰終古而如常，亦當與時而俱新，自非聖人復生，誰能語大道之恆常，而得免於蹈襲之嫌？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語有切己切時，從身世感觸，真心流露者，此皆一曲之誠，能推其一曲，卽通乎大方矣。梨洲所謂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是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斯道廣矣大矣。學之有深淺，體之有純駁，然苟內能切己，外能切時，致曲有誠，出言自衷，斯亦已矣。守門戶者往往以道統門戶之空論，高自位置，睥睨一切；亦有純藉一己之體會而評置古今之學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由一隙爲私窺，孰若與各方爲共覩？本編於所錄各家，概不再加批註按語，庶免以指點而限視聽，在己可避專輒之嫌，在人可廣聰明之用，梨洲風光狼藉之憾，此編轉可或免也。

謝山宋元學案，有附錄一項。李蘅客極稱之，謂其剪裁尤具苦心，或參互以見其人，或節取以存其概，使純疵不掩，本末咸賅。徐氏清儒學案，亦有附錄。此編依之。昔亭林淹雅，而二曲

誠其驚外；梨洲閎通，而楊園譏其近名。若二先生之艱苦篤實，庸德庸行，尤足師表末世，采摭較詳，亦寓風世之微意焉。

本編纂錄，正值國難，覓書匪易，又期日迫促，疏誤必多，斟酌盡善，俟諸異日。

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本編取材各別，不相踵沓，而義旨互足，讀者幸賜兼觀。

序錄

夏峯梨洲二曲學脉同出陽明，清初稱三大儒；而夏峯之學，流行尤遠。弟子著者有王餘佑介祺，魏一鰲蓮陸，耿極誠齋，薛鳳祚儀甫，申涵光鳧盟，趙御衆寬夫，湯斌潛庵諸人。其一時交游，刁包魏裔介魏象樞張沐杜越許三禮之徒，亦如衆星之拱北斗，羣山之仰喬嶽也。稍後顏習齋崛起博野，得交蘇門弟子王五修王介祺，蓋有聞於夏峯之規模而興者。其爲學門徑亦略相似。夏峯誠不媿當時北學之冠冕。明儒學案已收之諸儒下卷，徐氏謂蘇門講學時入清初，取靖節晉宋兩傳之例，以弁清儒，茲本其義。述夏峯學案第一。

梨洲師事劉蕺山，平生以捍衛姚江自任，而於王學末流亦痛斥至嚴，蓋屹然王學之干城也。然梨洲之學已從性理一轉手，博綜經史，務爲廣大。南雷弟子最著者，莫如萬氏兄弟，皆寢寢乎專攻經史，畢精著述，蓋與晚明講堂語錄之爲學迥以別矣。梨洲正其繼往開來之人也。述梨洲學案第二。

楊園踐履，篤實明粹，亦清初之吳康齋也，而身當易世，痛切明夷，其貞晦之操，深潛之

節，尤爲過之。交游有海鹽何商隱，烏程凌渝安，歸安沈石長，嘉湖之間稱四先生，而楊園深遠矣。平生懲講學標榜之風，務自謙抑，請業奉教者雖不絕，而受贄著籍者寥寥，惟吳江張嘉玲佩葱姚瑚蟄庵桐鄉顏鼎受孝嘉石門姚夏大也數人。晚年與石門呂晚村交好。平湖陸隴其，因晚村而知楊園，讀其遺書而推之。清廷旣以隴其從祀孔廟，遂及楊園，後人乃每以清獻楊園並舉，目爲一代儒學正宗，實非楊園之所願也。述楊園學案第三。

清初學者，多主調和朱王，折衷宋明。其著者，北方有夏峯，南方有桴亭，桴亭之論明儒，尤爲後人所稱。至其究心六藝，實關學術之新嚮。顏習齋聞聲想慕，引爲同調；而其弟子李恕谷南遊，得讀桴亭書，返告其師，欲以心性存養補師門事物經濟之不逮，此可以見桴亭學術之恢張與平稱焉。同時有陳瑚確菴，盛敬聖傳，江士韶樂園，與桴亭爲切劘之友，皆籍太倉，所謂婁東之學是也。桴亭弟子著籍，亦多太倉人，西及江陰武進，而其傳不著。六藝之學，終不光昌，南北一例，是可慨也。述桴亭學案第四。

亭林推爲清代開國儒宗。其學實事求是，務爲經世致用，日知錄一書規模尤闊。後之學者，各因其一端而申之，皆成專業。惟亭林猶得晚明講學遺緒，故其書亦尙兢兢以世道人心爲主，論學論治皆推本焉；不似後人專務博雅考訂，此亭林之所爲卓絕也。平生深惡明季招門徒立名譽之習，故其門牆甚峻，著籍者罕，傳學著者僅潘次耕一人。而交游特廣，崑山歸莊玄恭，吳江吳炎赤溟，潘耒章力田，朱鶴齡長孺，皆少日鄉里之遊。及其渡江而北，足跡遍天下，遂盡識

其賢豪長者，若李顥二曲，張爾岐蒿庵，傅山青主，吳任臣志伊，張弢力臣，王宏撰山史，李因篤天生，馬驪宛斯，路澤農安卿，汪琬茗文，王錫闡曉庵，以及朱彝尊竹垞，楊瑀雪臣，閻若璩潛邱之徒，凡當世知名士，亭林無不奉手納交，通聞論業，曲證旁推，兼集衆長，宜乎其學之益臻於大也。述亭林學案第五。

船山梨洲亭林，於晚清號明末三大儒，而船山之學尤爲治新學讀西方哲家書者所喜稱，以其探求宇宙本末，分析心理精微，路徑略相似也。船山父修侯，少從遊伍學父之門，又問道於鄒泗山，蓋遠承東廓之傳。故船山之學，長於抉剔心隱，洞人肺腑，其精神血脈，略近江右王門，而於東廓念菴尤似。再復於此轉手，得北宋橫渠正蒙之神契，故亦善言道氣陰陽宇宙之變。其論心術而會於佛，則旁治八識。其論宇宙而會於道，則兼探圖緯，浸深涵廣，滙爲大觀。惜身後湮沒不彰，直至晚清始顯。述船山學案第六。

石莊先世累代講義理之學，及其身，以勝國遺貞，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韜晦之深，過於船山。遺書垂二百年而始傳，自擬爲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之流，而論者謂其廣大精微猶過之。清代鄂學稍微，石莊特爲一大家。述石莊學案第七。

清初江西言理學者有程山髻山易堂諸子，皆明遺民也。易堂聲氣特盛，寧都三魏競爽，叔子爲之魁。氣節文章志在經世，交游著者有南昌彭士望躬菴，林時益確齋，寧都邱維屏邦士，所謂易堂九子是也。而星子宋之盛未有，與其邑人同隱講學，稱髻山七隱。其學以識仁爲要，微言奧

義，頗雜老佛。程山最醇亦最細，尚不失宋明矩矱。晚年築尊雒堂，其學一以程朱爲歸，而所得於陽明者實深。其辨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可謂窮前人所未窮。江右本王學精神所在，程山實其薪傳矣。程山弟子甚衆，高弟皆在南豐，稱程山六君子。述程山學案第八。

昔北宋橫渠張子，崛起關中，開門授徒，與洛學分庭抗禮，馮少墟關學編遂以託始。有明一代關中大儒，若王恕石渠，呂柟涇野，馮從吾少墟，皆恪守程朱，而渭南南大吉瑞泉兄弟則純主姚江，師說各有不同。二曲論學雖主陸王，然亦兼取程朱，遂爲清初關學大師。門下執贄著籍號以千計。弟子最著者曰鄆縣王心敬爾緝，號豐川，其他如李天生因篤，王山史宏撰，皆爲交游，足徵一時關學之盛。述二曲學案第九。

晚明兵燹，河朔殘破特甚，一時豪傑之士，若容城孫奇逢啓泰，祈州刁包蒙古，皆習齋書中所謂忠孝恬退之君子，豪邁英爽之俊傑，是爲吾儒一線之真脈者。此自當時河朔學風之大同，雖習齋莫能外。惟習齋制行雖近孫刁，而立論頗多創闢，其氣益厲，其辭益激，排擊宋明，別開生面。而其注重六藝兵農，則又與同時婁東之學，南北相呼應焉。弟子最著者曰李塏王源。述習齋學案第十。

江浙自晚明夙爲人文淵藪，學術久而必變，疑辨之風，漸已萌茁。其著者如乾初之疑大學，爲當時理學界一絕大公案。乾初亦出蕺山門下，而論學則具隻眼，與同門如楊園梨洲諸人皆不合。同時有慈谿潘平格用微，不喜中庸，於朱陸皆昌言排擊，梨洲與之辨難尤苦。此皆可見當時

理學界轉變之風嚮。稍後有休寧姚際恒立方，疑古文尙書，疑小戴禮，作九經通論，又徧疑古今僞書，而深以未見乾初大學辨爲憾。其爲恒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則議論與北方顏李合轍矣。述乾初學案第十一。

晚明考覈之風，已南北俱盛，惟南士頗多疑辨，而北人則尙綜整。蒿菴隱居績學，爲清初山左第一醇儒。而精擘禮經，墨守高密，最爲亭林所推服。其時亭林方唱經學卽理學之說，頗厭心性空談，蒿菴貽書獻難，尤見卓識。蒿菴交游有長山劉孔懷果菴，亦長考覈。述蒿菴學案第十二。

鼎革之際，浙有隱君子一人焉，曰應潛齋，拔起於明季社事文學之中，卓然有以自得。論學於陽明多糾纏，而於朱子亦不盡合，蓋其自得者然也。交游有仁和沈昀朗思，徐介狷石，皆貞確潛德隱君子也。述潛齋學案第十三。

晚明兵燹，蜀中所罹尤慘酷，宜其學者談思所及，常有餘痛，而激宕所至，亦與河北顏李如合符節，若新繁費氏其著也。燕峯曾從遊蘇門，並交李恕谷，序其大學辨業。述燕峯學案第十四。

（以上第一編）

潛菴夏峯弟子，爲政以清節稱，清初數儒臣者必及焉，然與晚明諸遺老志節鏗然者異矣。一時從遊有柘城竇克勤敏修，鞏縣姚爾申岳生，而上蔡張沐仲誠，登封耿介逸菴，皆與夏峯潛菴交遊，亦皆出仕清廷，此清初洛學之大宗也。述潛菴學案第十五。

清初王學尙盛，夏峯梨洲，壇坫門牆，南北相望。獨石門呂留良晚村，納交於楊園，關王尊

朱，不遺餘力。其批選四書時文，不脛走天下，而晚村亦抗志不出，並時時寄其種姓文物之感，謂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傳。稼書聞其說而悅之，獨不能守節勿仕，嘗遺書晚村曰，吾與君不同者止出處耳。其後晚村既死，猶以湖南曾靜之獄全家遇禍，而稼書之學，遂爲清廷所尊，首得從祀孔廟，自是朝官講學，必奉程朱爲準，而稼書粹然稱醇儒。然稼書論學，門戶之見過甚，並時學者已不滿，湯潛庵貽書諍之，稼書亦不能改也。同時大興張烈武承，著王學質疑，攻陽明最烈，稼書引爲同志，極稱其書。錢塘沈近思闇齋，出孝感熊賜履之門，熊亦朝臣尊朱者，而闇齋尤篤信稼書，輯其遺書，爲之傳法焉。述稼書學案第十六。

西河與張武承同在明史館，憤於武承王學質疑之偏激，而爲折容辨學文，既以申王，力尊古本大學，而排詆朱子益甚。章實齋謂其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然後之治考證者深推之，阮文達謂西河經說，學者不可不亟讀。而凌次仲氏則謂西河之於經，如藥中大黃，以之攻去積穢固不可少，而誤用之亦中其毒，顧亦稱其四書改錯，爲有功聖學。說者謂自西河以下，人始不敢以空言說經。其人其學雖未醇，要亦當時一大家也。述西河學案第十七。

習齋之學，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變。恕谷遨遊南北，問樂於毛西河，問禮於萬季野，雖一遵習齋六藝之旨，而內慕南士博辨之風，不能如習齋之卓立。平生交遊甚廣，有武進惲鶴生皋聞，上元程廷祚縣莊，皆因恕谷而信習齋之學，顏學之流衍南方由是始。述恕谷學案第十八。

園亭其先亦蜀人，而厲吳，與魏叔子潘次耕顧景范王崑繩梅文鼎交游，其學頗特出，亦由往來於數子者之間耳。述圃亭學案第十九。

繼莊生平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昉滋創共學山居，衍高忠憲之遺緒，躬菴則易堂講友，治學宗陽明念菴，而以致用爲歸者也。則繼莊平日之所存亦可知，而復遊徐乾學之門，南北宿老，爭趨競赴，又多藏書，繼莊之學遂益恢張無涯畔，然全謝山推其用心是也。述繼莊學案第二十。

南昉父一菴，初好佛，又喜道家言，年六十餘，始得梁谿高顧書而潛心焉，號爲一宗程朱。至南昉則釋毀密證兩錄顯袒姚江矣。至其曾孫尺木，則復由儒而釋矣。然彭氏門庭鼎貴，世爲三吳望族，其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亦其學風之漸被爲家風者則然也。述南昉學案第二十一。

餘姚沈國模求如，明季諸生，嘗與蕺山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邑人史孝咸子虛，孝復子復，管宗聖霞標，實共從事。其先卽錢緒山講學之故址也。是謂餘姚四先生。越後有韓孔當仁父，山陰王朝式金如，皆國模弟子，又合稱六先生。又有邵曾可子唯，師事史孝咸，而劉門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姚江之與證人，亦明季浙中講學兩大結合也。念魯，曾可孫，幼時猶及聞國模之講會，長師孔當。毛西河亦主書院講席，念魯列門牆稱弟子焉。念魯於毛氏深推敬，厥後毛氏不爲浙人所喜，而章實齋表章思復堂集甚至。述念魯學案第二十二。

餘山自奮隴畝之中，名立而教成，剛毅篤實君子人也。弟子錢塘桑調元弢甫，仁和盧存心玉巖。玉巖之子文弢抱經爲經師。私淑有仁和沈廷芳椒園，而弢甫弟子有秀水盛世佐庸三，錢載鐸石，風流所被廣矣。述餘山學案第二十三。

清初中州諸儒多奉夏峯爲依歸，至孝先始專宗程朱，一遵平湖陸氏之說，遂以理學而兼名臣，纂輯宣揚，厥功甚偉。康熙理學之有張孝先，一猶乾嘉經學之有阮芸臺也，弟子以漳浦蔡世遠聞之爲最著。述孝先學案第二十四。

凝齋之學出於安溪李光地晉卿。康熙朝盛獎儒學，孝感安谿實左右之，皆號爲恪奉程朱。而光地旁及厓算樂律音韻，皆爲清帝所契許。又能以慎密固寵，清帝嘗曰，知光地莫若朕，知朕莫若光地，其信任如此。出其門下者有中牟冉覲祖永光，湘潭陳鵬年北溟，漳浦蔡世遠聞之，而凝齋尤閭然躬修，程魚門以之比潛菴稼書，稱爲國朝三大儒，異乎光地之經其書而緯其行者矣，又豈止能補師說所未及而已哉。述凝齋學案第二十五。

自朱陸有異同之論，而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遂爲理學一大公案。辨之最力者爲東莞陳建之學菴通辨，其書極爲清儒所稱。自宛平孫承澤有考正晚年定論，而柏鄉魏裔介，孝感熊賜履，大興張烈承之。然皆逞意氣，爭門戶。最後有寶應王懋竑白田，爲朱子年譜，始確然學人之言，較之陳建以下，超出遠矣。止泉與白田同邑交游，而論學不相合。頗與顧昀滋往還，又親至共學山居，蓋有得於高忠憲之遺旨，所契視白田爲深，惟一顯一晦。其朱子聖學考略流傳未廣，摘其文

集。述止泉學案第二十六。

康熙中葉，朝野皆尊朱學，有激而樹異幟者，穆堂也。穆堂同時交友有南昌萬承蒼孺廬，鄞縣全祖望謝山，二人者頗能糾穆堂之偏，而謝山他日之成就，蓋亦自穆堂啓之。又有全州謝濟世梅莊，爲學不遵程朱，然亦并斥陸王，與謝山同時得罪。此又學術風氣將變之徵。述穆堂學案第二十七。（以上第二編）

清初東林之學，高忠憲從子世泰彙旃實主之，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業，凡三十餘年。鉅儒如李二曲陸桴亭張清恪皆嘗至會，祈州刁蒙吉尤往復論學，有南梁北祁之稱。而休寧汪琬默菴，施璜誠齋，歙縣吳曰慎微仲，及汪學聖，陳二典，胡淵，汪佑，朱弘之徒，先後游世泰門，相次問學。時新安有紫陽還古兩書院，皆自東林上探朱子。流風不沫，其後遂有婺源江永慎修，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治漢學者奉爲先河。慎修之學，一傳爲休寧戴氏，再傳爲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經學遂較惠氏尤爲光大。然其淵源實本紫陽，則不可誣也。雙池與慎修同時同鄉，而生平未嘗相見。其學涵泳六經，博通禮樂，亦恪守朱子家法，與慎修同中有異，乃顯晦迥殊。其弟子有婺源余元遴藥齋，又洪騰蛟鱗雨稱私淑。藥齋孫龍光黼山，亦能傳其家學。述雙池學案第二十八。

雍乾之際，風氣已變，理學漸衰，經學漸盛，榕門起自偏陬，治學猶循舊轍，居官蒞政，粹然儒者，堪與湯潛菴張孝先後先媲美。述榕門學案第二十九。

閩學自安溪梁村，皆宗朱子。翠庭受業於梁村，閩嶠後進，多依歸焉。述翠庭學案第三十。

關學自李二曲同時，有朝邑王建常仲復，閉戶窮經數十年，與二曲東西並峙。而恪守洛閩，秦士或莫之知也。蘿谷師康百藥，又與王豐川交游，康王皆二曲門人，而蘿谷獨信好復齋。所撰開知錄，三原賀瑞麟角生亟稱之，是可謂關學之中權矣。述蘿谷學案第三十一。

魯人之學，自蒿菴以下，久無嗣響。值三吳徽歙，經學考據之風既盛，乃仍有循舊躅，守故轍，墨守平湖陸氏作尊朱非陸之辨者，公復亦其一人。同時先後山陽有任瑗東澗，昌樂有閻循觀懷庭，皆篤守洛閩，惟膠州法坤宏鏡野，亦與公復懷庭游，而爲說出入姚江云。述公復學案第三十二。

章實齋謂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蓋其爲學重根柢，尙志節，心性爲體，經史爲用，自南雷開先，二萬繼之，謝山又繼之，風氣驟延，數百年弗替。而謝山宋元學案一書，亦足與梨洲明儒學案後先爭美。述謝山學案第三十三。

東原爲慎修高弟，惟慎修不菲薄紫陽，而東原則盛肆詆呵。治程朱者多斥陸雜禪，東原則並以雜禪譏程朱，其立說乃頗與清初河北顏李及浙人陳乾初潘用微之說相符合，是亦可謂卓然成一家言者。東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故著弟子籍者不多，能傳學者爲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石臞，曲阜孔廣森巽軒。然皆傳其經學考據，義理之蘊所不談焉。惟歙縣洪榜初堂，生平服膺東原，謂其孟子字義一書，功不在禹下也。述東原學案第三十四。

易疇與東原同學於江慎修，東原自謂說經遜其精密，而論學小記所述性命誠敬之學，亦復不

實明粹，所指有超東原之上者，惟不能如東原之才氣縱橫耳。述易疇學案第三十五。

二氏之學，吳人耽之其深，惠氏經學喜涉讖緯，亦其變也。大紳落落，蹊徑獨闢，孤往絕衆。其書調停二氏，進退百家。原本心術，而思以用世，自謂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又謂讀吾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其自負如此。此在吳中學者洵爲矯矯特出矣。從之遊者有常熟程在仁。述大紳學案第三十六。

尺木世家子，既承其家學，有志建樹，不得意乃一逃於禪，又治金石碑版以自怡。同時瑞金羅有高臺山，不得志於功名，亦逃於禪，與尺木大紳在仁諸子相往還。尺木考求文獻，臺山篤志訓詁，在仁精熟史乘，皆非耽溺寂滅，甘心忘世。身當太平盛運，一切蹈常襲故，聰明意氣無所舒，則暫而湊於此。時尙有薛起鳳家三，亦逃於佛。江沅鐵君從尺木遊，其佛學傳之仁和龔自珍定菴，清季士大夫學佛之風漸盛自是始。述尺木學案第三十七。

方惠戴之學，盛行吳皖，而嘉定錢大昕竹汀，崛起婁東，其學無所不擅，而尤邃於史，一門羣從互爲師友，學術之盛，照映當代。然竹汀持論大體，頗亦鄙薄宋儒，不能出東原之範圍。東原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也。餘姚邵晉涵二雲繼之，亦以史學名家，而宗仰其鄉先生陽明念臺梨洲之遺風，故雖通漢詁而宗主仍在宋學。然明而未融，不足以開壁壘而張一軍。實齋與二雲交好，有通識能持論，乃始以浙東史學自負。其於東原，不啻欲爲楚漢之割鴻溝。嘗謂東原學術實自朱子，其在清代則爲亭林浙西之學。梨洲出於浙

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劉王，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流長。又謂顧氏宗朱，黃氏宗陸，浙東貴專家，浙西貴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然實齋持論雖高，乃欲以周公下掩孔子，尊政事而薄心性，則亦稍異夫浙東之傳統矣。實齋在當時，頗見闐寂，身後數十年，學者始相翕然。述實齋學案第三十八。

當乾嘉漢學極盛之際，理學既衰歇，而始有以古文爲程朱干城者曰桐城派。其學託始於方苞望溪，至姚鼐姬傳，標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爲宗旨。一時徒眾稱盛。其弟子方東樹植之，著漢學商兌，漢宋門戶之爭乃益顯。桐城古文之學又流行而至陽湖。陽湖治古文者，推張惠言皋文，惲敬子居，然皆不囿於桐城。皋文長於經，子居精於子。時同郡多秀，如孫星衍淵如，洪亮吉稚存，皆以詞章傑才進臻樸學。而治經掣古，相尙不涉宋以後書。蓋其趨嚮近乎惠錢，皋文經尙專家，亦近惠氏，惟子居鋒鋷，頗能於漢學致譏刺焉。述子居學案第三十九。

三吳學人多出世家，而徽歙之間則頗業行賈，吳徽仲汪默菴汪雙池皆是也。故其學翔實，旁通於藝，而近禮家。次仲拔起市販之間，禮學專門，亦精樂律，不失其鄉先輩之遺風。能持論，一本東原而推之愈遠，則不免於偏陷。述次仲學案第四十。

漢學之稱始於三吳惠氏，然其楹帖曰六經尊服鄭，百行師程朱，是尊漢尙不詆宋。甘泉江藩鄭堂，受學於惠氏弟子元和江聲艮庭，長洲余蕭客仲林，而爲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亦不於漢宋分軒輊。東原乃始一義理於經訓，雖本顧亭林氏經學卽理學之說，然其排詆宋儒，則雖其後學

不敢效也。故東原既卒，其弟子段王傳其小學，巽軒傳其測算，興化任大椿幼植傳其典章制度，而義理之學無傳者。獨凌次仲以私淑而推極東原之意，往往偏至。里堂與鄭堂同邑，一時有二堂之目。說經精粹，而言義理亦本東原，然較次仲爲深篤矣。後世以戴焦並稱，非無由也。述里堂學案第四十一。

芸臺里堂同里同學，然芸臺早躋通顯，敷歷中外，所至提唱經學，爲萬流所傾仰。而其所自得者亦精卓，其持論則與次仲伯仲之間，未逮里堂之醇正。其教澤傳衍浙粵，詁經精舍學海堂諸生，皆親受裁成，人才蔚起。而如高郵王引之伯申，歸安姚文田秋農，陽湖張惠言皋文，閩縣陳壽祺恭甫，德清許宗彥積卿，雖係科舉受知，然多相從講學，可以徵一時學術風會之大趨焉。述芸臺學案第四十二。（以上第三編）

經學考據莫盛於乾隆，嘉道以下，則義理心性之說復張。鏡塘以澹定之姿，生平未嘗著書，燕處京邑，而諸名士帖然出其下。仁和龔自珍定菴，於時少所許可，獨心折先生，至不敢道其字，稱曰姚歸安，可以見矣。述鏡塘學案第四十三。

誨叔姿性卓犖，遨遊數萬里，顧獨與鏡塘講爲寡過之學而終身焉。或曰誨叔自交鏡塘，變化氣質，由狂返狷，而平實未逮。或曰，誨叔規模宏遠，足濟鏡塘所不及。其遊京師，上自公卿，下至婦孺，莫不知有潘先生也。述誨叔學案第四十四。

湖湘之間，船山而後，士多潛修，康熙間有善化李文炤恒齋，一時同遊，皆恪守程朱，而名

行未顯。鏡海繼起，適當吳皖經學盛極轉衰，京朝學者翕然歸之。述鏡海學案第四十五。

清代之盛，萃於揚州，而其衰象亦至揚州見之。鹽漕之病，吏胥之蠹，莫不於是乎而著，乃有經世之學，起於淮揚江皖之交，涇縣包世臣慎伯，荆溪周濟保緒，其著也。四農獨以爲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卽陷功利。乃闡然爲懲忿窒欲之學，立身教世，清明醇粹，蓋能主經世而復返之宋儒之軌轍者。其弟子有清河吳昆田稼軒，孔繼鑠有函，漢陽葉名澧潤臣。述四農學案第四十六。

嘉道以來，學者自漢返宋，遂有鄭君朱子並尊之論，倣居實導成之。其中戴氏性理諸義，分析透闢，初堂次仲所未逮也。子以周，從子以恭，孫家岱，俱能傳業，東南稱經師者必首舉黃氏焉。述倣居學案第四十七。

心伯父鑾朗齋，官徽州訓導，居朱子之鄉，已以誦法程朱爲唱。心伯承家學，又自爲婺源教諭十八年，當經學考據之盛，兼采漢宋，而以發明紫陽爲幟志，其所獲有足正清瀾白田之缺失者。一門兄弟，自相師友，心伯長於經，季燮謙甫長於史，仲炯卯生能言政事，而抨擊乾嘉有過甚者。述心伯學案第四十八。

乾嘉之際，平湖有蔣大始，慕其鄉先輩陸清獻之學，謹守程朱。著人範一書，未行於世。生齋繼起，亦一依正學舊矩，於當時江浙經生博雅考訂之業，悠然若無足動其意。其子寅甫，及冠而卒，亦有志向，並附見焉。述生齋學案第四十九。

咸同以來，理學之風日盛，竹如官京朝，與蒙古倭仁艮峯，河南李棠階強齋，稱清代中興儒臣，而竹如篤信恪守，剖辨儒釋，所得爲細。卽薛文清陸桴亭之書，有毫釐必析者。述竹如學案第五十。

強齋與竹如同朝，而所學成於堅苦，兼采衆說，自求心得，不分門戶，有足美焉。清代中州鉅儒輩起，強齋爲之後勁。述強齋學案第五十一。

當乾隆期，武進莊存與方耕，於六經皆有撰述，而不漢不宋，自爲一派。其猶子述祖葆琛，及外孫同邑劉逢祿申受，長洲宋翔鳳于庭，推衍穿鑿，益廣益深，所謂常州之學是也。龔魏說經皆本常州，定菴言古史源自實齋，默深言時務經世，則發自善化賀長齡耦庚。述默深學案第五十二。

通甫文字交游，盡一時知名士，而清修篤學，獨重山陽潘四農，誼在師友之間，相契莫逆。曾文正至淮安，數屏騶從，就問天下事。述通甫學案第五十三。

湘中自唐鏡海講學，學者無不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飢窮刻厲，意氣益奮，以醇儒爲名將，一時部曲多出講學生徒，雖事功未竟，亦足彰儒生之實效矣。述羅山學案第五十四。

粵東自阮文達建學海堂，學者競起，然多從事漢學考訂，九江獨超然門戶之外，有志宋人遺緒，崇氣節，尙躬行，經史並業，志在經世，規模闊闊，足以開一方之風氣焉。弟子著者有順德簡朝亮竹居南海康有爲長素。述九江學案第五十五。

東塾之學兼宗鄭君朱子，意在通漢宋之郵，而於清代尤尊亭林，嘗謂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當專明學術而待效於數十年之後。故其書醇正篤實，爲求速化期急效者所畏。弟子著者南海桂文燦子白，廖廷相澤羣，則皆經學舊轍也。交游有象州鄭獻甫小谷，東塾擬之王符仲長統之流。述東塾學案第五十六。

滌生之學，文章宗桐城姚氏，訓詁尊高郵王氏，經學考據師崑山顧氏，金匱秦氏，窮蹟擷精，海涵地負。其在京朝，常從唐鏡海倭良峯吳竹如諸人遊。然不拘拘爲講學家言。嘗自謂欲以禹墨爲體，老莊爲用，雖非從容中道，亦庶幾矣。誠近世間出一偉儒也。述滌生學案第五十七。

筠仙始宗朱子，治宋學，既乃轉而致力於考據訓詁，於晚清經師中，卓然成一家。而於宋以來士大夫議論虛矯誇張，不求實用，尤慨乎言之。其爲學塗轍，憂憂獨造，如其爲人。述筠仙學案第五十八。

霞仙與滌生仲嶽交游最密，平昔相與講貫磨礪者甚勤且至。獨於晚年得養晦家居，抽身世外，讀其思辨錄疑義，知所得者邃矣。述霞仙學案第五十九。

融齋性靜情逸，與倭良峯以操尙相友，而論學兼取朱陸，不尙門戶。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四年，論者謂其有胡安定之風。述融齋學案第六十。

倣季少承家學，並尊鄭君朱子，欲以禮學代理學，卽以禮學代經學，以泯漢宋之爭。禮書通故體大思精，蓋遠承浙東經制遺意，而近紹之於徽歙之學者。述倣季學案第六十一。

清季歐風東漸，政治學術，皆有新舊交爭之象。香濤以封疆大吏所至興學，教澤之宏，或以上擬阮芸臺，而時會之艱千百過之。其人之功罪是非，雖在身後，未有定評，然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亦爲輓近學界爭論一公案，幾於亭林之經學卽理學焉，是亦未可存而勿論。述香濤學案第六十二。

清季士大夫恫於內憂外患，羣知非考據詞章之學所能挽，乃相率思以經世厲天下。古愚承數百年關學傳統，聞風奮發，本陽明良知之教，通之經術，見之時務，欲使官吏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講學數十年，門弟子千數百人，是亦不當僅以關學限者。述古愚學案第六十三。

魯人尙樸學者，嘉道間有棲霞郝懿行蘭皋，安邱王筠貫山，其後繼起則鮮。東甫精研諸經，尤篤於春秋三傳，所論猶循乾嘉遺轍而獨有意於前哲微意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惜享年不永，所欲著書多未就。同時交游如榮城孫葆田佩南，膠州柯劭忞鳳孫，皆博究羣籍，學有本原，實山左諸儒之後勁也。述東甫學案第六十四。（以上第四編）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一)

書名	作者	類別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錢穆	國學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穆	國學
中西兩百位哲學家	鄒黎 昆建 如球	哲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	吳森	哲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二)	吳森	哲學
文化哲學講錄(一)	鄒 昆 如	哲學
哲學淺論	張 康 譯	哲學
哲學十大問題	鄒 昆 如	哲學
孔學漫談	余 家 如	中國哲學
中庸誠的哲學	吳 怡	中國哲學
哲學演講錄	吳 怡	中國哲學
墨家的哲學方法	鐘 友 聯	中國哲學
韓非子哲學	王 邦 雄	中國哲學
墨家哲學	蔡 仁 厚	中國哲學
希臘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洋哲學
中世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洋哲學
近代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洋哲學
現代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洋哲學
佛學研究	周 中 一	佛學
佛學論著	周 中 一	佛學
禪話語	周 中 一	佛學
公案疑禪不懼	吳 洪 怡	佛教
文化與教育叢談	錢 上 官 業 穆 佑	教育
印度文化十八篇	錢 上 官 業 穆 佑	教育
清代文化十八篇	劉 兆 瑣	社會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二)

書名	作者	類	別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穆	社	會
國家論	薩孟武譯	社	會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	社	會
財經文存	王作榮	經	濟
財經時論	楊道淮	經	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政	治
憲法論	林紀東	法	律
黃帝物叢	錢穆	歷	史
歷史與人論	吳相湘	歷	史
歷史與文化論	錢穆	歷	史
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	史	學
中國文字學	潘重規	語	言
中國聲韻學	潘重規	語	言
中國學與音律	謝雲飛	語	言
還鄉夢的幻滅	賴明	文	學
葫蘆地之歌	鄭大	文	學
青島在臺灣的拓墾	葉貞	文	學
比較文學的壑	葉洪	文	學
比較神話到文學	葉添	文	學
從比較神話到文學	葉添	文	學
牧場的憶生	張媛	文	學
萍踪與生活	賴景	文	學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琦君	文	學
文開隨筆	王潤	文	學
文開隨筆	廉文	文	學
知野草詞賞集	陳鼎	文	學
野現散文欣	章瀚	文	學
藍天白雲集	鄭明	文	學
	梁容	文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三)

書名	作者	類別
寫作是藝術	張秀亞	文學
孟武自選文集	薩孟武	文學
歷史圈外	朱桂	文學
小說創作論	羅盤	文學
往日旋律	幼柏	文學
現實的探索	陳銘礪編	文學
金排附鷹	鍾延豪	文學
放	吳錦發	文學
黃巢殺人八百萬	宋澤萊	文學
燈下燈	蕭蕭	文學
陽關千唱	陳煌	文學
種籽	向陽	文學
泥土的香味	彭瑞金	文學
無緣廟	陳艷秋	文學
鄉事	林清玄	文學
韓非子析論	謝雲飛	中國文學
陶淵明評論	李辰冬	中國文學
文學新論	李辰冬	中國文學
離騷九歌九章淺釋	繆天華	中國文學
累廬聲氣集	姜超嶽	中國文學
茗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	王宗樂	中國文學
杜甫作品繫年	李辰冬	中國文學
元曲六大名家	李應王裕忠	中國文學
林下生涯	姜超嶽	中國文學
詩經研讀指導	裴普賢	中國文學
莊子及其文學	黃錦鉉	中國文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四）

書名	作者	類別
清真詞研究	王支洪	中國文學
宋儒風範	董金裕	中國文學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羅盤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鑑賞舉隅	黃許慶家萱	中國文學
浮士德研究	李辰冬譯	西洋文學
蘇忍尼辛選集	劉安雲譯	西洋文學
文學欣賞的靈魂	劉述先	西洋文學
音樂人生	黃友棣	音樂
音樂與我	趙琴	音樂
爐邊閒話	李抱忱	音樂
琴臺碎語	黃友棣	音樂
音樂隨筆	趙琴	音樂
音樂林華露	黃友棣	音樂
樂谷鳴泉	黃友棣	音樂
水彩技巧與創作	劉其偉	美術
繪畫隨筆	陳景容	美術
都市計劃概論	王紀鯤	建築
建築設計方法	陳政雄	建築
建築基本畫	陳楊榮麗美黛	建築
中國的建築藝術	張紹載	建築
現代工藝概論	張長傑	雕刻
藤竹工	張長傑	雕刻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趙如琳	戲劇
戲劇編寫法	方寸	戲劇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生。民元卽在鄉村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至大學。曾任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西南聯大齊魯華西川大江南大學各校教職。大陸陷匪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民國五十六年，來臺定居。

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大綱、史記地名考。有關子部者，有孔子傳、論語新解、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關集部者，有理學六家詩鈔。其他不勝縷舉。

